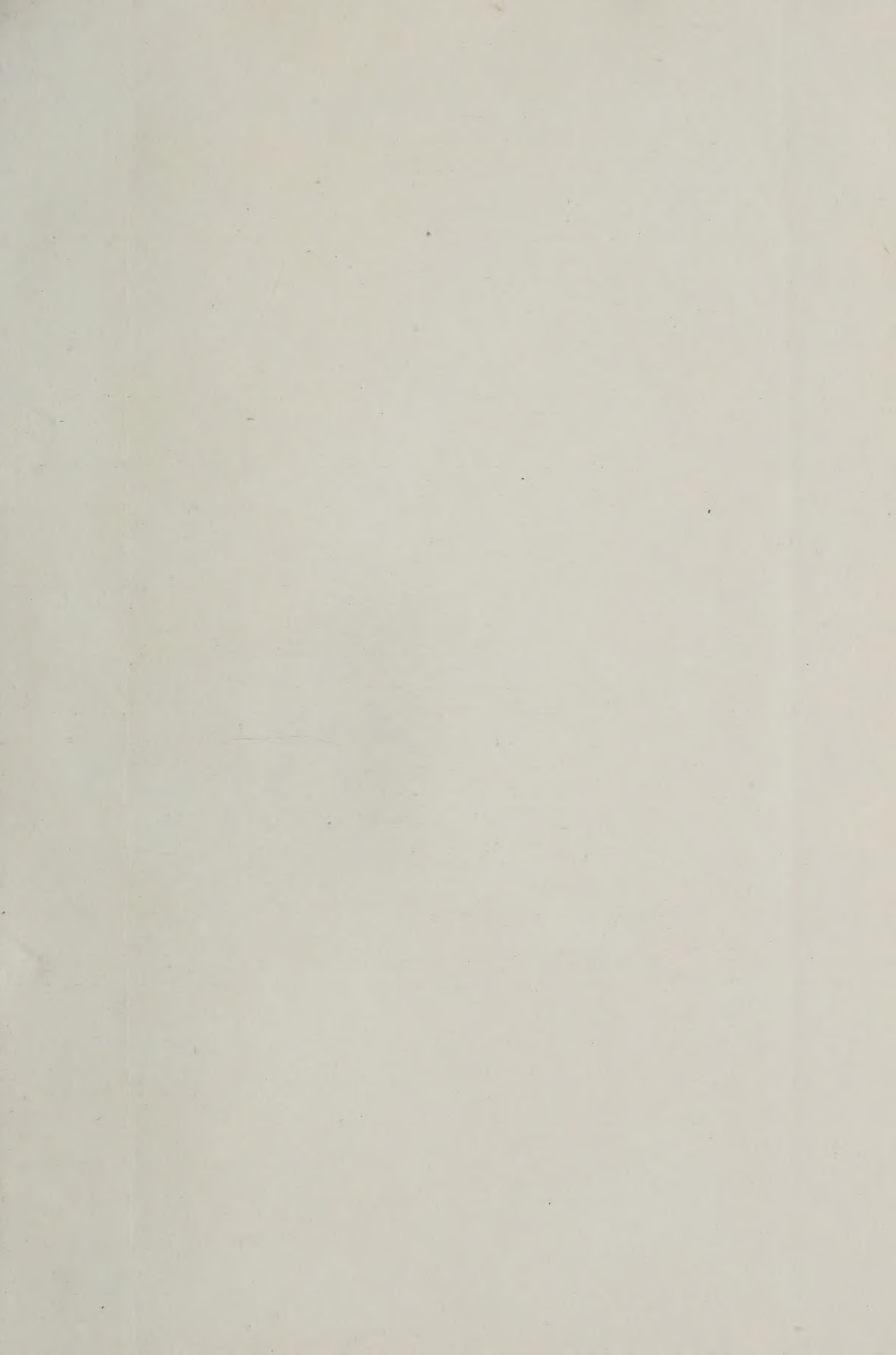








# 解放军将领传

## 第十二集

解放军出版社









# 解放军将领传

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

12

解放军出版社

1990·北京

解放军将领传

（十二）

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 印张　348 千字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199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500

ISBN 7-5065-1437-0／K·120

定　价：7.00 元

# 目　　录



吕 正 操



# 吕 正 操

## 一

吕正操（1905— ），字必之。一九○五年一月（清光绪三十年冬）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山后村在海城城南四公里唐王山北山脚下。唐王山是座小山，在南满铁路东侧，相传唐太宗李世民征东时，与薛仁贵曾在此山顶下过棋，因而得名。

吕正操的祖辈是河北省清河县人。在明朝洪武年间，先辈靠卖豆腐为生，后来被官府发配东北，于是在海城县唐王山后村落了户。祖父很贫苦，当过长工，当过铁路工，挣了几个钱，到晚年有了几亩薄田，成为自耕农。父亲吕名禹，兄弟四人，除种地外，冬闲时外出拉脚，以维持生计。父亲身材高大，性情豪爽。母亲是东山丁家沟人，家境贫困，为人善良，吃苦耐劳，相貌俊秀，人缘极好，很受乡里尊重。吕正操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第二，上有大姐，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

吕正操出生的前一年，即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这是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而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后经美国斡旋，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日俄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这是一个牺牲中国和朝鲜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在条约中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俄国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从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割让给日本；并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从此，日本更加紧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南满铁路就由山后村西经过，吕家的菜地紧挨着这条铁路。乡亲们到村西种地，路过铁路，常常挨日本人的毒打和辱骂。吕正操的祖父、大伯都因过铁路而被日本人砍伤。有的乡亲还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死后推到河里。少年时代的吕正操，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迫与屠杀，他打心眼里恨透了这些日本人，总想长大后一定要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

吕正操从小就好打抱不平，性格倔强。山后村里，有一条东西街，东街富，西街穷。有钱家的孩子欺负穷孩子，他就领着西街的穷孩子同东街有钱家的孩子打群架。

吕正操八岁开始读书，在唐王山后村上小学。入学时，老师给他起了个学名"正言"，并解释说，是言语的言。年幼的吕正操听后感到不对心思，边走边想，走到家门口，坐在门坎上沉思起来：上学读书为的是求知识，长大要当兵，操练好了才能打日本。于是他打定主意自己改

名为“正操”。为了求得祖父同意，就说是老师给起的大名，是操练的操。他没敢提当兵的事，因为那时还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年代，祖父最疼爱这个长孙，指望他光宗耀祖，怎么能让他当兵！吕正操在小学念了不到四年书，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供不起，就中途辍学了。华本清老师喜他记忆力强，过目成诵，觉得失学可惜，便在一九一七年初开学时要他附课学习，义务为他补习国文、数学、英文等课，争取免费送入县立中学。华老师还颇费心思地对他说：“再给你起个号吧，就叫必之，古书云操之必正。”殷切地希望他能长大成才。华老师的一番苦心，使吕正操至今回想起来，仍对这位良师感念不尽。

吕正操附学半年后因家穷没有能够上中学，又辍学了，在家干农活。一九一八年春，由华本清老师介绍，吕正操到海城北关裕德号缫丝（柞蚕）厂学徒。学徒生活很苦，起早贪黑地干重活、杂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仍坚持学习、练字、打算盘，从不间断，如饥似渴地读了《千字文》、《百家姓》、《论语》、《诗经》、《古文观止》、《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许多书，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养。

一九二〇年冬缫丝厂倒闭，吕正操被介绍到海城车站附近一家粮栈学徒。几个月后，因粮栈生意不好，吕正操被辞退，又回家种地。

一九二二年春，吕正操已满十七岁。他从小就想当

兵，以为扛上枪，就能打日本。这时有一位在张学良部下当军医的远亲，向他介绍说，张学良的卫队旅是新式军队，重用识字的青年人。于是，吕正操果决地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参加了东北军，从而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

## 二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张作霖自一九一六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长期盘踞东北。当时张学良是东北军新派领袖人物，思想比较开明，身边集中了一大批有知识、思想进步的青年，试图把东北军从一支封建割据的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式的军队。他执掌的卫队旅，士兵精壮，服装整齐，器械精良，很有一股朝气。吕正操加入东北军，就在张学良的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当兵。

吕正操到卫队旅后，由于他精明强干，能读能写，勤奋好学，很快就考取了旅部的上士文书，到副官处工作。一九二三年，他又被张学良选送考入东北讲武堂深造。东北讲武堂主要培训军事人才，创办于一九〇六年。张作霖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培植干部，又于一九一九年重办，并亲兼监督。张学良为讲武堂第一期毕业生。从第四期起，张学良即作讲武堂学监，以后又升任监督。吕正操上讲武堂后，在学习上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是他凭借着顽强的毅

力和刻苦求知的精神，终于学完了几何、代数、三角及化学等课程。同时，他还利用课余到青年会学习英语。这使他的文化知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吕正操经常参加青年会组织的活动，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

一九二四年秋，讲武堂停课，随东北军入关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吕正操分到由卫队旅改成的第二旅，在第一团第一营一连当排长，作战时代理连长，战斗中负了伤。直奉战争结束后，一九二五年春讲武堂复课，吕正操回校继续学习。同年十月，吕正操从讲武堂毕业，被任命为新兵营营长，未到职即因郭松龄倒戈失败而弃职回家。同年十二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派人召吕正操到锦州，担任他的少校副官。从此，吕正操就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或在他的部下任职。

一九二六年，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迁至北京。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军团司令部进到郑州，先同吴佩孚的军队作战，后又同张发奎率领的军队作战。下半年，又同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作战。此时吕正操改任少校秘书，兼任宣讲队长。一九二八年初，张学良派他回沈阳担任同泽俱乐部（东北高级军政人员文娱活动场所）干事。这期间吕正操开始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他看了法国共产党人巴比塞的《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托洛茨基的自传、列宁的《两个策略》和《进一步，退两步》

等书，结识了一批有志之士，其中有的经张学良派往日本留学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这些志士向吕正操介绍共产党的知识，讲述革命道理，还导谕他："你不要在城里上层社会混了，要到下边去掌握部队。"问他："你讲武堂毕业，为什么不去带兵？"这使出于民族仇恨从而倾向革命的吕正操受到很大启发，他多次向张学良要求下部队去。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张学良主政东北，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于次年春，派吕正操到十六旅任中校参谋处长。十六旅旅部驻在新立屯，后移驻黑山县。一九三〇年冬，十六旅入关，驻防杨柳青。次年夏，又移驻北平南苑。这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袭取沈阳。东北军接受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撤退至山海关以南。日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东北军广大将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军中有志之士强烈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一九三二年冬，十六旅奉命开赴热河。不久，全线受挫，热河失守。当时十六旅在喇嘛，虽打了胜仗，也只好后撤。一九三三年三月，张学良电召吕正操连夜赶往北平，询问战况并征求下一步作战意见。吕正操回答说，我部据守长城各口，军队士气高昂，眼下日军后方空虚，我们完全可以打！张学良当即表示要"不惜一切收复热河"、"东北军全部拚上也要打到底"的决心，并委任吕正操回去

接任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但第二天下午，“张学良下野”的号外就出来了。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洋“参观游历”，委任何应钦代行张学良的职务，强令东北军撤离长城防线。三月底，吕正操率六四七团移驻易县县城及附近农村。他和团内官兵对蒋介石停止热河抗战、强迫东北军撤退甚为愤慨。

在易县，吕正操与黄显声常有来往。在东北军将领中，黄显声是最早而且坚决实行武装抗日的，他所率领的骑兵二师驻防易县西陵、良各庄一带。骑兵二师，已有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当兵，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还有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中共北方局五十三军工委成员刘澜波、孙志远等也在该师领导地下党的工作。吕正操在那里结识了刘澜波、孙志远，以后，便经常接触，交往日深，商讨在六四七团内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三四年春，六四七团移驻北平，担任城防。这期间，吕正操和孙志远、刘澜波见面更多。六四七团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十分活跃。在团内，开始成立有士兵代表参加的经济委员会、图书馆、俱乐部、体育队等组织，办有救亡小报，提倡官兵平等、民主生活和开展抗日救亡教育。并由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派来东北大学进步学生顾少雄、张绍清等协助宣传教育工作，在连队组织读书班，教士兵唱救亡歌曲。因此，六四七团在当时有“红色团”、“摩登团”之称。

六四七团为保卫北平城防和日军常有冲突。当时驻东交民巷的日军不断向六四七团城防部队挑衅，企图寻找借口侵占北平城防，屡遭六四七团值勤部队坚决抵制，一直未能得逞。一九三五年六月，石友三部叛变投敌的铁甲车队队长白坚武，勾结日军企图用铁甲车冲进永定门东边的城豁口，与日军里应外合侵占北平。叛军先用炮击，炮弹落在二龙坑路，引起市内人心惶恐。吕正操得知情况后，立即亲自带领部队乘汽车奔赴永定门城豁口进行堵击，炮击叛军铁甲车，将叛军打退。与此同时，吕正操又派出部队到丰台截断叛军后路，施以前后夹攻，叛军全部被歼，六四七团却无一伤亡。市民亲眼看到六四七团官兵英勇奋战，严惩叛军，群情振奋，欢欣鼓舞，纷纷打电话、写信或到部队慰问。欧美驻华使馆的武官和记者也到永定门上的指挥部参观、采访。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还当面向吕正操致意，对其出色指挥赞不绝口。

这一年华北事变发生。随着日本侵略军对华北侵略日益加深，华北的政治经济实权都已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数万人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在此救亡运动高潮期间，六四七团官兵主动配合，给予同情和支持。当游行学

生在西直门遭到警察拦截时，该团强令警察开门，援助学生进城。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黄华回忆，在市区内，当游行的学生被警察追赶时，六四七团部队即装作把学生队伍包围赶到一所大院里，躲过追赶的警察以后，再把学生们放走。黄华说，后来他才了解到，当时保护他们游行队伍的，就是吕正操率领的部队。

一九三六年初，六四七团移驻河北徐水一带，吕正操和黄显声、孙志远等仍然经常接触。此时，张学良已回国统率东北军，提升一一六师师长缪澂流当五十七军军长，并原拟加委吕正操接任一一六师师长。但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反对吕正操升任师长，与缪澂流背着张学良，把吕正操送到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吕正操到南京后，和一个横行霸道的国民党特务发生冲突，打伤了这个特务，国民党的报纸用大字标题登载“东北军军阀吕正操行凶打人”。张学良得知后，随即电告何应钦调吕正操立即回团。九月，吕正操回到北平，与东北抗日联合会（东北救亡总会前身）商讨筹组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并任总队长。十月，张学良调吕正操临时到西安张公馆服务。吕正操参加了张学良组织的东北革命军人同志会。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等主张。事变期间，吕正操在张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和应邀来西安共商大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周

恩来的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常有接触，和参加西安事变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宋黎朝夕相处。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吕正操立即赶回徐水团部掌握部队。

吕正操刚回徐水，孙志远即赶来团部，通知吕正操：中共北方局已同意他加入共产党。吕正操想把孙志远留团内做中共党的工作。孙志远说，他在五十三军太红了，将调往山西，北方局另派人来六四七团主持党的工作。

回到徐水的当天晚上，吕正操就把平射炮连连长沙克找来，告诉沙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手造成的祸国殃民的内战就要停止了。"讲述了共产党光明磊落，为国家民族利益不念旧恶，英明地处理了西安事变。他还对沙克说："我们共事多年，算得上知己。不瞒你说，我已经加入共产党。"他问沙克："你想参加共产党吗？"沙克很激动，当下表示："我也愿意参加共产党。"他们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夜，决定以经济委员会为基础，积极扩大团内"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以便聚集和扩大革命力量。此时，黄显声已调任一一九师师长，并兼任五十三军副军长，驻防石家庄。吕正操和黄显声经常来往，共同商讨，配合工作。

一九三七年初，孙志远受周恩来、叶剑英派遣，与林铁等组成中共五十三军工委会。孙志远负责吕正操部的工作。经五十三军工委会介绍，胡乃超、杨经国、戈亚明等

学生党员六七人，来六四七团下连当兵。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吕正操很快将他们提升为班、排长。二月初，中共北方局派李晓初来六四七团任中共总支书记，对外名义是上尉书记长。李晓初代表党组织郑重通知吕正操，北方局已批准他参加共产党，并由李晓初和胡乃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同年一月间，万福麟借口开会把黄显声扣留保定，撤销了黄的师长职务。这时，吕正操对万福麟已有戒备。万福麟多次召开团长会议，吕正操都托病不去参加。万福麟为扣押吕正操，乘铁甲车前来徐水车站，召集六四七团官兵训话，大骂共产党。万还要吕正操即刻跟他同去保定。吕正操借口万福麟训话后还要继续给部队做工作，坚辞不去。其实，吕正操早已做了防备，由沙克负责准备炮火，在徐水的漕河桥头埋上了炸药，如果万福麟竟敢把吕正操带走，就把桥炸掉，再动用迫击炮截断铁甲车去路，把万福麟扣留。万福麟察觉到气氛不佳，形势不利，便无可奈何地乘铁甲车败兴归去。

万福麟走后，吕正操更加防备。不久，万福麟为了监视六四七团的活动，就把这个团调到定县师部附近。吕正操针锋相对，及时派可靠的部队和共产党员，进行反监视。这时，万福麟、刘元勋又趁蒋介石缩编东北军的机会，把六四七团拆散，分编到两个师的三个旅里。宣布命令时，六四七团全体官兵群情激愤，反对改编；团内共产

党员、“东抗”队员纷纷要求把队伍拉出去，西渡黄河去找红军。吕正操和李晓初当即召开共产党员和“东抗”干部会，决定派李晓初到北平请示中共北方局。李晓初请示后很快赶回部队，向吕正操等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六四七团千万不能拉出去。因为，第一，那样做会破坏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队伍拉不到黄河边就会被打散；第三，要服从改编，分到各师去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发展革命力量。吕正操拥护北方局的指示。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六四七团服从了改编。五月初，吕正操带一个营到石家庄与一一九师六五四团的两个营（其中也有中共秘密组织）合编为一三〇师六九一团，并出任该团团长。

就在从定县去石家庄的途中，五月四日的晚上，李晓初代表共产党组织，在一个帐篷里，举行了接受吕正操入党的仪式。

到了石家庄，吕正操、李晓初立即和中共石家庄市委陶希晋等取得了联系，积极协同石家庄市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六九一团官兵和正太路工人联合组织歌咏队，演唱当时流行的救亡歌曲，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这时，由于吕正操、李晓初等共产党人的积极活动，中共组织在六九一团发展很快，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队伍，为使这支队伍成为坚决抗日的革命武装，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六九一团全体官兵的命运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坚持敌后抗战的革命队伍。

## 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驻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从此，中国进入了八年抗战的历史时期，这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时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方局预见到，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会很快溃退，指示六九一团趁机回师北上，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吕正操和李晓初，坚决遵照北方局的指示行动。七月中旬，六九一团从石家庄出发时，他们就在火车上提出了“向敌后退却，北上抗日”的口号，并经过共产党员和“东抗”组织分头向战士进行思想动员，还成立了抗日俱乐部，创办了《抗日旬刊》。

六九一团开到任丘一带设防，八月底又开到安次、永清附近永定河设防。师长周福成有意把六九一团部署在永定河一个三面受敌的突出部位，企图借敌人的力量削弱这个团。吕正操把团部设在曹家务，率领全团担任永定河右岸的防守，与日军隔河对峙。日军于九月十五日正午十二时许开始进攻。六九一团左翼第三营坚守阵地，受到日军炮火压迫和包围。营长给吕正操打来紧急电话，请示怎么

办。吕正操命令:“死守阵地。”随即骑马赶到前沿阵地，营长刘裕勤、副营长王德平、连长王宽民和一个姓李的排长(四人都是共产党员)，为坚守阵地，均以身殉国。三营的阵地守住了。后来日军从六九一团和六九二团的接合部突破了防线，置六九一团于不顾，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到十八日晚上，略加休整的六九一团就整队沿河堤尾随日军南撤。

永定河战斗后，六九一团总结了这次战斗，从士兵到官长一致感到不能单纯防御，久守必败，要求打运动战和进攻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主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但是，军长、师长却一味撤退。这时，六九一团广大士兵的不满情绪迅速滋长，纷纷要求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寻找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晚上，沙克去找吕正操反映情况，还没等沙克开口，吕正操就说:“你看，这样跑下去就要过黄河了。咱们不能只顾跟着他们逃跑，应该另想办法。”沙克立刻反映了士兵的情绪和要求。吕正操沉思片刻，说:“我们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目前应先抓紧‘东抗’，团结群众。一面做好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准备，一面寻找党的关系。”李晓初此时不在团内，部队路过任丘时把他留下来去找地方党。

蒋介石作为消灭异己的一种手段，总是让嫡系先撤，杂牌殿后。而六九一团又奉命掩护五十三军，更处于危险的境地。然而，万福麟作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安排，

又恰好为六九一团脱离五十三军提供了方便条件。

十月十日下午，六九一团先头部队进抵束鹿半壁店时，突然发现日军五六十名骑兵。尖兵连果断地跑步抢占村庄，发起进攻，激战一小时，打得日骑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毙日军少尉队长一名、士兵八九名，缴获一批军用品及战马多匹。六九一团无一伤亡。经过这一仗，官兵们更加相信运动战和进攻战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术。当晚，六九一团继续向师指定的地点急速前进，第一营进驻梅花镇，第三营随团部进驻附近的四德村。夜里十点多钟，约有一营日军进攻梅花镇。经过激战，一营日军大部被歼，但其后续部队陆续增加，将六九一团第一营团团包围，形势十分严峻。这时，万福麟已率五十三军跑得很远，师长周福成和旅长从兆麟分别给六九一团打来电报，叫吕正操丢下一营，带三营去追赶他们。吕正操坚决不同意把一营丢下，立即派部队去接应一营突围出来。吕正操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果断决定“就此脱离五十三军北上找地方党，打游击去”。他召集各营、连长开会，商议部队行动，大多数都同意马上回师北上。于是，吕正操率领六九一团当夜开往晋县小樵镇。

六九一团在小樵镇休息了三天，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吕正操连夜召开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计划。与此同时，在一所小学校的大教室里，他还主持召开了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他在会上说：“今天不

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的前途命运。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接着，他讲述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他在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最后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象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吕正操的讲话，象是在干柴上加了一把烈火，把官兵代表们的抗日情绪烧得更加旺盛，大家激昂慷慨，争相发言。回师北上抗日的气势，就象一股洪流，不可阻挡。吕正操见大局已定，便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了“全团立即回师北上”的决定，并说：“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五十三军，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决定将六九一团改称人民自卫军，佩戴长方形臂章，白底，蓝边，上面为“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星。要求部队严明纪律，官兵平等，不准扰民，发动群众抗战。代表回去传达后，全体官兵欢欣鼓舞。人民自卫军最初编为三个总队，吕正操任司令员，李晓初任政治部主任，优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被选拔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这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吕正操部从此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道

路。

吕正操率领人民自卫军继续北上，进驻深泽、安国等县城。每到一处，吕正操都和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在沿途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建立中共县委组织、抗日民主政府、人民自卫队及抗日救国团体。在安国，中共保属特委派侯玉田、刘亦珺等前来迎接人民自卫军。这样，人民自卫军和中共冀中地方组织正式接上了关系。经与冀中党组织商定，吕正操率人民自卫军取道博野蠡县，向中共保属省委活动的中心地区高阳进军。路过博野时，吕正操会见了博野民军司令张仲翰，约定双方同心协力，联合抗日。到蠡县后，与中共保属省委领导下的一批地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部分抗日武装会合。在蠡县，吕正操会见了正着手组织抗日武装的孟庆山。孟庆山向吕正操详细介绍了高阳城里的情况。十月三十一日，人民自卫军进抵高阳城下。当日晚上九时许，吕正操指挥人民自卫军向高阳城发起进攻。人民自卫军英勇作战，迅速炸开城门，在冲锋号声中战士们一拥而进，占领了高阳城，全歼了盘踞县城的冀中伪保安队尹松山部千余人，缴获了全部枪支。人民自卫军入城后，当众枪决了土匪头子、汉奸尹松山。

打开高阳城，震动了整个冀中。人民自卫军官兵士气高昂，军威大振。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出现了踊跃参军的高潮。各种地主武装也都陆续找来，要求加委。

当时党的政策是，不管是谁，只要抗日，都表示欢迎。这时，李晓初来到高阳，他告诉吕正操，在任丘已收编了高顺成部，编为游击第一师。这样，高部便加入了人民自卫军行列。

吕正操率领的人民自卫军同地方党会合后，在冀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大力支援下，如鱼得水，迅速发展到五千多人，编成三个步兵团，一个特种兵团，一个特务营。与此同时，冀中地区的定县、藁城、无极及深、武、饶、安等县，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纷纷组织起人民自卫军县大队和各种名称的地方抗日武装。这样，吕正操率领的人民自卫军，就成为中共直接领导下坚持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 四

人民自卫军刚刚从旧军队脱胎而来，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革命改造，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存在一些问题。地方党组织输送来的兵源和刚入伍的新战士，较普遍地存在家乡观念。部队的纪律性也较差。因此，人民自卫军急需提高军政素质，使之成为八路军式的革命武装和坚持敌后的抗日主力军。在此关键时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孙志远来到高阳，并带来电台呼号和密码。吕正操和孙志远在抗日战场重逢，并肩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心情格外振奋。他们当即同聂荣臻司令员接通了电报，报告了冀中

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情况。从此，人民自卫军同晋察冀军区正式建立了联系。为加速人民自卫军的建设，吕正操在致电聂荣臻时，报告了这支队伍是由旧军队改编成的，缺乏党的和红军的优良传统，请求率部到路西八路军部队见习和受训。聂荣臻司令员很快回电表示同意。

一九三七年冬，吕正操、孙志远率领人民自卫军两个步兵团、特务营和抗日义勇军的两个支队，开到路西整训。到了阜平的王快，部队留下参观受训，吕正操和孙志远去阜平县城会见聂荣臻司令员。他向聂荣臻司令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在东北军的情况，以及他和张学良将军的关系。他恳切地表示，自己在旧军队呆久了，对革命队伍的许多东西很生疏，希望聂司令员多多帮助。聂司令员勉励他说："你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军，参加八路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开创了冀中抗日的新局面，这第一步就搞得很好嘛！"聂司令员强调说："冀中那个地方是平原地区，这个意义就更大了。"他还告诉吕正操："你们挥戈北上和开辟冀中的工作，我已经向中央和总部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已经知道了，他很高兴。今后你们去延安，一定会见到毛主席的。"聂荣臻会见吕正操后，对吕正操和人民自卫军寄予了很大希望。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开头写道："必之（吕正操字必之）来，谈很久，印象很好。"

在晋察冀军区，吕正操、孙志远同聂荣臻司令员商讨

了将部队改编成八路军的问题，同时研究了部队整顿和训练计划。他们组织人民自卫军的干部到军区直属部队和军政学校去见习、参观，学习八路军部队的军政工作和游击战术。聂司令员还亲自给人民自卫军营以上干部做了一次重要讲话，着重讲解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等问题。人民自卫军各部队在整训过程中，认真学习了八路军的传统和作风，学习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政权的经验，并对人民自卫军中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机关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整顿和充实。

人民自卫军在整训期间，正赶上晋察冀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吕正操和孙志远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这次大会产生的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临时政府）委员。吕正操和孙志远还参加了晋察冀军区政工会议，听取了聂司令员对冀中工作的指示。聂司令员用手指着地图对吕正操和孙志远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冀中，作为一个正式的军事、行政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阜平，聂荣臻还和吕正操、孙志远等详尽地讨论了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聂荣臻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光靠山是不行的，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地站住脚。人民群众比山靠得住，广泛的群众基础比地

形靠得住。就说大山吧，如果山上没有群众，山路又很窄，敌人把山路一堵，我们根本不能坚持，不用说别的，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没有群众供养我们，难道能吃石头吗！对于建设敌后根据地，首要的问题是发动群众，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地形的作用还是比较次要的，而且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晋察冀这块根据地虽然发源于五台山，但我们不是有了五台山才有了这块根据地，而是敌后的群众支持我们，拥护我们，才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大的发展。”这番谈话使吕正操开始懂得人民战争，对在冀中平原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也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他非常赞同聂荣臻的意见，说：“冀中区位处平、津、保三角地带，在津浦、平汉、北宁三条铁路干线之间，是一个战略要地；平原地区，物产丰富，是晋察冀边区的衣、粮库。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较之在山区，虽然有一些不利的地形条件，但这里人口众多，文化比较发达，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较好，又有山区根据地作依托。而日本侵略军兵力不足，只能守住大城市和沿铁路线上的城镇，广大乡村和铁路线以外的地区都在我手。我们依靠广大群众这个‘人山人海’，到处可以走来走去。”聂荣臻又说：“冀中这块抗日阵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根据地，意义非常深远。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借鉴的经验。”通过这次谈话，吕正操受到很大鼓舞，也使他更加感到责任的光荣

和重大。他根据聂荣臻谈话的精神，经过反复思考，在胸中勾划了进一步开辟冀中区的蓝图：树立冀中的中心区，改造杂色武装，肃清反动势力，有计划地扩大武装力量，改造旧政权，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安定人民生活，建立抗日秩序。

为了统一和加强冀中地区党的领导，确定成立冀中区党委。聂荣臻派鲁贲和吕正操、孙志远一起回冀中，负责筹备区党委事宜。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到路西开会的北岳区党委书记黄敬调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四月初吕正操偕黄敬同回冀中。之后，在区党委领导及河北游击军的配合下，迅速解决了几十股汉奸武装和土匪武装，先后收编了各路杂牌武装，广大群众为之拍手称快。组织北上先锋队，赴大清河北开辟工作，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展开游击活动。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并肩作战，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第一次春季“扫荡”，根据地得到了很大扩展。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平津路，南达沧石路，整个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有二十四座县城在我军手中，各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和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民群众得到广泛动员，纷纷参军参战，出现了冀中抗战的“黄金时代”。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黄敬主持下，冀中区党委召开了全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了统一冀中党的领导、统一民主政权和统一部队指挥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和

中央军委的指示，整编冀中部队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为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之后，中央军委总部先后派王平、程子华来冀中任政治委员，创建了平原抗日根据地。自此，吕正操率部长期坚持了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斗争之残酷，牺牲之壮烈，游击战术之灵活，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度发挥了人民战争之伟力。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季，冀中战事频繁。据聂荣臻一九三九年一月所著《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一书所载，冀中军区上报晋察冀军区的战斗数字，仅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冀中军区成立到七月七日抗战一周年，两个月时间，就有二十五次。

在抗战一周年的时候，吕正操应邀为驻重庆的东北救亡总会撰写了一篇题为《抗日一周年总结冀中平原区游击战的经验教训》一文（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出版的《反攻》杂志四卷二期上）。在这篇文章中，吕正操对于在冀中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了五点主要经验教训：

（一）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只要能执行正确的抗日政策，满足广大群众迫切的抗日要求，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信赖，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共同抗击敌人，就不仅能够歼灭性地打击敌人，维持本身的生存，并且还能很快地发展壮大起来，这在整个抗战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平原上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有着文化水平较高、思想较开通的广大群众，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普遍觉醒起来，因此在平原上发动游击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具体的现实。在冀中，更有无数条大小河流，稠密的村庄，浓密的树林，曲折蜿蜒的小径，这些都成为开展游击战争的极其有利的自然条件。在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条件互相配合之下，不仅可以开展游击战，保护游击队的有生力量，而且极有可能坚持持久战，并在相当期间，保持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三）中国在军事上战胜日本侵略军，必须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占领区域，到处进攻敌人，寻找敌人的弱点，断其交通联络线，分散或抑留其大部兵力，截夺其辎重，消耗其物力、财力与人力，迟滞其增援与兵力的转移，不断取得大的或小的胜利，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力争在持久抗战过程中转变敌我实力的对比，以求最后总决战的彻底胜利。

（四）在辽阔的平原上，敌人没有群众基础，若没有可靠的近代交通联络线，没有较大兵力保护交通联络线，以维持其现代化兵种所需庞大资源的供给，要想在平原上站住脚，是很困难的。我们必须一切为着抗日，一切战时化，适应游击战争，彻底毁掉一切可能通行汽车的道路，埋藏所有食粮与重要物品，严密封锁消息，实行全体总动

员，防止汉奸潜入，彻底做到物质上精神上的坚壁清野，以粉碎敌人任何进攻企图，保证游击区的巩固与扩大。

（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最可靠的保证。唯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团结各个阶层和广大群众。人民群众团结的力量，才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力量，才是实现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力量。

冀中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成，扩大了晋察冀根据地的范围，使山区能够得到平原人力、物力的支援和战略上的直接配合。它是在日军占领的心脏地区矗立起来的一个抗战堡垒，同其他兄弟根据地相配合，形成了对日军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从而能够更有力地牵制日军、长期坚持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 五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中共冀中区党委及军政领导机关，从安平移至任丘城西北青塔镇，坐镇大清河岸，准备开辟大清河北地区。

开辟大清河北的工作，首先从进一步解决高顺成的部队着手。高顺成的部队，实际上是由一些流氓无产者组织起来的，有浓厚的土匪性。“七七事变”后，基于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情绪，高顺成也打起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

称自己的队伍为游击第一师。后来，人民自卫军加委高的游击第一师新的番号，纳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冀中人民抗日武装序列。至一九三八年夏，高的游击第一师已号称万人之众，成为冀中地区一支较大的武装力量。这支队伍，尽管对日伪军打过一些仗，配合地方民主政权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对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起了一定作用，但在政治改造、部队作风等方面，没有明显进步，纪律松弛，作风不正，抢劫、掠夺事件时有发生。高顺成对当年一起拉杆的伙伴和亲朋好友，采取姑息纵容态度，高本人也不愿受组织纪律约束，吸毒，嫖妓，为所欲为，对部队造成很坏影响。当军区决定改编游击第一师时，高顺成等人散布不满情绪，心怀逆反。高还派人到保定同敌人暗中勾结，准备投敌。因此，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彻底改编高的部队，处理高顺成，派王光文去高部负责改编工作，任副师长。

"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时，高顺成在任丘召开大会，借口请吕正操、黄敬等冀中区领导人去给部队讲话，妄图先动手，把吕、黄等扣起来。吕、黄等领导人早有戒备，由王光文带一个手枪排保护，在吕正操讲话时，手枪排严密监视高顺成，高未敢动手。会后，吕正操对高顺成说，要把游击第一师编成八路军正规部队，从八路军主力部队派来几个干部，问高有什么意见。高顺成满口答应。只一周时间就把游击第一师改编完了。但高顺成拒不服从军区

命令，迟迟不去安平驻防。三四天后军区通知高到青塔开会，高仍抗命不行。当组织强令高顺成去军区报到时，高竟以武力相胁，执意顽抗，被当场击毙。解决高顺成后，顺利地处理了高部的改编和善后问题。

一九三八年秋，国民党抬出了早已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招牌，委任鹿钟麟为主席，张荫梧为民政厅长，成立所谓冀察战区，目的是分割和瓦解抗日根据地。这年九月底，冀中军区驻在蠡县附近。这时，邱立亭以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代表的名义，经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兼统战部长）介绍，到冀中区党委黄敬处来见吕正操。邱曾是吕正操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邱对吕讲，鹿钟麟派他来商谈有关冀察战区统一作战指挥的问题。吕正操当即对邱说："我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又是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归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挥，聂司令员说了算，我无权决定。但我认为，冀察战区的作战指挥，必须首先经过晋察冀军区，否则就不能接受。"晚上，邱立亭又到吕正操住处对吕讲，蒋介石可以委任你一个军长，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饷有饷。妄图以官和钱拉吕。吕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蒋介石是什么人？张学良大仁大义送他回南京，倒被他扣起来，直到现在抗战了，还不放出来。你也是张学良的学生，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吕不让邱再说下去了。后来，邱竟当着吕的面骂起共产党来了。吕正操一听就火了，站起身拍着桌子骂道："混蛋！敢当着我的面骂共

产党，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将邱撵出屋去。第二天，吕正操向黄敬、孙志远汇报了邱立亭与他谈话的经过。黄敬说，不应该骂邱立亭，还要搞统一战线嘛！他说他的，不同意就婉言拒绝，送走了事，何必骂他。事后，吕正操从抗战大局出发，请邱吃了一顿饭，把邱送回冀南。

十月间，鹿钟麟又通过杨秀峰找黄敬，要吕正操到南宫与他谈判，商谈河北省政权“统一”问题。鹿当时是冀察战区司令、河北省主席，吕当时兼冀中行署主任。鹿找吕就是要搞所谓“统一政令”。事先，吕正操与黄敬商定了谈判原则，即冀中行署是受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的，不能直接接受河北省政府的政令。如果要统一政令，得经晋察冀边区政府同意，我们无权决定。吕正操到了南宫，在八路军一二九师见到了徐向前，就住在徐那里。还见到了刘伯承、朱瑞、宋任穷、杨秀峰等，并向他们谈了准备与鹿钟麟谈判的方针。第二天，鹿钟麟约吕正操到他的省政府去谈判。参加会谈的有省政府的各厅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架势很大。会谈时，鹿首先提出，统一河北省的政令，要给冀中各县的县长加委，并要发公文到各县去。吕对鹿说:“我这个行署主任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委任的，我得听晋察冀边区政府的。你想向冀中各县发委任和公文，得首先统一发给我，我再向晋察冀边区政府请示如何处理。”这时，鹿的部下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出来猖狂地叫嚷，不但“政令要统一”，军队也应“统一”，不能搞封建割

据。还说他在冀中留有民军，还要带部队回到冀中去。吕正操当即驳斥说："日本鬼子来了，你们丢下人民，丢下大好河山，都跑了。你是河北民军司令，跑到太行山去干什么？现在冀中人民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失地，要说割据也是人民从日军那里割来的。你们要想从人民手里收复失地，冀中人民决不答应！"他正告张荫梧："你如果一定要来冀中，就必须服从冀中军区的统一指挥，叫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我对你和冀中的其他部队可以一视同仁，但随便闯入冀中不行！你随便闯入冀中，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就这样，吕正操当场把张荫梧顶回去了。鹿钟麟与张荫梧有矛盾，便乘机打圆场说，今天谈政权问题，不谈军事。后来，鹿又以请吕正操吃饭为名，约吕个别谈话，拉交情，套近乎。鹿没有达到目的。事后鹿对人说，看来吕正操是共产党，不要再想打他的什么主意了。

十一月间，张荫梧要到冀中博野来。他先派副司令王长江、政治部主任张存实（共产党员）到冀中来接洽。王、张等对吕正操说，张荫梧要以河北民军总司令的名义，带三个主力团到冀中博野和张仲翰的博野民军会合。吕正操当即明确表态："张荫梧要来可以，但是一定要由冀中军区安排他的驻地和供给，行动要由冀中军区统一指挥。他随便到博野去，那不行！"吕要王长江电告张荫梧，未经商定以前，不得到冀中来，否则造成严重后果，由他张荫梧自己负责。之后，张存实又单独找到吕正操，介绍

说，张荫梧野心很大，王长江和张荫梧之间有矛盾。于是吕正操找王长江单独谈了一次，对王讲明，张荫梧要来抢地盘，向人民收复失地，是决不能允许的，要来抗战，就必须接受冀中军区统一指挥，否则不准来，来了对抗战不利。王长江答应转告张荫梧，未接洽好，暂不要来；并向吕正操表示，如果张荫梧一定要来搞摩擦，他王长江也站在冀中人民一边，反对张荫梧。十二月初，张荫梧亲自率领三个核心团向博野进犯，并在冀中二分区制造摩擦。二分区八路军部队奋起自卫。在吕正操的指挥下，二分区所属八路军部队，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三个核心团包围，自拂晓打响，很快解决了战斗，予以全歼。其中大部分是放下武器或战场起义。消灭了张荫梧的民军以后，吕正操利用“第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队”的名义，通电全国，揭露张荫梧袭击冀中部队、破坏抗战的事实。又把张存实、王长江所带的部队编成两个团，改称冀中民军，完全与张荫梧脱离关系。就这样，吕正操率领冀中抗日军民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胜利。

这期间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已经走上了全面建设的轨道，但还不够巩固。摆在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冀中根据地的建设，及时向冀中军区各种武装提出进行整训的要求。还做出决定加强冀中军区的领导力量。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给聂荣臻

司令员电报中指示:

(一) 冀中地区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二) 为此决定:

(1) 派程子华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程子华同志任冀中军区和第三纵队政委。加强部队的正规化，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2) 派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主力去冀中，争取扩大一二〇师。

(3) 一二〇师一部到冀中，可以推动、影响当地武装部队正规化的进程。

中央还指示冀中区党委，应以极大力量帮助扩大一二〇师，具体计划由贺、关与彭德怀、聂荣臻酌办……

一九三九年初，程子华来到冀中，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政委。吕正操同程子华合作得很好，他们亲密无间。虽也有过不同意见，但都能摆到桌面上，畅所欲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个人之间毫无芥蒂。程子华从延安带来一批干部，对冀中军区部队建设和健全八路军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示及晋察冀军区的整训计划，冀中军区于这年三月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并开始对部队进行分批整训。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和支持这次政工会议提出的“按照八路军的样子建设第三纵队”的口号。通过人民军队

的光荣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三纵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军阀残余、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和游击习气等不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坚决的斗争。整训后，冀中军区共建成了十四个主力团，两个游击支队，五个游击总队。这些部队以崭新的人民军队的姿态，出现在冀中平原上，同县、区游击队及地方人民武装结合在一起，担负起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任务。

比程子华稍晚几天，贺龙率领一二〇师也来到冀中。吕正操同贺龙虽然未曾见过面，但这次一见如故。在此后相处的八个月时间里，吕正操与贺龙戎马相随，朝夕与共。贺龙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吕正操终生难忘。在贺龙离开冀中的前夕，吕正操惋惜地说："贺老总，你知道，过去我是个旧军人，没有经过长征锻炼，也没搞过土地革命，对咱们八路军这套东西还没有学会，还需要你继续帮助，你却要走了！"贺龙听了，哈哈大笑了几声，对吕说："你常说你是个旧军人，就算个'小军阀'吧，那算个啥！我在旧军队里当过镇守使、师长、军长，可是个'大军阀'呢。但一找到共产党，跟上毛主席，有了觉悟，就有个'突变'嘛！过去的事提它干啥，要紧的是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风吹浪打不回头！"他还鼓励吕正操说："八路军这套东西，都是毛主席教会的。你现在正在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就好嘛！另外，有事多向聂荣臻司令员和区党委请示报告，一

定可以把冀中搞得更好。"临别时贺老总还特别嘱咐说:"毛主席对冀中很关心,你现在就写信给毛主席,把这里的情况汇报一下。"吕正操遵照贺龙的指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特别提到,贺龙和一二〇师在冀中的八个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冀中部队能够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能够经受住一九四二年日军发动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最后能为党保存下几万人的战斗部队,是与贺龙、关向应的亲自指导和一二〇师部队的传、帮、带分不开的。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影响。最早来冀中根据地的国际友好人士,有英国学者林西(以后改叫林迈可),他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后来又有美国记者韩森(实际是美国使馆武官)、原美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等人到过冀中。他们参观了冀中根据地,参观了八路军部队和民兵,还访问了日军俘虏。吕正操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来访很重视,亲自接见,介绍根据地的建设情况。此后,这些国际友人分别在美、英有影响的报纸上报道了冀中根据地,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极大关注。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来到冀中。吕正操曾多次同他会见。白求恩大夫牺牲后,为了纪念这位伟大战士的无私献身精神,在唐县军城山上修建了白求恩陵墓。墓边有聂荣臻等晋察冀军区领

导人的题词。吕正操也题写了“人类解放战线上最英勇的战士”。印度柯棣华大夫也来冀中根据地工作过。柯棣华大夫病逝后，晋察冀军民在唐县葛公村举行了追悼大会，吕正操代表聂荣臻司令员在会上讲了话。吕正操还特为柯棣华大夫作了一支挽歌：

柯棣华，
你从温暖的印度洋的岸边到中国的北方，
来抗拒严寒；
你为着明天的自由，
在中国苦战了四个秋天；
你逝在长夜的尽头，
流干了生命之泉。
啊，亲爱的柯棣华同志，你巨大的形象，
将在我们行动中复活，
在我们的记忆里长存到永远。

## 六

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兵力陆续增加。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易人，由冈村宁次接任，提出“治安强化”的战略方针，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下，消极

抗战，积极反共，甚至公开进行反共战争。这就使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处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包围和夹击之中。坚持敌后抗战进入了极为严重的困难时期。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日军对冀中区展开了全面的“蚕食”进攻，其方式是扩展点线为面的占领，与向抗日根据地内压缩相结合；以“蚕食”为主，与“扫荡”相结合。为坚持和保卫根据地，吕正操率领冀中平原抗日军民针锋相对地与日军展开了反“蚕食”斗争。这次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武装斗争和其他各种斗争相结合，巩固基本区，突击落后区，缩小敌占区。

斗争是十分残酷的。这年四月，吕正操带着一个工作组到十分区去检查工作，并慰问在残酷环境中坚持斗争的抗日军民。工作组有二十来个干部，出发时只带了警卫连的七十多人和一部电台。还预定带回民支队一个营和该支队的一个剧团，当时这个营和剧团正在徐水一带活动。吕正操一行到安新、容城一带时，碰上敌人天天“拉网扫荡”，他们便进入十分区二十九团驻地——安新县的三台。在那里，他们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进到徐水县的崔庄，跟回民支队的一个营及剧团相会合。在崔庄，他们又和敌人接触了一次。进到雄县白洋淀边的留通后，他们和分区、地委的领导会合，在吕正操主持下连夜开会汇报研究工作，然后又分头转移了。吕正操等人夜行军穿过白洋

淀，拂晓时到达北冯村。休息一天，当晚出发，穿过高保公路，下半夜到达桑园。吕正操等正在入睡，突然听到枪响，发觉已被日军包围。警卫连掩护吕正操等人突围。日军跟踪追击，警卫连和回民支队边打边走，一天之内和敌人接触多次，终于从敌炮楼下擦身穿过公路，回到军区司令部驻地安平义里。当日正赶上庆祝“五四”青年节和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吕正操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纪念活动。为庆贺八路军三纵队成立三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专程送来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桑园突围，充分体现了冀中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为桑园突围的胜利，吕正操即兴赋抒怀诗一首:

桑园突围

——一九四一年五月三日从十分区归来

桑园突围破晓间，
战士奋战苦衣棉。
寇追情急急似火，
春日昼长长如年。
马逸人散阵不成，
往来冲突西复东。
天似有罗地似网，
此起彼伏相呼应。
回支骁勇天下闻，

有女如龙叱风云，
从容迫敌却追兵，
过路入营日西沉。
就榻疲顿举足难，
梦少神安醉里甜。
翌晨欢庆青年节，
人马一一散复还。
地下有道道有沟，
是真罗网疏不漏。
倭寇纵有黔驴技，
人民眼底一蜉蝣。

“有女如龙叱风云”，指的是回民支队剧团的女青年指导员白石，她英姿飒爽，亲自指挥剧团的男女青少年奋勇作战。

一九四一年，日军的秋季“扫荡”也是极其残酷的。这次“扫荡”的重点，是寻找冀中区党政军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这使冀中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不仅面临严重局面，而且要善于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机警灵活地穿来穿去。反“扫荡”开始后，军区是单独行动的，区党委、行署则分散活动。在反“扫荡”中，军区司令部机关被炸，遇到了一次未曾有过的危险。那是九月间，军区司令部从深泽大堡过来，日军的飞机就一直跟上了。走到安平的宗佐，军区司令部住进了一个紧靠村边的大房子，作战室住正房，程

子华住东厢房，吕正操住西厢房。他们刚进屋，日机就直冲他们的住房轰炸，一个炸弹打中了正房。紧接着又用机关枪扫射，四五架日机轮番扫射、轰炸。飞机轰炸时，吕正操和程子华都趴在床底下。轰炸过后，他们就互相呼唤，谁也不知对方死活。他们走出屋后，才发现炸死了作战室的一个值班参谋和一个通信员。

桑园突围、宗佐历险，突出表现了吕正操在严酷的形势下临危不惧、沉着对敌的大无畏精神。后来编辑出版的《冀中一日》一书，收入了王林编写的一篇记叙吕正操一天活动的文章。书中说，当时吕正操正在白洋淀一带检查工作，遭遇敌人的“拉网扫荡”，一天之内受到五次反复合击。吕正操一马当先，无所畏惧地朝敌伪据点冲进，惊破敌胆，终于胜利地冲出敌人的合击圈。

在反“扫荡”斗争中，冀中军民十分英勇顽强，而且丰富了对敌斗争的经验。他们开展地雷战和地道战，在平原游击战争史上，创造了奇迹般辉煌灿烂的一页。白洋淀地区的人民组织起了水上游击队——雁翎队，以独特的方式同敌人斗争。

到一九四二年，冀中区的斗争形势就更为严峻了。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存在，一直视为心腹大患，下定了不予摧毁决不收兵的决心。四月中旬，日军制定出作战实施计划，于四月二十八日下达了作战命令。据当时《华北治安战》记载，此次日军对冀中区“扫荡”的作战方针是：“对吕

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

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对敌情变化十分清楚，对当时周围日军的部署、调动，了如指掌。四月下旬，吕正操便同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军区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代理主任卓雄、参谋处长张学思等（政治委员程子华此时在路西另有任务），在全面分析研究、掌握日军“扫荡”的意图和谋略的基础上，制定了反“扫荡”的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把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机关各部门大大精简，由三四千人减到两千人以下。减下来的人员划分小组，分散到部队或区村，与战士、群众和基层干部一起坚持反“扫荡”。

二、调二十七团随领导机关活动，调二十七团一个连为机关特务二连，增强保卫领导机关的力量。

三、各主力部队要突破日军的包围圈，由内线转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地方部队留原地区，分散隐蔽活动，和敌人兜圈子，寻机打击敌人，采取“敌进我进，避实就虚，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游击战。

四、在日军进逼以前，仍留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活动；待日军进逼、基本形成合围态势时，再开始突破一点向外线转移。

五、要搞好侦察、通信联络和保密工作。

吕正操及时地把冀中区这些反“扫荡”措施，电报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并得到批准。

四月底，冀中区党委召开了干部会议，吕正操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党政军民一齐行动起来，进行空前未有的反“扫荡”。他说：“将有十万鬼子兵‘扫荡’冀中区，进行凶残的烧杀。敌人将对我们进行闪击战，我们要对敌人进行脚丫子闪击战……。”

五月一日，日军开始“扫荡”了。就在这一天，冀中区党委和冀中总工会，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黄敬和吕正操都讲了话。他们分析了冀中区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了这次反“扫荡”的任务，并鼓励大家说，这次反“扫荡”是有胜利条件的，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敌人的兵力虽多，却象睁眼的瞎子，他们要捕捉冀中区的领导机关，叫他们摸不到。号召机关干部要分散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坚持斗争。要求部队采取机动配备，以隐蔽迅速的行动与敌人周旋，保存住有生力量就是胜利。纪念大会在进行中，日军的飞机便来盘旋侦察。吕正操抬头望望天空，然后又向会场环视，自信而风趣地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好，那就让他看吧！晚上再演场戏给他看，然后开始行动。”当天晚上果真演了戏，演的是曹禺的话剧《日出》。煤气灯照得方圆数里通明。

在坚持地区作战和向外转移的过程中，冀中八路军各

部队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在当地广大群众的配合下，避实就虚，内线与外线结合积极地打击敌人。从五月一日到六月底，在两个月的反“扫荡”中，我冀中部队共作战二百七十二次，击毙日伪军三千八百九十一名，击伤日伪军七千五百二十一名。冀中八路军主力部队伤亡指战员四千六百七十一名，区县游击队损失五千三百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六万人。

在反“扫荡”中，吕正操和黄敬率领领导机关和随行部队，从五月二日出发，转战冀中各地，时而西进，时而东进，时而向南，时而向北，在掌史指挥部队坚守阵地，并适时突出重围。参战的二十七团，指战员英勇果敢，沉着应敌，使日伪军的伤亡高达七八倍。仅以一个团的兵力，保卫了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安全突围，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因而受到了中央军委的电令嘉奖，被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

掌史突围后，吕正操和黄敬率部队顺利地走到冀鲁豫军区驻地，受到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等的热情接待。八月底，他们向太行区转移。到涉县时，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来迎接。转天，彭德怀来看望，向吕正操表示亲切慰问。在八路军总部期间，吕正操、黄敬向中共北方局和总部机关汇报了冀中“五一”反“扫荡”、两面政权以及斗争策略、经验教训和冀中广大军民英勇抗敌的光辉事迹。总结这一段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吕正操概括为以下

四点：

一、在敌人以优势兵力四面出击合围的情况下，采取避实就虚、不硬拼、突破包围圈、及时转到外线作战的方针，是正确的，必要的。

二、敌人此次作战，是从多路出击围攻根据地中心地区。冀中军区的行军路线则专走县与县交界，军区与军区交界，河流、公路、铁路两旁，这些地方敌人守备力量薄弱，往往不被注意，不易形成包围圈，不致四面受敌。

三、加强侦察情报工作，准确地了解敌情，作出机警破敌的决定，严格保密工作。在四五十天的反“扫荡”中，几乎是夜夜行军，风雨无阻，长距离折角转移，使敌人捕捉不到八路军的影子。

四、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是严重教训。对敌人长期驻军，搞“剔抉清剿”缺乏思想准备，在一段时间形成被动。

吕正操等在八路军总部住了一个月，除了汇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也听了刘少奇关于战略战术、统一战线、合法与非法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几次重要报告，深受教育。十月下旬，敌人对太行地区也开始大“扫荡”。吕正操等就此离开总部，从昔阳、左权（即辽县）穿过正太路，回到晋察冀的平山、阜平一带。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在阜平温塘召开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参议会。吕正操作为一名参议员，参加了大会。会

后，他就回到当时的冀中军区驻地唐县张各庄。二、三月间，冀中各地委书记不断到路西来汇报冀中区军民反“扫荡”、反“清剿”、反封锁及坚持对敌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听了汇报以后，吕正操作了一次综合性的报告，经文字整理，以《穿插在沟线中的游击战争》为标题，刊登在延安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的《解放日报》上。

## 七

一九四三年八月间，中央军委来电，调吕正操带冀中军区六个主力团去延安。途经晋察冀军区时，聂荣臻告诉吕正操，他将同行到延安开会。九月初到达晋西北兴县时，贺龙在那里等候，告以中央电令吕正操留在晋绥军区任司令员。

这样，吕正操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冀中。吕正操虽然不是冀中人，但是他一直把冀中当作自己的家乡。他长期生活、战斗在冀中这块土地上，和这里的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他对冀中人民，对冀中的河流、村庄、田野、甚至一草一木，都是深深怀念的。吕正操也正是在这里，在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成为叱咤风云的抗日名将，成为民族的人民的军事将领。

吕正操带十八、二十七、二十九团于八月下旬开往晋绥二分区。接着，十七、二十二、二十六、三十二团和警

备旅第一、二团也相继开到晋西北地区。

晋绥边区，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敌后解放区之一，为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也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要屏障。

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兴县蔡家崖，中共晋绥分局住在北坡，相距很近，吕正操和分局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林枫经常见面商讨工作，推心置腹。吕正操和林枫合作得很好。

吕正操带部队刚到晋西北，就碰上了一九四三年秋季反“扫荡”。由于冀中来的部队原来一直在平原上活动，初到山地打仗不习惯。这次战斗是由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士第指挥的。为了粉碎敌人“蚕食”根据地的阴谋，晋绥边区的党政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广泛地开展起“挤”敌人的斗争，一九四三年边区军民共“挤”掉了敌人五十八个据点，收复了一千多个村庄，粉碎了日军大小“扫荡”十三次，取得了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提高了部队的士气，振奋了民心，使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得到根本改变。

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上旬，晋绥分局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吕正操在会上介绍了冀中区开展爆破运动的经验。林枫代表晋绥分局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民兵的爆破运动，他号召通过爆破运动来扩大民兵队伍，提高民兵的战斗力，培养智勇双全的民兵英雄。各级党组织和各地民兵坚决贯彻执行了晋绥分局的这一方针，开展了群众性的爆破运动，

取得了显著战果，对敌人造成严重的威胁，把敌人的凶焰打了下去。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曾记述晋绥边区开展地雷战的情景：

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有一个村庄由于这一方法运用得很成功，以致他们坚信自己摆脱了邻近据点的威胁。据点的四周是一个密布地雷的战场，民兵昼夜巡逻，防止日本人突然袭击。日本人虽然迫切需要水，但是却不能出来取水。我到达该地时，据点已经被围困二十天了。我问村民，他们是否愿意军队留下来帮助他们攻下那个据点。他们回答："不，我们自己可以处理它。"十天之后，他们攻下了那个被包围的据点，疲惫的守军没有什么抵抗，一半被击毙，另一半投降了。

福尔曼在介绍了自己的亲身见闻后说，这些，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原始武器的效果优良，而是在于它清楚地反映出人民的作战精神。一个人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能面对敌人可怕的现代化武器想出这些"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日军对地雷战是非常惧怕的。太原敌人出版的日文《东亚新报》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报道中惊呼："凡有民兵的地方，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爆破运动的广泛开展，更加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术，使得人民战争大放异采。

一九四四年春天，林枫陪吕正操到各军分区调查地方

和部队的情况。林枫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虚怀若谷、待人以诚的品格，使吕正操佩服，并深受感动。这一年，晋绥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各项工作大有起色，军民丰衣足食，兵强马壮，可以说是晋绥边区的“黄金时代”。

晋绥边区军民贯彻执行“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进行了很多出色的战斗。最大的一次战斗，是九月十四日至十七日进行的汾阳战斗。当时中外记者参观团正好赶到这里，他们登上靠近汾阳的山上，俯视城关战火，拍下了激战的情景。他们把自己目睹的这一次胜利的战斗，向世界作了客观、真实的报道。吕正操在军区司令部会见过中外记者代表团，并同他们亲切交谈。他们在晋绥进行了一个多月实地考察并加以如实报道，反映了晋绥军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实况。这些报道让全世界知道了中国抗日战场的事实真相，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诬蔑。

一九四四年冬，吕正操和林枫同行，作为晋绥边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去延安。到后两三天，毛泽东就接见吕正操和林枫等人。吕正操早就给毛泽东去过信，表示了想到延安学习和会见毛泽东的愿望。但当他来到毛泽东跟前时，好多心里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倒是毛泽东先开了口。毛泽东提到了那封信，微笑着说:“你那封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

操三个字。干吗要把三个字连成一个字呢！”吕正操笑了笑，没有回答，心里感到很不安。这天，毛泽东留林枫和吕正操全家在他的窑洞里吃了午饭。因时间关系，未能详谈，毛泽东让他们改日再去。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又派人用一辆大汽车把吕正操和林枫接到枣园，吃晚饭时，他们边吃边谈，一直谈到深夜。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冀中、晋绥，用“挤”的办法，快把日本人挤出去了。现在恐怕要有人来挤你们来了。吕正操说，再把他们挤出去。毛泽东说，对！你们冀中有八百万老百姓，晋绥有三百万老百姓，加起来力量可不小呢。听了毛泽东的话，吕正操又想起了一九三九年正当冀中军民抗战进入困难阶段的时候，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派一二〇师来支援的情景，不觉有一股力量油然而生。吕正操和林枫告辞出来，毛泽东还亲自端着蜡烛照明，送他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在延安，吕正操还由林枫带着去见过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中共“七大”开会前，吕正操学习了《六大以来》反教条主义的文件和党的历史，了解了党内的斗争，并参与酝酿“七大”中委和候补中委。

在延安，吕正操还见到刘澜波、李延禄、李范五、解方、贾陶等许多东北的同志，并在“七大”东北组召开的东北工作会议上参与讨论打回老家去的问题。吕正操与林枫、孙志远等一起，形成了关于东北工作的领导中心。刘

澜波、解方等对吕正操讲:“你留在冀中坚持抗日是留对了。我们丢掉了许多机会……结果只剩下常恩多一个师拉过来了。”吕正操说:“不是我留对了，而是北方局有明确指示。”大家对东北军力量的保存和成长是非常关切的，看到吕正操率领的队伍在冀中站住了脚，壮大了力量，感到由衷的喜悦。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吕正操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会后，各地代表都纷纷奔向自己的岗位。吕正操没有即刻返回晋绥，而是留在延安，结合“七大”文件，联系党内斗争的历史，又反复阅读了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和《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进一步提高了理论水平，更加深了对党的历史的理解。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八月十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朱德总司令立即向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向所在地附近的日军、伪军发出通牒，限时间向我军缴枪投降，听候处置。如遇反抗，坚决予以消灭。并派出部队对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负责一切行政事宜。

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

的方针》的讲演，指出："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当晚中央又召开了战斗部署与分配任务的会议。散会时已过午夜，吕正操和林枫、孙志远赶回住处时已是凌晨二时。清早，吕正操和孙志远就离开延安，奔赴绥远前线。不久，吕正操就由绥远率部向东北挺进，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打回老家去"。

## 八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朱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收日满敌伪军投降，命令吕正操率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八月十四日吕正操和孙志远由延安出发时，即电令第一分区马仁兴带二十七团赶往绥远，协同五分区姚喆部攻占归绥城。吕正操到兴县后，即和孙志远、许光达带三十二团和三十六团赶往绥远增援。他们到达绥远的清水河县，首先解决了马占山的土匪部队。前进到凉城和马仁兴会合后，又在凉城消灭了傅作义暂编一〇一师一个团。接着，又先后攻占晋北左云、右玉等城。这时，接军区转中央电告，要吕正操带队到商都去和苏联红军联系，接取苏军缴获的伪蒙军武器。十月中旬，吕正操

带队到达商都，和苏军会合，接收了武器。在商都，吕正操接到中央来电，令他先带一个团赶往东北沈阳。

吕正操于十月下旬到达沈阳。稍事休息，他即到中共东北局办公地点会见彭真、肖劲光、伍修权、叶季壮等。东北局书记彭真向吕正操谈了我党在东北的作战方针和任务，指出：主要是依靠关内来的一万干部、十一万部队，配合苏军占领东北，保住沈阳，拒敌于山海关内。要求吕正操把带来的部队进驻沈阳，一面扩大部队，一面保卫沈阳。这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已经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为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总司令，肖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

吕正操部扩编成两个旅。为扩大部队培养干部，又成立了军官学校，吕正操兼任校长。

十一月下旬，因苏军履行条约的义务，决定把沈阳交给国民党，我军被迫撤出沈阳。为解决这个问题，东北局在铁西召开会议，由彭真主持，决定成立东、西、南、北满四个分局和军区。西满的负责人是李富春、吕正操和张平化。

中共西满分局，为贯彻中央提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经请示东北局，成立了西满清霸动员委员会，并同时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反奸清霸运动的指示》，指出：争取东北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放手发动东北

人民，以东北人民自己的力量，最彻底地摧毁日伪法西斯的统治，同时也就是削弱与国民党反动派结合的社会基础。于是，西满地区纷纷开展了群众性的清霸运动。在清霸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成立了贫民会，加强了政权建设，发展了党的组织。西满地区的剿匪反霸斗争，在西满分局的领导下，也获得了重大战果。

一九四六年二月，吕正操到抚顺参加东北局召开的会议，不久即转移到梅河口继续开会。吕正操代表西满分局，汇报了西满分局成立以来的工作。其主要点：

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第一必须力争控制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以便开展广大农村工作。第二必须迅速切实地放手发动广大乡村农民群众来巩固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的控制，恢复农村经济，发展手工业，改善农民生活，发展中心城市轻工业，吸收失业工人，并开辟对外贸易，有效地包围孤立大城市。

必须坚持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争取多数打击少数的原则，争取大多数的中间分子到我方面来。现在要以民族斗争的口号——肃清敌伪残余的反奸清霸运动，作为发动西满人民的起点，广泛吸引与照顾中间阶层参加，以基本群众作基础，发动大规模的人民运动。

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善于等待与启发人民的觉悟。目前应当紧握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广泛开展反内战的运动。

力争时间，迅速地适当发展主力部队与发展干部力量。在三个月中，经过与国民党作斗争，扩大与巩固控制地区，发动群众，整编部队，消灭土匪，有计划地解决财经任务，以奠定根据地的相当基础，并发展三十万大军的战斗力量，即可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西满工作还应特别注意：力争控制由齐齐哈尔至大虎山的干线，保障西满军事的机动与经济发展，并努力建设骑兵；努力开展蒙古工作，保持辽西阵地与巩固的后方；与冀热辽保持密切联系，为共同保卫冀热辽与西满而斗争；经济上力争自力更生，发展工商业，但又要得到东满、南满、北满的帮助；西满地区，特别是冀热辽地区，为敌我必争之地，必然艰苦与困难，要准备长期坚持斗争。

梅河口会议之后，吕正操随东北局到吉林小住数日，又随东北局转移到长春。在支援四平作战中，吕正操负责管后勤运输，保证前方的物资供应，并附带察看长春周围地形，准备林彪、罗荣桓回来时汇报。林彪和罗荣桓从四平回到长春后，吕正操即将长春周围地形作了汇报。林彪讲，部队疲惫不堪，损失很大，不能再打了，要立即撤出长春，退到哈尔滨。到哈尔滨后，成立了松花江防守指挥司令部，吕正操任司令员，谭政任政委，任务是准备敌人进攻时掩护我方从哈尔滨撤退，并破坏铁路和炸毁松花江的两座大桥和桥头堡。六月初，松花江防守指挥司令部撤

销，吕正操即回哈尔滨，仍做铁路工作。

自从离开西满，直到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吕正操在东北主要是负责铁路修复和运输工作。刚解放的东北大地，到处是战争的创伤。铁路被破坏得百孔千疮，大部分线路被拆毁，桥梁、涵洞多处遭破坏，通信、信号、给水、站台等设备都遭受了严重损坏。经大力抢修，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东北解放区的铁路通车里程已有四千六百九十多公里。这些铁路均由各地方铁路局分散管理。东北局为了加强对铁路的管理和统一指挥，更好地支援前线作战，一九四六年七月成立东北铁路总局，任命吕正操为总局长兼政治委员。一九四七年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东北铁路总局改称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到辽沈战役前，东北解放区又接收和修复铁路五千七百多公里，通车线路里程达九千八百一十八公里，占全东北通车线路里程的百分之九十八，修复机车八百八十五台。这就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四八年八月下旬，东北铁道部接到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的紧急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秘密的情况下，把在东线的部队迅速运送到西线的新立屯、西阜新等地区，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打击；为保证前线作战的胜利，要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运两千万斤粮食和作战物资到前线；为堵截与包围长春之守敌，要从后方向吉林、四平运送十九个独立团；同时，还要准备几个列车随时供

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机动运输之用。东北铁道部党委认为，这次军运关系到东北战场战略部署的实现，关系到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胜负。党委决定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保证这次军运任务的胜利完成。随即迅速、周密地进行运输准备工作。九月十二日军运全面展开，在九天之内，共运送了六十四个军列，把近十万大军安全、迅速、及时地送上了辽西前线，胜利完成了大兵团调动的运输任务。九月二十八日，东北铁道部接到东北野战军总部的电报，表扬铁路员工在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完成了军运任务。

在辽沈战役中，由于敌机狂轰滥炸，频繁袭扰，使铁路遭到破坏，运输堵塞。东北铁道部采取了紧急措施，抢修抢运，有力地支援了辽沈战役。十一月二日，沈阳、营口宣告解放，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线一万零九百四十公里的铁路至此全部回到人民手中。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吕正操从东北赶来参加会议。会前他分别看望了中央的领导同志。吕正操去毛泽东那里时，正在伏案阅读文件的毛泽东见吕正操进来，劈头就说：你写的文章——《怎样办好铁路》，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这指的是吕正操写的《论乘务负责制》，此文发表在《东北日报》上。吕正操对毛泽东说：我讲的有不少是外行话。毛泽东微笑着说：外行可以变成

内行嘛！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军委铁道部，滕代远任部长，吕正操和武兢天任副部长。会后，吕正操即赶回哈尔滨，决定由东北铁道部抽调干部的名单。四月初，吕正操到北平军委铁道部任职，负责运输工作。

## 九

吕正操是新中国铁路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建国后，军委铁道部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吕正操仍任副部长。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吕正操兼任抗美援朝运输司令员。抗美援朝结束后，吕正操兼任军委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滕代远因病疗养，吕正操代行部长职务。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滕代远因病离职，吕正操代理部长职务。一九六四年八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吕正操到西南修铁路，负责西南三线建设工程。当时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任副总指挥。一九六五年一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吕正操被提名任铁道部部长。吕正操长期致力于新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旧中国的铁路，遭受长期战争的严重破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解放前夕，全国两万一千多公里铁路，勉强维持通车的仅剩一万一千多公里。铁路不仅数量少，质

量低，而且布局偏，大部分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西南、西北地区几乎没有铁路。建国后，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七年间，铁路事业发展波澜壮阔，建设速度快，运输效率高，服务质量好，铁路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好的声誉。旧线经过修复、改造，并修建了许多新线，根本改变了旧中国铁路的面貌。仅据一九五九年的统计，短短十年内通车里程已达到三万二千多公里。铁路干线已伸进西北、西南广大地区，除西藏外，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在铁路建设中，修建了许多艰巨复杂的工程，穿越秦岭的宝成铁路，横跨海峡的鹰厦铁路，飞渡长江的武汉大桥、南京大桥等，其规模之宏伟，技术之精湛，建设速度之快，都是世界少有的。

旧中国没有机车车辆制造工业，甚至修理用的主要配件，也要仰赖外国。十七年间，建立了年产成千台机车、几万辆客货车的机车车辆制造工业，自己设计并且成批生产了强力机车、大型货车、特种货车、新型客车。还试制出了电力机车、内燃机车，揭开了我国牵引动力革命的序幕。

在吕正操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期间，铁路事业发展很快，成绩卓著。吕正操在总结铁路建设的经验时说：我们已经摸索到一条我国铁路建设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全面协作，两条腿走路，综合经营，高速度地建设铁路，高效率地使用铁路。坚持这条道

路，将大大加速我国铁路建设。吕正操对我国铁路事业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满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现代化的四通八达的强大的铁路网，将密布在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

但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骤起，铁路部门首当其冲，受到猛烈冲击，铁路运输这条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遭到无可抵挡的破坏。文革初期，在周恩来总理昼夜操劳亲自坐镇指挥与多方保护下，吕正操勉强支撑应付着剧增的计划外运输的艰难局面。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凌晨，林彪、江青一伙竟然将煽动铁路停车，阴谋中断铁路运行的罪责横加于吕正操。一时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的帽子横空飞下。此后，吕正操处于被迫停职、连续遭揪斗的逆境，进而又被安上“东北叛党集团”主犯的罪名关押了七年多。吕正操身陷囹圄，专心读书，静观其变。直至一九七四年盛夏，在周恩来总理密切关怀、多方保护下，加之多层次多渠道营救，以及他自己多次上书毛泽东，终于在毛泽东亲自批示限期“八一见报”的强令催办下，始得冲破江青及其爪牙的百般阻挠在坎坷中恢复了工作。一九七五年一月，吕正操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年夏，吕正操调任铁道兵政委。粉碎“四人帮”以后，吕正操参加了中共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之后，他又参加了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

员。他还担任过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一九八八年，吕正操因年事已高离职休息。

此期间，吕正操业余兼职繁多，有全国网球协会主席、中国铁路老战士协会名誉主席等，各方来访应接不暇。

吕正操从铁道兵政委离职退居二线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工作更加灵活主动。除一九七八年、一九八〇年两次应邀随中国铁路代表团出国，到罗马尼亚、瑞典、加拿大、美国等国考察外，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工地现场。他还到边远地区实地考察，并写出有关国民经济、以铁路为主的综合运输、青少年教育、反对不良倾向、整顿党风以及改革开放等多方面的调查报告，对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中的失误大胆地提出批评，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他的调查报告，得到中央及有关方面重视，其中有的问题经中央批转印发有关部门参阅，深得各界有识之士的赞赏。

吕正操离职休息后，仍保持与各界社会人士的友好往来及中青年骨干和知识分子的广泛联系，保持着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习惯，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科技等书刊读物广纳博览，尤以轶事趣闻记忆清新不忘。由于吕正操见多识广，思想开放，言谈风趣，因而各方人士乐于与他交往畅谈。吕正操和不同年龄的人，不管旧交或初识，都能谈笑风生。

特别应当提及的一点是，吕正操早在青年时代就养成

对网球运动的爱好。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敌后战场，冀中平原，晋绥山坡，往往就麦场空地，也要和黄敬、孙志远及林枫等打上一场简易的网球赛。建国后，根据国家体委的分工，吕正操担任全国网球协会主席至今。除文革中被关押的期间外，数十年如一日，他总是挤时间坚持网球运动。由于坚持网球锻炼，他虽年逾八旬，仍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耳聪目明，朝气蓬勃，每当兴致所至，总是乐而忘返，置年龄乃至生死于度外。他在《川滇之行》一诗中写道："最喜夕阳无限好，人生难得老来忙。"这可看作是他晚年生活的格言，也是他革命情操的真实写照。

吕正操对国内外大事极为关切，公而忘私，直言不讳；同时他又是一位心胸开阔、不拘小节、童心未泯、公认为一身正气的健康老人。

一九五五年，吕正操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同时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吕正操的主要著述有：《论平原游击战争》、《如何办好铁路》、《铁路十年》、《怀念英雄的冀中人民——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回忆》、《冀中回忆录》、《吕正操回忆录》等。

（郑 尚 可）



刘 畤 西



# 刘畴西

## 一

刘畴西（1897—1935），湖南省长沙县（今望城县）靖港人，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到他父亲刘国忠手上，已有水田十多亩。刘畴西是家庭从花山岭迁到沙围子竹篱笆屋场后出生的，在八个兄弟中排行第五，小时候取名“刘五成”。

刘畴西的父亲一心想使家底丰厚，辛劳耕作，且家教极严，总是板起面孔训斥儿子们：“不许偷懒！”刘畴西自小放牛割草，挑水劈柴，有时候随父兄下田劳动。每到晚上，他还得烧上一炷香火，给“赵公元帅”磕头，祈求保佑。直到刘畴西十二岁那年，目不识丁的父亲被豪绅作弄，白白多捐了几石谷子，这才使他横下一条心，送刘畴西去念私塾，以期支撑门庭。

辛亥革命后，湖南光复，创办了一批新学堂。刘畴西于一九一二年夏进入靖港镇长沙县立第四高小，正式取了个学名叫“刘梓荣”。他从小爱看《三国演义》、《水浒

传》，深受影响，在班上敢于仗义执言，打抱不平。这时，他对那些“推翻满清，创建民国”的英雄们更为仰慕，向往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

一九一五年初，有个叫郭亮的学生，因写了一篇《问问社会》的作文，被铜官镇西湖寺高小退学，转到仅一江之隔的第四高小就读，与刘畴西同班。郭亮小刘畴西三岁，他俩都是血性少年，很快就成为一对密友。这年五月，第四高小召开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大会，校长徐继规（同盟会员）老泪纵横，慷慨陈词。刘畴西、郭亮等同学激动万分，跃上讲台大声疾呼：“我们不当亡国奴，坚决反对卖国条约！”他们还带领一些同学往靖港码头作宣传，号召“中国人不坐日本船”。当时，日本戴生昌轮船公司，为招揽生意，垄断湘江客运，贴出“乘船免费”广告，有时还赠毛巾、肥皂、香烟、火柴之物。刘畴西就对众人说：“我们的爱国心，不是一条毛巾、一包香烟所能收买的，大家快去坐自己同胞开的船呀！”人们听后，纷纷离开候船的“洋棚子”，气得日商咬牙切齿。

不久，袁世凯派军阀汤乡铭督湘。湖南各界对汤乡铭鼓吹复辟帝制的行为极其愤怒，趁云、贵发动护国战争之机，奋起驱汤。此时，刘畴西已与郭亮一同考入长沙市长郡中学，都在第二十三班学习。他们参加了省会的“驱汤运动”。袁世凯倒台后，汤乡铭也被逐出湖南，长郡中学为此举行了庆祝会，刘畴西与郭亮等同学都登台赋诗，庆

贺胜利，他还当众郑重宣布："我要改名为刘武臣，下决心习武，做国家的忠臣。"大家都拍手叫好。

郭亮在长郡中学只读了两年，因经济窘困而辍学，回家乡铜官镇作了小学教员。刘畴西对挚友的处境极为关切，曾发动同学们解囊相助。不久，五四运动的浪涛在湘江两岸奔腾，刘畴西读到《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立即投入学生运动的洪流。他曾代表长郡中学出席省学联成立大会，他还组织学生罢课、游行，推动长沙工人的罢工和商人的罢市斗争，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他还作为国货维持调查员，带领一些学生，臂带袖章，手提木棍，封查日货。对那些偷换标签的奸商，便在其招牌上大书："亡国奴，卖日货。"一天，他们发现"华泰长"洋货店以日货冒充国货出售，便将该洋货店的日货全部没收，在省教育会坪焚烧。据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湖南《大公报》报道："一时，日货狼藉满地，旁观之人无不拍手称快。"由于学生爱国运动高涨，省长张敬尧极为恼火，发出《告诫学生的训令》，称"倘有听信谣言，固执己见，荒废学业，游行市街者，本省长为维持治安、预防祸患起见，定当遵照命令严加制止！"刘畴西等没有屈服张敬尧的压力，他们分组赴长沙县属各乡镇演讲，号召"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湘"。他还把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爱国传单和小报带给郭亮。郭亮就是在这些宣传品中读到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的。郭亮对

他非常感激，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弟与兄共灯对榻者，前后六载，于兹知己，其情无殊手足。”

一九二〇年秋，二十三岁的刘畴西在长郡中学毕业，抱着将来做一名教育家的志向，邀郭亮一起报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被录取在第二部第二班。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是长沙有名的人才荟萃的学府，徐特立、杨昌济、毛泽东、黎锦熙、熊瑾玎、陈昌、李达、方维夏、李维汉等先后在此执教，大开一代新风。刘畴西的同学中，除郭亮外，还有夏明翰、夏曦、肖述凡等一批英姿勃发志向远大的青年。刘畴西在这个革命摇篮里学习、生活了两年，他与进步师生交往密切，关心国事，抨击时弊，思想与时俱进。当时，学校里各种思想和政治派别异常活跃，经常发生争论，其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颇大。刘畴西毅然选择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俄罗斯研究会”的活动，使他懂得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的真理。他与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他还与郭亮、夏曦等进步同学，根据毛泽东“到群众中去”的倡导，深入到一师附近的造币厂、黑铅冶炼厂、玻璃厂作社会调查，常“深夜不归”。这年冬，他与郭亮等进步同学在一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后，他常去毛泽东、易礼容等创办的文化书社阅读进步书刊，去毛泽东、何叔衡等开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参加由中共湖南支部组织的社会活动，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一九二二年

夏，他在一师毕业前夕，由郭亮、夏曦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 二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在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进入低潮时期，刘畴西受党组织的派遣，以教书作掩护，到粤汉铁路北段秘密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并着手在广州东郊长洲岛开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三月间，毛泽东、何叔衡受黄埔军校筹委会委托，在湖南招生。何叔衡离广州返回长沙，通过中共湘区委员会秘密通知各级党的基层组织，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清水塘预考。当时，刘畴西正在湖北省任小学教员，接到湖南党组织发出的通知时，预考期已过，他便持党组织的推荐信，径直由武汉往上海参加复试。与此同时，已预考的湖南考生由赵自选带队，也到了上海。

上海复试由国共合作上海执行部委员毛泽东主持。刘畴西除了参加复试，还补考了《试述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的作文，以“刘仇西”署名。他对同伴们说：“列强如此欺侮我们，不报此仇，非炎黄子孙。今后，我就改名刘仇西。”文中，他历数帝国主义侵华罪状，鞭挞了北洋军阀为虎作伥的行径，表达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愿望和从军救国的决心。毛泽东认为，湖南送考的学生，思想文章都好。

上海复试后，刘畴西与赵自选、陈作为、袁仲贤、王尔琢、郭一予、郑洞国等一起，乘海轮赴广州，参加全国复试。

全国复试，刘畴西各科成绩优良，以正取生资格，于五月五日到黄埔军校入学，编在第一期第一队，与徐向前、蒋先云、陈赓、左权、蔡升熙、许继慎等同学同在一队。他们常在一起研讨军事，议论政治，如切如磋，形同手足。

黄埔军校初办时，只有三十支步枪，仅敷岗哨使用。到八月间，苏联政府首批为军校运来俄式步枪八千余支，子弹四百万发。刘畴西与同学们敲锣打鼓迎接，随即上船搬运。从早晨忙到黄昏，肩挑背扛，皮肤磨破了，垫上衬布又继续干，他们兴奋地说:“好啦，革命有本钱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军事教学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典、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军制学等理论课；术科包括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军事技术。每日三操两课，异常紧张，有时晚间还要紧急集合，长途拉练。刘畴西投入严格的训练生活，泥里滚，水里爬，从不叫苦叫累。在他的成绩单上，门门课程都是优秀，因而他常在队前受表彰。

不久，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策动广州商团武装叛乱。黄埔军校学生义愤填膺，请

缨杀敌。刘畴西所在的第一队学生军首先投入战斗，攻入商团盘踞的西关大楼，将反动的商团武装缴械，为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清除了一个隐患。当时，在革命阵营内部也隐伏着一股暗流，国民党右派极力排斥共产党和革命左派力量。为了把进步学生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支持下，组建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支部书记是蒋先云，刘畴西、陈赓等为支部委员。他们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在一期墙报上，他们画了一幅漫画，挖苦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向孔夫子乞求“理论根据”。他们还多次组织讨论会，与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贺衷寒、林振雄等展开辩论，揭露了这些所谓“孙中山信徒”的真面目。通过积极宣传和开展斗争，争取到校内外更多青年军人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刘畴西热情地为会刊《中国军人》和旬刊《青年军人》组织稿件，星期天他还把这些刊物背到驻粤桂军、滇军中发行。“孙文主义学会”把刘畴西视为眼中钉，处处刁难他的活动，把他列入“军校 CP 活动分子”名单，准备暗害，只是慑于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才未敢下手。

一九二五年初，盘踞在广东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企图进犯广州，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广东革命政府于一月十五日发布《东征宣言》，决定以黄埔学生为主力，组成学生军，辖两个教导团，出兵平

叛。士兵是临时从广东、湖南、浙江等地招募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各级军官由黄埔师生充任。刘畴西等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只经过一个月的入伍训练、六个月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就提前毕业了。刘畴西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被分配到第一教导团（团长何应钦）第一营第三连任党代表。党代表制度是仿效苏联红军、在中国军队中第一次实行的，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党务工作和群众工作，刘畴西很乐意承担这个职务。

学生军刚组建，便立即开赴战区。二月一日乘坐兵船离开黄埔港，在东莞县石龙镇登岸，沿广（州）九（龙）铁路前进。刘畴西所在的第三连奉命先行，在樟木头至塘头厦之间，与一股叛军遭遇。刘畴西与连长、三个排长（都是黄埔第一期同学）商议，决定趁敌人不明虚实，先发制人。叛军虽势众，但士气不高，武器都是单响枪，不如学生军，一经接火，就被打得晕头转向，赶紧后撤。刘畴西等率第三连乘胜追歼，进抵距深圳以北二十公里的平湖，转向东进，经龙岗迫近惠州南的淡水，与叛军洪兆麟部对阵。

东征行军途中，部队凭两只铁脚板，每日疾走数十里。为鼓舞全连士气，刘畴西身先士卒，一面宣传东征的意义，一面组织革命积极分子为掉队士兵扛枪。这种官兵一致的新风，与军阀部队判然两样，许多新兵表示愿效死力作战。为了在东江老百姓心目中树立国民革命军的威

信，刘畴西命令全连士兵严肃行军纪律，保护群众利益。每到一处宿营，刘畴西都派人在民宅的屋门贴上“民众住宅，不得进入”的字条，并约束士兵只能在户外问事。部队进军迅速，后勤供应接济不上，特别是吃菜困难，刘畴西教育士兵不得在农家菜地采摘，应找主人作价购买。第三连秋毫无犯，老百姓感慨地说：“从前这里过军队，见什么就抢什么。现在你们吃点菜都给钱，这样好的军队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过。”刘畴西认真执行东征军政治部发布的“不筹饷，不拉夫，现款雇役，力资每公里银毫两角”的规定。在雇役的民夫中有些是妇女，刘畴西常劝她们少挑一点。妇女随军外宿不便，刘畴西就让她们提前卸担，趁早赶路回家。由于第三连纪律严明，军民关系好，受到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称赞，他认为第三连给基层的政治工作做出了表率。后来，东征军各部均仿效实行，给东江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盛赞黄埔学生军为“仁义之师”。

二月十三日，刘畴西在淡水城外侦知，陈炯明已派一旅士兵增援淡水，学生军将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刘畴西即将这一敌情报告东征军总指挥部。十四日晚，东征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苏联顾问向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建议：利用春节期间城上守备减弱，挑选敢死队架梯爬城攻入，以迅速结束淡水战斗。于是总指挥部挑选了由十名营连党代表和百名士兵组成的奋勇队攻城。十名党代表中，刘畴西、张际春、李奇中、郑洞国等八人是共产党员，由张际

春担任奋勇队队长。十五日拂晓前，奋勇队轻装奔袭，摸到淡水城下，架竹梯爬城。由于被敌军发觉，遭敌射击，奋勇队员伤亡过半，刘畴西奋不顾身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率先攀上城墙，与敌展开搏斗。搏斗中刘畴西被敌刺伤，他毫不退缩，咬紧牙关，与敌血战。后续部队趁机炸开城门，蜂拥而入。战斗在上午八时胜利结束，俘敌千人，解放淡水，洪兆麟夺路逃脱。

两天后，洪兆麟卷土重来，率近万人进抵平山，企图夺回淡水。敌不惜代价，接连发动三次冲锋，都在学生军的顽强抗击下败阵，横尸在阵地前。在进攻的敌人动摇之际，刘畴西与战友们跃出阵地，英勇反攻，敌溃逃。他们又乘胜追歼溃逃之敌。当他们抵达海陆丰地区时，受到彭湃领导的农民协会会员的拥护和欢迎。接着，学生军于二月二十六日占领普宁、揭阳。

洪兆麟近万人的部队竟被三千初出茅庐的学生军打败，陈炯明恼羞成怒，重新集结数万余众，由部将林虎、李易标带领，自兴宁、梅县南下，誓与学生军决战。三月十二日晨，刘畴西所在的学生军第一教导团，在棉湖西北山地与敌林虎主力打响，激战八小时，战线延伸了数里，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由于学生军第二教导团未能及时驰援，敌三面合围，全力猛攻第一教导团。战斗打得十分艰苦，第一教导团伤亡严重。特别是楔入前沿阵地的刘畴西等率领的第三连，已损失过半。面临强敌，刘畴西等仍

率部坚守，寸步不让，接连挫败敌人五次冲锋。黄昏时第二教导团赶到，向敌右翼冲击，顿时敌阵地出现混乱。刘畴西见援兵到达，敌军阵乱，立即向全连喊道:“同志们，敌人动摇了，要抓住战机，坚决把敌人打退!”接着他又高声鼓动:“打仗无秘诀，你不怕死，死就怕你，大家跟我冲吧!”他用力拔出阵地前的旗帜，向前一指，带头跃出战壕。敌人被学生军震耳的呐喊声和枪炮声吓懵了，稳不住阵脚，被迫后撤。突然，一颗流弹击中刘畴西擎旗的左手，鲜血顺着旗杆滴滴流下。刘畴西强忍伤痛，不下火线，坚持战斗，高举战旗，继续冲在前头，终把战旗插在敌人的阵地上。

刘畴西由于伤势严重，战后被送入广州东山的博爱医院治疗。他的静脉破裂，血管溃烂，医生告诉他，只有割掉左臂，才能保全生命。刘畴西回答:“为了打倒军阀，性命尚可牺牲，割掉一臂又有何妨，请放心做手术。”

刘畴西投考黄埔军校前，已在家乡成婚。此时，他去信湖南家乡，要妻子杨淑纯来广州。仅隔一年不见，杨淑纯见丈夫断臂，已成残废人，心情十分悲恸。刘畴西开导她说:“切莫悲伤，革命免不了流血。我们的许多战友连生命都丢了，何况我只丢了一个胳膀。没有左臂，我还有右臂可以干革命。”

六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滇、桂军阀的内乱。战后，周恩来偕邓颖超到博爱医院，慰问东征负伤官兵。

周恩来走到刘畴西的床前，拉着刘畴西仅有的一只右手，站立良久，代表东征军指挥部宣布了给刘畴西的嘉奖令。黄埔军校也给刘畴西颁发了军功状，并由校长蒋介石批准，拨款为他装配了一只假手。

不久，陈炯明趁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叛之机，再次占领东江。国民革命军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刘畴西几次申请归队，均未获准。经他再三请求，才同意他出院，留后方在黄埔军校工作。

## 三

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发动了排挤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接着，蒋介石为了培植亲信，控制军队，又下令同时取消“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另组“黄埔同学会”，并规定该会对军校毕业生的任免、升迁、调补等项，有一定的自治权。六月二十七日，千余名黄埔师生在广州举行“恳亲大会”，刘畴西、蒋先云等被推选为第一期毕业生的代表，参与筹备黄埔同学会。刘畴西担任黄埔同学会组织科的统计员，负责掌握同学名册及其人事变动记载。不久他调任黄埔同学会总务科长。由于一批共产党员参与黄埔同学会的工作，为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活动争得了更多的合法权益。

七月初，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收复长江流域大片国土。刘畴西留守设在大后方的黄埔军校校本部。十

一月间，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黄埔军校由广州迁南昌，一九二七年三月又迁到南京。刘畴西到南京后，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义愤填膺。此时，“黄埔同学会”也成为蒋介石的御用工具，开始清洗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刘畴西愤然秘密离开南京，五月底经江西进入湖南。但“马日事变”后的长沙，也是一片白色恐怖，他只好回家暂避。在苦闷中，他幸好在铜官镇寻找到中共湖南临时省委的省委书记郭亮。郭亮正与柳直荀等组织长沙附近各县农民进攻长沙，见到刘畴西非常高兴，说：“我们正愁缺少军事人才，你来得正好，和我们一起干！”各县农民武装，号称十万余众，斗志高昂，高唱着“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战歌，浩浩荡荡向长沙开去。可是，这一壮举却被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所阻止，强迫农军撤退。由于湖南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刘畴西无法在长沙附近立足，便与郭亮一起乘车北上，赶赴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

当时的武汉，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集团正在策划“清党分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将两湖地区的大批工农运动干部，输入贺龙、叶挺部队，刘畴西被派到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师师部担任参谋。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叶、贺这两支中共掌握的革命武装，立即以“东征讨蒋”的名义，由鄂东

南乘船至江西九江，并于七月二十六日开赴南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屠杀政策。

在南昌市内心远中学的第二十四师指挥部里，刘畴西汗流浃背，协助叶挺制定起义计划。他按照起义军军事参谋团的部署，反复在地图上策划，建议把主攻方向摆在天主堂。叶挺于七月三十一日起草了“明四时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的命令，并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会议，号召务求全歼敌第六军一个团和第三军两个团。

八月一日凌晨，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刘畴西在设于松柏巷女子学校的第二十四师前方指挥所里，见到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并向他汇报了战况。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敌人固守的天主堂、贡院、新营盘等据点均被起义军攻下，整个市区一片胜利的喜悦，南昌回到人民手中。

八月四日，三万起义军按计划撤出南昌，打算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北伐。刘畴西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先头营营长，率部向南挺进。时值酷暑，战士们背着沉重的武器和被包长途跋涉，不少人中暑患病，加上第十师不辞而别脱离起义军，沿途群众也对起义军不理解，部队情绪不高。刘畴西不失时机地向部队进行革命乐观主义的教育，并以自身的模范行动率全营官兵南进。在赣南，敌以重兵钱大钧、黄绍　两部阻击起义军。刘畴西营奉叶挺命令，从洛口向会昌进攻，于岚云岭突破敌西北防线，向东突

围，由赣入闽。部队在福建长汀重新整编时，刘畴西调任团参谋长。

九月下旬，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的汤坑作战失利，损失惨重，分散突围。刘畴西带伤杀出重围后，发现自己身边仅有四人。路上，他们又遇到郭亮、柳直荀和王德荣，经商议，决定一起去海陆丰寻找党组织。敌人已四处设卡捉拿起义人员，路上行走不便，他们只得改走海路，先去香港，设法与内地取得联系，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他们埋了长枪，把剩下的三支没有子弹的短枪藏在身上，化装成老百姓，昼伏夜行，赶到韩江港，雇了一只机帆船，不料这是一只海盗船，饭菜里被投下蒙汗药，饭后他们即昏昏沉沉，全部衣物被劫，枪支也被搜去，将他们反绑起来，扔在一只舢舨上，任在海上漂流。

刘畴西等在海上漂流了三天三夜，被海风吹到北部湾海面。正当他们处境垂危之际，突然遇上一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商船。他们便一齐喊话呼救。柳直荀是教会学校毕业的，会英语，与英国船长攀谈后，船长答应送他们到越南西贡登岸。经过这段海上漂流历险，他们虽绝处逢生，但已衣不蔽体，身无半文。幸亏郭亮有个金裤带环没有被海盗发现，他们将其变卖，买了七张通舱船票，于十月二十七日到达香港。

十一月初，刘畴西等到达上海，由郭亮联系，找到中共中央。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周恩来鼓励他们不要怕挫

折，并给他们分配了工作。刘畴西因伤病交加，身体已极度虚弱，周恩来对他十分关心，安排他在上海休养一个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六大”通过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指出:“红军必须造就大量的军事干部。现在即应开始派人至国外由兄弟党办理。”由于国内军事斗争的需要，刘畴西经党组织选派，赴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这所学院里设立的中国班，主要任务是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和高级参谋人员。刘畴西早年在长沙读书时，英语成绩较好。到苏联后，他通过英俄对照阅读，很快熟悉了俄语。在两年时间内，他攻读了马列军事著作，努力掌握军事科学知识和参谋业务，并着手翻译苏联步兵操典，想带回国内训练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

一九三〇年五月，刘畴西和中国班的学员左权、刘伯承、刘云等，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命令，提前毕业，回国从事军事工作。当时，推行“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调集红军“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造成全国的赤色高潮，急需一批军事干部。刘畴西等立即启程，取道海参崴，经哈尔滨到达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分配去江西中央根据地，开始了红军的戎马生涯。

## 四

一九三〇年八月，刘畴西沿着三年前在南昌起义撤出时走过的山道，由闽西进入赣南。当时，红一方面军组建不久，刚撤出围攻长沙的战斗，千里回师赣西南。刘畴西到达江西中央根据地后，立即去红一方面军总部向毛泽东、朱德报到，被分配到红一军团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工作。

一九三〇年冬，在蒋介石指挥下，鲁涤平率十万国民党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诱敌深入，在龙冈设伏，歼国民党“围剿”军第十八师九千余众，活捉“围剿”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鏖战中，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红三军第八师师长龙芝道阵亡，红军总部立即命令刘畴西接替指挥。接着，红八师在师长刘畴西、政委王如痴的带领下，马不停蹄，于东韶拦腰截住敌人，与尾追而来的红军部队形成夹击之势，又将敌“围剿”军第五十二师（师长谭道源）歼灭过半。在祝捷大会上，红军总部表彰红八师“追如猛虎，守如泰山”，对保证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八师奉命在宁都一带分兵发动群众，组建地方武装，肃清根据地内部的敌碉堡和“土围子”。工作刚刚开展，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又派何应钦带领二十万国民党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

军事“围剿”。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仍使用诱敌深入的打法，调红八师从永丰星夜南驰，集结于东固地区，隐蔽了二十五天之久。战斗打响后，敌“围剿”军一个师被歼，俘敌副师长王庆龙以下四千多人（敌师长公秉藩也被活捉，但混在俘虏中未被认出，领到三块银元后逃脱）。接着，刘畴西率部随红一方面军主力由西向东横扫，十五天内，连续追歼七百余里，在水南、白沙、中村等战斗中，歼敌“围剿”军两个师又一个旅，继而又穷追不舍，在广昌再消灭敌“围剿”军刘和鼎师一部。战斗痛快淋漓地结束，一派“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红军军威大壮。

蒋介石连遭失败，十分恼火。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调三十万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红一方面军两战未得休整，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只能避实就虚。刘畴西与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红军总前委的命令，迈开铁脚板，自闽西建宁出师，向西翻越武夷山，克服盛暑困难连续行军十天，奔袭千里，赶向赣南兴国集中。在取得莲塘、良村两次大捷后，红八师佯攻黄陂敌“围剿”军周浑元部，歼其四个团。九月七日，红三军兵分三路，全面出击，追歼兴国北逃之敌。红八师为左路，从茶园冈出发追歼，歼敌“围剿”军蒋鼎文师一个旅。随后，刘畴西率红八师协同兄弟部队，在东固的方石岭包围并歼灭敌“围剿”军韩德勤师，仅韩德勤只身化装成

伙夫逃脱，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刘畴西率红八师英勇善战，指挥若定，被中央根据地人民誉为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

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中央政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红都瑞金开办一所红军学校，定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刘畴西毕业于黄埔军校，又在苏联专修军事，中革军委将他从主力红军调出，到红军学校协助校长肖劲光负责军事训练。红军干部的文化水平较低，要使学员听得懂、学得会，必须从学员的实际水平出发。刘畴西在制定施教方案时，提出以开设军事技术课为主，辅之以军事理论课。教学中他十分重视言传身教，尽管自己失去左手，仍和学员一道训练。他强调教学要结合红军反“围剿”的实际进行战例分析，使学员从背诵操典、条令中解脱出来，学会游击战争的战术运用。红军学校培养了大批军政素质较高的指挥员，周恩来曾评价说：“它比黄埔军校办得更好！”

蒋介石企图扑灭苏维埃运动的火焰，调动五十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前线反“围剿”战事又趋紧张。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刘畴西奉中革军委令重返前线，接替左权任红二十一军军长。红二十一军是一支由赣南地方武装独立第三师和第六师合编组成的部队，枪械弹药均很匮缺。刘畴西到职后，与政委李井泉率红二十

一军转战闽浙边境，开展游击战争，使部队得到较大发展。一九三三年一月，红二十一军奉命配合红军主力军团作战。当时，虽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以正确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组织了黄陂战役。红二十一军配置在红三军团左翼，受彭德怀指挥。敌“围剿”军第一纵队李明、陈时骥两师进入包围圈后，遭红军痛歼，损失逾万。蒋介石对这次惨败极为痛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痛心地供认：“此次失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打得十分激烈，虽然在中央根据地战场上捷报频传，但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场却非常吃紧。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调刘畴西、王如痴到闽浙赣根据地工作，以加强那里军事斗争的领导。刘畴西等离开硝烟弥漫的中央根据地，由一个警卫排护送，向闽浙赣根据地急进。

闽浙赣根据地的主要地域在赣东北，是在方志敏发动弋（阳）横（峰）起义的基础上创建的。这里原有一支能征善战的红十军，已调中央根据地编入红七军团，留在闽浙赣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地方部队，以赤色警卫师为骨干，又建立了一支新的红十军，受闽浙赣省军区指挥。刘畴西到闽浙赣后，接替刚牺牲的唐在刚任省军区司令员，王如痴任红十军军长兼政委。

闽浙赣根据地靠近蒋介石统治的中心区，对南京以及南昌、杭州威胁很大。为保卫这块根据地，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动员全省军民掀起了以扩大红军为中心的"春季冲锋运动"，使红十军由一千五百人发展到二千五百人，组建了三个师。到这年十月，蒋介石以百万兵力对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闽浙赣根据地军民全力以赴支援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连续对敌筑碉堡展开破袭战，致使敌"围剿"军包围中央根据地的堡垒体系未能形成。为此，为瓦解和破坏闽浙赣根据地，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南昌行营，一面四处张贴布告，分别以八万、五万光洋的悬赏，缉拿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痴，一面派周浑元率"围剿"军三个师攻打黎川，截断中央根据地与闽浙赣根据地的联系；与此同时，派"围剿"军五个师又四个保安团，向闽浙赣根据地的中心区赣东北扑来，使闽浙赣根据地的军事形势日趋险恶。

在黑云压城的紧急关头，为动员全区军民进行反"围剿"斗争，十一月二十日，在横峰县葛源召开了闽浙赣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刘畴西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形势，号召全省军民"务必不惜用血肉和头颅来执行大会的一切决议和口号，……为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而斗争"。会议期间，在他提议下，搞了一次"全省群众武装展览"，展出了省兵工厂和各县制造的地雷、老虎弓、石头炮及各类枪械，并作了地雷演习和武术表演。大会之后，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纷纷进行紧急战争动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动员了二千五百人参军，新编了四个团，使红十军的兵力扩大了一倍。对此，中央根据地《红色中华》报曾以显著位置作了报道：“闽浙赣苏区本来决定在两个月之内扩大二千三百名新战士，结果，经过二十五天的努力，不独达到了原定数目，而且超过了。”

国民党“围剿”军以重兵压境，十一月二十七日，其先锋闯进闽浙赣根据地大门，抵达横峰，另一股敌“围剿”军企图偷袭根据地的杨家门。刘畴西接到侦察员的报告，立即命令红十军及横峰独立营在王家坂至杨家门之间设伏。二十八日拂晓，敌“围剿”军进入伏击圈，红十军发起猛攻，居高临下给敌以突然打击，打得敌“围剿”军晕头转向，其第二十一师一个团被歼，团长以下三百多人被俘。接着，刘畴西、王如痴又率红十军坚决阻击了向周坊、富林进攻的敌“围剿”军第五十三师，之后又在罗桥、枫岭头歼敌“围剿”军第八十师一部。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杀伤了许多敌人，迫使向河口、上饶、弋阳等地进犯之国民党“围剿”军撤退。尽管刘畴西等率领闽浙赣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守土抗击，英勇杀敌，但由于临时中央推行“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等“左”倾战略方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被动局面，闽浙赣根据地和红十军及各县地方武装也都陷入被动局面，受到一些损失。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刘畴西是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并当选为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他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未能与会。由于他的声望和对苏维埃的贡献，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同年八月一日，中革军委授予他一枚二级红星军功章，以表彰他在红军战争中的卓越功绩。

## 五

一九三四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在强占我国东北之后，又向华北扩张。蒋介石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紧“围剿”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突围长征。在红一方面军突围长征前，中革军委派红七军团作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军团长寻淮洲率领下从瑞金出发，历时四个月，纵横三千里，转战闽浙赣皖四省数十县，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敌“围剿”军的兵力，有利于主力红军的突围转移。

十一月初，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根据地的德兴县重溪，方志敏、刘畴西等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及红十军负责人，从五十里外的葛源赶来接应。接着，红七军团和闽浙赣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原红十军分别编为第二十、二十一

师，共有兵力六千余人，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并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刘畴西主持了红十军团成立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部署了军团的任务：第十九师挺进浙皖赣边境，打击“追剿”之敌，相机发展新根据地；第二十、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根据地，抵御“围剿”之敌，保卫根据地。会议还决定，红十军团对外仍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活动，由刘畴西任总指挥。

红一方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对闽浙赣根据地的“围剿”日趋严重。十二月中旬，中央军区（红一方面军长征后在中央根据地成立）电令红十军团转到外线作战。遵照中央军区的电令，刘畴西率红十军团指挥部及第二十、二十一师离开闽浙赣根据地，经婺源、开化之间和休宁南部，北上皖南。沿途，部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的罪行。红十军团进入新区以后，刘畴西强调严明军纪，秋毫无犯，争取群众的支持。部队一面行军，一面作战，击溃了国民党浙江保安师两个团的尾追，攻克旌德县城，摧毁敌碉堡百余座，在兰渡战斗中，截获敌二十一旅汽车四辆，缴枪数百支，迫击炮两门。

红十军团经长途转战，已是人倦马乏，加上伤冻交加，有些指战员掉队了。刘畴西命令部队减轻辎重，轻装前进。十二月十日，刘畴西所部进抵黄山东南麓的太平县

汤口，与寻淮洲领导的第十九师合兵一处，休整了两日，准备继续北进。蒋介石为防南京老巢被袭，急忙调兵遣将，动用了五个正规师、二个独立旅及浙皖四个保安团，共十多万兵力，并在沿途抢筑了二千个碉堡，前堵后追，妄图将红十军团置于死地。首先赶来寻求决战的是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该旅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精良，见红军十分疲惫，想抢“头功”。

为了摆脱前后受敌的局面，刘畴西召开军团军事会议。他在会上提出:“红十军团兵力与敌补充第一旅相当，只是装备不如，如果选择有利地形，打敌一个措手不及，必能获胜。”他建议在太平县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设伏。他的建议得到与会领导同志的一致同意。乌泥关是个狭隘山口，东侧是六三〇高地，北面是小山坡，谭家桥公路经过这里，是敌必经之地。会议当即作出战斗部署：派皖南游击队牵制敌人，而以红十军团主力置于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十九、二十、二十一团的顺序，摆成一字长蛇阵。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时，王耀武带领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进入红十军团设伏地区。刘畴西下令发起总攻击，三发信号弹腾空而起，第十九师的一个连迎面封锁了乌泥关，第二十一师的一个营马上截断敌后路，各师主力亦同时对敌拦腰出击。敌补充第一旅遭受突然打击乱作一团，敌前卫第二团团长被打落马下。可惜的是，第十九师未将主力配置于乌泥关以北，而是放在南面的悬崖峭壁上，兵

力不易展开，正象方志敏后来评价的，是将“有用之师置于无用之地”。敌人在红军猛烈火力的攻击下虽曾一度呈现混乱和动摇，但很快就重整旗鼓，调整了部署，集中全力进攻不长于阵地战的红十军团第二十、二十一师，而战斗力较强的第十九师受地形限制增援莫及，北段阵地被敌冲开。接着，敌人夺占仅有少量红军兵力把守的制高点六三〇高地。寻淮洲准备率部夺回六三〇高地，但不幸腹部中弹受重伤，不久身亡。此时，敌增援部队正向谭家桥逼近，战局逆转，红十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也先后负伤。战斗持续下去对红军十分不利，刘畴西下令部队撤出战斗，向北转移。敌补充第一旅也因伤亡过重无力跟追红军而退走。

谭家桥战斗的失利，使红十军团元气大损，部队损失过半，动摇了刘畴西继续进入敌占区作战的决心。在泾县茂林镇，一部分同志曾建议分散兵力，就地开展游击战争，但方志敏、刘畴西等军团负责人还没有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认识，担心兵力分散更难应付敌人的重兵“围剿”，于是，经军团干部会议决定，由方志敏电告中央军区负责人项英后，将部队带回闽浙赣根据地休整。

红十军团南返时，由方志敏、粟裕率八百名红军战士先行，刘畴西、王如痴率军团主力二千余人殿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二日，先行部队从杨林进入化（开化）、婺（婺源）、德（德兴）小苏区根据地，接着，又继续向

前，开进闽浙赣根据地的港头。当刘畴西率后续部队抵达杨林时，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第五团抄捷径抢先赶到前面，在三坂、徐家村一带修筑工事，挡住了红十军团主力南进闽浙赣根据地的通道，发生遭遇战。刘畴西见敌已布防，即率领部队经南华山折向化、婺、德小苏区根据地。

时值敌“围剿”军正加强闽浙赣根据地外围的封锁线，这对红十军团能否进入闽浙赣根据地是一个很大的难关。一月十六日，刘畴西接到方志敏从港头派人送来的信，指出敌情严重，部队应赶快靠拢，军团主力务于当晚全部通过陇首地段的封锁线。刘畴西见信有些犹豫，他看到部队已经极度疲劳，不忍心把刚宿营休息的指战员叫醒赶路。当方志敏得知刘畴西并未率部果断行动的情况时，心急如焚，他与粟裕商量，认为耽误时间无异于作茧自缚，便命粟裕率部先行，自己返回找刘畴西所部。第二天，方志敏找到了刘畴西所部，但敌“围剿”军已封锁了陇首地段，无法通过。方志敏、刘畴西根据当地一个老百姓提供的情况，决定走比较隐蔽的金竹坑。不料金竹坑也筑有敌碉堡。本来金竹坑守敌不足一连兵力，如强行突破是可以冲过去的，但由于敌情不明，加上对被敌“围剿”军包围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当金竹坑守敌打枪拦击时，部队就折回，一连几次变换突围方向，在怀玉山游弋了数日，致使敌“围剿”军从四面八方赶来，完成了包围圈，终失突围良机。红十军团在纵横不到十五里的山地上，陷入了敌“围

剿”军第四十九师、第四十三旅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十四个团的重围之中。

红十军团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英勇征战，付出了极大代价，指战员伤病交加，忍受着雨雪夹袭、寒风刺骨之苦，弹将尽，粮将绝，面临全军覆没的困境。刘畴西是一位坚强的红军指挥员，他不能坐以待毙，更不能放下手中武器，他要为革命而战，要为战友们求生存。他率部在怀玉山的东南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马山等地，浴血冲杀，终未能突出重围，反被敌冲散分割。山高林密，敌人搜索不便，派飞机轮番轰炸，后来竟放火烧山。红军战士们各自为战，许多红军伤病员不愿当俘虏，被活活烧死，有的红军战士且战且退，被逼上山顶绝路，舍身跳崖。

敌“围剿”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一月二十日午夜，方志敏、刘畴西率余部八十多人在许坞作最后一次突围，不幸误入敌群，经过五个小时激战，左拼右杀，仍不能冲出，只好又退回怀玉山中。为了不被敌人一网打尽，他们化整为零，打算先潜伏下来，伺机偷越敌封锁线。

刘畴西与第二十师参谋长乔信民等结伴，昼伏夜行，翻山越岭。刘畴西在许坞突围时，仅有的一只右手也负了伤，只好由战友们搀扶着走。路上，他责备自己指挥失误，使红十军团遭到前所未有的惨痛失败。他看到自己身上的重伤，还要连累战友们，感到心如刀绞。他恳切地对

乔信民说:“老乔，我没有用了，不能拖累你们，你们突围吧，我也决不当俘虏，给我一枪吧!”战友们感动得眼睛都潮湿了。乔信民说:“老刘呀，我们绝不会丢下你，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

又过了两天，刘畴西等与一股搜山的敌人遭遇。战友们为了掩护刘畴西，把他隐藏在草丛中，然后分散跑开。刘畴西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饿得走不稳，冻得睡不着，爬到程家湾附近时，再也不能向前移动了。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闽浙赣省委从截获敌人的电话中得知，敌军搜山“清剿”基本结束，省委准备派人去营救山中幸存的红军指战员。蒋介石因为没有捉到方志敏、刘畴西等红军领导人，下令继续搜山。一月二十七日，敌“围剿”军第四十三旅第七二七团的士兵，在程家湾附近发现了刘畴西，从他左臂断残的特征，判断他就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总指挥，便如获至宝，把他押到驻陇首的团部，次日再解玉山县城，送敌“围剿”军四十三旅，向旅长刘振清“请功”。在此前后，王如痴、方志敏也不幸被捕。由于战略上的“左”倾错误和战术上的指挥失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最终失败了。然而，他们写下了一部“血染东南半壁红”的英雄斗争史，其事迹是可歌可泣的。

## 六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刘畴西等在玉山县城被“游街示众”后，即递解驻上饶的国民党赣浙皖闽四省“剿匪”司令部，由司令兼第八军军长赵观涛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亲审。刘畴西理直气壮地阐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赵、俞恼羞成怒，第二天即派出大批军警，将刘畴西等押到上饶城金龙岗体育场开“庆祝大会”。刘畴西等昂首挺立，浩然正气，视死如归，台下群众无不黯然落泪。

二月二日，敌人出动四辆装甲车和五辆卡车，由赵观涛、俞伯庆“陪送”，将刘畴西等解往南昌，囚禁于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这里原是委员长行营军法处看守所，红一方面军自中央根据地长征后，蒋介石把行营移往武汉，江西的军务由顾祝同主持。刘畴西与方志敏、王如痴、曹仰山四人同囚一室，分别被钉上十斤重的脚镣，是看守所关押的“重犯”。在看守所其他囚室关押的还有三十五名红十军干部。

国民党新军阀为了扩大影响，二月七日下午，在南昌市豫章公园召开“庆祝生擒方志敏等大会”。英国《字林西报》的记者对现场作了这样的报道:“豫章公园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关枪，谁也不准从路旁跑入街心。”从当时保存下来的一张照片看，戴了脚镣手铐立于台

上的三个人，方志敏居中，刘畴西在左，王如痴在右，都有一股不可征服的气概。这家报纸还有以下评论："当局看来，群众态度之静默，殊属可怕。"

刘畴西抱定"男儿到死心如铁"的决心，随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在半年的铁窗生活中，他无私无畏地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方志敏在狱中所著《可爱的中国》等文中，曾多处记述刘畴西（即文章中所称的"田寿"）与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天晚上，刘畴西被提审了。公案后坐着的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翻动一双小眼睛，挤出几句话："你是黄埔的一期生，委员长很器重你。不是吗？你那只假手也是委员长批款给你装上的。我想向你进一忠告，既然你们失败了，还是到国方来做事吧！"

刘畴西哼了一声，正色地说："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不要希望我给你们办任何事情！"

钱协民不死心，狡黠地劝道："对你直说了吧，上峰要重用你呀，不然，为什么还留着你不杀呢？再说，你们的主义也不见得会实现，即使实现也恐怕要等几百年。你何必这么傻，为几百年以后的事送命呢？"

刘畴西斩钉截铁地回答："共产主义的实现，谁也阻挡不了！"

钱协民遭痛斥，只得打出一张叛徒的牌，问："你晓得孔荷宠吗？"

刘畴西回答:“听过这个名字，是个无耻的家伙!”

钱协民说:“这叫弃暗投明，告诉你，现在他当了少将参议，每月拿五百元大洋。”

刘畴西毫不犹豫地说:“我不象他，我不要官，也不要钱。”

钱协民嚎叫起来:“经我的手判处枪毙的，连我自己都无法计数，你要放明白点!”

刘畴西哈哈大笑，昂起头来，大义凛然地说:“你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的信仰，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

刘畴西等在狱中坚贞不屈，使敌人无计可施。国民党《扫荡报》作出如下报道:“方、刘二匪，至死不悟，倔强异常，……对匪军内部情形，不愿吐露。”

方志敏、刘畴西是“要犯”，生活上较一般被捕人员要“优待”些，有二十元零花钱。可是，刘畴西枪伤未愈，入狱后又得了伤寒病，病魔折磨了他两个月，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毕竟顽强地活过来了，渴了就喝盐开水，不能吃硬饭就啃烧饼。方志敏送他“烧饼主义者”的绰号。他们也有一大“发现”，即在包烧饼的报纸上寻找“新闻”。一天早晨，烧饼刚送到，刘畴西接过后骂了一句:“妈的！连报纸都不给看。”他展开包烧饼的报纸，看到一条要在“收复区”建造白骨塔，以纪念“国军阵亡将士”的消息，他便挖苦道:“造白骨塔，就在这个监狱里造。造个高十丈的塔，

把这里被枪毙和被活活折磨死的人的骨头装进去，一年之内就会装满。”方志敏补充说：“我替他们计划一下，全国可以造十几万个，每村一个，大城市则造一百个，专收那些饿死冻死、无钱治病而死、为革命被杀、战场上牺牲、因无法生活而自杀者的骨头。”方志敏的一席话，使刘畴西感叹地说：“中国人的生命，真象一个蚁子，一皮草儿，一天到晚不知要糟踏多少？”大家沉闷了许久后，刘畴西又说：“我们几个人的骨头，恐怕能卖几块钱，来增加他们的财政收入吧！”引得大家一阵嘲笑。

刘畴西自知必死，心里却很坦然。闲谈时，方志敏说：“死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刘畴西从竹床上爬起来伸长脖子接着说：“脖子伸硬些，挨他一刀，临难无苟免！”

一天午饭后，看守兵端来半盆凉水，刘畴西让人帮着洗头。方志敏见状笑着问：“只手将军，你把头发洗干净了准备做什么？”

刘畴西笑答：“我把头发洗干净，准备去见上帝。”

方志敏说：“看不出你会说这样有趣的话。好吧，你死了会升入天堂的，让你坐在上帝的右边。”

刘畴西执意地说：“不，我偏要坐在左边！”

当他们谈到红十军团的损失时，心情却十分沉重。那时，他们还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党内“左”倾的错误领导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只能从指挥失误、内部团结等方面

找原因，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战友，对不起根据地人民。他们经常发出沉痛的叹息:“我们的中央，一面要责备我们，一面又要可惜我们。”“赣东北的同志们，这次你们都吃了我们失败的大亏，你们又要重过一九二八年的艰苦生活了!”

死，对于坚定的革命者来说并不可怕。方志敏、刘畴西等常说:“我们为革命而生，也愿为革命而死，现在无法得生，就只有一死谢党。”他们拟定了临刑时的口号，约好“临刑要高声的呼，使劲地喊，以示我们的不屈!”但敌人没有很快枪杀他们，妄想等待他们“觉悟”。铁窗生活，也是革命者的战场，刘畴西等并不单纯地等待一颗子弹或挨一刀时候的到来。五月间，刘畴西从敌人对方志敏的提审和从看守兵那里了解到，赣东北根据地军民的革命斗争没有被平息，继续组织起“赴难军”打击敌人。他就与方志敏等商议，利用敌人对他们延期处死的这段时间越狱。王如痴认为越狱无把握，刘畴西反驳说:“并非完全不可能，不过必须有外援。”他只是担心自己与难友曹仰山是残废，行动不便，怕影响别人。方志敏曾做通一个看守的工作，把狱中其他三十五个红十军干部联系上了。后来，由于敌人看守严密，狱中与外界的联系未能接上，加上方志敏被单独囚禁，越狱计划没能实现。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和方志敏、刘畴西等红军领导人在怀玉山被捕的消息见报后，很快传到国外。关怀

祖国抗日的爱国华侨，纷纷致电所在国的中国使馆，于是电报从美国纽约、三藩市以及古巴等地传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被俘抗日红军人员，使南京政府既尴尬又恼火。

刘畴西等被俘六个月来，坚贞不屈，国民党反动派从他们口中没有得到任何需要的东西，诱降遭到可耻的失败。于是，蒋介石密令驻赣绥靖公署，将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主犯”“秘密处死”。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凌晨，南昌细雨霏霏。顾祝同派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打开牢门，将刘畴西等押往南昌市城北下沙窝的秘密刑场。刘畴西与战友们拖着沉重的铁镣，器宇轩昂地走过去，在一口水井边停了下来，对着晨曦发出微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发出雷鸣般的呼喊：“中华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激昂的口号声，划破长空，使敌人闻之丧胆，急忙开枪射击。在一阵排枪响过之后，刘畴西饮弹倒地。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英勇就义时，年仅三十八岁。

刘畴西壮烈牺牲了，他的浩然正气，将与世长存。湖南刚解放，望城县人民政府就派出秧歌队，给他的遗孀杨淑纯和女儿刘爱生送去了“伟大英烈”的金字匾，他的家乡也以他的名字改为“畴西乡”。现在，湖南省会长沙市烈士公园，高耸着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塔内陈列着刘畴西的

遗照和斗争事迹。这是党和人民对革命先烈刘畴西的最好纪念。

（曾 长 秋）



李　　勋



# 李　　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湘鄂西前委和鄂西特委，在长阳建立了一支以土家族儿女为主体的人民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六军。该军军长就是红军将领李勋。

## 一

李勋（1899—1929），又名小秀、世贤、骏侯，湖北长阳（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土家族人。一八九九年四月出生在清江河畔都镇湾镇头的一户农民家庭。都镇湾是一个小镇，街道从山坳上垂下来，沿着山谷向清江边伸去。街下头的清江上，船只络绎不绝，上抵资丘，下达宜都，使都镇湾成了繁荣集镇。街东侧有一座岩峰，独高峻绝，名武落钟离山，是古代巴人的始祖——廪君部落住过的地方（即土家族先祖的发祥地）。李勋的房舍依山傍水，风光秀丽，四周翠竹环绕，村前清江欢歌，村后青山叠翠，都是李勋幼时戏耍的场所。古人有言：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李勋爱山，爱水；既爱登山，也喜戏水。登山，采摘山果；戏水，捕捉鱼虾。

李氏先祖租种地主田地，后自置薄产，自耕自种。李勋的父亲李吉万，勤劳，朴实，忠厚；母亲刘氏，俭朴，善良，聪慧。全家虽有十来亩薄田，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军阀、土豪劣绅层层盘剥，终年劳碌仍不得温饱。李勋从小目睹贫苦农民在荒年吃草根、树皮、观音土而饿殍遍野的惨状，更看到地主、豪绅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便埋下了仇恨这不平社会的种子。

父母忍着贫困，决心送李勋上学读书。他们将祖辈经营的房前屋后的竹子砍伐，扎成竹筏，沿清江运往外地变卖，以此供李勋交纳学费。这样，李勋便在七岁时进私塾读书。李勋聪明伶俐，勤工苦读，每逢考试，都名列前茅。蒙师姜群坊夸他有“师者爱之，同窗信之，少者怀之”的气度。几年后，李勋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就读。这时，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传到该校，在几位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反帝爱国的思想在他心中迅速萌发。因而他愈加刻苦读书，希望文化知识能帮助他找到救国之路。一九二一年李勋在高等小学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宜昌商业中心。李勋跨入学业高门，使父辈们特别高兴。父亲卖掉万斤竹子，母亲卖了首饰，伯父李达万和李静万又资助五百串钱，凑了一笔钱。李勋带着这笔钱，挑着行李，赴宜昌求学。在学校里，李勋除了学习商业知识外，更多的是接触社会科学知识，这使他的视野迅速开阔起来，因而，他的

反帝爱国思想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浓烈。一九二三年，他在商业学校毕业后，重返故里，受聘在都镇湾丁字墒和十五溪等地教书。从此，他开始了宣传革命理论、号召人们起来斗争、改变社会不平的革命生涯。

李勋在十五溪执教期间，常和他的远房叔父李子俊一起，探讨学问，研究马列，抨击时弊，抒发爱国热情。

李子俊出身在长阳十五溪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李焕甲是晚清拔贡，宣统年间曾任长阳县议事会长，后到北京从事教育工作。李子俊幼时随父在北京读书，后考入北京大学。辛亥革命后，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纷纷投身革命中心武汉，李子俊也由北大转入武汉大学继续求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篡权称帝，实行投日卖国政策。李子俊和进步学生一起投入反袁斗争，因事泄，和举事同学十一人被捕入狱。李子俊的父亲到武汉设法营救，找到当时在湖北省政府任参议员的长阳人晏卓甫出面保释出狱。李子俊回到十五溪家中，一面自修大学课程，一面阅读《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鼓吹革命的书刊，使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于是再去武汉，投身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在武汉他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党组织派他回长阳秘密从事党的活动。他凭藉家庭的背景和父辈的关系打入敌机关，初任都镇湾自治区团总，后任县议事会副会长。

李勋就是在族叔李子俊的帮助和影响下，革命思想和

斗争意识得到了升华。

李勋经常利用教师的身份，在讲台上向汉族、土家族青少年讲革命形势，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他教育学生热爱劳动，热爱人民。他还在学校增设了军体课，组织学生开展军事游戏，增长军事知识。他教唱的“快来快来，快快来比赛，作准备，听号令，奋勇夺魁最光彩”；“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要奋斗”等歌曲，充满着革命的气息和战斗的激情。他还以崇尚的热情，向学生讲述岳飞、洪秀全、孙中山等英雄人物的斗争故事，教导学生们要做时代的有为青年，激发学生们对统治阶级的反抗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李勋为长阳地区的革命运动播下了火种。

李勋任教时，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各种武装经常出入长阳。一次，从施南窜入一股两百多人的土著武装，驻扎都镇湾。李勋经过调查，发现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出身贫困的穷汉子，只因生活所迫，才扛枪上山的。他认为这些人是可以改造教育好的。于是在一个阴云密布万籁俱寂的黑夜，他带领两名学生，提着灯笼，步行十余华里，找到这支武装的首领，陈述时势，动员他们投奔河南建国军（时值国共合作，建国军属孙中山领导，李勋有同学在该军任职）。李勋这一壮举，受到了当地人们的称赞。

一九二五年，李勋以突出的教育成就和组织才能被各界人士推举为都镇湾区团董。面临军阀混乱、国难当头的

局势，李勋常发出“兴我中华，匹夫有责”的感叹！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关注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久，全国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国共合作的喜讯传到长阳。李勋再也抑制不住澎湃的爱国激情，四处奔波，鼓吹革命。后经李子俊介绍，他于同年千里迢迢赴河南，进入建国军军官学校。这所军校是“五卅惨案”后，孙中山委任建国军司令樊钟秀在河南临颍创办的“沪案后援建国军官学校”。其队长和教官多数由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学生担任。学校的军事思想、训练方法都比较先进，李勋在这里受到了革命思想的薰陶，掌握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技能。一九二六年，李勋在军官学校毕业后，南下广东，参加了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了毛泽东对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等有关中国革命理论的精辟论述。在讲习所，他还学习了马列理论，进行了社会调查，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出师北伐的号召，随国民革命军向湖南、湖北挺进。十月十日，北伐军攻下武昌，李勋受党组织派遣，参加了武汉赴鄂西发展农民运动代表团，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回到长阳。

## 二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邓玉麟师姚汉澄旅进入长阳县城龙舟坪镇，驱逐了县长丁保琛，委

姚绍虞代理长阳县县长，宣传革命主张，组织群众团体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十二月中旬，党组织派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郑良品、胡棠本等回长阳县，筹备组建国民党长阳县党部。李勋回到长阳时，国民党县党部已经建立，他被委任为国民党都镇湾区党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二月，共产党员陈泽南、龚良鹏从董必武在武汉举办的省党务干部训练班结业回县，一面参加国民党县党部工作，一面筹建共产党的组织。龚良鹏、陈泽南根据中共湖北区委的指示，在县城观音阁秘密召开了中共长阳第一次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长阳特别支部，并建立了龙舟坪、都镇湾和流溪三个党支部。李勋担任了都镇湾党支部副书记。四月，李勋在都镇湾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成立了店员工会、木匠工会、纸厂工会、商业工会、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在这个群众大会上斗争了都镇湾原团总李汉香和劣绅沈南轩，还给他们戴上绿高帽子游乡。广大农民群众扬眉吐气，斗志昂扬。

正当人民革命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五月上旬，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率部叛变。长阳逃往宜昌的大土豪邓进武等乘机带一伙流氓打手回县，纠集反动势力对革命势力进行疯狂反扑。长阳一时黑云压城。县党部被砸，参加县党部的共产党员刘继和等五人被杀害，参加妇女会和学生会的一批革命者被捕入狱，白色恐怖笼罩着

长阳山城。龚良鹏等转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秘密活动；陈泽南赴武汉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面对血雨腥风，李勋毫不动摇，他和李子俊利用国民党员身份和军官学校学员名义，打入敌军，伺机开展革命活动。七月，黔军四十三军进驻长阳，军长李晓焱委任参军龚勋南代理长阳县长。龚勋与李勋、李子俊、田进武等中共党员均有同学与旧交关系。李勋找到龚勋，经龚勋介绍，李勋到四十三军作后勤组织工作。不久，李勋又被委为该军在宜都举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副教育长。龚勋同时委李子俊为长阳县临时“清乡”委员会委员。李勋在四十三军任职时，负责在各地筹集军饷。他借此机会外出，几次回长阳与地下党联系，组织、发展革命力量。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指示，李勋、龚良鹏在杨柘坪召开了党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首先由陈泽南传达了中共“五大”决议精神、介绍了外地革命形势。与会者分析讨论了长阳的状况，研究了斗争的策略，决定按省委的指示，以农村为基础，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到十月，长阳县共产党组织恢复了西流溪、流溪和茅坪三个党支部，新建龙潭坪和杨柘坪两个党支部，全县党员发展到八十余人。

一九二八年初，宁汉战争之后，新军阀为控制两广、两湖，下令四十三军加紧镇压革命活动。军长李晓焱派李勋回长阳，协助新派任的县长邓先奎，督导“清乡”，搜捕共产党。李勋回长阳县后，于二月下旬在都镇湾家中，以

为已故祖母祝寿为名，约龚良鹏、陈泽南等二十余名党的骨干集会，决定以“灰面孔”出现，派一批共产党员打入各级“清乡”委员会和团防。同时决定利用反动政府允许地主自办武装的时机，顺势发展工农武装，以“清乡”为名，行壮大革命力量之实。会后，李勋以“清乡”督导身份，到全县各区开展活动。民国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长阳县“清乡”委员会正式成立，县长邓先奎兼主任委员，委员有李子俊、李勋、田玉龙、邓宗模等九人。以后李子俊担任了县“清乡委员会”副主任，龚良鹏担任了都镇湾区“清乡团”书记。从此，以李勋为首的共产党员掌握了长阳“清乡”组织的大部权力，展开了一场“清乡”与反“清乡”斗争。

为掩护革命活动，李勋秘密布置各地党支部，以组建团防开展“清乡”为由，发展游击武装。他还利用合法身份下令各区团防搜捕土匪和与土匪勾结为患的地痞流氓，解县惩处。在此期间，李勋偕李子俊到后河西岔溪、流溪一带，同地下党的负责人陈泽南、向泉山一起，召开党员会议，分析革命形势，研究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流溪一带有共产党员作骨干，群众基础好，地形有利，按照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可以在这里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他们还研究了把当地带有迷信色彩的“神兵”组织，加以改造，使之成为革命力量。

与会同志满怀信心，按部署分头行动。当时，流溪一带常有土匪武装出没，抓人抢粮，闹得鸡犬不宁，老百姓怨声载道。陈泽南便趁此机会在流溪组建了以“防匪保家”为名的长阳第一支革命武装——人民自卫团，拥有长枪十八支，短枪两支，不久就由组建时三十多人迅速发展到七十多人。曾在宜昌三师读书时就参加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向泉山，在董必武创办的省党务干部训练班结业后由武汉回到长阳县，在家乡西岔溪一带，借当地土豪出钱兴办“佛堂”（即“神兵”）之机，建立了一支以抗击“棒老二”（即川军）为名的“神兵”大刀会队伍，有三百余人。“神兵”本是农民自发联合起来的一种武装自卫组织，它以灭兵、灭捐、灭税的“三灭”为宗旨；以禁烟、禁酒、禁色、禁盗的“四禁”为戒律；以“佛祖”为首领，按神坛为单位，成立“神兵”组织。这些“神兵”大多穷苦出身，虽有封建迷信思想落后的一面，但也有反抗压迫强烈要求革命进步的一面。李勋、陈泽南认真分析了“神兵”的状况，认为经过教育，是可以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于是，他们在对共产党员向泉山所率“神兵”加强领导的同时，派共产党员打入其它“神兵”组织，作争取“神兵”群众的工作，并因势利导，加以扩充。到一九二八年上半年，长阳县就出现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四支较大的“神兵”武装。不久，共产党员向泉山、向高龙和石习然为首的流溪、白沙驿几支“神兵”武装并入李勋领导的人民自卫团，使人民自卫团发展到五百

余人。人民自卫团的建立和发展，揭开了长阳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七月中旬，从施南窜来一股土匪，首领杨超与流溪土豪何作哉勾结，进攻人民自卫团。陈泽南等领导自卫团奋勇还击，杨匪死伤十余人后败逃。长阳人民武装初战获胜，斗志倍增。此后，李勋又到前河、都镇湾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亲自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与党的骨干李俊川、李步云、姜梦雄等策划，以训练“团防”为名，在都镇湾茅坪组建了三十多人的游击武装。这支游击武装，在当地积极开展打土匪、抓流氓的活动。到七月底，中共鄂西特委向省委报告说：“长阳游击战争已经发动。”“在党的引导下可以参加行动的有一千人。”

十月初，贺龙派陈寿山来长阳，和李勋、龚良鹏等计议，组织武装暴动。十月八日，李勋、陈寿山组织了由共产党员梅孝达掌握的二百余“神兵”在长阳榔坪举行暴动。暴动“神兵”乘夜攻打由榔坪土豪方楚臣、程申白等四家组成的“黄帮”，打死方楚臣等五人，没收了周俊人、董香成、方楚臣、程申白四大家财物。暴动成功后中共湘鄂西前委决定：“任梅孝达为工农革命军第二路指挥，立即夺取长阳（指县城）与资丘的反动武装。”榔坪暴动惊动了敌人，四十三军派一个团（团长蒋俊）的兵力前往镇压。李勋、李子俊一面派人通知梅孝达，以当地绅士名义到县府和蒋团呈诉“黄帮”罪恶；一面以“清乡委员会”的名义从中调解，以暂时解散暴动“神兵”武装（实际未解散）、收缴

刀矛为条件，终使蒋团撤走，从而保护了这支“神兵”暴动武装，使之成为人民的革命武装。

一九二八年夏秋之际，国民党新军阀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进攻，指令各县成立“保卫团”。县长兼团长（亦称团总），添设副团长（亦称副团总）一职。县保卫团设常备大队，各区组织预备队，协助县常备大队剿匪。李勋的资历和军事才干颇受四十三军器重，组建县“清乡”团时又颇得国民党县政府的赏识，因此，十一月李勋被任命为长阳县“保卫团”副团总。李勋通过县长正式成立了县保卫团和县常备大队，并在分区建立了六个区团预备队。这样，李勋便控制了整个县“保卫团”。与此同时，他又秘密与人民自卫团和各地游击队保持着紧密联系。随后，陈泽南根据党的指示率人民自卫团在流溪活捉了大土豪何作哉，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后处决了。县政府根据何作哉家属的控告，以“解决宗派纠纷”为名，派员传陈泽南到县受审。陈泽南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便派其弟陈化田和陈兴垣、陈守范、何建东等前往县政府说理，结果四人均被扣押，打入了死牢。李勋和李子俊闻讯后，立即进行营救。他们假借研究“清乡”委员会和“保卫团”的工作，来到县长应余庆办公室。应县长对他们说：“清乡要抓紧进行。流溪发生的事，表面上看是宗派纠纷，实则是共产党为乱。我已下令将抓的四个要犯枪毙，明日执行。”李勋听后暗自吃惊。他仍镇静地说：应县长这个判断十分准确，但共产党究竟在怎样

活动，我们不甚了解。这四个人抓得好，我们正好从他们身上弄清共产党的组织、人员和活动计划，然后再出动“保卫团”将他们一网打尽。李子俊插话说：处决这几个人当然容易，若线索断了，共产党查不出来，危险依然存在。应县长认为他俩的意见有道理，于是下令暂缓死刑，听候处理。由于李勋等积极营救，被捕的四位同志不久即获得释放。

长阳各地革命武装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目，榔坪区团总董湘臣准备“围剿”梅孝达所率的“神兵”，到县城找县团总，请求派队伍协助“围剿”。李勋口头应允前往“围剿”，实则按兵不动。李勋暗中捎信给梅孝达嘱他提高警惕，巧与周旋，致使董湘臣的“围剿”计划落空。

李勋在县“保卫团”中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常在士兵中宣讲革命道理，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并且发展了涂龙、田玉龙等一批斗争骨干分子加入共产党。这批新党员在党的哺育和李勋的直接培养下，后来均成长为红军指挥员。涂龙担任红六军特务团团长后，在几次与敌浴血奋战中，表现得极其英勇顽强。李勋还逐步地把共产党员安置在“保卫团”的重要岗位上，即：姜梦雄担任了县团总教官，李俊川担任了茅坪区团总，李实担任了区团总录士，李步云担任了区团总庶务。一九二九年五月，中共鄂西特委在《鄂西报告》中充分地肯定了长阳的兵运工作，赞扬“长阳在保卫团的士兵运动中有了相当基础”。由于长阳兵

运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为党在长阳发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全县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一百多人，中共长阳县委于一九二九年元月在都镇湾正式成立。此后，长阳的各项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人民自卫团日益壮大，共产党员李步云在杨柘坪和茅坪组织的游击队发展到一百多人，各地农民协会建立起来，组织农民开展了反苛捐杂税、打击土豪劣绅和惩办贪官污吏的斗争。长阳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使反动当局惶惶不安，他们开始对李勋产生怀疑。县政府以教育局局长张希之为首，伙同劣绅邓进武、陈秀山等，向新任县长方云藻控告李勋有“通共纵匪嫌疑”，提出撤换李勋的要求。方县长召开县政会议讨论“御匪”问题，张希之公开对抗李勋。李勋针锋相对，当面痛斥张希之代表豪绅腐儒，“以文挟武”，驱张出会场。张即赴省控告。《长阳县志》（民国二十五年版）载云：“李勋，充县副团总，气日以骄，与教育局局长生龃龉，遂相仇视，希之赴省告勋等为共产党。”李勋机智沉着，应付自若，不露破绽。

为了解各地暴动情况，李勋决定到资丘一带去看看。他和李子俊商妥之后便找到方县长说：“这些时来，下面闹事，我们情况不清，拟带一班人到各地巡察匪情。”征得方县长同意后，李勋一行十余人到达了资丘。资丘是长阳中部清江北岸的一个山镇，镇上经营中药材、山羊板皮、山货土产，不少外省人在此经商行艺；有“小汉口”之称。李

勋等在刘家祠堂下榻。一日，他带两名卫兵，察看资丘镇容，了解镇周围的地理环境。突然，“当、当、当！”“咚、咚、咚！”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声在资丘下街刘家祠堂门前敲了起来。李勋一打听，原来是唱皮影戏的。李勋凭着自己的经验意识到，干革命工作的总是装扮成各种角色，这个唱皮影戏的偏巧在我住的门前唱，说不定其中有文章。于是他叫卫兵传唤唱戏的人到祠堂屋里来唱。原来扮“戏子”的是中共鄂西特委特派员罗正品，他们早就相识。为了不泄机密，他们均未动声色。李勋先叫“戏子”敲唱了一番，然后借故支开卫兵。罗正品向李勋传达了鄂西特委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建立农民协会，发展赤卫队，进一步做好“神兵”和团防士兵的工作，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好准备的决定。罗特派员还向李勋通报了一个重要情报：贺龙将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前来长阳，要求做好迎接红军入境的工作。

李勋与罗正品会见后，兴奋不已。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贺龙军长将来长阳，都将极大地推动长阳武装斗争的发展，他预感到一场急风暴雨似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李勋毕竟是军校出身，深知武装斗争除了人这个决定因素而外，天时、地利也是重要条件，要战胜敌人，不仅要知己知彼，还要熟悉地形地物。为全面了解资丘周围的地形概貌，李勋带贴身护卫，找向导引路，以观赏资丘“晚八景”为由，详细进行了地形勘察。资丘对岸的黄柏山

超然耸立，巨石悬空，丝丝白云在岩腰悠悠飘荡，见此云，将为晴天，名“黄柏晴云”。镇背后东侧的马岭岩，嶙峋奇秀，每当夕阳倾注在这岩壁上，黄里透红，光彩夺目，名“马岭夕照”。有诗云：朝观黄柏千重翠，晚眺马岭一点红”。资丘东下约三华里是蔡庄坪，从蔡庄坪渡清江即是广阔的西湾平坝。李勋被资丘“八景”的美好风光所吸引，他边看边默默地思考，这里的地形条件是理想的武装起义的场所。河对岸的黄柏山连着施鹤八县，再接湘西，贺龙正领导那里的人民闹得天翻地覆。李勋的思考延续着，他想，资丘一带群众基础好，是“保卫团”和李步云游击队大多数干部、战士的家乡，他们了解当地情况，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同时又有便于作战的地形，上至桃山、枝柘坪，下至巴山、西湾，特别是有连接西湾的黄柏山和五（峰）鹤（峰）根据地做毗邻，回旋余地大；而且各地资本家云集资丘，商业繁盛，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李勋激动不已。他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返回县城，连夜与李子俊等党的领导骨干密议暴动事宜。他们一致认为资丘有得天独厚的发动武装起义的条件。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莺歌燕舞的阳光普照都镇湾。麦苗吐翠，菜花喷金，大地洋溢着盎然生机。贺龙率领红四军由五峰渔洋关到达长阳都镇湾。贺龙住在镇上刘泽召家中。工人，店员，农民，奔走相告。街上，到处贴着欢迎红军的标语，到处在演讲宣传红军的主张，到处在

联欢，表达军民激动的心情。红军没收了胡泰源等几家大土豪的财产，分给贫苦的工人和农民，长阳的各族人民都把子弟送入红军。

时值蒋桂战争爆发，原驻防长阳的四十三军全部开走，长阳武装仅有李勋、李子俊控制的县“保卫团”。县政府一片慌乱，急找李勋商量对策。李勋以抵抗贺龙部为由，趁机率队西上，探听情况，并伺机与贺龙接头。县“保卫团”经沿头溪，郑家榜，沿着陡峭的石壁到达天柱山。这里庙宇重叠，金碧辉煌，和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李勋站在庙前遥望南方，紫云翻腾处露出玉带般的清江，他的心已飞向了江对岸的都镇湾。李勋一面密派中共党员、“保卫团”军事教官姜梦雄去向贺龙汇报；一面向团防队伍宣布说:“真贺龙到，人多力强，其势不可敌，立即撤兵回县城。”退兵时，团防班长李元山（系土劣之子）向李勋通报敌情说:“贺龙没有几个人，可以打。”李勋以谎报敌情、有通共嫌疑将李元山逮捕，派中共党员黄必典押送县城，途中又以企图逃跑罪将李元山枪决。红四军这次进长阳，在李勋的密切配合下，通行全县无阻。

四月二十六日，以贺龙为首的中共湘鄂西前委来到离都镇湾七华里的茅坪。这里是中共长阳县委所在地，贺龙住在朱家铺子里。县委书记龚良鹏，县“保卫团”军事教官姜梦雄，向贺龙汇报了长阳党组织的发展，农民协会的建立，“神兵”的活动，党所掌握的县“保卫团”及部分区团防

的情况。贺龙在茅坪主持召开了工作会议，陈寿山、龚良鹏、姜梦雄、李步云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贺龙肯定了长阳地区的革命斗争颇有基础，指示长阳县委按中共“六大”精神必须迅速建立革命武装，控制团防。会议决定陈寿山为前委代表，仍留长阳协助李勋等建立革命武装。随后，中共鄂西特委特派员罗正品来长阳传达了特委在江陵沙岗为贯彻“六大”而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从而更加明确了发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姜梦雄自茅坪返回县“保卫团”，向李勋传达了贺龙主持召开的茅坪会议精神和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当李勋得知红四军已向鹤峰开拔时，深感未能与贺龙会面亲聆贺龙指教而惋惜。李勋和李子俊遵照贺龙的指示，抓紧革命武装的组织和建设。他们利用原驻防长阳的四十三军派任县长沈凤威的权力，以加强团防武装为名，召开了全县扩大行政会议，决定县“保卫团”成立团务、防务、训练三股；各区建立正式团董；县常备大队和各区团董都必须由懂得军事的人负责。李勋借机兼任了县常备大队大队长，各股与各区团防均安插了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县、区“保卫团”大部为李勋等共产党人所控制。

一九二九年五月上旬，中共湘鄂西前委代表陈寿山在偏宕（离县城七公里）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鄂西特委特派员罗正品和李勋、龚良鹏、陈泽南、李子俊、胡荣本、向泉山等人。会上传达了贺龙抓武装的指示，分析

了长阳形势。由于当时长阳无敌军主力，新派来的县长方云藻不了解情况，军政权力均为李勋把持，一致认为是举行兵变发动起义的良好时机，研究制订了武装起义计划：李勋迅即集中各区团防武装，伺机撤离县城；人民自卫团和游击队乘隙攻打县城，再西上与李勋会师，举行武装起义。会后，李勋以扩大"常练队"、加强团防军训为名，召集龙舟坪（一区）、都镇湾（二区）、资丘（三区）、渔峡口（四区）等区团防五百余人集训，统一由县"保卫团"直接指挥。在"常练队"中设警卫、文书、经济、宣传四股，分别由共产党员姜梦雄、李子俊、李实和田玉龙担任股长。至此，中共党员基本上掌握了全县武装，并派出李子俊利用特殊社会关系到沙市、宜都等地购买枪支弹药，对发动武装起义做了全面部署。为夺取长阳武装起义的胜利，以龚良鹏为书记的中共长阳县委积极行动起来，领导全县各党支部抓紧秘密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猛烈发展游击武装。在武装起义的号召下，共产党员李步云等在杨柘坪、都镇湾一带很快发展游击队两百多人；流溪、西流溪的人民自卫团和"神兵"都作了整顿和加强。在加紧准备武装起义的过程中，陈寿山回到鹤峰，罗正品回到宜昌，他们分别向湘鄂西前委和鄂西特委汇报了长阳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湘鄂西前委书记贺龙当即做出指示，长阳的武装起义由陈寿山、李勋和陈泽南三人指挥，李勋为总负责人。其行动计划为：先打县城，攻占资丘，再向桑（植）

鹤（峰）靠拢。鄂西特委完全赞同贺龙代表湘鄂西前委作的指示。按照贺龙的指示，李勋审时度势，于六月中旬率“保卫团”五百余人，以“剿匪”为名，由县城西上驻扎西湾。六月二十一日，陈泽南在流溪召开党员骨干会议，制订了武装攻打县城的具体部署。翌日，陈泽南、向泉山、李步云率人民自卫团与游击队五百多人，三十多条枪，大部人手执大刀、长矛、土铳，头缠红布头巾，腰系红布带，扮成“神兵”，分为七个战斗队，从香花岭整队出发，夜行四十余华里，出敌不意地冲进县城龙舟坪，处决了县长方云藻，及豪绅刘光耀、杨星武等十二人，捣毁了监狱，缴获县政府及看守人员长短枪十余支，营救出被扣押的共产党员陈兴垣等四同志和无辜群众四十余人。六月二十三日清晨，陈泽南率人民自卫团回师流溪城子集训；李步云带领游击队经西寺坪、平洛回到杨柘坪休整。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攻占长阳县城摧毁反动统治的巨大胜利，加速了长阳革命形势的发展。

工农武装攻占长阳县城的消息传到驻资丘、西湾的“保卫团”中，个别反动分子不服气，在军中叫嚷要出兵打流溪人民自卫团。李勋发现这一情况后，果断采取措施，首先把“保卫团”的武器掌握在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可靠人员手里，然后开展纪律教育，加强政治宣传，提出：“武装来自工农，维护工农利益，反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是地方武装的职责。”又编写了《劝兵歌》，由共产党员带头

领唱。歌词是:“士兵第一志气强，人无志气铁无钢，堂堂男儿汉，替军阀背枪，倒不如参加革命战场；士兵掉转枪口来，杀尽一切反动派，工农弟兄们，建设苏维埃，自由平等真正爽快；士兵大家团结紧，参加红军打敌人，推翻国民党，消灭白匪军，大家解放才能得安宁……。”在开展纪律教育时，强调军队必须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任何人不得违反。对于“保卫团”中个别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实行纪律制裁。有一个姓向的班长，公开煽动团丁逃跑，将其拘捕审查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被当众处决。从而较好地整肃了“保卫团”的纪律，保证了令行禁止。

前委代表陈寿山和交通黄超群专程赴桑植找到红四军，将攻占长阳县城及武装起义准备情况向中共湘鄂西前委作了汇报。在贺龙主持下湘鄂西前委及时做出决定:“迅速举行长阳起义，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同时对该军的建制与干部的配备作了具体部署。

为执行湘鄂西前委迅速举行起义和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六军的决定，七月初，李勋、陈寿山通知陈泽南、向泉山和李步云率队到资丘会师。陈泽南率部攻打了五区团董任金声后，凯旋西上，屯兵资丘。李步云从杨柘坪率部于同日到达资丘。长阳中部清江北岸的商业集镇——资丘，上通恩施，下达荆沙，为鄂西咽喉要地。七月八日（农历六月初二），陈寿山、罗正品，李勋于资丘镇召开了中共领导骨干会议，参加者有县委书记龚良鹏等三十余人，陈寿

山代表中共湘鄂西前委传达了举行长阳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六军的决定。同时宣布了第六军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命。罗正品在会上宣布成立了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前敌委员会。六军前委由罗正品、李勋、陈寿山、陈泽南、李子俊等组成，罗正品代理前委书记，陈泽南为第六军前敌指挥。

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首府出发，溯清江西上百余里，出巴山峡牛马巷，便可见南岸有片依山傍水的平地，独成村落，散居着七八十户人家，这就是西湾。七月九日（农历六月初三），旭日初升，会集资丘的自卫团、游击队、“神兵”，浩浩荡荡沿清江东下，向西湾进发，与在西湾的“保卫团”会合。当日正午，李勋在西湾大沙坝主持召开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军民大会。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李勋宣布长阳县“保卫团”举行武装起义。接着，湘鄂西前委代表陈寿山宣布人民自卫团、游击队和县“保卫团”起义部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简称红六军），任命李勋为军长，陈寿山为副军长，李子俊为参谋长，陈泽南兼军法处长，李步云为政治处长，陈兴垣为军需处长。全军暂编一个师和直属军部的三个团，共一千一百多人，枪四百余支，史称“西湾起义”。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招展。“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声响彻山谷，顿时，震耳欲聋“打倒国民

党专制独裁”、“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声，在清江浩荡，在巴山回响。在大刀、长矛丛中军歌嘹亮，人民扬眉吐气，战士斗志昂扬，长阳一派革命的景象。

西湾起义和红六军的创建，是长阳人民武装斗争的壮举，也是湘鄂西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中共鄂西特委巡视员万涛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四日的报告中写道：“李勋在县保卫团当副团长，团防武装系数起集中编成，适值团局各负责人都因事离开，交李勋一人指挥。长阳党认为时机已到，时不可失，遂举兵变，把县长杀了……宣布成立了红六军。”

## 三

红六军，是一支以土家族劳苦群众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全军指战员中土家族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军长、参谋长、政治处长和几个团长都是土家族。它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支以军为建制的工农红军。以土家族为主体的红六军的诞生，标志着少数民族的觉醒，并成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革命力量。

红六军正式成立后，代理军前委书记罗正品到巴兴归地区巡视后转回宜昌，向中共鄂西特委汇报了长阳武装起义的情况。为加强红六军的领导，特委决定派刚从中共中

央分配来鄂西的董朗来到长阳任红六军前委书记。后因形势变化，董朗未能到职。李勋率领红六军指战员分别在资丘、麻池、马连、刘坪、城五河、璞岭、水竹园一带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改造旧保甲政权。在半个月中，打土豪三十多户，开仓放粮一千八百多石。李勋还积极筹饷扩军，召集资丘镇的资本家，动员他们捐银元、布疋。各地进步人士也自动为红六军筹粮筹款。共计筹集军粮六百多石，银元七千余块。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少部充军饷，大部分给穷苦农民和红军家属，深受群众拥护。青年农民自动参加红军者二百余人。土豪李光汉的儿子李文训，过去与李勋多次接触，思想受到启发，他也带三十多人的武装投奔了红六军。红六军迅速扩大，队伍由一千一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四百多人。

红六军的斗争及其发展壮大，震撼了鄂西，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欢欣鼓舞。而土豪、劣绅们却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们狂叫："共产党搞不了多久！"李勋针锋相对，特地请人绣制了一面"中国共产党永存"的红旗（此旗原件现存湖北省博物馆），以此对全军官兵进行共产主义必胜信念的教育。

李勋十分注意部队的建设。为提高指战员的政治军事素质，他在七月中旬对部队进行了一次集中整训。在整训中，李勋、陈寿山、陈泽南等亲自给指战员讲军事课和政治课，宣传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

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李勋还组织编写《工农革命军歌》在全军中教唱。歌词写道：

工农革命军，起义为人民，拿起枪炮和锄镰，没收豪绅大资本；

学苏联、信马列，兴起工农革命军；

打土豪、杀劣绅，铲除反动派不留根，推翻旧社会，一切权力归穷人。

在李勋的主持下，军部政治处为部队制定了不准强奸妇女，不准造谣惑众，不准替反动派当走狗，不准抢劫民财，不准叛变投敌，不准泄露军情等纪律。通过这次集中整训，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增强了战斗力。随着部队的壮大，红六军扩编为两个师、四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并派参谋长李子俊到宜都等地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又购回一批枪支，装备了部队，使红六军的军威大振。这时，湖北省政府为红六军的发展胆战心惊，调集当地反动武装对红六军实施“围剿”。沿头溪四十八大家之一的团防头子邓甲山，招兵买马，声称要与红军决一死战。贺家坪团董任金声逃到县城，自命为县长。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一面勾结邓甲山阴谋剿灭红军；一面大施反革命报复，从流溪、彭家河和杨柘坪等地抓来一批革命群众，惨杀在龙舟坪河坝。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为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装备自己，李勋决定先发制人，首先攻打沿头溪团防邓甲山，然后乘胜直捣县城。七

月二十九日，红六军挥师东下，分两路进攻沿头溪。一路由李勋、李子俊率领，沿江北，过巴山峡，翻天柱山，下两河口，直逼沿头溪；一路由陈泽南、陈寿山指挥，乘清江木船东下，绕下渔口进沿头溪，形成两翼包抄、东西夹击的阵势。当李勋、李子俊兵临沿头溪山麓时，陈泽南、陈寿山部尚未到达。李勋、李子俊分析了敌我力量和地形条件之后，认为，即使是水路部队尚未到达，也可击败敌人。当日，大雾弥漫，李勋派人侦察敌情，得知邓甲山带领一百多团防正在大土豪邓士泽家里集结。李勋当机立断指挥部队隐蔽接敌，在白茫茫的浓雾里，将邓甲山团防包围后，即发起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大土豪邓士泽被击毙，邓甲山团防被打死打伤数十人，其余部被打散，邓甲山本人翻墙逃往县城。这一仗打胜了，缴获步枪、土铳三十余支，罐子炮两门。红六军首战告捷，声威大振。李勋、李子俊与陈泽南、陈寿山率领的水上部队会合后，在沿头溪打土豪，筹集军饷，开仓济贫。

七月三十一日晨，红六军乘胜东下，准备攻打县城龙舟坪。这时，张发奎部十一旅二十一团陈凤诏部一千五百余人前来长阳“围剿”，沿清江至龙舟坪后，由邓甲山带路，直逼沿头溪。反动团防任金声也带三百余人在后河堵截红六军。红六军在向县城进军途中与敌遭遇，展开激战，有两名战士牺牲。为避强敌锋芒，李勋下令撤退，分两路行动，摆脱敌人。撤退中在流溪与团防任金声部接

火，李勋指挥所部利用高山密林及深涧狭谷的有利地形，痛击任金声团防，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任金声带领残部狼狈逃窜。八月三日，红六军两路部队在二岩子会合。敌陈凤诏团探知红六军的行动方向，尾追不放。为摆脱敌人，李勋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问题。李勋认为，红六军初建，武器装备差，队伍素质不强，敌我力量悬殊，不能与强敌硬拼。他主张在敌重兵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必须跳到外线活动，创立新的立足点。会议一致赞同李勋的意见，制定了红六军撤离长阳、向桑鹤革命根据地转移与贺龙会合的行动方案。

八月四日，红六军向资丘开拔，黄昏遇暴雨，途中宿营。翌日，队伍踏泥泞路前进，翻腊树坳进入资丘。镇上张灯结彩，杀猪设宴，欢迎红六军。为防尾追之敌突袭，李勋派交通邓钊等扮成货郎侦察敌情。敌陈凤诏部兵分三路，一路从一碗水，一路从三圭坪，一路从西阳坡，从三个方面向资丘包抄。邓钊等在三圭坪遇敌逃生，致使红六军未能及时获得敌人情报。在三面受敌、一面临江、情势危急的情况下，李勋率红六军仓促应战，虽经指战员殊死搏斗，终因敌人兵力强大，战斗失利，全军慷慨悲歌，人枪溃散。军长李勋率黄超群等四十余人杀开一条血路，从后街老虎园丛林中突围出去；参谋长李子俊等二十余人在掩护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前敌指挥陈泽南、师长向泉山以下八十余人被敌人俘去，当晚即被集体枪杀于烟墩台下

的石灰窑。当地人民把红军烈士遗体安葬于石灰窑内。在长阳这片土地上，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出威武不屈的英雄篇章，凝成土家儿女的“民族魂”。如今在山环水绕的资丘古镇上，耸立着一座庄严、雄伟的烈士纪念碑，记载着红六军这段壮烈的历史。

李勋自资丘突围后，仍按原计划往桑植、鹤峰方向行动，一行四十余人经渔峡口、枝柘坪，辗转到达同长阳接壤的鹤峰邬阳关，与红四军五路指挥陈连振取得了联系。八月底，李勋在陈连振的帮助下，以突围出来的战士为骨干，组建红六军第三十八团，团长陈宗普。三十八团配合红四军反击了两万多敌人对湘鄂边苏区的“围剿”，他们还击败了孙俊峰团防。

为在长阳迅速恢复红六军建制，扩大革命武装，使长阳和桑（植）鹤（峰）连成一片，九月下旬李勋带十六人返回长阳榔坪，准备联合梅孝达“神兵”，重整旗鼓。他们一行十七人，经枝柘坪，涉过绍淶河、龙潭河，艰苦跋涉两昼夜，爬上土地垭，来到了梨园，住在王家一栋大瓦房里。离这里仅两里多路的枫橡树村住着区团董秦铸堂。天快黑的时候，秦铸堂听说来了一路带快枪的人，便派心腹前去打探，当探知是李勋一行时，秦铸堂即派人与竹坪的梅孝达联系（梅孝达已叛变投敌），谋划擒拿李勋等人。第二天，李勋一行到洞头沟，宿在秦应裕家里。当晚，梅孝达的“神兵”包围了李勋住地，摸掉了两名哨兵后直冲楼

上，睡在铺上的李勋等人闻警起身与敌人展开搏斗，终因“神兵”人多，寡不敌众，李勋等被捕。面对敌人的屠刀，李勋大义凛然，昂首怒目，痛骂梅孝达叛变革命的可耻行径。敌人把李勋等押往榔坪，途经土地垭时，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李勋后背射进穿透前胸，敌人下毒手了，李勋倒在血泊中。李勋就义后，罪恶的敌人还将他的头颅割下送县城领赏。随李勋同行的十几名同志全部遇难。当地人民用松树做成简易棺材，把李勋等烈士的忠骨埋葬在龙潭河畔的土地垭山上。

李勋是土家族的骄子，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鄂西红六军的缔造者和充满革命气质的红军青年将领。李勋的壮烈牺牲，更加激发了长阳人民对敌人的仇恨。不久，李勋的部属黄超群、李步云、姜梦雄等在中共湘鄂西前委的领导下，重建了红六军第一师，这支部队以后发展演变为拥有一千四百多人枪的工农红军第五十师，在长阳掀起了更加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并使长阳成为苏区，与桑（植）鹤（峰）五（峰）石（门）苏区连成一片。全国解放后，长阳人民在资丘建立的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寄托着对以李勋军长为首的红六军殉难将士的思念和缅怀。

（翟 怡 鹏）



李　志　民



# 李 志 民

## 一

李志民（1906—1987），原名李凤瑞，又名李明阶，湖南省浏阳县船仓乡西坑村人，一九〇六年七月九日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生父李庆文是个纯朴忠厚的贫苦农民，生下子女六人，无力抚养。李志民满周岁时，就过继给堂伯父李奇文为嗣子。养父李奇文也是个世代务农的庄稼人，为人刚直、豪爽，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字，且擅武术，是村中拳师，平日好打抱不平，排解纠纷，在村里颇有威望。但因家境贫寒，两个弟弟均无钱娶妻，三兄弟相依为命，勤劳耕作，仍难得温饱。养父李奇文、养母游氏年过半百仍无子女，所以才将李志民过继来继承他家三兄弟的“香火”，视同亲生儿子一般。

养父李奇文家住在西坑村，与生父李庆文家的双坑村同在一条山沟里，相距仅四五华里。这里位于浏阳城东北约三十公里处，是湘赣交界一个极其偏僻的深山区，山高水冷，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当时

正是清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李志民的养父李奇文家只有李志民一个小孩，劳动力多，生活比生父李庆文家稍好一点，但也很穷苦。全家五口人只有一亩自己开荒的旱地，房前屋后有一小片山林，种植一些竹子、油茶、茶叶和红薯、蔬菜，供全家食用，但自己耕地少，每年不得不租种“祠会”二十多亩公田，逢上好年景，一年可收二十多担谷子，除交租谷和还清青黄不接时的借谷外，所剩无几。除正月初一和夏收、秋收开镰时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外，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红薯丝饭，冬季和农闲时还得将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即使这样节俭度日，每年仍然要缺几个月的粮食，第二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又得向“祠会”借三四担谷子才能度过春荒；要是遇上灾年，日子就更难熬了。

李志民的少年时代，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勃兴和失败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大小军阀各自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背后支持下，拥兵称雄，割据一方，为争夺地盘，进行连年的混战，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李志民和所有劳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六岁就开始放牛，每天牵着牛到山坡上放牧，采集猪草，不论是夏热还是冬冷，他常常忍饥受渴。有一年盛夏的一天中午，李志民正在放牛，突然飞来一大群牛蝇叮咬老牛，老牛暴躁起来，用牛角来顶他，使他跌到坡下刚砍伐过的竹林里，赤脚板被尖利的竹茬子刺穿，血流如注，父亲闻讯赶来，才把他背回家去。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尝到了人生的苦味。

一九一五年，李志民九岁时开始上学，在私塾读了两年半，从《三字经》、《百家姓》启蒙，尔后学《集韵增广》、《理言增广》、《幼学琼林》、《论语》等等，为他打下了较好的汉语和书法基础。一九一七年夏天，区政府下令查封私塾，他转学到马栏坳李氏山枣国民学校初小二年级插班，由于勤奋读书，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深受老师的喜爱。初小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考试作文，国文老师胡万程以“桃花”命题写作，李志民因从未写过这类题目的散文，一时破不了题，便胡乱写了一篇交卷。胡老师很生气，责令他重作一篇，作不好不准吃午饭。李志民委屈地回到座位重新构思，突然想起老百姓贴春联有“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风一家”的对子，受到启发，打开思路，便以“桃花报春，万物复苏”的主题展开，写得十分流畅，赶在午饭前交了卷。胡老师看后满意地笑着说：“吃饭去吧！”可是，李志民仍赌气不吃午饭。这件事在全校影响很大，不久，高坪区学务委员李石麟到学校视察，听讲起这件事，称赞李志民“学有进取，可以造就成才”。

李志民不仅勤奋读书，而且放学后、星期天、特别是寒暑假都主动参加地里劳动，上山砍柴，有时还同叔父李香文一起挑柴到永和市去卖。有一次卖柴时，碰上军阀吴佩孚部队的一个采买上士，硬逼着他们把柴挑到水府庙驻地，分文不给。他和叔父上前讲理，还挨了打。军阀部队这种土匪行径，使李志民幼小的心灵中燃起了仇恨的怒

火，决心要报此仇。从此，他积极跟着父亲学武，逐渐练就了一身比较过硬的“铁骨桩”拳，这对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二〇年春，李志民初小毕业，考上了高坪区公立旬溪高等小学。高坪区离他家十多华里，要住校读书，因家穷交不起学费和膳费，父亲不准备让他继续升学。此时，区学务委员李石麟因对他有“勤奋好学”的印象，便积极为他向宗祠“祀会”申请助学金，果然得到“祀会”同意，每年自家只要出两块大洋，其余费用都由“祀会”赞助，李志民才得以继续升学。但是，当时能读到高小的学生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穷人家的孩子很少，李志民因家穷常受到同学的耻笑。刚入学的那年阳春三月，天气转暖，学校上军事操课，李志民怕热，只穿罩衣去，把补得五光十色的破棉袄藏在被子里，等他出操回来，不知是谁搞的恶作剧，把他的破棉袄挂在宿舍门口“示众”，取笑说：“这是叫化子穿的。”故意出他的丑，使他的自尊心深受伤害。他真想不通：为什么有钱的同学家里那么富，而自己的父母亲、叔父终年劳累却不得温饱，世代受穷？

随着年岁的增长，李志民日益感到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想通过读书来摆脱贫困。他十分用功读书，而且能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纪律，学业成绩和“操行”（即品行）总评，每年都在前五名，几乎年年都受奖。他拿了奖学金除买学习用品外，都交给父母亲留作下

学期的学费。当时，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已遍及全国，学校六七个教员，大都思想倾向进步，特别是国文、历史课的老师邓子封、贝星煌，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国民党，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对李志民的影响更大。每当李志民听到老师讲述帝国主义列强依仗船坚炮利入侵中国，强迫清朝政府和袁世凯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商埠，国家在衰亡，民族受欺凌，他都悲愤交集，伤心落泪，在童稚的心田里播下了仇恨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和誓雪国耻的火种。而每当听到老师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朝腐败统治的斗争故事，他打心底里敬佩洪秀全、林则徐、孙中山等英雄人物，立志要继承先辈的革命伟业，毋忘国耻，振兴中华。

在旬溪高小读书期间，每年五月七日至九日，即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国耻日"时，李志民都积极参加学校举行的"国耻纪念大会"，并于会后到高坪、石湾等地示威游行。他和同学们沿途高唱《国耻纪念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的卖国条约！""毋忘国耻，抵制仇货"等革命口号，演出老师编排的活报剧和双簧，对群众进行宣传。这些爱国活动对李志民的思想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他在学生时代就萌发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

一九二四年春，李志民高小毕业，很想继续升学，可

是，读中学要到长沙，每年需要八十多块大洋的费用，虽经学务委员李石麟四处奔走，但马栏坳和西坑大小“祠会”只能补助他七十块大洋，自己每年还要出十几块大洋，实在力不从心，只好忍痛辍学。他回家后，同学李国文邀他一起到广州报考黄埔军官学校，他非常高兴，可惜两人都筹措不到路费，不能成行，只能遥望南天兴叹。

## 二

一九二四年秋，李志民刚满十八岁就开始当初级小学教员，后来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校长。当时初小教员的年薪是三十担谷子，约合六十多块大洋，生活虽不宽裕，但比一般农民要强。可是，农村教员的工作十分辛苦，一个教室里有程度不同的四五个班级，每个班级有国文、常识、算术等几种课程，教员要轮番上课，并辅导作业，每天讲课讲得口干舌燥。要是遇到雨天，还要背着年幼的学生来上学，放学再背他们回家，更是劳累。不过，李志民通过教学，同学生家长及周围群众很快熟悉了，这就为他开展革命工作创造了方便条件。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长沙市的学生同工人一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活动之后，为了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组织了许多宣传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浏阳县到长沙读书的学生组织了“浏阳县旅省同学会

宣传队”，由李志民在旬溪高小的同学詹连吾带队来到高坪。此时，李志民正与学校几个教员讨论怎样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旅省同学宣传队的到来给他们明确了斗争的方向。他们马上带领一部分学生参加了宣传队，深入到高坪、石湾、马栏坳一带，组织群众集会，讲演、表演活报剧，并进行募捐。李志民向群众激昂陈词，大声疾呼："中国之所以遭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任人宰割，是因为中国的大小军阀封建割据，象一盘散沙，要解救中华民族出苦难，工农大众就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群众听后都慷慨解囊，尽自己的能力捐献。这种热烈的场面，使李志民和宣传队员都深受感动。

宣传队几乎跑遍了高坪区所有的村庄，初步打开了农村工作的局面。共产党员张运鸿、詹连吾就留下来在这个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张运鸿、詹连吾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都以"个人资格"参加了国民党，并负责在高坪区组建国民党区党部。因为在宣传队工作期间，他们二人对李志民的革命热情和工作情况比较了解，所以，一九二六年初便动员李志民参加国民党，并在高坪、船仓两乡组建国民党高坪区分部，由李石麟任常务委员，李志民任组织委员，刘绍珊（小学教员）任宣传委员。张运鸿、詹连吾在介绍李志民参加国民党和组建区分部时很明确地对他说，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统一战

线组织，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区分部和国民党党员的任务，就是要发动、组织广大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所以，区分部一成立，李志民就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扎根串连，积极发展农民协会会员。一九二六年二月，成立船仓乡农民协会。在农会会员大会选举时，李志民得票最多，但他考虑到李石麟的社会经历、学识和经验都比自己丰富，在第一次执委会上，便建议推选李石麟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他和李秀松为副委员长。

乡农会成立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领导农民推翻地主阶级的代表——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村政权，宣布“一切权力归农会”，使农民挣脱几千年来压在头顶上的封建统治枷锁，翻身做了主人。为了镇压土豪劣绅的反抗，保卫新生的农民政权，他们很快地组织了农民自卫军，把农民武装起来。农民自卫军和农会会员、妇女会员、儿童团员经常召开大会，会后高举缀有“耕犁”的农民协会会旗，佩戴红袖章，背着鸟枪或手持大刀、长矛、梭镖游行，个个精神抖擞，扬眉吐气，使地主豪绅见了就打颤。

农会的第二个行动，是反对高利贷，进行平粜和减租减息斗争，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当时地主大都囤积许多粮食，青黄不接的季节再抬高粮价出售。农会就贴出布告，限定粮价，明令禁止地主把粮食运到外地出卖。农会还派出儿童团、自卫军在路口站岗设卡，发现地主豪绅偷运粮

食出境，立即没收，并捉来游乡，使他们威风扫地，无脸见人。

农会经过会员大会讨论通过，还贴出告示宣布：禁止赌博吸毒、偷盗抢劫、乱砍树木、演坏戏；禁止嫖妓宿娼、虐待妇女、纳妾、娶童养媳；提倡男女平等平权，宣传妇女剪短发、放脚；还有，不准搞迷信活动，不准坐轿子等等。对于违犯禁令者，区别情况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处理。这些禁令横扫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使乡村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尊老爱幼、家庭和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新风尚、新面貌。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李志民受到深刻的教育，认识到农民确是国民革命的一支生力军。李志民的斗争精神和联系群众的良好作风，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

一九二六年暑假，李志民被挑选到设在古港"狮山书院"的国民党高坪区暑期政治讲习所学习了一个月。这个讲习所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浏阳县党部筹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班。所长李九鸣和教员潘心源、罗纳川等同志都是中共浏阳县委的负责干部（他们都担任国民党浏阳县党部的领导职务），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实际斗争经验。这些同志抓住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革命形势高涨的有利时机，对国民党左派中的先进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使其成为共产党的培养发展对

象。讲习所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和《职工运动》等；此外，每人还发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几本书作为自修之用。李志民虽然过去在《新青年》等一些革命的报刊上读到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但仅是一鳞半爪，这次学习，对他来说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收获很大，特别是通过《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使他懂得劳动创造世界、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道理；懂得劳苦大众受穷受苦不是命苦，而是地主、资本家剥削的结果；懂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其帝国主义本性决定的；他向往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工农大众夺取政权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通过这次学习，更使他懂得了为什么必须进行革命和社会发展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从而明确了要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二七年初，李志民再次被选派到国民党浏阳县党务研究所学习。这个党务研究所同样是中共浏阳县委领导的，教员除了浏阳县委的领导干部外，还有中共湖南省委的特派员，师资力量更强。课程内容除了区讲习所的全部课程外，新增加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二七年三月刚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李志民虽然亲身参加过这场运动，也深切感受到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和它给农村带来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仅是感性的认识，通过较系统地学习后，他才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并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学习结束后，四月初，李志民又经张运鸿、詹连吾二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共船仓乡党支部。从此，李志民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六十余年如一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 三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李志民入党才一个多月，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就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长沙城外识字岭上，天天传来枪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枪声，仅二十多天时间，长沙城及附近各县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一万多人，工农运动遭到严重的摧残。

在浏阳，以西乡反动民团团总张枚村为首的反动势力也十分嚣张。他们伙同东乡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使浏阳各地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船仓乡党支部与上级党委失去了联系。六月上旬，张运鸿、詹连吾外出寻找党组织（詹连吾后来逃到上海，被捕叛变），船仓乡只留下李志民一名共产党员和原国民党区分部、区行政委员会的四名干部。第二天，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聂帮阶从区公所回家途

中被人暗杀，他的家人拿着血衣到区政府来报信，李志民和区里的干部感到局势严重，便决定暂时分散回家隐蔽。

六月二十日，在农民运动高涨时期逃往外地的地痞、讼棍郑宝道从浏阳西乡的反动民团团总张枚村处借得三百名团丁，拼凑了一支“清乡队”，自封为团防局长，在东乡各地疯狂进行烧杀抢掠。在高坪首先捕杀了李志民的老师、国民党高坪区党部常务委员邓子封和高坪女子学校校长贝星煌；在抄家抢劫中，又杀害了高坪区平民银行主任胡少武。接着，郑宝道便带着“清乡队”四出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一天下午，郑宝道亲自带了二三十名“清乡队”队员和几条狗，突然从李志民在西坑的住家后山包抄过来，幸好被邻居发现报信，他马上同躲藏在他家的李石麟分头跑到房屋东侧的山沟里隐蔽起来。郑宝道在李志民家里里外外搜查一遍，没有找到他，就转到房屋周围的山上去搜。这时，李志民已在群众的掩护下，沿着曲曲折折的山沟跑到双坑的生父家藏起来。而李石麟由于身材高大，又穿着白色衣衫，目标明显，被郑宝道抓到高坪坐了牢，以后才花钱赎出了狱，逃到外地去了。

九月，张运鸿（化名刘大荣）通过浏阳县委派巡视员同李志民取得联系，口头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消息，指示他转入地下活动，组织秘密的赤色工会、农会和游击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是，当时全

区只有李志民一个共产党员，单枪匹马要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开展工作，困难很多。这时，他回想起农民运动高潮时期，农村有了强大的农会组织，又掌握了一支农民武装，虽然武器很少，但土豪劣绅见了梭镖、大刀也是要打颤的。血的经验教训，使他更感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于是，他便积极在群众中秘密串连，组织赤色农会小组，为建立农民革命武装、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创造条件。

一九二八年初，公立平安第二小学一位教员因事请假，请李志民去代课。他看形势有些缓和，便答应下来，搬到学校去住。没想到，二月间的一天拂晓，国民党高坪区常备队突然出动二三十人到西坑抓他。幸好他的养母机智地找人到学校给他报信，他赶忙转移到生父家双坑的山顶一座庙里隐蔽起来，但年近古稀的养父和叔父却被抓捕入狱，折磨了一年多。

一九二八年三月，白色恐怖又趋严重。中共浏阳县委派巡视员通知李志民转移到湘赣边的连云山区长坑、丙子岭一带，交给他组建高坪区游击队的任务，并任命他为区游击队的党代表。历经白色恐怖漫漫长夜的李志民，倍感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党要他搞武装，他特别高兴。游击队初创时只有五个人，三支汉阳造步枪。枪少弹缺，力量薄弱，要扩大队伍，开展武装斗争十分困难。李志民心想，浏阳是闻名遐迩的花炮之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配制火药、导火线和制作花炮的技术。他便发动游击队员自制

土手榴弹和土手枪，自己武装自己，基本上做到人手一二件武器。

那时候土豪劣绅的活动还很猖狂，反动气焰甚嚣尘上。游击队就采取昼伏夜出的方式活动，事先侦察好哪个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的情况，夜晚出动突然袭击，把反动分子抓住处决，贴出告示，宣布其罪状，杀一儆百。同时，还四处张贴布告："土豪劣绅不要恶，红军一到杀脑壳！""土豪劣绅不要凶，红军一到用枪冲！"这样杀掉几个反动分子，震动很大，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活动便大大收敛了。游击队又深入附近山村，发动群众组织秘密农会，打土豪，除劣绅，筹粮筹款；同时，游击队还积极地在农会骨干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重新聚集农村的革命力量，传播革命火种。一九二八年秋，李志民把筹到的款拿出一部分，化装成商人到江西万载县株潭镇买回两支步枪。这时，游击队的枪增加到五支，队员也发展到十几个人，不仅晚上活动，有时白天也出去活动，长坑、丙子岭这块小根据地，也日渐巩固了。

一九二八年冬，平江起义的红五军第二纵队纵队长黄公略率部分队伍来到浏阳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李志民奉中共浏阳县委之命，调任红五军第二纵队七大队四中队党代表，从此他开始了革命的戎马生涯。

## 四

一九二九年春，红五军第二纵队七大队仍在浏阳地区打游击。四月初，李志民和中队长王炳良率四中队在横叉山口伏击高坪区挨户团下乡抢粮的几十名团丁，首战告捷。六月十一日，正值农历的端午节，据侦察员报告，永和市商会和土豪劣绅要大摆酒宴犒劳国民党保安团。李志民和王炳良抓住这个歼敌的好时机，联合第一中队一起行动，于十一日凌晨，选择了一条避开闹市、隐蔽接敌的山路，奔袭保安团驻地的菊溪小学。到了菊溪小学，李志民率先冲进了保安团饮宴的厅堂，正在大吃大喝、猜拳行令的团丁，听到李志民大喝一声:“不许动，谁敢乱动打死谁！”开始还莫明其妙，以为是他们的同伙在开玩笑。当他们看到站在面前的是真格“从天而降”的红军时，就象被捅乱了的马蜂窝，一哄而散，有的钻进桌子底下，有的跳窗夺门逃跑。李志民一枪撂倒了一个企图逃跑的团丁，立即带领战士追击，仅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歼敌数十人，缴枪十余支。

战斗刚结束，李志民和王炳良从俘虏口中得知，离菊溪小学二三里地的菊溪（俗称大溪河）东岸的水府庙内，还驻扎着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队。他们喜出望外，马上集合队伍，与第一中队一起直趋水府庙。水府庙的敌人也正放假过端午节，当官的到河西岸营部饮宴作乐去了，留下

当兵的吃饱喝足之后也在岸边四处游逛，成了一群散兵游勇。李志民小时候曾在这里卖过柴，对这里的地形、道路十分熟悉，他带头领着四中队的战士冲在前面，一中队的战士紧跟在后。当队伍接近水府庙一百米左右时，他高喊:“同志们，冲啊，消灭白狗子!”紧接着，吹起了冲锋号，他指挥部队一股作气冲向水府庙。国民党士兵突然听到号声、枪声、喊杀声，吓得不知所措，乱成一团，不少人狗急跳墙，跳进了菊溪，企图泅渡到西岸逃命，可是河面有近百米宽，当时又正是洪水季节，波涛汹涌，一下子就被巨浪席卷而去；没有跳水的敌人，有的被打死、打伤，有的被活捉，很快就歼灭了敌人的这个连，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特别是成箱成箱的子弹，当时还是很罕见的。红军一天两战皆捷，声威大震，革命群众听到捷报，都高兴得奔走相告。同年八月，李志民和王炳良又乘胜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袭击了马栏坳联防队和高坪区团防局。每次战斗，他作为中队党代表，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英勇杀敌，为战士作出榜样。这几次战斗的胜利，打击了当地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使广大革命群众被白色恐怖压抑了一年多的忧郁心情又迸发出胜利的希望。

一九二九年九月，李志民调任红五军随营学校党支部书记，担负培养基层军政干部的任务。当时红五军参谋长邓萍兼任随营学校教育长，经常召开学员座谈会，总结工

作经验，然后加以归纳提高，再给学员上课。李志民就把邓萍召开座谈会的记录和讲课内容整理成文，如“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开好支组联席会议”等等，刻写蜡纸油印出来发给学员作教材。每期学员毕业后又把这些教材带回部队，在工作中运用；有的还传抄、翻印。在当时连队缺乏教材的情况下，这些带经验性的教材，对部队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李志民在工作中也学会了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方法。

一九三〇年三月，李志民调任红五军特务大队副政治委员，与大队长谢嵩一起率部转战于湘赣边区，参加了攻占安福、分宜、新余、袁州（今宜春）等县城的战斗。红五军连克四城，士气大振。可是，四月初，当部队离开袁州准备迂回湖南再北上进攻铜鼓、万载的行军途中，经莲花县路口镇时，正期与国民党朱耀华旅遭遇。军部令特务大队担任阻击，等待后续部队赶到进行反击。当时，敌人凭借兵力上的优势，疯狂向特务大队的阵地反复冲击，企图突破阻击阵地，迂回到红五军侧后，以便夹击、消灭红五军于行军途中，战斗异常激烈。李志民亲自在第一线指挥，顶住了敌人的多次冲击。在阻击战中他的右胸部中弹，负了重伤。但他仍带领部队顽强地抗击敌人，坚守住阵地，并亲自掩护身旁的五名重伤员。正在这危急时刻，后续部队赶到，一阵猛烈反击，敌人丢下辎重仓皇溃逃，红五军尾随追击，缴获很多。战斗结束后，后续部队才发

现李志民负了重伤，马上抢救包扎，转送永新后方医院养伤。

一九三〇年八月，李志民伤口初愈即赶回湖南。适逢红一、三军团在浏阳县永和市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他被任命为红五军党委秘书长，不久，在军党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九三一年二月，他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保卫大队政治委员；六月，又调任红五军第二师七团政治委员。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进占萍乡、安源和攻打新干、清江等战斗及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斗。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红五军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机，组织一个团攻打会昌县城，强攻二十多天未克，部队伤亡较大。军首长遂令红七团接替攻城。那天拂晓，李志民与团长龙昌汉率部从安远县罗田地区赶到会昌城外。他根据敌我态势机敏地分析，兄弟部队攻城虽未克，但守敌伤亡也很大，已是强弩之末。所以，他与龙昌汉研究，决定先开展政治攻势，再集中火力攻击。这时，恰逢兄弟部队再次爆破城墙成功，守敌陷入混乱。李志民马上抓住这个战机，组织战士对敌喊话，展开政治攻势。守敌见城墙已破，又见红军的援军赶到，军心动摇，不敢顽抗。李志民乘敌人火力减弱的瞬间，率部队一鼓作气攻入城内，仅二三个小时，即全歼守敌，创造了政治攻势与突击攻坚相结合的成功战例。

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奉命攻打赣州，因

赣州地势险要，城池坚固，守敌兵力雄厚，围攻三十余天不克。三月初，敌陈诚、罗卓英部二万余人驰援赣州，迫使红军不得不于三月七日撤出战斗。师部令李志民、龙昌汉率红七团留在赣州南门担任后卫任务。南门外飞机场是攻打西门的红一师东撤必经之路，如果七团不能有效地阻击敌人，红一师的退路就有被切断的危险。在这关键时刻，李志民与龙昌汉各带部分队伍，分兵扼守两侧阵地。敌人集中数倍于红军的兵力疯狂进攻，轮番冲击，一度曾突破红军的前沿阵地，切断了李志民同龙昌汉的联系。李志民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始终站在战斗的第一线，积极设法与龙昌汉所率队伍进行联络，并主动予以支援，终于击退强敌，完成了掩护红一师东撤的任务。

正当李志民、龙昌汉率七团即将撤离阵地时，红二师政治委员彭雪枫赶到南门，要求七团急往东侧的小南门为红五团解围。原来，七日拂晓，赣州城内守敌通过地道出击，将扼守在小南门的红五团围困在城外的阵地上。红五团指战员激战五个多小时，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大量杀伤了敌人，但自己的伤亡也很大，仍未能突出重围。这时，李志民因连日的频繁战斗已很疲劳，手中的驳壳枪子弹也已经打光。但他见兄弟部队处于危难之中，心急如焚，二话没说，向彭雪枫政委要了二十发子弹，立即和龙昌汉一起带领部队，随彭雪枫政委赶往小南门阵地，经与敌人艰苦拼搏，终解红五团之围。待红五团撤出小南门阵地向东

转移之后，李志民和龙昌汉才率七团撤离赣州城，表现了一个指挥员胸怀全局、团结战斗的优秀品质。

一九三二年三月，李志民调任红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随部西渡赣江，进入上犹、崇义地区，先后占领了粤北的城口、长江圩和赣南崇义的文英、聂都等地，尔后进入湖南，占领桂东、汝城。八月，参加攻克乐安、宜黄战斗，胜利后就地休整。师部驻在官仓前村，师领导干部马上分头到各团帮助总结战斗经验。李志民刚到五团驻地不久，敌陈诚、罗卓英部突然由西向东窜入红二师驻地，将五团隔在师部北边。李志民临危镇定自若，当机立断地率五团先向东北方向的深山转移，侦察清楚敌情后，便出敌不意地指挥部队与敌对进，抄小路由东向西摆脱掉敌人，把五团带到江西军区所在地的凤岗圩，与彭雪枫政委带领的七团会合，使部队免遭损失。但由于当晚下了暴雨，天黑路滑，在山地行军转移中，李志民滑倒摔伤了右脚腕，待部队会合后，彭雪枫政委马上派人把他送到医院作手术治疗。

一九三三年五月，李志民脚伤初愈，分配到红三军团教导营任政治委员。教导营主要是培养营、连、排级军政干部。他引导学员边战斗边学习，通过总结作战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提高基层干部的军政素质。一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二月，他和营长彭绍辉率教导营随“东方军”两度入闽作战，参加了拔除泉上土堡、攻占朋口，收复连

城和攻克沙县等战斗。一九三四年二月回师江西，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高虎垴、万年亭等战斗。在此期间，李志民虽率领教导营奋力苦战，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干扰破坏，取得的一些胜利成果都先后丧失殆尽，使他倍感痛惜。

一九三四年十月，李志民脚伤尚未痊愈，又患疟疾，身体虚弱，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带着伤病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和营长彭绍辉率教导营担任红三军团后卫掩护与收容的艰巨任务，并参加了会理、土门、鲁班场等战斗。当时，军团长彭德怀特地给教导营配备了一部电台，与军团指挥部直接联系，并交代他万一被敌人截断，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时，可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壮大革命武装。但他们每次完成后卫掩护任务之后，都及时与指挥部取得联系，克服了种种困难，迅速赶上部队，深得彭德怀的赞许。七月初，长征队伍翻过雪山到达黑水芦花地区休整，教导营奉命看守先头部队缴获反动土司的数百头牛羊。当时部队刚翻过雪山，体力消耗很大，指战员们饥肠辘辘，都渴望宰杀几头牛羊改善一下生活。但李志民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以身作则，并耐心教育部队严守纪律，精心照料牛羊，宁肯自己吃青稞麦和野菜，也不动一只牛羊。后来，红军总部根据实际情况，通知各部队可以宰杀牛羊，准备制作过草地的干粮，因李志民在外单独执行任务，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待他请示上级返回驻地后，

他们看守的牛羊已被兄弟部队全部拉走，但他毫无怨言，表现了一个领导干部忠于职守和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优秀品格。

七月下旬，长征部队缩编，李志民调任红三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总医院政治委员，带领一百多名伤病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的茫茫草地。途中，他和医务、担架人员发挥阶级友爱精神，精心护理伤病员，使重伤员平安度过难关，轻伤员没有掉队。当伤病员到达巴西宿营时，有人送给李志民一只五六斤重的獾子，他自己舍不得吃，煮熟后全都送给重伤病员补养。他这种关心战友的赤诚之心感人至深。九月，红一、三军团在哈达铺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李志民调任保卫分局第二科科长。十月，到达陕北吴旗镇后，他又调任红四师组织科长，参加了直罗镇战斗，结束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一九三六年一月，李志民调任红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二月下旬他与团长罗开桂一起率部参加东征战役，编入“抗日先锋军”右路军序列，东渡黄河，直趋同蒲路。当时红一方面军刚结束长征不久，广大指战员的体力尚未恢复，而且他们都是经过长征的骨干力量，为减少伤亡，红军总部指示各部队，在战斗中一般应采取袭击手段，不采取攻坚战，以保存红军实力。三月十日，李志民等率红十一团与兄弟部队一起向兑九峪地区之敌发起进攻，将敌击溃，歼敌约两个团。三月十七日，他们又率部突破敌汾河

堡垒线后，十九日由霍县地区向南急进，攻打赵城未克，之后又配合红十团攻打洪洞县城，仍未克，即在洪洞县与浮山县之间的广大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致力于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扩大抗日红军的力量。四月间，红四师政治委员彭雪枫来到十一团，指导部队围攻浮山县城，筹款筹布。李志民陪同彭雪枫亲临浮山城下观察地形，见浮山虽已在红军包围之中，成为一座孤城，但城墙既高又厚，易守难攻。于是，决定采取“大造舆论，主攻其心，使其惊慌，取而胜之”的智取方针。团长罗开桂带领部队赶挖地道，扎制云梯，进行爆破城墙的演练，制造攻城的战斗气氛。李志民带领宣传队到城外各村寨张贴布告、标语，并对城内守敌发动政治攻势，向反动县长发出最后通牒，限定三日之内为红军筹款五万元，土布三百匹，并严令他所筹布、款只能在富豪商贾中筹集，不许分摊给小商贩及贫苦居民，否则将加倍处罚。反动县长见红军兵临城下，惊恐万状，只好全部接受红军所提条件，不到三天时间，即从城墙上将所筹布、款全部坠下城外。这样，红十一团既向城内富豪商贾筹集了布、款，又在城外广大农村宣传发动了群众，扩充新兵六七百人，凯旋而归。这种攻城战法在当时红军中还是个创举。当十一团撤离浮山县时，城外的群众都依依不舍，热情送别。

五月二日，由于蒋介石、阎锡山调动二十万大军拦击

红军抗日先锋军，阻断红军东出河北敌后与日本侵略军直接作战的去路，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遂令红军抗日先锋军回师陕北。这时，红十一团奉命在黄河东岸的永和关上担任后卫任务，掩护部队西渡黄河。五月五日凌晨三点钟，东征红军的大部队都已渡河，李志民突然接到指示，到离永和关十几里的毛泽东主席的驻地领受任务。毛主席面示李志民，后卫团过河之前，要在二十多里的行军路上，仔细检查一下前头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借的东西还了没有，房子打扫干净没有，门板上好没有，在村庄里或行军途中，有没有踩坏群众的庄稼，有没有丢下什么东西，是否留下了路标，如果发现破布、碎纸或纸烟头、烂布鞋等，统统收集起来销毁；把路标统统擦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真正做到秋毫无犯。李志民理解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他深刻认识到这次东征，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次进入山西，纪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影响，关系到红军的声誉。他返回驻地后，马上召集各连干部和各级纪律检查小组成员开会，及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结合本团的实际进行简短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分工。拂晓，部队开始下山。李志民带领各级干部和纪律检查小组，沿途分头到各村庄，到田野和山间小道，认真检查群众纪律，该付钱的付钱，该赔偿的赔偿，该清扫的清扫，把一切破烂东西和路标都收拾起来销毁，一路上，象没有经过大部队一样。直至上午八点多钟，当全团撤离黄河东

岸，李志民带领最后三条渡船刚划到河心，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赶到永和关山上，遭敌机枪、迫击炮的猛烈射击。李志民冷静沉着地指挥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胜利地回到西岸，受到师首长的表扬。红十一团维护红军纪律的模范行动，与国民党军队奸淫掳掠军阀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山西人民留下了好影响，并为以后在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六年五月，李志民调任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西征战役。他同师长文年生、政治委员李宗贵一起率部包围安边城守敌，并击溃了增援安边的国民党八十六师高双城部一个团的进攻，完成了“围城打援”的任务，维护了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与西征前线部队的交通要道。进驻甘肃、宁夏交界的甜水堡后，就地宣传发动群众。九月上旬，红八十一师奉命南下，围攻李旺堡。李志民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李旺堡城墙坚固，且时处枯水季节，城外清水河滩开阔，守敌系马鸿宾部一个骑兵团，兵力充足，易守难攻；但马部与蒋介石素有矛盾，又是孤城坚守，军心民心倾向抗日，厌倦内战。基于这一分析，他建议采用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打法，一面积极准备攻城，一面开展政治攻势。他的建议被采纳，于是他发动全师指战员，大家献计献策，利用风筝、“孔明灯”等方式飘送传单。与此同时，他组织宣传队，白天在城外村庄宣传发动群众，夜晚抵近城墙对守敌宣传团结抗

日的道理，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马鸿宾部官兵的爱国思想。经过几天的对敌宣传，守城敌军对红军的态度越来越友好。李志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写了一封致守城敌骑兵团马团长暨全团官兵的公开信，晓以抗日救亡大义，邀请他们派人出城谈判。在送公开信时，还随信送给守城部队几头肥羊，表示慰问。第二天，守城马部派出代表与红八十一师敌工科长谈判，同意撤出李旺堡，返回原驻地。当守城马部骑兵团撤离时，李志民亲率部分队伍，列队在清水河滩上，军号班吹起庄重的欢送礼号热情送行，使马部骑兵团官兵深受感动，频频挥手告别。这样，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取得了李旺堡，创造了政治攻势克敌制胜的成功战例。

十二月初，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二九师奉蒋介石之命进攻红军西路军。红八十一师担负在河连弯以西地区进行阻击的任务。根据中共中央争取、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的指示，师长文年生组织部队构筑工事，作好阻击准备，政治委员李宗贵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以防东北军弹足粮丰长驱直进。李志民则深入发动指战员做好政治攻势的准备工作，并在东北军必经的路上，不论墙壁、木板、石崖、树干，凡是能写上字的地方，都写上标语或贴上《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的传单，有的还抄贴一些抗日歌曲，造成一种动员东北军团结抗日的气氛。

十二月七日前后，东北军一二九师先头部队开始向红

八十一师阵地进攻。李志民及时组织前沿阵地指战员向东北军一二九师喊话:“东北军弟兄们，不要替蒋介石打内战！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在红军激动人心的政治攻势的感召下，东北军一二九师停止了进攻，很快退了下去。当天傍晚，红八十一师奉命后撤七八公里。在撤离阵地前，在阵地上留下许多标语、传单。入夜，李志民又派出宣传队到东北军前沿进行宣传，唱起《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悲壮的歌声，唤起东北军官兵怀乡的情思，激发了抗战的热情。利用这个机会，红八十一师宣传队还邀请东北军官兵第二天派人到红军阵地上来联欢。果然，第二天晚上，东北军就派官兵来和红军座谈联欢，共抒联合抗日的情怀。就这样，红八十一师打了一场奇特的“阻击战”，白天“打仗”，夜晚联欢，化敌为友,“激战”数日，双方无一伤亡。直到发生“西安事变”，东北军官兵在阵地上留下“红军兄弟，抗日前线再见”的字条，撤离了战场，结束了这场漂亮的“政治仗”。自此，李志民善于打“政治仗”的声名风传一时。

一九三七年一月，红八十一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李志民任军政治部主任，驻陕西洛川一带，维护延安至西安、三原的交通线，做支援东北军、西北军对付国民党“讨伐军”进攻的准备。四月，红二十七军移驻宜川，开展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这期间，李志民积极组织红二十七军与东北军相互访问，双方来往频繁，关系密

切，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红军与东北军的抗日统一战线。

## 五

一九三七年六月，红二十七军划归留守兵团，缩编为陕甘宁警卫团，李志民主动要求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李志民进入抗大第三期仅学习、挖窑洞一个多月，即被抽调到第五队任队长兼政治教员。十一月，随着全国抗日高潮的兴起，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涌进延安，抗大的规模日益扩大，干部紧缺，李志民遂调任校政治部组织科长，后任干部科长。李志民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每一期知识青年学员入学到毕业时应发展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入党”的指示，认真贯彻“大胆发展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党的发展方针，积极慎重地做好发展知识青年入党的工作。白天，他深入各学员队了解情况，找党的发展对象谈话；夜晚，他在油灯下仔细审阅大量的入党申请书和有关材料，提出审批意见。在他的努力下，抗大从第三期到第五期，先后在知识青年中壮大了党的力量，发展了近万名新党员，圆满地完成了党的发展任务。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大总校挺进晋察冀敌后办学，校政治部干部科、组织科合并成立组织部，李志民任组织部长。一九四〇年一月，李志民调任抗大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他与校长孙毅认真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十分重视学校的革命化建设，通过开展“创造模范党支部、模范共产

党员、模范干部”竞赛活动，使党的支部真正成为战斗的堡垒，共产党员更好地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李志民还根据分校处于敌后战斗环境的特点，致力于培养广大学员的战斗作风，有效地提高二分校的战斗力。在一九四一年八月至十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孙毅校长带领抗二团学员英勇地坚持了冀西的斗争。李志民则带领抗一团学员，以无畏的气概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冀中抗三团活动的地区，继续坚持教学，从而取得反“扫荡”和教学双胜利。一九四一年秋，李志民根据晋察冀军区和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创办了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并亲自兼任校长，从晋察冀根据地军内外先后招收了一千五百多名十三岁至十六岁的高小毕业生入学。一九四二年二月，又从部队中挑选了六七百名优秀的班、排长和老战士，组建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他呕心沥血，加强这两所中学的领导，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了一大批青少年学员。这批青少年学员和抗大二分校培养的二万多名学员一样，后来都成为军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李志民在抗大总校和二分校从事教育工作达五年半之久，为团结教育青年学生和培养训练干部做出显著成绩，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被评为抗大的“优秀教职员”。

一九四三年二月，抗大第二分校返回陕北归总校建制，李志民被留在晋察冀军区工作，先后担任第一分区副政治委员、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第四分区政治委员兼地

委书记等职。一九四四年一月，李志民刚到平山四分区工作时，分区南临伪军据点，敌人经常出动袭扰，对四分区进行“蚕食”。李志民和司令员郑维山领导四分区军民，积极开展反“蚕食”、反抢麦斗争，以地方武装为骨干，带动广大民兵和群众破袭公路、铁路、袭击敌人的火车、汽车和运输队，使敌人的交通线濒于瘫痪。与此同时，相对集中分区主力，部队用摆设地雷阵、火力封锁通道、断绝敌人粮草及饮水等手段，围困敌据点，待敌人弹尽粮绝时，攻占敌碉堡，或将敌人逼退，再乘胜追歼逃敌，把敌人从根据地挤出去。全分区的军民，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就拔除和逼退敌人许多据点，使抗日根据地获得新的发展。在四分区工作期间，作为地委书记的李志民，为了坚持持久战，他领导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动部队、民兵、群众实行劳武结合，发展生产，保证军需民食。当时晋察冀军区的《子弟兵报》报道了他们的斗争事迹，并撰文介绍了他们反抢麦斗争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经验。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李志民调到重新组建的冀中军区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林铁、行署主任罗玉川等进入冀中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恢复、巩固和发展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积极准备战略大反攻，任务十分艰巨。开始时，刚恢复的冀中军区只有一个主力团和部分分区、县的地方武装，而且处于被敌人分割、各自为战的游击战争

环境，部队都穿着便衣，住在堡垒户家中，活动于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之间。根据这种形势，李志民同冀中军区的领导同志一起，一方面积极整训原坚持在冀中进行游击战争的地方武装，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使之成为地方武装的主力；一方面认真贯彻党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和使用原冀中军区的干部。他们对在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军“五一”大“扫荡”后继续坚持冀中斗争的干部、战士，颁发了“五一奖章”，以鼓舞指战员的斗志；对在大“扫荡”中失掉联系回家隐蔽又自动归队的干部、战士，表示欢迎；对有顾虑或不好意思归队的，派人前去动员归队，不冷漠，不歧视，给以信任；对当时被俘，后来又逃离虎口，经初步审查没有干过坏事的，也动员他们归队，在斗争中考验。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动员工作后，在大“扫荡”中失散的大部分干部都陆续归队，重新聚集起一支干部队伍，又通过这些干部去发动、武装群众，使冀中军区的抗日武装队伍很快壮大起来。

一九四五年四月，冀中军区第九分区部队经过七天七夜的激烈战斗，攻克日、伪军的辛中驿据点，揭开了冀中春季攻势的序幕。接着，在军区的指挥下，各分区乘胜进攻，发起了任（丘）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安（平）饶（阳）战役，毙伤俘敌近四千名，收复县城八座，拔除敌碉堡三百多个，解放五百多个村镇，使大清河以南，沧石路以北，子牙河以西，平汉路以东的抗日

根据地连成一片。六月，又发起夏季攻势，以在路西整训的练兵团为骨干，编成四个地方主力团，形成拳头，在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及广大群众的配合下，首先拔除子牙河岸三十七个日、伪军据点，接着发起大清河北战役，歼灭日、伪军一万一千多人，解放县城十一座，使冀中地区近九百万人口获得解放。在春、夏季攻势中，李志民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和敌军工作，每次战役他都动员成千成万的民兵和群众参战、支前。他还组织许多俘虏及投诚的敌军官兵及其家属对敌喊话，宣传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瓦解了敌军，使敌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力地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后，仅在几天内冀中全区武装就动员编组成立了三个旅、二十六个团，浩浩荡荡向天津进发，包围了被日军占据的天津，并向驻天津的日伪军发出“缴械投降”的命令，还曾一度攻占了天津外围的杨村车站、北仓车站和飞机场，切断了平津、津浦之间的铁路交通线，显示了冀中军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威力。

## 六

抗日战争刚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方面指令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一方面紧急调兵遣将，抢占北平、天津等华北各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在八年浴血抗战中创建的解放区形成包

围态势，内战迫在眉睫。鉴于这种形势，冀中军区部队奉命撤围天津，回师冀中，连克十三座县城，全部肃清了抗日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扩大了解放区，把国民党军完全压缩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上。为了保卫晋察冀解放区，做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准备，九月，以原冀中军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冀中野战纵队（一九四六年六月，正式命名为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杨成武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

冀中野战纵队是以长期在冀中平原分散作战的分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编入了大量的县、区游击队组建的。他们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灵活机动打游击的特点，但缺乏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特别是缺乏打运动战、攻坚战的经验。而且，整编后部队立即向绥远进军，来不及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也来不及训练和改装，其中有的团队还是在进军途中才把游击队时所穿的杂色便衣改换成统一的军装，补充了一些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以营或连为单位，调整了步枪的口径，武器装备较差。李志民和杨成武等纵队领导同志深知，要把这支由游击队编成的部队锻炼成为一支坚强的野战部队，需要艰苦的磨炼。他们利用向绥远进军和沙城整训的有利时机，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特别是在部队中开展诉苦运动和“保卫胜利果实”的教育之后，掀起了练兵热潮，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当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

内战时，冀中野战纵队立即投入保卫晋察冀解放区的战斗，取得大同战役、易满战役的胜利，在战斗中部队迅速成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平汉线北端国民党第五十三军及第九十四军第五师分南北两路西犯晋察冀解放区的易县。李志民、杨成武率由冀中野战纵队改称的第三纵队阻击南路来犯之敌第九十四军第五师。在这场阻击战中，三纵第二十三团第一营奉命插入敌侧后，切断樊家台与南桥头敌人之间的联系，以造成各个歼敌的有利战机。十七日拂晓，敌人察觉侧背受到威胁，立即组织重点疯狂反扑。三纵二十三团一营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从清晨激战到晚八时，全营四百多名指战员打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十余次进攻，坚守住阵地，毙伤敌七百多名，击毁、击伤敌坦克二辆，沉重地打击了素称精锐的蒋介石嫡系第五师。最后，该营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将敌击溃。在这次战斗中，一营营长朱彪四处负伤，教导员曹良眼睛被打瞎，不下火线，仍坚持在第一线指挥战斗；战士们更是人人刺刀见红，杀出了军威。战斗结束后，李志民立即从指挥所策马八十多华里赶到一营驻地，召开庆功授奖大会，亲自把“钢铁第一营”的奖旗授予一营，并授予营长朱彪战斗英雄称号。授奖大会之后，李志民逐个慰问尚未转送后方的伤员。在他的关怀下，又将腿部伤势严重的朱彪转送到旅卫生部手术治疗，并亲自交代医护人员一定要想方设法保住朱彪的大腿，非万不得已不能截肢。李志民这

种爱下级爱战士的深厚情怀，使朱彪及全营指战员深受感动。朱彪伤愈归队后，率领一营屡建功勋，充分发挥了“钢铁第一营”的先锋作用。

一九四六年冬，李志民调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杨得志也由第一纵队调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一九四七年七月陈正湘继任司令员）。此时，解放战争已逐渐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李志民与司令员杨得志、以后又同陈正湘率第二纵队参加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平汉路战役、察南战役、保北战役及第二次察绥战役和平津战役，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保卫晋察冀解放区、解放华北地区的作战任务。李志民作为部队的政治领导干部，他把军政首长亲临第一线指挥、临机处置战场复杂多变的情况、果断地下达决心、及时地修改不适时宜的作战预案，以减少部队伤亡和争取战斗的胜利，视为爱兵的最实际体现。因此，每次战役、战斗，他都同军事指挥员一起，亲临第一线，在参与作战指挥的同时，积极开展战时政治工作，激发部队的士气，培养部队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战斗作风。由于他平易近人，善于走群众路线，经常深入连队班排调查研究，与干部、战士促膝谈心，所以他能及时总结经验，并运用报纸、刊物和文工团、宣传队等宣传手段，宣扬典型、推广先进经验，从而有效地推动了部队革命竞赛和杀敌立功运动的开展，把部队搞得生龙活虎一般，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保证了战役、战斗

的胜利。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李志民、陈正湘正率领第二纵队同兄弟部队一起围攻徐水县城，石家庄守敌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突然率军部和第七师并指挥第十六军一个团企图北犯保定，协同徐水以北固城地区之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等部南北夹击二纵。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遂令二纵第四、第六两个旅与兄弟部队五个旅迅速南下，歼敌于方顺桥以南地区。第四、第六旅接到南下作战命令后，即以强行军速度一昼夜步行二百五十华里，及时赶到预定地域，将企图夹击我军之敌合围于清风店西南地区，不待休息立即投入战斗。经浴血奋战，二纵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敌一万七千余人，俘敌军长罗历戎，为解放石家庄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战斗激烈，二纵的两个旅伤亡较大，战斗结束时已无力打扫战场，而由后续的兄弟部队去收容俘虏、收缴敌人的武器装备，因而自己缴获很少，但两个旅的指战员从大局出发，毫无怨言。二纵这种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不争功不争缴获的高尚风格，深受上级和兄弟部队的赞扬。

一九四八年二月，李志民主持召开了第二纵队营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多年的战斗经验和当时战略反攻任务的需要，他运用正太、青沧等历次战役、战斗的战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战时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指出战时政治工作必须保证全体指战员都能懂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指导原则，尤其要懂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思想，从

而使打“运动战”的思想深入人心，只有这样，部队在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的情况下，才能吃大苦耐大劳，保持旺盛的斗志，保证多打胜仗。他还要求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必须做到“五到”、“五快”，即要求干部下连队要做到口到、脚到、眼到、耳到、脑筋到，真正有助于连队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要求政治机关做到：布置动员工作做得快，整理组织快，总结经验教训快，上下联系反映情况快，解决问题快。“五到”、“五快”战斗作风的培养，使二纵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加强了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使思想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战斗性，把政治工作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紧密结合起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志民率第二纵队正与兄弟部队一起围攻归绥守敌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迅速向东包围张家口”的命令。当时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患病未愈，李志民马上与副司令员韩伟等纵队的领导同志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当日即率第五、第六旅向东进发，冒着大雪，经两天半急行军，于二十九日抵达东洋河、宣平堡一线，三十日攻占张家口外围柴沟堡、左卫等据点，与兄弟部队一起进逼张家口，揭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遵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二纵对张家口守敌“围而不攻”，其主要任务是阻击援敌，粉碎守敌突围的图谋。十二月一日，守敌果以两个师又一个骑兵旅的兵力，向二纵孔家庄一带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企图突围，被二纵五旅

英勇击溃。十二月八、九两日，张家口守敌又出动七个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集中兵力向二纵五旅十四团的北新渠阵地拼死攻击，妄图打开一个突围的缺口。十四团指战员以“压倒一切敌人”的顽强战斗精神，与突围之敌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守住了阵地，阻敌成功。守敌的突围失败了。为此，十二月十日，毛泽东主席特来电表彰。二纵就是以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围困张家口守敌达二十五天之久。十二月二十三日，张家口守敌弃城向以北的大境门外逃跑。李志民奉命率二纵对守敌发起总攻，二十四日与兄弟部队并肩追歼逃敌于大境门外，解放了张家口，全歼守敌五万余人，其中二纵歼敌一万余人。接着，李志民又率部乘胜前进，兵临北平城下，参加了保卫北平的战略行动，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二月，李志民调任第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太原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四月二十四日太原宣告解放，完成了解放华北的任务。六月，李志民调任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与司令员杨得志等一起，率部进军大西北。杨李兵团在中央军委和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积极贯彻“先箝马（箝制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打胡（打蒋介石的嫡系主力胡宗南），后箝胡打马”的作战方针，经过艰苦行军和追击，于七月十一日，进至乾县、礼泉地区，箝制“二马”，配合兄弟部队将胡宗南四个

军九个师约四万余人包围于扶风郿县地区，十二日全歼该敌，取得扶郿战役的胜利。

七月二十一日，十九兵团沿西（安）兰（州）公路追击逃敌“二马”。八月一日，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在固原以南的任山河，经六小时激战，歼灭马鸿逵第十一军约五个团，共五千余人，解放了固原。战后，六十四军即留在固原一带箝制宁夏马鸿逵部，分割“二马”，使其不能出援兰州。八月八日，李志民、杨得志率第六十三、六十五军继续沿西兰公路追击马步芳部，向兰州进军。当时正值酷暑，西北高原燥热缺水，而且这里是回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敌人在这里造谣惑众，煽动民族仇恨，给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行动造成许多困难。面对这一艰巨任务，李志民要求各部队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个指战员，做深做细，与此同时，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李志民不仅注重领导者的积极言传，他更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各级首长，与士兵同甘共苦，风餐露宿，忍饥受渴，尊重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不进清真寺，不吃猪肉，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实际行动揭破了敌人的谎言，逐渐赢得了回族同胞的信任和欢迎。

八月二十日，十九兵团与第二兵团在兰州城郊会师，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兰州城（北面为黄河，仅一铁桥通往青海），二十一日即发起总攻，因准备匆促，加之部队存在轻敌思想，激战竟日，进展甚微，初战受阻。遵照彭

德怀司令员的指示，两兵团暂停攻击，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战法。经过三天准备，于二十五日再次发起总攻。十九兵团与二兵团协力攻坚，当天下午四时，六十三军一八九师即攻占敌主阵地马家山，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当晚也攻占古城岭。敌军见大势已去，匆促弃城溃逃，二兵团第六军乘胜攻入城内，十九兵团六十三、六十五军则追击逃敌二十余里，直抵东梢门，消灭了逃敌，至二十六日十二时，两个兵团已占领城内外各要点，并越过黄河铁桥，占领北塔山，全歼敌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三千余人，兰州宣告解放。

兰州解放后，李志民、杨得志几次看望原国民党甘肃省参议员、开明绅士郭南浦老先生。当时郭南浦已年逾古稀，但当他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军宁夏，并有意和平解决宁夏问题时，便自告奋勇要到银川劝说马鸿逵及其堂兄马鸿宾投诚。李志民、杨得志请示彭德怀司令员后，提出以“北平方式”和平解放宁夏的条件，并派以郭南浦为首组成的“和平代表团”入银川。但马鸿逵及其子马敦静（国民党军驻宁夏兵团司令官）顽固不化，拒绝和平解决。在此情况下，九月九日李志民、杨得志率十九兵团从兰州、定西、海原地区分三路向宁夏进军。马家军闻风丧胆，纷纷溃逃，少数顽抗者迅速就歼，三路大军势如破竹，仅十天时间就解放了靖远、同心、中宁等城，大军直指中卫。九月十八日，马鸿宾之子、国民党军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

靖亲自到中宁与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军部谈判，表示接受和平解放宁夏的条件，率部举行起义。随即十九兵团进占中卫，并乘胜前进，先后攻占青铜峡、金积、吴忠、灵武等要地，歼灭马鸿逵部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各一部。马鸿逵之子马敦静乘飞机逃跑，马家军群龙无首，更陷入一片混乱。九月二十三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派出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三名代表到中宁与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谈判，愿意接受和平解放宁夏的条件。李志民、杨得志代表十九兵团与马鸿宾的代表签订了《和平协定》，当晚先头部队即进驻银川，宁夏全部解放，完成了解放大西北的作战任务。

## 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李志民任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政治委员，并任中共西北局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与司令员杨得志一起率部驻守陕西、宁夏地区，积极贯彻中央和西北局“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指示，在完成剿匪、整训和大生产任务的同时，积极支援地方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恢复生产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此期间，他们领导部队参加修筑宝天铁路，完成宝鸡到天水段一百五十三公里的土石方工程，为大西北的交通事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九五〇年夏，李志民为加强部队建设，在西安创办了十九兵团军政干部学校，两

年间先后训练三期营、连、排干部，培养军政干部五千二百多名，为十九兵团出国抗美援朝作战准备了大批领导骨干和战斗骨干。

一九五〇年十月，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李志民、杨得志和十九兵团广大指战员义愤填膺，纷纷请缨出征，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十一月二十二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杨得志、李志民率十九兵团离开大西北开赴津浦铁路山东兖州、泰安、滕县一线集结待命，进行战前的政治动员、组织整顿和战斗训练。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李志民与司令员杨得志一起，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李志民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以坚强的政治工作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及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部队，开展广泛、深入的杀敌立功运动，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攻如猛虎、守如泰山，连战皆捷。在四月二十二日开始的第五次战役中，十九兵团以初战必胜的姿态，在扫清临津江以西之敌后，即强渡临津江，直捣三八线以南的议政府。接着，十九兵团继续南进，追歼敌人，于五月十七日占领汉城以北的高阳、金谷里、磨石隅里、清平川、上泉里等地。这时，西线之敌为策应其东线作战，向十九兵团展开重点进攻，十九兵团即转入积极防御，箝制敌人，与兄弟部队一

起，粉碎了敌人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迫使美国政府接受停战谈判，取得了入朝第一仗的胜利。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九兵团遵照志愿军总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从运动战转入阵地战，先后进行了涟川、铁原间的阻击战和铁原以西的大马里、夜月山、天德山一带的阻击战，杀伤了大量敌人，粉碎了美军、南朝鲜伪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此后，十九兵团又依托坑道，进行长期的积极的防御作战，从"地下长城"出发，向敌人"挤阵地"，开展小部队活动和"冷枪冷炮"杀敌的狙击运动，坚守阵地，并不失时机的在开城前线和马良山、石砚洞北山等地与敌进行反复的争夺作战，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底，十九兵团（包括配属部队在内）共歼敌十四万四千余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一九五二年冬，李志民调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在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的领导下，负责组织指导志愿军政治工作的开展。他通过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和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的代表作祖国建设成就的报告，以及祖国人民大量的慰问信、慰问品和军人家属的来信，开展"与祖国人民来来往往"的活动，不断加深对部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还广泛开展了立功创模运动，极大的激发了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特别重视开展敌军工作，要求各部队通过广播、传

单和战场喊话，并通过组织圣诞节、元旦等节日与敌军阵地联欢，赠送礼品，宣传志愿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和宽待俘虏的政策，揭露美、李集团破坏和平谈判的阴谋，从而加深了敌军官兵思乡厌战的情绪，瓦解了敌军的士气。在李志民的精心组织指导下，志愿军这段时间的战时政治工作十分活跃。

一九五三年五月，李志民还参与组织、指挥夏季进攻战役。这次战役的许多战斗，为了保证发起攻击的突然性，减少在接敌运动中的伤亡，进攻部队，有时数十人，有时是上千人的部队，必须提前一个晚上运动到攻歼目标前二百米左右的地域潜伏一天，待第二天傍晚突然发起攻击，保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敌人。在潜伏过程中，部队可能会遇到敌人盲目扫射、炮击、轰炸及预想不到的种种困难，还要忍饥耐渴，忍受蚊虫、蛇蝎的侵扰。万一有一人暴露目标，将会破坏整个战斗计划，甚至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这就需要部队每个指战员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整体观念和不怕苦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李志民根据战役的特点，狠抓各部队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整体观念的教育，广泛开展军事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提困难，想办法”，群策群力，设想开进和潜伏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提出解决的办法，做到对困难心中有数，较好地提高了部队的胜利信心，保证了每次战斗打必歼，攻必克。在两个半月内，志愿军在宽达二百公里的正面上，进

行了大小进攻战斗一百三十三次，特别是第三次进攻战役——金城战役，击溃南朝鲜伪军四个师，歼敌二万六千多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朝鲜停战后，一九五四年二月，李志民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三月，任志愿军政治委员。在此期间，他先后同邓华、杨得志、杨勇等几任志愿军司令员搭档，继续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爱护和尊重朝鲜的党、政、军、民及其领袖金日成同志；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和一草一木；带领志愿军广大指战员，为维护朝鲜和平，积极加强部队建设，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与美军、南朝鲜伪军破坏停战协定的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维护朝鲜和平的同时，他们领导志愿军各部队积极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他们还教育部队认真执行停战协定，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做好优待俘虏、遣返战俘和移交敌军阵亡人员尸骨的工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誉。

李志民在志愿军工作达七年之久，是在朝鲜前线战斗、工作时间最长的志愿军高级将领之一。因此，他先后三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两次荣获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九七五年十月他访问朝鲜

时又荣获一级国旗勋章一枚。

## 八

一九五七年十月，李志民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九年一月任政治委员。他长期致力于部队院校建设和军事、政治教育事业。他在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罗荣桓等老帅的关怀和支持下，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教育方针，继承和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学习的基本内容，启发引导学员通过总结过去的战争经验，特别是抗美援朝的作战经验，联系军队当前的实际，重点研究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战略及战役、战术中的政治工作。他还强调，在坚持以我为主学习军事的同时，还要重视借鉴其他国家军队的先进经验。他还注意对古今中外军事经验的研究。一九六二年毛泽东主席提出“高级干部要读点书”之后，他在学院率先响应。在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开出三十本马列著作的“读书目录”经毛主席圈阅后，决定在高等军事学院办高干读书班，以轮训方式组织全军军以上干部学习。李志民热情地承担了这一任务。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办了三期高干读书班，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四本书。参加读书班学习的高级干部普遍反映收获很大，对提

高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现代军事科学水平及其领导艺术和指挥才能起了重要作用。

李志民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期间，十分重视教员队伍的建设。他亲自参与教员的选调，要求干部部门在军内外广招贤才，优中选优；他还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学员都要尊重教员。他在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和生活上对教员关怀备至，经常与教员一起备课，共同研究教学中的问题。他还帮助教员反复修改教学提纲。除此，他还深入课堂和练兵场，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的问题，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他的这种好作风，深得教职学员的尊敬和爱戴。

一九五九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李志民遵照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的指示，组织了由陆海空三军的上将、中将、少将二百三十人组成的将军合唱团，并担任合唱团指挥，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大唱革命战歌，在军内外和国内外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李志民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残酷斗争和迫害。一九六九年十月，又强迫他化名李光“下放”到江西省高安县渡阜农场劳动。李志民身处逆境，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边，坚决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不懈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强的党性和原则性。

一九七二年十月，李志民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出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他的革命精神和斗志仍不减当年。他坚决按照中央军委和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同司令员皮定均一起，领导军区党委一班人，不顾个人荣辱得失，竭力抵制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部队建设的干扰破坏，认真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积极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给部队建设造成的种种影响。他敢于排除各种干扰，着手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大批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干部，使他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一九七五年春，李志民认真贯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大力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整顿部队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团以上干部集训，学习中央军委重新颁发的“三大条令”，初步解决了各级领导班子中存在的“软、懒、散”问题和部队中存在的“肿、散、骄、奢、惰”问题，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他根据福建军区地处前线、担负海防战备任务的特点，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狠抓部队的战备、训练和连队基层建设的工作。他积极支持和配合皮定均司令员组织多次大小规模的战役演习，并保证了一年一度野营拉练工作的圆满完成。一九七五年，他已年迈古稀，但仍带领军区机关到闽浙赣边界进行野营拉练，行程上千公里，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巩固海防，作出了显著成绩。

粉碎“四人帮”以后，李志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带

领军区党委一班人坚决支持福建、江西两省委的工作。军区先后派出二万八千多名干部、战士进驻福州、晋江、莆田等地，宣传党的政策，支持地方党委，很快稳定了福建的局势，为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生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共中央对此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福建军区在关键的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七八年五月，当报刊刚开始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李志民便组织军区党委进行学习，认真领会，并很快写出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明确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李志民更以坚定的姿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的方针，大刀阔斧地开展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使遭到破坏的党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这同时，为大力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走遍了福建前线部队的各个师、团，深入前沿海岛连队，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好典型，及时宣扬好典型，较好地发扬了正气，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部队的侵袭，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一九八〇年二月，李志民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他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后仍十分关心军队建设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他不顾年老体衰及视力严重下降的困扰，经常外出视

察工厂、农村，看望部队的指战员和革命老根据地群众。一九八五年夏天，他到新疆时还深入伊宁的霍城看望边防哨所的战士。一九八四年冬，他返湖南时既看望了浏阳老根据地的乡亲，又跑了湘西许多老根据地作了社会调查。他一面鼓励老区群众发扬革命传统，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一面向中共中央如实反映情况，要求中共中央加强对老根据地贫穷地区的扶贫工作，使为革命胜利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老根据地尽快富裕起来。他还积极响应中顾委的号召，把湖南浏阳县作为联系点，深入调查，具体指导。一九八六年六月，他在抗大第二分校附设中学校友代表会上，鼓励老同志要发挥余热，最后还充满激情地高呼:“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表达了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李志民退居二线后，在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的同时，一直致力于总结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撰写革命回忆录，记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艰苦斗争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颂扬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英雄人民，缅怀革命先烈的英勇精神，冀求革命传统代代相传，永放光辉。他主持编审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上、下册)》三部书。他还倡议并组织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三

军团军史战史》的工作。他的这些劳绩，对总结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经验都具有重大意义。他撰写的反映抗日军政大学斗争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回忆录《革命熔炉》一书，受到了抗大校友和全国众多院校师生的欢迎。他在一九八七年病重期间，仍孜孜不倦地撰写革命回忆录；十分关心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并曾上书中共中央，表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为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大批年轻有为、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而由衷地高兴。

李志民在六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群众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军队建设事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和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愧是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的领导者和长期致力于军队院校建设的军事教育家。

李志民曾当选为第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为特邀代表光荣莅临。他还长期任“中朝友好协会”会长。

一九五五年李志民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李志民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一岁。

(王 金 陵)



李 赐 凡



# 李　赐　凡

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乡一个青翠的松柏坡上，屹立一座庄严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面铭刻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继陈毅之后的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

## 一

李赐凡（1908—1935），原名李嗣蕃，号汉亲，以后又用过李锡凡、李树凡等名，一九〇八年二月二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鹧鸪坪村。家中世代务农，父亲长期患肺病，抱病给人帮短工。母亲双目失明。李赐凡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贫寒多难之家，饱尝艰辛之苦。父亲喜欢他聪明，咬紧牙关，在堂亲们的资助下送他上了学。李赐凡在县立初中读书时，受到教员中的共产党员李文香、高静山和颜秉仁等人影响，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思想和学识与日俱进。李赐凡担任县城学生联合会主席之后，领导学联在宜章县捣毁“福音堂”，查禁、焚烧日货，慰问北伐军，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活动。他还回到家乡黄沙地区组织了最早的农会，推进国民革命。

不久，北伐的胜利果实被蒋介石篡夺，大革命失败了，李文香、颜秉仁先后被国民党杀害，宜章县立初中停办，李赐凡回到家乡鹧鸪坪村当了小学教员。新军阀蒋介石的背叛，擦亮了李赐凡的眼睛，更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转入地下斗争的中共宜章县委，秘密转移到离鹧鸪坪村十里的碕石承启学校，并建立了碕石特别党支部。李赐凡以无畏的献身精神在碕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以教书为掩护，以办夜学为名，积极开展农运，从实际斗争中发展党员，首先在鹧鸪坪一带建立了党的支部，并由他担任第一任党的支部书记。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到达湖南南部，与中共湘南特委和中共宜章县委一起，积极进行年关暴动的准备。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朱德率部智取宜章，李赐凡和中共碕石特支的彭晒迅即到县城听取朱德、陈毅和宜章县委的指示。一月十九日，在彭晒等人的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碕石暴动，李赐凡和农民党员李玉岗带领鹧鸪坪一百多农民参加了碕石暴动。第二天，李赐凡等返回本村，捕杀了大豪绅李天保，喊出了“暴动、暴动”的响亮口号，在鹧鸪坪竖起了武装暴动的大旗。几天时间，武装暴动的烽火即燃遍了黄沙区直至宜章全县。在武装暴动的基础上，李赐凡着手组建农民武装，率领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他亲手在仁里村一栋屋壁上写下的“杀尽土豪”、“枪决反动派”、“杀尽

地主，实行土地革命"的醒目标语，经历六十年风雨，至今仍清晰可辨。

山上李家村的反动豪绅害怕革命，故意挑起宗族纷争，煽动本村农民结队前去围攻革命堡垒的碕石彭家，并派人到鹧鸪坪等村游说，妄图把李姓农民都拉去为其壮威。李赐凡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斥责了游说者的卑劣行径，继而带领村里一百多名农民赤卫队员支援碕石。到碕石后，他站在前面，对受蒙蔽来围困碕石的李姓群众说："革命不分李家、彭家，天下贫苦农民才是一家。"在他的说服下，反动豪绅企图利用封建宗族势力绞杀革命的阴谋破产了。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中共宜章县委决定，把黄沙、白沙两区的农民赤卫武装统一起来，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独立营。李赐凡受党组织的委派参加了该营的领导。独立营一组建就随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频繁地参加战斗，成为湘南起义中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当湘、粤敌人从南北夹击宜章，工农革命军主力奉令向东转移后，正在偏远山区活动的独立营与上级失去了联系。这时，肖克、李赐凡等率领独立营这支五百多人的队伍，经艰苦转战，于四月中旬在资兴县龙溪洞与毛泽东带领的队伍会合。他们是第一支与毛泽东会师的湘南起义农军。

## 二

井冈山会师后，原宜章农军被编为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李赐凡担任第二十九团教导队（又称学生队）党代表。教导队队长先后由肖克、刘敬担任。教导队的学员都是连、排干部。肖克和李赐凡十分注重从战斗实践中指导他们带兵打仗，在战斗的间隙又精心组织他们训练，使他们的军政素质很快得到提高。教导队为二十九团培养了成批的优秀的军事骨干，二十九团也迅速成长为井冈山根据地能打硬仗的红军主力团之一。后来成为人民军队著名战将的陈光、欧阳毅、肖新槐和李克如等人，就是在这个教导队受过训练的，有的还是李赐凡介绍入党的。

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李赐凡担任二十九团少共团委书记。他在团里建立了一支很活跃的宣传员队伍，并且把他们分派到各营、连开展宣传工作。他要求宣传员们都学会“枪打、笔打、口打”，积极开展战场鼓动，鼓舞部队士气，慰问伤员，同时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紧密配合对敌作战。在七溪岭保卫战中，李赐凡带领宣传队员，在路旁和山口写上了红军的口号，在激烈战斗的阵地上用纸糊的喇叭筒向敌人喊话，有效地瓦解了敌军。最后，红四军获龙源口大捷，打垮了江西杨池生、杨如轩五个团的进攻，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执行“左”倾

盲动主义方针，趁毛泽东不在部队之机，强拉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冒进湘南。李赐凡与张际春、高静山、欧阳毅等政治工作干部对冒进湘南都表示反对。七月二十四日，冒进湘南的红四军主力虽然攻克了郴州城，但立即遭到敌范石生和许克祥部的疯狂反扑，二十九团被冲散，许多人不听指挥私自跑回家乡。有的想拉李赐凡一起跑。李赐凡坚定地表示:“我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他还苦口婆心地劝住了一些人，跟着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一起追上主力返回了井冈山。回井冈山后，李赐凡被编入二十八团党部工作，不久担任一营一连党代表。在井冈山时期的多次战斗中，李赐凡都表现出勇敢机智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并为红军初创时期基层政治工作的开展做出了贡献。

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向赣南进军。沿途有敌人追堵，天气奇寒，红四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于二月八日攻克闽赣边重镇瑞金。之后，敌刘士毅部尾追上来，为了打掉这个尾巴，军部决定在距城六十里的大柏地设伏。按照朱德军长的部署，李赐凡与连长李云带领部分战士担任诱敌任务。他们挑着担子，走在大道上，敌人来了，顶一阵就慌忙撤退，敌人停下时，他们又回过头来打，这样打打退退，折腾了大半夜，终于把敌人步步诱进了红军的伏击圈。尔后，李赐凡等带领一连迅速甩开敌人，绕过山背，很快插到敌人背后，兜住敌人的屁股。这时，埋伏在

两边山上的红军猛烈开火，奋勇冲杀，将敌人截成数段，打得敌人夺路逃窜。这一仗击溃了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八百余人，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

三月十四日，红四军攻下闽西的长汀城，土著军阀旅长郭凤鸣被击毙。部队在长汀进行改编，正式将团改为纵队，营改为支队，连改为大队，李赐凡升任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党代表。随后，红四军以第一纵队一支队为尖兵，连克瑞金、于都、兴国、会昌，于四月二十九日攻打宁都。宁都城大墙高，顽敌赖世忠凭坚固守，红军攻了两昼夜未克。朱德军长重新调整了部署，下令每个纵队准备二十把木梯子，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强攻。第三天入夜后，李赐凡带领一支队义勇连，在火力掩护下，顶着铺上棉被的桌子，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接近西城墙角下，竖起梯子，他率先登上城头，抡起大刀劈向混乱的敌群，给后续部队杀开了一条血路，为夺取宁都城建下奇功。

五月，红四军再次入闽，在攻打龙岩、全歼陈国辉部和进占"铁"上杭、消灭卢新铭旅一个团的战斗中，一支队都打得很出色，表现了勇猛的战斗作风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当时，毛泽东常随一纵队行动，李赐凡从毛泽东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尤其是在连队思想政治工作和作战指挥艺术方面，深受教益。他和支队长王良带领的一支队，经常得到毛泽东、朱德的赞扬，每当有难打的攻坚战斗，便把一支队调上去。

一九二九年的夏、秋，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之后，部队纪律一度松散，在攻打广东东江、梅县等战斗中损失不少精锐。李赐凡从战争胜、败的对比中，更加体会到了毛泽东对红军领导的重要作用。当时，毛泽东住在永定牛牯朴深山里，一面养病一面指导地方工作。李赐凡和王良便常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军情，转送书信报刊，沟通毛泽东与部队的联系。后来，陈毅从上海带回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到山里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红四军在连城新泉进行整训，毛泽东为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望云草室"召开了各级党代表座谈会。李赐凡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李赐凡详细地汇报了一支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情况，谈了自己上井冈山以来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体会。他敏锐并坦率地指出、分析了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主义、单纯军事观点、作风涣散和纪律松弛等问题。他以本支队一个大队长鞭打士兵为例深刻地说明："随便处罚人，说什么'三句好话不如一个巴掌'，甚至要枪毙人，都造成官兵对立，损害团结，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红军要生存，要靠政治工作，要以政治工作来保证部队的行动符合党的要求。"他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赞许。座谈会之后，李赐凡以正式代表的资格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后，李赐凡和王良率部北上宁化、东韶，在敌后的乐安、宜黄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击溃了敌金汉鼎部

的进攻，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建党建政，真正体现了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全新性质。一九三〇年三月初，在歼敌唐云山旅的水南战斗中，李赐凡与一大队长陈光率部占领右翼山包，咬住敌人连续激战一整天，赢得了战机。第二天，红四军四面围追敌唐云山旅，将其消灭三分之二，唐云山率残部逃入吉水以北。随后，李赐凡、王良率一支队参加围困赣州战斗，数日不克，转兵开向南部，连克寻邬、南康、大余、南雄、信丰等县。在创建赣闽粤边大块根据地的斗争中，一支队立下了汗马功劳，李赐凡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三

一九三〇年六月，红军再克长汀，成立红一军团，李赐凡升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李赐凡同纵队司令员王良一起，率领部队从闽西打到湘东，攻占了南昌南面的樟树镇和浏阳的文家市。参加第二次围攻长沙未克，在返回江西萍乡之后，于十月初参加了攻占吉安的战斗。李赐凡和王良率一纵队担任攻城第一梯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指战员们象出山猛虎扑向城边，用竹竿、木梯冲破敌人电网，用稻草填满密布竹钉的壕沟，奋勇杀进城内，守敌惊乱，四处乱窜，大部被歼。赣西南广大工农群众盼望已久的夺取吉安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夺取吉安后，红军再次进行整编。红四军第一纵队改

为第十师，王良任师长，李赐凡任政委兼师政治部主任。十师的老班底就是井冈山时期的二十八团。

部队在永丰、宜黄一带整训中，开展了肃反、清查“AB 团”的斗争，有的刮起了一阵无端怀疑、刑信逼供和乱捕乱杀之风。在这个乱捕乱杀风中，军保卫局通知第十师，说师宣传队有几个人是“AB 团”分子。师部逮捕了这几个人，经审问都不承认，用刑后都承认了，他们又供出十几个人，于是再抓再审，牵连了三十多人，其中有几个还是湘南起义中随李赐凡一起出来的。有个十四岁的王东保，刚从第十师调到军部作勤务员，也被人供出抓了。头脑清醒的李赐凡感到有问题，便同师长商量说：这些同志是在敌人枪眼下幸存下来的，大多数是党员，与敌人不共戴天，他们怎么能是反革命呢！师长王良也同意他的看法。于是，李赐凡立即骑马到军部找罗荣桓政委和负责肃反工作的军政治部主任彭祐，汇报了自己的看法。罗、彭听了李赐凡的汇报后，也认为不能这样搞，指示李赐凡回去把抓起来的人放了。由于李赐凡明辨是非，分清了敌我，勇于冒险负责，在罗政委的支持下，终于把一批忠诚的干部战士保护下来，免遭横祸，也使第十师在这次错误的肃反扩大化中没有受到多大损失，保持了部队的稳定。王东保等人后来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

一九三〇年冬，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采取“并进长追、分进合击”的战法，从江西吉安至福建建宁一线分数

路由北向南，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妄图将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作战方针，以少数兵力与敌保持交战接触，引诱敌人就范，主力则秘密集结在黄陂、小布地区休整待命。第十师中有些干部和战士对这样的作战方针不理解，反认为是被敌人吓唬住了，藏在山间等着挨打。他们纷纷到师部请战，要求早日出击，痛痛快快地与敌人战个你死我活。李赐凡赞扬了指战员们的歼敌士气，然后又以牵牛鼻子为喻开导大家说：同志哥莫急嘛，敌人的鼻子已被我们牵住了，让他们到山沟里规规矩矩转去，到了他晕头转向、懒得再转时，嘿，看我们的朱总司令、毛总政委怎样来收拾这些龟儿们吧！在他的说服下，指战员中的急躁情绪安定下来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敌第九路军“前敌指挥官”张辉瓒，率十八师进入永丰县龙岗，扬言要剃朱、毛的头，彻底消灭红军，骄狂不可一世。红军决定乘敌不知我而我知敌之良机，在龙岗至君埠的隘途里设下埋伏，以歼灭张辉瓒师于运动战之中。第二天拂晓，担负正面攻击的红三军首先打响了。李赐凡与王良率领第十师作为第二梯队从东北方向赶来，在上固未发现敌人，便迅速向南，从龙岗北面的高山上直冲而下，攻向张家车的敌人。开始一连三次冲锋未能奏效，遭敌顽强反击，战况吃紧。这时李赐凡和王良

都出现在队伍前面，驳壳枪一举，高喊：“冲上去就是胜利！”在他们的带领下，部队顿生虎气，战士们高叫着：“打到龙岗去，活捉张辉瓒过年！”一举攻下张家车。紧接着，第十师又抢占了龙岗西北面的高地，与兄弟部队一起以优势兵力将敌人的师部和两个旅分割包围，形成了对外阻敌增援、对内防敌突围的有利态势，敌军顿时大乱。当张辉瓒派出的一个团去为其戴岳旅解围时，还没来得及辨明方向，就被第十师等部队一举歼灭。下午三时，朱德发出全面攻击信号，红军从四面八方攻向龙岗镇，敌九千人马都成瓮中之鳖，乖乖被俘。

战斗结束后，第十师负责打扫战场，清查俘虏时，唯独不见张辉瓒。李赐凡说：红军把龙岗围得铁桶一样，张辉瓒即使长了翅膀也难飞出去。他立即组织搜山。师部管理科长陈茂带着红二连几个战士搜查万功山时，终于在一个山洞里把两手抱着脑袋缩成一团的张辉瓒拖了出来。

霏霏雨雾已悄然退去，夕阳辉映着满山红旗和红军战士们举枪跳跃的雄姿，战地群山上发出一片欢呼声：“张辉瓒被捉住了，张辉瓒被捉住了！”正在给俘虏讲话的李赐凡听到战士们的欢呼声，快步走向押着张辉瓒的红军战士们，高兴得用拳头轻击着他们的胸脯，然后以严厉的目光盯着敌“前敌指挥官”，用轻蔑的口气问道：“到底是你剃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你的头？”张辉瓒全身哆嗦，好一阵子才叩着头发出蚊子般的声音：“是朱、毛剃我的头。”

龙岗大捷后第三天，第十师又与红十二师一起乘胜追至东韶，再歼敌谭道源半个师。紧接着，第十师又与十二师一起连克广昌、南丰，所向披靡，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蒋介石接二连三地纠集重兵向根据地发动“围剿”，李赐凡和王良率第十师多次受命与敌人正面决战，打了不少硬仗。尤其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兴国高兴圩、老营盘血战中，李赐凡亲自带领第十师敢死队冲锋，在阵地上与敌人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争夺，战况空前惨烈。当敌人遭打击向吉安撤退时，第十师等红军部队在方石岭又阻敌五十二师，予以全歼。敌师长韩德勤本已被俘获，由于红军指战员不认识他，被他佯称伙夫获释逃脱。李赐凡与梁必业等为此编了一个小活报剧，生动刻画出韩德勤的凶狂与被俘后化装逃跑的狼狈丑态。李赐凡还在剧中饰演一个诙谐有趣的角色。坚强有力而又活跃的部队政治工作，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斗志，也教育、启发了不少俘虏兵参加红军。

## 四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王良调任十一师师长，以勇猛善战著称的陈光继任十师师长。李赐凡、陈光按毛泽东、朱德的部署，在石城县屏山、珠坑、横江一带参加攻打被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的战斗。在地方赤卫队配合下，他们

先后攻下多处土围子。

这时，驻守宁都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中共策动下正准备起义，军委决定派红四军迅速前往宁都城外的会同“相机予以协助”。十二月十三日午前，李赐凡和陈光率第十师攻占会同，即在附近加强工事，对城内守敌严密防范，同时派出便衣侦察员到头陂、驿前等地探明敌情。第二天，李赐凡和陈光又亲率一个连接近宁都城附近侦察情况，及时向红四军军部和中央军委报告了前线动向。在李赐凡、陈光率领第十师的灵活策应下，保障了宁都起义在十二月十四日夜胜利举行，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等爱国将领率领二万七千名国民党军官兵参加红军，促成了红五军团的诞生。

一九三二年一月，红军围攻坚城赣州，攻打一月不克。是役，李赐凡率第十师先作监视部队，后与第十一师攻打赣州南边的新城，消灭了广东军阀余汉谋一个独立旅，占领了新城。红军撤围赣州后，以红四军为主力组成东路军再进闽西，随军行动的毛泽东根据漳州守敌虚弱、易攻难守的情况，决定攻克龙岩后向闽南进军，直下漳州。四月十六日下午，红军进逼离漳州城外三十里的天宝大山下，李赐凡与师长陈光率领第十师迅速占领天宝山下东部各攻击点，与山上守敌严阵对峙。四月十九日拂晓，红军东路军向守敌发起攻击，第十师首先配合第十一师攻下了杨梅岭、风霜岭敌阵地，随后第十师单独作战，进攻

大尖山敌阵地。在瓢泼大雨中，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李赐凡带领一支队伍冲向九龙江支流的永丰溪，但溪上的宝明桥正处于敌人火力封锁下，部队难于从正面过桥。李赐凡果断地率部向下游转移，在窄谷处涉水过河，立即组织对山上敌人仰攻。经激战占领了大尖山东侧敌阵地。这时，军参谋长聂鹤亭也来到第十师阵地，与李赐凡一起指挥部队在大尖山到天宝山一线与据险顽抗的敌人拼杀。天宝山敌阵地被攻下，守敌王祖清旅被全部消灭，防守在笔架山、榕子岭之敌杨逢年旅被迫撤退。接着，身带枪伤的李赐凡，会合师长陈光后，指挥部队从天宝山冲下来，一鼓作气，横扫敌群。当时正值春洪，河水暴涨，许多敌人被淹死在河中。敌师长张贞闻风丧胆，慌忙带领余部弃城逃窜。二十日清晨，李赐凡等率部顺着宽阔的龙厦公路，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漳州城。

进驻漳州期间，李赐凡十分重视对部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他经常向指战员讲解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城市政策和纪律。他下到团里布置扩红、筹款时，总要检查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情况。他每到一地，总要帮助当地的工人成立秘密工会，创建中共地下党组织，不失时机的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漳州临海，茫茫的大海使他兴奋不已。他常与陈光师长漫步在月下的海滩上，昼夜畅谈参加革命以来的战斗历程，抒发壮志豪情。一次，他指着远处海面上的帝国主义军舰，对身边的师政治部青年科长梁必业等人

说：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外国兵从海上、地上全部赶出去。

漳州战役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开创了中央苏区巩固发展的新局面。漳州战役的胜利。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惊恐万状，急忙拼凑几十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为反击敌人的新“围剿”，东路军奉命回师赣南，经过长汀县大禾地区时，李赐凡随红四军军长王良去察看一个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突然敌人射来冷枪，王良不幸牺牲。王良牺牲，使李赐凡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无限悲痛。七月九日，红军集结在广东南雄的池江、水口地区，同二十个团的粤军展开拉锯式地争夺战。李赐凡满怀为牺牲战友复仇的怒火，率第十师于十日晨开到战场，会合红五军团在主阵地上与敌展开英勇厮杀。他身先士卒，站在最前线，从牺牲战士的手里抱过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他不顾面部被敌弹片擦伤，无畏地顽强战斗。在他的鼓舞下，许多战士手持大刀同敌人肉搏，整个战场杀声震天，敌陈尸遍野，极为惨烈，为红军战争史之罕见。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敌军溃败，撤退到南雄。此后，红军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北上作战计划，在乐安、宜黄战役，在闽北的黎川、建宁、资溪、金溪等一系列战斗中，李赐凡和陈光率领第十师都担任主攻，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作为红军师政治委员，李赐凡深受军事指挥员和部属

的赞赏。肖克曾说，李赐凡是个“思想开朗、有文化的英勇善战的好政委”。梁必业回忆说：李赐凡“在十师领导中是核心”，“不仅政治工作出色，军事指挥上也很出色”。李赐凡的政治工作做得非常活跃，他针对有些战士作战时同敌人死打硬拼，不注意运用灵活的战术，在每次战前动员时便耐心地开导说：“我们不是为死而战，是为求生、为人民解放而战。”他教育大家要动脑筋，多长几个心眼，讲究战术，既要消灭敌人，又要学会保存自己，才能多打胜仗。正因为李赐凡和王良、陈光等几任师长亲密合作，并以他的高尚思想和模范行动，带出了一批优秀干部，使第十师成为政治上强，军事上强，能征善战的红军劲旅。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第十师的指战员们都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高涨精神，打了许多大仗、恶仗和胜仗，愈战愈强，威震中央苏区，是红一方面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之一，多次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和嘉奖。

一九三二年底，红军在闽西的黎川再次整编，红四军缩编为十、十一两个师，撤销军的建制，直属红一军团指挥，李赐凡由第十师政委改任师长，陈光改任第十一师师长。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红军从黎川誓师北进，秘密向金溪开进。一月四日，天下着鹅毛大雪，部队进至黄狮渡时，遇上敌第五师周士达旅，十师和兄弟红军部队一起一举攻下黄狮渡，全歼周士达旅，俘敌旅长以下一千多人。一月八日上午，红军以十师、十一师为主力继续沿金溪公

路西进，迎战从浒湾来犯之敌十四师、二十七师、九十师。在枫山铺即与敌吴奇伟、孙连仲师各一个旅共六个团的敌人遭遇，遂在公路两侧展开激战。敌人抢先占领了公路北侧制高点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又有飞机大炮助战，把红军压在公路两侧。这时，红军分头迎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来到硝烟弥漫的十师前沿阵地，高举手臂发出庄严号召:“同志们，为苏维埃奋斗到底就在今天!”正在十师参战的原红四军政委罗瑞卿，立即手提马刀大喊一声:“冲啊!”便向山上敌人冲去。在周恩来总政委的指挥下，邻近的红三军团也向敌人发起猛攻。顿时，敌兵败如山倒，新岭前方高地被红军攻占。这时，李赐凡又受命带领第十师一部在山头上正面阻击敌人。正当红军杀得起劲时，敌人的飞机、大炮猛烈地向红军投弹轰炸和扫射，态势十分不利。李赐凡虽率部勇猛反击，但仍不能扭转不利态势，而且指战员伤亡剧增。敌人步步向第十师阵地压过来，眼看这个山头阵地就要丧失。形势非常危急，如果这一山头阵地被敌占领，整个战斗的结局将不堪设想。李赐凡当机立断，把师部谍报班、警卫班、通信排及凡能战斗的勤杂人员都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他马刀一挥，大吼一声:“同志们跟我来!”便带头向冲上来的敌人猛扑过去。在一片地域不大的战场上，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夹杂着双方厮杀的呐喊声，战斗异常激烈。就在这时，敌人一颗炮弹打在李赐凡的身边爆炸，他的双脚被炸成重伤。师部的

看护排长吴树隆急忙要把他背下去，他怕部队失掉指挥，招架不住敌人的进攻，便一把推开吴排长，坐在血泊中喊道：“同志们，顶住！只要有一个人，有一口气，有一滴血，就要保住阵地！”在此万分危急的时刻，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赶到，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你们打得很好！”随即在前沿阵地上直接指挥战斗，顿时振奋了部队士气，稳住了阵地，终于打垮了敌人的进攻。

浒湾战斗胜利结束后，李赐凡被转入广昌红军后方医院治疗。由于他的左脚骨踝被炸碎，医疗条件又差，不得不锯掉了左脚，装上假肢，靠双拐行走。治疗期间，他还代理过一段时间医院的政委，然而，他的壮心始终向往着战斗的前线。为了早日返回前线，他扔掉拐杖，苦练骑马。只有一只脚，在马上很难掌握平衡，多次被摔下来，有时衣裤也被血肉所粘连。来看望他的战友见此情景，无不垂泪相慰，也都为他那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所感动。可他自己却坦然笑道：“锯掉一只脚算什么！我们是革命军人，生命就是战斗，只能流血，不能流泪，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战斗不止。”

## 五

一九三三年春，李赐凡被派往中央苏区的腹地江西省军区工作。开始时他担任军区军事部长和武装力量动员部主任，四月又兼任省少先队党代表。六月间，李赐凡继罗

荣桓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这时，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已在中共中央逐渐取得统治地位。李赐凡刚到军区工作，就碰上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他由于长时期在主力红军部队中工作，对地方的情况不甚了解，对这场批判初时也感到茫然。他在批判会的会场上，亲眼见到“邓毛谢古”面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针锋相对，慷慨陈词，与批判他们的人据理答辩。他钦佩他们不屈强势、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对实际的接触，李赐凡明辨了一些是非，认为邓毛谢古等同志都没有什么大错，对他们批判和处理是不公正的。他常与那些挨过批判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谈心，鼓励他们消除疑虑，振作精神，努力工作。为此，军区司令员陈毅曾多次向同志们赞扬说：李赐凡“原则性强，很会做工作。”谢唯俊被撤职后又被派到江西做扩红工作，李赐凡在同谢唯俊合作共事中，进一步认识到谢唯俊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和很强的工作能力，处处尊重和信任这位受过错误打击的好同志。

扩红工作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件大事，也是武装力量动员部的主要工作。李赐凡刚一到职，就面临着中央政府给江西下达的每月扩红八千至一万人的繁重任务。为胜利完成扩红任务，李赐凡带领动员部的同志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力措施，即：必须先做好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使青少年自愿报名参加红军；扩大少先队和赤

卫军组织，进行野营训练，使他们适应军旅生活，然后逐步升级，编入红军；以中央号召为动力，大力开展“红五月”突击扩红运动。这些措施后来证明都是非常有效的。李赐凡首先选择了经济条件较好、群众觉悟高的兴国县作示范，通过深入细致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创造了该县赤卫军模范师四千多人全体加入红军的突出典型，继而推动博生、胜利、赣县、公略、永丰等县参加红军的热潮。“父送子，妻送郎，参军参战保家园”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整排整连整营的赤卫武装参加红军开赴前线；作为红军预备兵员的“少先队模范团”、“工人师”、“模范师”，也在各地相继成立。仅在红五月，江西省就给红军输送二万六千五百二十九名优秀兵员，为扩大红军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赞扬。

在扩红工作中，李赐凡十分注重把宣传发动和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坚决纠正了过去在扩红工作中曾发生过的各种损害群众积极性的作法和偏向。一次，青年干事谢帮全向他汇报说：有个乡政府为了完成突击扩红任务，在开群众大会时，把前后门关起来，简单动员后便强迫到会青壮年一一报名参军，甚至以封房子、没收土地相威胁。李赐凡听后当即指出：苏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牺牲，我们怎么能以这种办法来强迫群众参军呢？随后，他带领几个干部来到这个乡，一瘸一拐地登门向老乡们赔礼道歉。广大群众都深受感动，许多人热泪盈眶，原来不

大愿意参军的青壮年也自觉报名参了军。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少共国际师”在宁都成立，当第一任师长陈光接过少共国际师的军旗时，为组建这支少共军付出巨大心血的李赐凡，扔下拐杖急步上前，两位战友紧握双手，同声勉励：保卫革命，保卫苏维埃。

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央军委为对革命战争有功人员颁发第一批红星奖章，李赐凡毫不逊色地获得了这一殊荣。九月，在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会上，李赐凡被选为中共江西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十二月，李赐凡又被推选为江西苏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会上作了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问题的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一九三四年一月，李赐凡与李富春、曾山等一起赴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他在扩红中的优异成绩，又一次受到中央政府表扬，并授予他银质奖章。全苏二大后，李赐凡作为江西省军区的代表参加了红军政治工作会议。他在大会上的发言获得一致好评。许多熟悉李赐凡的同志，连连拍着他的拐杖称道：“好个李赐凡，你真行！”

第五次反“围剿”深入进行之时，红军分作东南、中央、西线几个大战场同敌军展开激战。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临时中央领导的干扰，红军丧失了战争主动权，仗打得很不顺利，指战员心里充塞着怨气。李赐凡在《红星

报》、《红色江西》等刊物上相继发表文章，对战局发表意见。在《粉碎地方武装中的机会主义动摇》一文中，他以江西军区所属一些部队的战时表现为实例，尖锐批评有些同志在敌人“堡垒政策”面前先是轻敌硬拼，继而走上害怕逃跑和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动摇。他提出：“要坚定地方武装中党的领导，保证我们队伍中思想上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他建议，地方红军要大胆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勇敢地配合主力红军打破敌人的“围剿”。他纵观战争全局，狠抓红军战争的兵员，因而他对地方武装和赤少队的工作抓得很紧，力求这两个组织在支援主力红军进行反“围剿”斗争中做出更大贡献。以后，他又以省少先队党代表名义与省少先总队长王昌豆发布训令，号召苏区青少年动员起来，大做军鞋，替军属耕作，开展竞赛，用实际行动支援前线红军作战。

一九三四年五月，中央决定成立赣南省和赣南军区，李赐凡调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不顾身上数十处弹伤，拖着一只假脚，转战在赣江两岸，协助军区司令员陈毅指挥作战。陈毅在兴国老营盘战斗中大腿负重伤后，李赐凡便继陈毅担负起指挥江西军区司令部的工作。李赐凡马不停蹄，夙夜匪懈，忘我地工作和战斗。马是李赐凡行走的主要支柱，一次，参谋人员谢德谋受了伤，李赐凡便把马让给谢参谋，自己拄着两根拐杖，顽强行军。

数年的戎马生活，磨炼成李赐凡刚强的意志。有次，

他寄上佩戴红星奖章的照片给家乡父兄，并在信中表示：赐凡现在远驰他乡，舍了小家，然为的是国家，走的是正道，志在为劳动阶级打出天下，改变富人挡道贫者受欺之现状；待黑暗的统治溃灭之日，吾当回归故里，或从教，或务农，以报效乡土父老养育之恩；纵然不日僵卧沙场，吾于九泉之下当含笑耳！

## 六

中央红军长征前，李赐凡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临危受命，出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十月二十六日，李赐凡与曾山带领军区与省苏维埃政府人员撤出宁都七里洞和李园村，转至西甲村。他们在这里召开了干部会议，研究部队行动和策略问题。会议决定，首先要牵制敌人兵力，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然后向东固山区集结，并以东固山为据点坚持游击战争。根据斗争需要，会议还做出决定，成立江西省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游击战争。在李赐凡提议下，将宜黄、洛口、永丰、公略、兴国、万太等县地方武装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师第一、二团，其他各县武装也统一改为挺进游击队。不久，中共公、兴、万特委又组织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

西甲村会后，李赐凡与曾山即率军区安南团、独立师、省政府保卫局机关人员以及部分游击队共四千多人，转至金竹坑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一方面组织部队袭扰敌

人，一方面发动群众抗租抗粮反霸，张贴标语，号召白军士兵不要打红军，要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尽管李赐凡和曾山等人尽了最大努力，仍未摆脱被“围剿”的困难局面。到年底时，他们已被围困在宁都的源头、石公坑、羊州坑一带很小的圈子里，形势危急。在这里，李赐凡同曾山商量，决定分三路向兴国和东固山地区突围。李赐凡考虑自己行动不便，怕拖累大家，便把军区的主要部队独立师和安南团交由曾山率领，干部游击队由胡海和洛口县游击大队长宁春庭带领，他自己身边只留下原省军区的一个警卫连。突围中，李赐凡这路队伍与另两路失去联系，未能向预定方向突出重围，不得已改向古龙岗，准备重返井冈山去坚持斗争。在此严峻的形势下，李赐凡怀着沉重而又乐观的心情对战士们说：“做胜利时的英雄容易，做失败时的英雄不易，同志们要有勇气做失败时的英雄。失败是暂时的，革命的胜利总会到来的。”在古龙岗附近，他率领的一路部队再次与强敌遭遇，打了一仗，李赐凡的右脚也被打伤。他果断地命令警卫连长和指导员带领队伍继续前进，自己和爱人邱姗姗及两名警卫员辗转回到了小布陂下村。群众把他们隐藏在岩背脑山上一个崖洞里。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邱姗姗同一名警卫员下山与群众联系时，不慎被前来搜山的敌人抓获。敌人得知她是李司令员的妻子，便断定李赐凡也藏在山上，于是调来

重兵，并逼着邱姗姗带路搜山。李赐凡眼看敌人迫近，又无退路，便同警卫员一齐开枪抵抗。打倒了几个敌人，警卫员牺牲了，李赐凡再受重伤。他已无力行走，四周也进退无路，为不落入敌手，李赐凡毅然饮下了自己的最后一粒子弹，为人民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李赐凡身经百战，亲历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身上布满累累伤痕，鲜血染在东南各省。打胜仗时，他是了不起的英雄，打败仗时，他仍然是伟大的战士。解放后，小布人民特在本地为李赐凡等红军烈士建立了纪念碑，并在他献身的地方特为他树碑立传。许多熟悉李赐凡的老将军和元帅们谈到他的时候，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一致称赞：李赐凡英勇善战，文武兼备，既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也是模范的部队政治工作者，是个具有钢铁意志的共产党员。

(李 安 牛)



贺　昌



# 贺　　昌

## 一

贺昌（1906—1935），原名贺颖，字伯聪，又名贺其颖，化名希毅、毅宇。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九日生于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今柳林县）。父亲贺雨亭，清末拔贡，为人耿直，学识渊博，在地方颇有声望。母亲阎氏，是一位善良的家庭妇女，生一子一女。

贺昌自幼喜听民族英雄故事，常常为岳飞、班超等英雄事迹所激励。他七岁入柳林小学读书，十二岁即一九一八年考入离石县立高等小学。他爱好文史课，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并先后结识了张叔平、李燕敖、田开疆等进步同学。当时的班级主任刘菊初老师，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人士，与贺雨亭是文友，对年幼的贺昌给予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少年的贺昌常对同学们说：大丈夫不做岳飞死，亦当做班超报效国家名震天下。他曾立下誓言："努力前进，专心向学，以在校之储蓄，出应以社会，尽国民之天职，立不朽之功业。"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传到吕梁山区的离石。年仅十三岁的贺昌，和王达成、杨逢昌几个同学，带头发动离石县城的学生们，走上街头讲演，表演文艺节目，掀起了响应五四运动的爱国活动，公开揭露卖国贼，宣传抵制日货。当时的离石县县长贾占堂，是一个媚外亲日的家伙，他严令禁止学生罢课，并亲自带领警察四出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一天，贺昌牵着一条戴东洋草帽的小哈吧狗，随游行队伍来到街头，他进行形象生动的讲演，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给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吸引了几百名群众围观。突然贾占堂头戴东洋帽率一群警察闯过来。这时贺昌机智地用手指一指贾占堂和自己脚下的哈吧狗，用眼色示意是一路货色。群众当即哄笑领悟，一拥而上围住反动县长，七嘴八舌地嘲骂他："哈吧狗，哈吧狗，东洋鬼子的哈吧狗!"贾占堂气急败坏地连声叫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慌忙摘下头上的东洋帽，狼狈而逃。在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一九二〇年春，贺昌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他不仅很快接受了广泛传播的新文化思潮，而且不久就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从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的高君宇，对贺昌的影响最大。一九二一年四月，已经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高君宇回到太原，在第一中学的同学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批判无政府主义、"科学救国"等错误思潮。在高君宇的直接教育影响下，贺昌的思想觉

悟有了很大提高，开始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五月一日，贺昌参加了由高君宇、王振翼发起成立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山西第一批八个青年团团员之一。他参加青年团的第一次会议，就明确了以“唤醒工农，改造社会”为宗旨，任务是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贺昌入团后，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团结教育青年。在五四运动两周年纪念日时，贺昌、王振翼等带领青年团员和部分一中学生，分四路出发到太原市内，散发了一批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义翻印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影响。贺昌还协助王振翼编辑《平民周报》，揭露反动当局，进行革命宣传。他发表了《敬告新选众议院议员书》，针对贿选丑闻一针见血地指出:“视选举为买卖，国法如无有。而诸君当选非智识之当选，乃金钱之当选……而将己之人格，一败涂地，祸国殃民，其害无穷。”同年暑假，贺昌参加了王振翼等创办的晋华书社，翻印和出售《新青年》、《少年中国》、《俄国革命纪实》、《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在青年学生中传播。十月，贺昌和王振翼、刘廷英等在太原一中发起组织成立青年学会，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出版《青年》刊物，组织进步青年阅读进步书刊，探求革命真理。不久，贺昌被指派为出

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之一。他来到北京，随同何孟雄、王俊等一起乘火车经东北去苏联，途经黑龙江省时被反动军警扣留关押数月。一九二二年春，经过中共北方区委努力，以北京大学校长名义去函商谈，贺昌同何孟雄等才获释返回。这次遭遇，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一九二二年九月，太原的青年团组织已经发展建立了七个团支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年仅十七岁的贺昌被选为团地委书记。随着青年团组织活动的开展，太原的青年运动日趋活跃。山西军阀阎锡山对此深感不安，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压制，进步书报常被当局检查扣留，印刷出版物时常禁止递送，集会结社无时不受干涉，学校受制于军阀。对阎锡山的无理干涉，以贺昌为首的团地委，领导广大青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驱逐一中反动校长事件。魏日靖担任一中校长后，积极追随阎锡山迫害学生运动。他一面伪装关心青年，"规劝"学生们"要好好读书，不要胡谈政治，不要上赤党的当，以免毕业后考不上大学"；一面则用记过、留级、开除等手段打击进步学生。贺昌、李毓棠等因担任团的领导工作，均受到记过处分。这年暑假考试，魏日靖有意出难题、偏题，致使二百余名学生不能升级，十几名学生不能毕业，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贺昌主持团地委开会，决定开展驱魏学潮。九月初，开学第二

天，贺昌、李毓棠等召集一中全体学生在礼堂开会，号召学校举行罢课抵制校方的迫害，立即获得同学们的响应，当场通过了《罢课宣言》，要求当局撤换校长。会后，贺昌率领愤怒的学生们高呼口号，冲进校长办公室，把吓得目瞪口呆的魏日靖抬起来扔到校外。全校六十余名教职员也支持学生们的要求，停止了教学和其他活动。经过半年多的持续斗争，终于把反动校长魏日靖驱逐出一中校门，打击了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青年学生的斗争信心。傅懋功（彭真）、王瀛等一批进步骨干，就是在这场斗争中经受锻炼后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

贺昌在领导太原青年运动的同时，重视发动工人斗争，注意把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为纪念劳动节，贺昌参加编辑《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五一特刊》，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指出："只有实现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那时，全世界劳动者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号召工人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改善经济生活条件"，"争取政治权利"。为了真正了解工人，达到"学生生活工人化"，贺昌深入工厂、车间和工人宿舍，和工人们促膝谈心，同吃同住，交了不少工人朋友，学习了工人阶级优良的思想作风。他以青年学会名义，利用一中教室开办业余平民小学，向穷苦的工人子女免费进行文化教育。尔后又增开了平民夜校，向参加学习的工人群众灌输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他在讲

课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工人讲述求生存谋解放的道理。这年五月中旬，贺昌和王振翼等领导发动了太原大国民印刷厂的罢工斗争。他们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群众书》，组织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四出活动，为罢工工人安排好食宿地点，并在纯阳宫召集全市印刷工人集合，号召举行同盟罢工，向当局呈递成立印刷工会的请愿书。由于阎锡山命令太原公安局进一步进行干涉限制，同盟罢工未能实行，大国民印刷厂罢工工人被迫复工。这次罢工的失败，使贺昌深刻认识到：只有深入广泛地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斗争，结成坚强的工人团体，才能取得胜利。

一九二二年十月，在太原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在京汉铁路沿线工人运动的推动下，正太铁路工人也迅速行动起来。这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刘明俨来到太原指导工人运动。正太铁路工人，“因感觉本身的生计困难，与法国资本家的压迫，乃急起组织工会”。担任太原团地委书记的贺昌，积极协助刘明俨开展组织工人群众的活动，成立了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区分会，由贺昌兼任区分工会秘书。这时，全国的第一次罢工高潮正在兴起，八月举行了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九月发生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十月又举行了开滦五矿大罢工。在全国罢工高潮的推动下，十二月，贺昌参与领导的太原铁路工人，参加了正太铁路工人全线总罢工。这次为在“阶级斗争的热潮中争回

自己的权利”的罢工，由于组织严密，行动一致，结果取得胜利，铁路当局被迫承认工会提出的十二项条件。这次罢工的胜利，鼓舞了铁路工人的斗志，纷纷捐款作工会的基金，铁路工会也积极加强同各地工会的联络。一九三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贺昌领导太原铁路工人积极响应，举行了同盟罢工，用实际行动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

一九二三年春，贺昌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直晋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当时他的同学王振翼担任中共北京区委会委员长。贺昌身担领导河北、山西等北方团组织的重任，热情地奔走于太原和北京之间。他很重视深入调查研究青年学生的现状，引导学生运动健康发展，撰写了一些文章指导青年工作的开展。在《学生运动的使命》一文中，他指出:“此时学生运动有一种很大的误谬，就是只知标榜‘打倒军阀’，而不标榜打倒（甚至不敢说）助长封建军阀为恶、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国际帝国主义。”他呼吁:“要集合全国学生于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目标下面，抛弃一切和平改良的观念，采用革命的方法，并且要亲切地站在劳动群众的利益前面而奋斗。”贺昌在《反抗帝国主义》一文中，鲜明地提出:“我们今后的运动应当是:内除国贼——封建的军阀和丧权误国的政府，及违法殃民的国会！外争国权——否认列强侵略中华民族的条约和反抗助长军阀作恶的行动！”贺昌不仅领

导青年运动，还经常在北京、天津、太原深入工矿企业，从事工人运动。纺织工人康清煌回忆，贺昌抓住轧死一个纺织工人的事教育我们，说：“我们织的布，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做衣服穿……仗着我们一滴一点的血力来赚钱，而对我们的生命却不负一点保护的责任。”“我们自己保护自己的法子，就是团体，就是工会。”这位老工人就是在贺昌的启发引导下，提高了觉悟，成为工会积极分子。年方十八岁的贺昌，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迅速成长，成为北方青年运动的优秀领导人。当时在北京中法大学读书的陈毅，后来咏诗赞道：“贺名播幽燕。”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 二

一九二三年夏，贺昌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他领导太原地区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日益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仇视。为了摆脱跟踪的密探，他经常要改换住的地方。一次他去太原南站散发传单，被密探发现，军警立即把车站围得水泄不通。他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化装成一名列车长，机智地脱离了险境。不久，组织上调贺昌到上海青年团中央工作，又送他入上海大学学习。一九二三年七月，贺昌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经常聆听瞿秋白等人的教诲，并同邓中夏、张太雷、张秋人等编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贺昌一面认真读书学习，一面积极为召开

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准备工作。他在《先驱》杂志发表了《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一文，提出："本团是代表青年工人利益的团体，劳苦少年群众的组织，而学生加入本团的唯一责任，是要努力为了劳苦少年的利益而奋斗，领导青年工人做所需要的经济斗争。"八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贺昌在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大会发言时坚决拥护中共"三大"确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认为"国民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所以我们应当作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加入国民党"。他提出建议："要特别注重在青年工人中间的经济奋斗和文化运动。"他的建议得到了大会的采纳。

一九二三年十月，贺昌被派往工人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安源，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股长，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水口山矿工人俱乐部遭到军阀镇压，引起水口山工人罢工，贺昌积极支持并参加了这次斗争。他撰写了《军阀屠杀水口山工人》一文，刊登在《工人周刊》第七十九期上。他强调，要提高"工人们的阶级自觉"。他还明确指出："只有加工减时的经济奋斗，是不能够把我们救出苦海"，"我们快速的要参加政治奋斗！"这表明，贺昌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在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一九二四年春，贺昌被选为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执行委员，任委员长兼会计。在此后的一年里，他连续担任第三、第四届安源团地委秘书（即书

记），领导安源的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积极参加巩固和发展安源工人运动的斗争。当时的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工人中享有很高信仰，安源的党、团组织很活跃，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安源的工人团员在数量上是全国各地区团组织中最多的一个。贺昌主持安源团地委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加强对团员和青年工人的革命宣传教育，组织团员和广大青年参加工人学校、读书班学习，领导团员、青年参加工人俱乐部的重大活动。团中央十分重视安源团的工作，同年八月和十月，先后派恽代英和林育南到安源团地委检查指导工作。安源青年运动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领导骨干，为全国青年团和青年工人的斗争提供了经验。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贺昌作为安源团地委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总结了建团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制定了在全国扩大团的组织推进青年运动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决议，并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贺昌积极参加了会议的讨论，以鲜明的立场赞同会议的决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团中央常务委员兼劳动部部长。会后，贺昌留在上海团中央，同张太雷、任弼时、恽代英等一起担起共青团中央领导工作，以战斗姿态投入新的革命斗争激流中。贺昌充分利用在安源工作的经验，深入上海沪西、沪东等区工厂，了解青年工人状况和团组织的活动。五月中旬，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

工人顾正红事件后，贺昌被派到工厂、学校进行宣传，动员组织工人和学生参加抗议斗争。五月三十日，上海各校二千余名学生，分头到公共租界各马路讲演、散发传单，抗议帝国主义侵略。贺昌积极参加了这天的斗争，他在讲演时满怀激情地向群众大声疾呼:“外国帝国主义横行无忌，视我如殖民地，最近残暴之行为，更是日甚一日。上海工人几十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现在忍无可忍了!”他提出:“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一日不推翻，中国民族的生命与自由便一日没有担保。”当天由于英国巡捕开枪屠杀爱国的学生和工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贺昌参与领导上海团组织发动学生罢课，并组织学生到各工厂、商店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他曾亲自深入到上海码头，策动在外轮做工的中国海员罢工，组织码头装卸工人拒绝装卸英轮、日轮的货物。当时贺昌同任弼时、张秋人、张伯简、谢文锦等编在一个组过党的生活，尤其五卅运动阶级斗争的烈火，把他锻炼得更加坚强。

贺昌善于及时总结斗争经验用于指导工作，他从五卅运动中认识到青年学生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在《青年运动与职工运动》(载《中国青年》第 91、92 期) 一文里，他论述了两者关系，强调指出:“青年学生离

开了民众，便一事无成。”他希望各地学生团体应该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组织，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常识，激起工人阶级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觉悟。贺昌很重视农民问题。他在《调查农村经济情况》（载《中国青年》第96期）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占着重要地位，“凡是忠实民族革命的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万无忽视之理”。作为团中央领导人之一的贺昌，对于共青团组织的性质和任务，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年来的奋斗》（载《中国青年》第93、94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组织，就是要建设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团的组织“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我们不愿隐瞒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他号召：“中国的青年无产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的青年们起来，一致团结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下，高举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向世界帝国主义者奋斗，以获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贺昌的论著同毛泽东、邓中夏等当时的论著一样，强调了中国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地位，对共青团的思想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五卅运动后，共青团中央发动上海各校联合组织了赴外埠演讲队，利用暑假时间扩大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宣传。贺昌率一部分学生到北京、天津、太原等地，在学

生、工人中间报告上海五卅运动斗争情况。他以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精神，教育启发青年和工人们的觉悟，并在先进的青年工人、学生中发展团的组织，促进学生和工人相结合。同年冬，贺昌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赴苏联，到莫斯科出席了少共国际（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他亲自参观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了其他国家青年团与青年运动的经验，开阔了眼界，更加增强了斗争信念。会后，他由苏联回国抵达北京。一九二六年春，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发展得轰轰烈烈。贺昌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参加了深入工厂、学校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宣传动员，参与组织举行全市工、学、商和民众的示威游行活动。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向青年们介绍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经验，亲自带领青年们上街游行示威，并曾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向人民群众揭露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罪行，受到了广大青年的拥护。

一九二六年夏，贺昌奉命返回上海。这年六月，他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亦称上海区委）委员兼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影响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发动了征讨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贺昌积极领导上海和江苏、浙江等地共青团组织，为迎接北伐军到来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他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忽视对资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社会阶层的联合，耐心地进行启发教育，提醒同志们重视做好对各阶层的统战工作，以扩大革命阵营的力量，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贺昌在区委的一次会议上建议，各部门的工作既应重视工人方面，也要注意其他方面，如商人、妇女、小资产阶级等工作。区委根据他的建议，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对深入贯彻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起了积极作用。为了迎接北伐军早日到来，江浙区委决定发动上海工人在适当时机举行武装起义，贺昌积极投入起义的深入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同年十月二十三日，为响应浙江省省长夏超率部起义进攻上海的号召，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缺乏经验，时机选择不当，力量动员组织不足，这次起义失败了。贺昌出席了江浙区委召开的临时主席团会议，同大家一起总结失败的经验，讨论了善后工作和准备再次起义的各种问题。会议通过了加紧政治宣传、加紧军事训练和组织秘密活动等决定，并责成何松林（即汪寿华）和贺昌分头召开会议，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发动。会后，贺昌深入上海各高等学校，通过共青团和学生会等组织，动员和组织青年学生积极进行再次举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十一月间，北伐军在攻占武汉后已占领江西大部，正进行攻打南昌战役。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江浙区委立即抽调一批干部赴接近战场地区，发动民众，支援北伐军行动。贺昌同关向应、顾作霖等四人负责，率领一批人员深入前线，进行宣传动员

和组织活动，完成任务后返回上海。

一九二七年春，贺昌先是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又投入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战斗。他被指定为中共中央同江浙区委合组的宣传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动员工作。起义前，他主持共青团江浙区委和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宣传队进行深入宣传发动，协助军事委员会选拔优秀的青年工人和学生，进行秘密的军事技术训练。他领导部署各高等中等学校组织学生罢课，他还通过工会发动青年工人参加总同盟罢工。三月二十一日，他在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中，身临战斗第一线，参与组织指挥，同工人们并肩战斗。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上海工人阶级勇敢奋战，终于赶跑军阀军队，占领了上海。贺昌在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战斗中，一方面表现出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坚定性和出色的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才能，另一方面使他经受了更激烈的阶级大搏斗锻炼，开始学会领导群众武装起义的本领，为尔后独立领导白区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不久，四月初，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至武汉，贺昌出任共青团湖北区委（不久称省委）书记。当时的武汉，是全国革命的中心，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机关所在地。在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团结国民党左派，发动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坚决反对和声讨新军阀蒋介

石的反动罪行。贺昌领导武汉和湖北省广大共青团员、青年学生、工人及农民们，积极投入声讨新军阀、支持工农运动和继续北伐的斗争。他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演，他亲自深入工厂、学校的团组织和青年中间去了解情况，参加各种集会，利用各种时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贺昌出席大会，积极参加了会议的各次讨论和各种活动，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被指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贺昌才二十一岁，是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五月十四日至十六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贺昌参与这次大会的领导工作，任大会主席团委员，会上继续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仍任团中央常务委员兼劳动部部长，成为团中央领导人之一。这时，汪精卫集团同蒋介石加紧勾结，正在武汉策划反革命政策。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一再妥协让步，革命统一战线内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空前尖锐。贺昌同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宣传部部长李求实等清醒地认识到革命形势逆转的危险，他们专门召开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了要求迅速武装工农向资产阶级右派反击及批评中共中央领导人右倾的两项决议。当任弼时向陈独秀当面陈述团中央领导的意见时，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大发雷霆，拒不接受，摆起家长架子对任弼时横加训斥。面对严峻的形势，贺昌

积极工作，终日奔走于工厂、学校及各团组织之间，进行提高团员和青年们革命觉悟的宣传教育。一次汉口团市委在友益街湖北总工会机关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贺昌亲自主持仪式。他在会上讲话时，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对象，指出：“中国的军阀与买办阶级是完全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必然是反革命的；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亦决不能为革命的领导者。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力量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坚定地与帝国主义进行彻底的斗争。”他还强调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有力助手，要努力扶持和扩大无产阶级的势力，从事中国的革命运动。”贺昌的演讲充满激情，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次会议上，贺昌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革命伴侣的黄慕兰。

在轰轰烈烈的北伐大革命中，勇敢、坚定、机智的贺昌，始终站在火热的第一线，以充沛的精力活跃在工厂、学校，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曾是中共三大候补中央委员、上海区委会委员长的徐梅坤后来回忆说：贺昌“理论水平高，分析国内外形势条理清楚，做报告富有鼓动性和说服力，是大家最敬仰的同志之一。”

## 三

贺昌是中国共产党白区地下工作杰出领导人之一。他不仅善于机智果敢地发动政治斗争，而且重视发动军事斗

争，领导兵运工作。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前敌委员会军委成员，贺昌为组织发动、举行南昌起义与处理起义军南下失败善后工作，做出了贡献。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前，派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等赴九江、南昌等地考察形势。以周恩来为部长的中央军事部成立了由聂荣臻、贺昌、颜昌颐三人组成的“前敌军委”，同时赴九江、南昌叶(挺)贺（龙）部，进行军事联络工作。不久，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前敌军委”（化名“钱第钧”）即在前委直接领导下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及起义后负责管理起义军内中共党的组织。贺昌参加了九江会议，积极向中共中央提出举行南昌起义的建议，同时奔走于在九江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有影响人物之间进行联络。七月二十七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赶到九江，借口共产国际来电指示起义要慎重为由，召集在九江的中共中央和前委的领导人开会，企图阻挠起义的进行。贺昌同恽代英等与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贺昌用血的事实说明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发起这次起义的必要性，他严正指出：阻挠起义就是对革命犯罪！但张国焘固执己见，又赶到南昌进行阻挠，遭到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委的坚决反对。八月一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南昌武装起义终于胜利爆发了。贺昌由九江赶到南昌参加了起义。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了革

命委员会，贺昌任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这时，由于聂荣臻已担任了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颜昌颐担任了第二十四师党代表，他们都在领导部队作战，“前敌军委”只剩下贺昌一人，开展工作困难。贺昌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起义军南征广东途中，努力了解掌握各部队中共组织和党员状况，参与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十月初，南昌起义军遭到严重失败，贺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李立三等离开潮汕地区，经甲子港乘轮船转移到香港。在香港，贺昌从十月十五日起，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他同有关同志一起，负责接待安置南昌起义军失败后来港的同志。他们想方设法疏通各种渠道，秘密地把一批又一批流落失散的战友，收拢、安排、隐蔽到安全的地点，为党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做了大量工作。

十一月中旬，打着拥汪反共旗号的张发奎，同桂系军阀爆发了公开的武装冲突，张发奎的部队夺取了广州。此前，中共广东省委已预见到粤、桂军阀的冲突不可避免，曾作出计划：一旦爆发新军阀战争，立即发动广州武装起义，并派省委张善铭、贺昌赶到广州执行这一计划。但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的军队已完全控制了广州。在这种形势下，加上准备的不足，立即组织武装起义是不适宜的。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的一位工作人员，于十一月十八日，召集张善铭、贺昌和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吴毅等人开会，他反对省委原定乘粤桂军阀爆发战争之际举行起义，

主张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与黄琪翔谈判（当时张发奎不在广州），争取张发奎部。贺昌同张善铭等坚决反对这一改变，认为乘张发奎同桂系黄绍竑冲突之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是正确的，中共绝不能与张发奎妥协。这位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的建议遭到贺昌等激烈反对后，固执己见，到香港向广东省委再次建议争取张发奎。省委与省委军委分别开会讨论，一致赞成贺昌、张善铭等人的意见，拒绝了争取张发奎的建议，并认为目前夺取广州政权不可能，但积极准备是必要的。广东省委的这一计划，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意图，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正是这个精神。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结束后，张太雷返回广东，领导广州起义。

由罗亦农任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现时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对中共中央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方针提出异议，在决议中明确提出："目前绝非总的暴动时期"，要想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长江局的这一正确决定，却遭到共青团长江局、团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等人的反对，他们联名向中央政治局控告罗亦农和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在唐生智从武汉溃逃时"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中央"彻底查究"。为此，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四日成立了一个"查处长江局问题"的特别委员会，由苏兆征、贺昌、郭亮三人组成。自此，贺昌奉调离开广东省委，前去参加中央

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贺昌到上海接受中央给予的任务后，立即同苏、郭赶至武汉。由于对湖北及武汉地区实际情况不了解，参加过南昌起义不久的郭亮和贺昌，到达武汉后，采取了错误的方针，不恰当地改组了湖北省委，对武汉暴动问题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十二月十四日，湖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郭亮被选为省委书记，贺昌被选为省委委员。由于湖北广大党员和干部对中央和特别委员会的处理不满，加上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在实践中遭到严重挫折，临时中央政治局听取双方的意见后，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承认，罗亦农对湖北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所谓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九二八年一月初，中共中央决定郭亮、贺昌调动工作，由中央另行分配。贺昌离开武汉到上海，参加了中央办的短期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广州起义已失败。贺昌从广州起义失败以及中共湖南省委发动的长沙暴动、中共浙江省委举行的杭州暴动遭到镇压的事实中，认识到否认敌强我弱实行盲目暴动造成的严重危害。此后，贺昌重视学习和研究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坚持秘密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一九二八年春，贺昌担任中共中央巡视员，被派往湖南重组湖南省委和接通同井冈山毛泽东部工农革命军的联系。他同林仲丹（张浩）从上海动身到湖南湘潭，找到湖南省委秘书长杨开明等，经过了解情况，于五月二十日在湘潭召开湖南省委会议。由贺昌（化名毅希）代表中央主持的这次会议，改组了原省委，组成新省

委，确定杨福涛（湖南特委书记、湖南省委委员，此时已在湘南牺牲，但不了解他已牺牲）、廖保庭、宁迪卿、林仲丹、易庆和五人为省委常务委员，杨福涛为省委书记，未归前由宁迪卿任书记，廖保庭任副书记，林仲丹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时指定杜修经等三人为巡视员，滕代远任湘东特委书记。贺昌向新省委传达了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指示信的精神和中央领导人对湖南工作的指示，强调要努力创造以湘东为中心的区域割据局面，加强同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部的联络。五月下旬，根据毛泽东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的几次报告，由贺昌主持起草，经过湖南省委讨论，作出了建立罗霄山脉根据地、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改造与建设红军等十四项决议，并致信毛泽东、朱德及四军全体同志。贺昌等遂即派杜修经上井冈山，将省委的决议和信件送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表示对省委指示精神的赞同。后来毛泽东给湖南省委写信申明:“五月三十日此间军委召集扩大会，由杜同志报告政治情形，并宣读省委来信，扩大会完全接受。”“省委指出焚烧城市的错误，此间决不再犯……改造军队，洗刷流氓无产阶级当尽力去做。废除饷银制度，此间早有计划……。”给省委的信同时要求“派大批安源矿工来此当兵”。事实也表明，在贺昌主持下湖南省委这次对红四军指示，对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九二八年六月初，贺昌随同湖南省委机关由湘潭迁至安源，隐蔽于矿区之中。贺昌认为，安源是上海中共中央与井冈山联系的最理想的中转站。在安源的三个多月里，他主持建立了秘密交通工作线，指派可靠的党员担任同上海中共中央和井冈山红四军的联络工作，选派了黄春圃（江华）、刘亚球等一批干部赴井冈山根据地工作，转送了几批从长沙来安源的青年学生去井冈山参加斗争，还动员了安源工人党团员分期分批携带枪支加入到红四军的行列。贺昌对巩固、发展和扩大红四军在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局面十分重视。六月七日，他参加省委与湘东特委联席会议，主持讨论通过了《湘东最近工作决议案》，决定由滕代远、蒋长卿、潘沁源为湘东特委常务委员，滕代远任书记，统一领导醴陵、浏阳、攸县、茶陵、莲花、萍乡、安源等地武装斗争。六月十九日，湖南省委在贺昌主持下，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对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决议案鲜明地赞同由毛泽东任书记的湘赣特委和四军军委"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的计划"，提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为主力的割据局面"的主张。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支持。但是，当省委听取杜修经关于井冈山红四军情况的汇报后，同月二十六日又错误地改变了原来决定，发出指示信命令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并决定重新恢复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务委员，

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指派省委委员杨开明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前去“帮助前委工作”。杜修经同杨开明到井冈山后，贯彻了这一错误指示，结果招致了红四军主力冒进湘南的“八月失败”。

同年六月下旬，贺昌同林仲丹在安源向滕代远传达省委指示，决定滕代远改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前往浏阳、平江恢复特委机关，并与驻防平江的湘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中共支部和该团团长共产党员彭德怀等联系，策划武装起义。滕代远在《平江起义前后》一文中曾回忆当时贺昌、林仲丹对他的谈话：“他们说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郭亮同志因苏先骏的叛变，已经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地牺牲了。要我调任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顶郭亮同志的缺。”他们还告诉我，驻防平江城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部有党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是团部的候差副官邓萍，团长彭德怀也是共产党员。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组织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以便与井冈山的红四军相配合。滕代远接受任务后，立即动身前去平江，经过紧张的周密计划与准备，于七月二十二日同彭德怀、黄公略领导举行了平江武装起义，成立了红五军。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贺昌这时仍在安源指导湖南省委工作，未能参加这次大会。七月二十二日，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组成的留守中央来信称：

“毅宇同学并转湖南省委：……中央那封信（指“六四”来信）也认为罗霄山脉一区域有群众的斗争并且易守难攻，可以为之根据地而造成割据局面。现在中央可批准茶陵、攸县、邓县、遂川、宁岗、永新、莲花的湘赣边界特委及其组织，并批准受湘省委指挥。”非常关心并热情支持井冈山朱毛红军的贺昌，在接到留守中央苏区指示信时，已经听到了红四军主力冒进湘南受挫的消息。正当他同省委焦虑地期望由袁德生去调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消息时，八月中旬，湖南省委及湘东特委、安源市委等十一处机关，在安源遭到严重破坏。此后，贺昌同省委几个主要成员又迁往长沙，他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继续在湘鄂赣边视察和指导工作。九月间，由于交通站和联络点均被破坏，湖南省委无法在长沙立足，便迁往上海，贺昌亦随同去上海，回到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贺昌认真学习了中共“六大”文件。这期间，任中共江西省秘书的黄慕兰调任中央政治局秘书也来上海，经党组织的同意，他们不久结为革命伴侣。十一月上旬，贺昌被中共中央派到广东视察工作。他到韶关中共北江特委了解当地斗争情况和井冈山红四军的情况。红四军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教训，以及他奔走各地所见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事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年轻的红军必须采取正确的发展策略和作战原则。十一月六日，他通过中共北江特委发出了《中央巡视员给龚楚兄转玉阶、润之及四军军委的信》，明确指出：“四军以在赣

西湘南发展为正当的战略与唯一的出路。”“必须采取游击的战术，以发动群众，肃清豪绅武装，扩大红军为中心任务，对于敌人的大部队，尽可能回避作战，以保存实力为主要目的。”信中强调说：“对大城市不宜轻于进攻，如果群众没有起来，城市工作没有基础的时候，单纯的军事进攻是无益的。”他的这些指示和意见，受到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等的重视。事实表明，贺昌对红四军的巩固发展和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对平江起义的指导和红五军的建立，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四

贺昌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具有丰富的白区斗争和地下工作的经验。他是党内少有的历任过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和北方局主要领导职务的优秀的白区工作领导人。他的战斗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多次濒临险境，由于机敏过人却从未被敌人逮捕过。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旬，贺昌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到香港，视察广东、广西两省委的工作。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致广西临委的信》中，指派贺昌参加在香港的广西临时省委会议。贺昌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经过了解情况，主持在香港的中共广西临委委员，讨论了广西党的任务和当前工作，决定广西临委成员马上回广西，迅速恢复和开展党的各项工作。在解决广西问题后，贺昌立即深入了解中共广东省委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贺昌参加并指导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会议。会上省委重新分工，原宣传部部长杨石魂调到湖北省委，由贺昌兼任宣传部工作。在此期间，贺昌曾给中央写过三封信汇报工作情况。三月下旬，贺昌和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郁同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三月三十一日《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称：中央听了毅宇、陈郁二同志的报告以后，对（省委）扩大会议后省委工作的路线大体认为正确，中央决定广西改为特委，受广东省委指导，南洋临委仍存在，归广东省委指导；中央指定广东省委常委由正式五人候补三人组成，并指定贺昌为省委正式常委。贺昌在上海期间，中央领导又单独同他谈过广东省委常委分工问题。贺昌回到香港后，广东省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重新确定常委及分工：黄钊、卢永帜、贺昌、陈郁、聂荣臻为常务委员，黄学增等三人为候补常务委员；由黄钊任省委书记，卢永帜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贺昌任宣传部部长，陈郁任工委书记，聂荣臻任军委书记。黄、卢均是从工人中新提拔的干部，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都低（后来黄、卢逃跑脱党），由于贺昌是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参加省委，陈郁和聂荣臻都很尊重贺昌，因此，广东省委实际上形成以贺昌为领导核心，一切重要问题都由他作主。自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春，贺昌全力主持了广东省委的工作。当时的香港，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秘密工作既危险又艰苦，

但贺昌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勇敢地投入地下斗争。曾同贺昌一起工作的柯麟回忆说：“生龙活虎的贺昌象一团火，日夜不停地为党工作，在紧张的时候，他常常是晚上和衣躺一会，就又爬起来工作。”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贺昌的妻子黄慕兰被调到香港工作，但他很少顾及到已怀孕的妻子。

贺昌在实际上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第一，重视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开办干部训练班。省委办的秘密训练班，每期几十人，多时上百人，分批培训两广各地和外地调来的干部。贺昌亲自任课，充分发挥了他的讲演才能。为了开展白区的武装斗争，训练班把学习军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由聂荣臻讲授南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和军事知识。省委专门开办的军事训练班，由徐光英、龚楚、石迟锋当教员，着重给工人干部讲授了城市巷战的战术和技术，并负责训练了兵运人才。第二，重视舆论宣传，创办出版《香港小日报》。这是一份公开发行的日报，内容含蓄，以灰色面目出现，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新军阀的罪行。贺昌对如何办好报纸经常给予指导。他指派叶季壮任报社总经理，派省委宣传部秘书周天谬任主编，陈复任副社长负责具体工作，由李六如编辑第四版国际新闻，谭天度编辑读者园地，许苏魂等撰写文章。这份报纸虽然几经殖民当局查纠，仍坚持出版一年多。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报告

中曾经提到:“香港的公开发行的日报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第三，重视健全党的组织，发展扩大党的队伍。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各地党的组织普遍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贺昌主持省委，派出巡视员分别去东江、北江、琼崖、南路、西江等地，帮助重建特委，恢复加强党的领导。五月下旬，贺昌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专门谈了广东的党组织问题，中央对此专门作了答复。贺昌回省委后，认真贯彻中央的要求，建立了党的中心区域和产业党支部，突出了中心工作，实行了党员职业化，积极进行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同时注重了党员质量的改进。据六月十五日统计，香港的秘密党支部发展到二十余个，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半数是产业工人。第四，重视发展农村武装割据，加强对东江、琼崖红军和党的领导。为了恢复发展东江地区的武装斗争，又派省委委员林道文任东江特委书记。六月，在丰顺召开了中共东江一大，选举组成了正式特委，同时成立了东江红军总指挥部，由古大存任总指挥，随后又成立了东江红军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八团，建立了以八乡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八月初，中共琼崖特委机关于海口市被破坏，在省委指导下，九月由冯白驹、王文明主持成立了中共琼崖临时特委，在农村领导恢复武装斗争，扩大红军和根据地。第五，重视改进白区群众政治斗争的策略。贺昌主持广东省委认真贯彻中共“六大”争取群众积蓄力量的总路线，注意

总结白区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改进斗争的方式方法。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忠发、李立三，要求各地党组织于“五一”劳动节在城市组织游行示威，指令广东省委在香港一定要举行活动。香港的工人运动正处于低潮，参加过省港大罢工与广州起义的大批失业工人刚刚安定下来，他们中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分散在各区各行业，是党和赤色工会的基本力量。香港的五一游行示威怎样搞法，省委派聂荣臻协助香港市委组织纪念活动。聂荣臻到现场发现，如果举行集中的游行示威，党团员就会全部暴露遭逮捕，便立即说服市委书记邓发把来的工人解散，取消了这次公开的集中的游行示威。贺昌主持省委果断地支持了这一做法，事后虽然因此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批评，但却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

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贺昌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中央在政治问题报告中称：目前在中国，只有朱毛及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并阐明红军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和以朱毛红军为例说明红军为什么能建立发展起来而不被消灭的四个条件。很明显，贺昌较其他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对红四军、红五军有更多的了解，他提供的报告对形成中央这一看法起了重要作用。据中央六月二十五日统计，一九二九年一月至六月十五日止，各省委同中央的文件来往数量，广东省委列各省委之首。广东省委给中央共三百五十六件，中央给广东省委共二百六十

件。这一事实表明，贺昌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后同中共中央联系的加强，也说明中共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重视。值得提到是，贺昌对转战赣南、闽西的朱毛红军，一直关心和寄予厚望，他在广东省委积极宣传井冈山和朱毛红军的光辉事迹。广东省委《红旗周刊》第六期刊出《论朱毛孤军奋斗篇》，“全篇都注重在夸朱毛”。“朱毛不会消灭，并且他们将造成许多朱毛”。但由于存在“过份信仰朱毛之弊病”和“等待朱毛观念”，广东省委一再向中央提出要红四军向东江地区发展。十月间，在广东省委的要求下，红四军奉命冒进东江，在梅县受到严重损失，又退回闽西。鉴于红四军在东江的失利，以及贺昌了解到红四军前委内部发生的争论和毛泽东离开部队等情况，使他和广东省委甚为忧虑，他指派东江特委的罗欣然作为代表，前去闽西了解红四军的情况。此后，贺昌主持广东省委讨论并提出了红四军工作的意见信，同罗欣然关于红四军的报告一并送中共中央。中央很快做出了《关于红四军问题给广东省委指示信》，答复说：“关于四军的重要与其对全国以及对国际的影响，诚如省委所说，如果错入失败之途，确为促进革命高潮动力的损失。”信中指出：“省委现时所虑的好象还没有知道润之同志病愈复职这一件事。”“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自然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

一九二九年夏，思想倾向革命的广西将领俞作柏和李

明瑞，率所部占领南宁，接管了广西国民党政权。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俞、李的争取和支持，指派贺昌为中央巡视员并代表广东省委领导部署这项重大工作。五月中旬，广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吸收广西特委书记朱锡昂参加。在贺昌主持下，会议分析研究了俞、李回广西后党组织面临的新形势与任务，决定抓紧有利时机立即开展工作，并派朱锡昂马上回南宁，同俞作柏商谈合作问题。六月上旬，贺昌在香港亲自找主办省委军事训练班的龚楚、徐光英、石迟峰等分别谈话，向他们交代任务，派他们去南宁。随后他又派张云逸、李谦、沈静斋、叶季壮、许卓、许苏魂、符斌、李权等一批党的干部前去南宁，参加俞、李部队做争取工作。七、八月间，中共中央特派贺昌为中央巡视员，同邓小平（化名邓斌）、陈昭礼（福建省委书记，化名陈导民、陈豪人）前去南宁加强领导。在贺昌和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在俞、李部队中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陈豪人出任广西省政府秘书长，随俞作柏工作；徐光英任编遣特派员公署总务科科长，随李明瑞工作；龚鹤村（龚楚）任南宁公安局局长，冯达飞任公安局督察；将南宁军校改组为军官教导总队，徐光英兼主任，张云逸任副主任；成立了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张云逸任第四大队长，俞作豫任第五大队长。九月一日，在贺昌和邓小平指导下，在南宁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二次代表大会。贺昌向大会传达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广东省委

对广西工作的指示。他特别强调了广西的兵运工作，不仅要做好，要争取上层领导，更要重视深入开展士兵群众的工作，要重视广泛发动工农群众运动。大会改选了广西特委，由雷经天任书记。为统一领导，成立了直属中共中央的广西行动委员会，贺昌、邓小平、陈豪人、俞作豫、龚楚为委员，由邓小平任书记。当时贺昌、邓小平住在龚楚任职的南宁公安局院内，天天紧张地进行工作，他们白天分头去了解情况，晚上秘密开会讨论研究工作，决定部署和活动，非到午夜不能休息。在贺昌、邓小平领导下，经过一系列有效的工作，中共在南宁直接掌握了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和第五大队等部队的指挥权，发展了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与此同时，由共产党人韦拔群、陈洪涛、黄治峰领导的右江地区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农民武装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就为尔后发动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九月下旬，贺昌转经香港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并请示广西下一步工作。恰在这时，即十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誓师反蒋，不料某部下被蒋介石策动和收买，内部发生叛变，很快招致失败。十月八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广西直至毅宇同志巡视后，才开始向士兵群众中发展。"强调会后"要深入土地革命斗争，扩大游击区域，建立红军乃至发动可能的游击战争"。随即将从南宁来上海请求工作的龚饮冰派回广西，贺昌返回香

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十月下旬，张云逸、俞作豫等分别率领警备第四和第五大队从南宁撤至右江平马、百色和左江龙州地区。十月三十日，广东省委开会讨论广西工作。鉴于情况的变化，决定成立广西前敌委员会，以邓小平为书记，领导左右江的武装斗争和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决定广西特委如无法在城市开展工作，应撤至右江，在前委领导下工作。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委成立后，派龚饮冰到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了撤到右江地区后部队和地方工作的情况。贺昌同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黄钊已调走由卢永帜任书记）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警备第四大队"即速转变，并限定龚同志到后，不能超过十天，即须动作。"龚饮冰返回百色后，前委开会讨论，"完全接受中央指示之精神"，"决定于最短时间内以极紧张之精神，使工作上略为布置就绪即行动作"。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李明瑞、韦拔群等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百色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建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贺昌在组织、部署和指导百色起义的工作中，起到重大作用。不久后，贺昌在香港听了邓小平介绍左右江的情况，为百色起义胜利和红七军的建立，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一九三〇年初，中共中央发现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决定以调动工作的方式将张慕陶调到中央，并决定由贺昌同聂荣臻、陈复前去顺直省委担任领导工作，

贺昌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调动。由于中共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情况复杂，斗争艰苦，贺昌决定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贺平，托付给广东省委书记卢永帜夫妇抚养。贺昌的妻子黄慕兰舍不得丢下孩子，贺昌耐心地开导她说：“孩子是属于党的，属于国家和社会的。我和你一样疼爱孩子，更希望他快快长大，接过我们的枪。但是现在条件不允许我们把他带在身边，我们应该首先从工作出发，不能被儿女情长缚住我们的手脚。”就这样，贺昌夫妇告别战友，丢下爱子，起程北上。

贺昌到天津后，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聂荣臻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陈复担任宣传部部长。原来省委各部门领导人继续留任的，有工委书记张昆弟，农委书记郝清玉，军委书记廖划平及副书记张兆丰等。顺直省委统一领导北平、天津、唐山和河北、山西党的工作。贺昌领导顺直省委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他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熟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及兵运等各方面工作的进展，考察各市委、特委、区县委组织状况及领导干部的表现，研究如何加强各项工作的措施。贺昌很关心干部的疾苦，他听说一起在太原并肩战斗的战友原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彭真被捕后，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坚定，但被折磨得身体很虚弱，生活很苦，便想法搞到一些钱，派胡三奎经过关系送给彭真。对其他难友也一样，他通过革命互济会采取各种形式组织营救，给以帮助。贺昌十分重

视北方地区的兵运工作，他运用在湖南、广东工作时的丰富经验，亲自过问省军委兵委工作。在他领导省委期间，将曾在方振武部任过中校参谋的共产党员谷雄一，从天津监狱里营救出来，派他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军委书记，从而加强了对山西军阀阎锡山各部队兵运工作的开展。后来，谷雄一领导发动了平定兵变，成立了红二十四军。顺直省委还派郝清玉任保属特委书记，深入河北蠡县、完县等地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秘密农民武装。为纪念五一劳动节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贺昌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主持省委部署了天津、北平、唐山等市委的宣传活动。还派聂荣臻同张昆弟去唐山巡视指导工作，尔后聂荣臻又去中共北平市委指导工作。贺昌自己亲赴唐山、北平等地检查指导工作。

一九三〇年六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求各地成立行动委员会，实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根据中央的决定，顺直省委改为中央北方局，由贺昌任书记，阮啸仙任组织部部长，余泽鸿任宣传部部长，陈复任秘书长。八月初，成立了北方行动委员会，贺昌任书记，并任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贺昌积极执行了中央的错误方针，在领导北方斗争中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主持部署了于同年夏秋之间发动的磁县彭城暴动，成立了红二十军；完县五里岗农民武装暴动，成立了红十九军；博野、蠡县农民暴动，成

立了红二十二军。由于敌强我弱，各方面条件不成熟，这些暴动均先后失败。九月，成立了平汉北段兵暴委员会，在栾城县准备举行兵暴，因叛徒告密而失败，北方局原军委书记张兆丰被捕后不久牺牲。贺昌主持北方行委还指示中共山西特委，立即发动武装起义，在太原、汾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对此，山西特委提出不同意见，被批评是“例外主义”，重新改组了山西特委领导。在此期间，他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给北方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损失。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停止了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计划，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贺昌出席了这次全会，受到了教育，开始认识到自己在北方局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在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贺昌赶回天津。十月初，他主持召开了为时三天的中央北方局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及精神，决定立即停止组织暴动的计划。他向北方局沉痛地检查了自己执行“左”倾方针的错误，提出了如何改变目前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会议结束后，贺昌同北方局其他领导人一起，努力加强对各地工作与斗争的检查指导，逐步恢复、发展了各地的党组织，使北方党的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正当贺昌努力在实际工作中改正自己错误的时候，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

等借批判“立三路线”、“调和路线”为名，取得中央领导的地位，提出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冒险主义的纲领。贺昌出席了会议，受到点名批判，被撤销中央委员资格。全会决定取消北方局，恢复顺直省委。贺昌被撤销领导职务后，调回中共中央进行反省，检查错误。贺昌回上海后，住在法租界酱园小店铺的楼上，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论著，联系自己工作的实际，深入思考，认识到自己执行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损失。他曾表示："郑重接受历史教训，决心站起来战斗，以百倍的努力来补偿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当时，贺昌对罗章龙等人的分裂言行表示了明确的反对，对王明等人把同志当成敌人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作法，也深为不满，经常与关向应等交换看法，向任弼时等反映意见。贺昌闭门思过，通过深入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使他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他在上海看到党内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的派别斗争，眼见中共中央机关几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一批一批优秀的同志和亲密的战友惨遭敌人杀害，再也呆不下去，他向组织申请到革命根据地工作。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同意派他去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当贺昌准备同妻子黄慕兰离开上海时，关向应等党的几名重要干部被捕，担任革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的黄慕兰，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营救被捕同志出狱的活动。为了营救战友，他让妻子黄慕兰集中精力工作，建议组织上让自己先走。他

毅然告别了亲人和战友，踏上新的征途，表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勇于奉献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高尚情操。

## 五

贺昌不仅是中共在白区工作的著名领导人，而且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一年五月，贺昌等由吴德峰伴送，从上海绕经闽西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红都江西瑞金。贺昌被分配去赣南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县份之一的兴国，协助著名的中共女县委书记李坚贞工作。当时的兴国，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两次“围剿”后，全县普遍建立起革命政权，正在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贺昌到兴国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作风深入，关心群众生活，重视调查研究，经常下乡现地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指导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基层干部和群众，深受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老贺同志”。贺昌在兴国工作期间，团结县委一班人，领导全县开展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形势喜人。兴国县平分土地后，在开展生产运动、扩大红军、扩大地方武装、支援红军作战、优待红军家属等项工作中，都取得很大成绩，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模范县之一。贺昌通过工作实践，也学习了兴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农村工作经验和优良的思想品质。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恢

复红三军团第五军的建制，贺昌被任命为第五军政委。贺昌离开兴国赶到红三军团，随部队过赣江向西行动。他同军长邓萍、政治部主任黄克诚率全军三个师，到茶陵、莲花、永新一带开辟工作，发动群众，整编地方武装，尔后挥师上犹、崇义地区。在军团首长彭德怀、滕代远统一指挥下，红三军团先后攻克城口、文英、桂东、汝城，扩大巩固了湘赣革命根据地，部队补充了大批新战士。六月，红五军随军团回师赣南，奉中革军委命令，会合由红一军团为主组成的东路军，解决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粤系部队，并相机攻夺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刚到红军工作不久的贺昌，由于对党内“左”倾排斥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引起的争论了解不多，在当时大好形势下，又出于对中革军委和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信任，他同多数干部一样，拥护“积极进攻路线”，而他并不认为这是“左”倾的路线。在率部队向南康、大余开进途中，军政治部主任黄克诚鉴于强攻赣州未克的教训，对继续进攻中心城市的做法表示异议，贺昌曾批评黄克诚是“左”倾机会主义。黄不服，据理反驳，部队宿营后两人争论得很厉害，“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了谁”。以后若干年，黄克诚在回忆这次争论时写道：“贺昌同志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七月二日，贺昌与邓萍指挥红五军在大余东北池江地区投入战斗，协同红七军击溃广东敌军四个团。随后配合红一军团

进行水口战役，又击溃广东敌军十个团。这两次作战，沉重打击了广东军阀。

水口战役之后，中革军委决定发起乐安、宜黄战役。八月八日，毛泽东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直接指挥下，红一、三军团分别于八月十七、二十日，攻占乐安宜黄。贺昌同邓萍指挥的红五军，在攻打宜黄城的战斗中，士气高昂，奋勇作战，经过连续一天的激战，终于在当夜歼灭守敌大部，攻占了宜黄城。此后，红五军随全军撤至宁都、广昌地区，贺昌领导部队抓紧进行了休整。这时，红三军团又撤销了红五军番号，所辖三个师由军团直接指挥，邓萍调回军团部任参谋长，贺昌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但由于前方工作需要，贺昌当时并未到总政治部任职，而是以总政治部副主任身份兼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精力充沛的贺昌，担任红五军政委半年，工作深入踏实，善于虚心学习，已经熟悉并掌握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和方法，积累了实际工作经验。他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期间，重视深入调查了解部队思想状况，积极领导政治部门开展各项工作，他还动员军团全体干部都来做政治工作，从而有效地加强了战时政治工作，保证了红三军团这支红军主力部队始终具有饱满的战斗热情。贺昌心怀宽广，对干部知人善任，重视使用能独立思考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他当军团政治部主任后，立即把与他观点不同已被降职为教

导营政委的黄克诚，调到军团政治部任组织部部长，协助自己工作。虽然黄克诚的观点并未改变，两人重新一起工作有时仍然发生争论，但贺昌宽厚待人，同志间的关系仍然处得很融洽，使黄克诚终生难忘。贺昌很重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对担任副主任的曾日三、继任组织部部长的徐策和吴溉之、谢翰文等同志，团结他们，支持他们，注意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一九三二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贺昌协助彭德怀等指挥红三军团参加了建（宁）黎（川）泰（和）战役，为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一九三三年一月初，红三军团在红二十二军协同下，在黄狮渡歼国民党军一个旅，继而协同红五军团击溃国民党军一个师。在此期间，贺昌一度兼任红二十二军政委，他同军长罗炳辉指挥全军英勇作战，很好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不久，他仍回红三军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红三军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贺昌领导军团政治机关全力以赴，深入作战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战时政治工作，激发斗志，鼓舞士气。广大红军指战员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投入战斗，发扬了勇敢顽强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先后取得黄陂、草台岗伏击战的胜利。黄陂伏击战刚结束，国民党军的飞机突然向红军总部狂轰滥炸，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被弹片射穿肠子，伤势严重，被迫离职住后方红军医院治疗。不久，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红三军团随方面军开向永丰、乐安之

间的大湖坪地区休整和整编。在行军途中，贺昌的坐骑惊奔，他不慎坠地跌断了右腿，被送到后方医院治伤，从此他离开了红三军团。同年夏，贺昌伤愈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他到红军总政治部工作。贺昌到职后，主任王稼祥因伤重继续在后方医院治疗，贺昌以副主任和代理主任的身份，主持总政治部工作。一九三三年五月初，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后方瑞金，在前方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原在前方的红军总政治部机关人员大部留在前方改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杨尚昆为主任。移至后方的红军总政治部机关，实际上是在贺昌主持下重新建立起来的。当时住在瑞金沙洲坝以北约十五公里的山沟里。一座用土坯盖成的两层楼里，分住着总政治部各部门的办公室。贺昌对总政治部的干部，选用十分慎重，坚持德才并重，任人唯贤，对“左”倾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有所抵制。当时总政各部门的主要干部是：秘书长肖向荣；组织部部长李弼廷；宣传部部长徐梦秋，副部长刘伯坚；红军马列主义研究总会主任张如心；红军反帝大同盟主席李霭民；《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动员部部长罗荣桓；破坏部（开始称兵运工作科）部长李涛；青年部部长先是高传遴，后为肖华。这些干部中大多数是出国留过学的大学生，年龄比贺昌大，但作风比较民主善于团结同志的贺昌，同他们相处得很好。

贺昌在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认真负责，要求严

格，作风深入，讲求实效。他抓紧工作之余孜孜不倦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经常亲自起草重要文件，为《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等报刊撰写文章，给红军学校、红军大学讲话，作形势报告。当时，虽然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建立的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受到排斥，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仍很严重，但经过总政治部机关和各级政治部门与全体政工干部的努力，红军的政治工作仍然有了较全面的发展，较好地保障了反“围剿”作战，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做为红军政治工作主要领导者之一的贺昌，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贺昌对红军战时政治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五次反“围剿”前，贺昌同王稼祥签发了关于政治动员的训令和指示，要求在红军内部和人民群众中普遍深入进行宣传教育，发动指战员做好战前准备。为保障红军指战员在反“围剿”作战中履行军人的神圣职责，在贺昌等主持下总政治部制订并经中革军委批准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人誓词》。为发扬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贺昌等领导总政治部又及时地制订并经中革军委批准发布了《关于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对作战“有特殊功绩”的红军军人，按功绩大小，分别授予一、二、三等红星奖章。在一九三三年“八一”建军节，红一方面军部队仅获得二等红星奖章的就有三十四人。在一九三四年“八一”时，红一方面军部队获

得二、三等红星奖章的有七十三人。贺昌等领导总政治部还在部队中开展了创造模范支部、模范连队和模范团的活动，激发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荣誉感和革命责任感，涌现出“模范红五团”、“英勇冲锋”红四团等大批先进单位和英雄人物。贺昌对加强连队建设倾注了心血。在贺昌的主持下，总政治部要求各级政治机关特别重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九三四年五月，专门召开了红军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发出了加强连队政治工作的指示，强调“百倍的加强对连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同时对“战斗情况中连队政治工作”和“目前连队中宣传鼓动的中心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在加强连队建设过程中，贺昌等十分重视连队的巩固和防止非战斗减员，为此曾多次发出训令和指示，决定以连为单位组织反逃跑的“十人团”，挑选“政治坚定、作战勇敢、工作努力热心”的战士为成员，“从政治上去兴奋、鼓舞全体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做好防逃跑的工作。贺昌尤其热心于加强对新战士的工作，使他们很快成为铁的红军。

贺昌对后勤部门和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也是非常关注的。他根据部门性质和任务特点，提出政治工作的不同的要求。在他主持下制订的《关于医院政治工作的训令》中指出:“必须以改善医院工作和完成医院的当前任务为中心，如果脱离了医院当前的任务，而单独进行检举与肃反

工作，那便是政治上的错误。”为加强游击队的工作，他和王稼祥签发了《关于游击队工作的训令》，强调“必须巩固党在游击队中的绝对领导作用，立即建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并须建立起坚强的支部组织来领导游击队”。还对游击队的组成、领导、纪律、群众工作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同时签发了《关于争取白区群众发展游击运动扩大苏区的训令》。为了动员群众巩固与扩大红军并支援红军作战，要求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深入开展了优待红军家属的活动，还组织地方各界慰问红军部队，请地方干部到部队作报告。

贺昌对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为开展这一工作，总政治部专门设立了破坏部（后改称白军工作部），并为规定瓦解敌军、进行兵运工作的任务、方法和具体要求，连续发出了《健全破坏部的组织与工作》、《战地敌人近方瓦解白军工作》、《堡垒下瓦解白军工作》等指示。在部队中广泛开展前线对敌宣传活动，采取各种形式，争取敌军官兵放下武器。还由总政治部编写并经中革军委批准，颁发了进行白军兵运工作的《士兵工作提纲》和《士兵组织工作提纲》。这些文件，有效地指导了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是多年从事兵运工作的经验总结，长时期发挥了指导作用。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一日，贺昌在瑞金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参加了大会各项

议题的讨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前后，贺昌全力投入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准备及召开。经过充分准备，二月七日至十二日，在王稼祥、贺昌主持下于瑞金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与会者主要是红一方面军和江西、福建、闽赣、粤赣、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军区红军的代表共二百五十八人。大会由王稼祥、贺昌、李弼庭、李卓然、袁国平五同志组成主席团，王稼祥主任致开幕词，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讲了话。在会议进行期间，王稼祥主任作政治工作报告，李卓然作了战时政治工作报告，贺昌在大会讨论时发言，并最后致闭幕词。这次会议对红军政治工作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再次明确了政治工作的地位，提出："政治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要求政工干部学习军事，会指挥打仗，加强与改善政治教育，加强战时政治工作。这些原则和要求的提出和确立，无疑都是正确的，为红军政治工作的建设解决了方向性问题，极大地推动红军政治工作的发展。但由于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红军的政治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的严重影响，自觉与不自觉地宣传贯彻了"左"的方针和口号。贺昌在会议发言和以后所写的《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一文中，虽然也宣扬了"左"倾口号，但他明确提出并且坚持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和根本原则，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符

合红军政治工作实际的。他针对“过去部队中一般的缺乏基本政治教育，大部拿鼓动代替宣传”的情况，强调了“加强与改善我们的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实行对红色战士的基本政治教育，要培养每个红色战士成为反帝的土地革命的为苏维埃事业与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的自觉的阶级的武装战士”。他针对政治机关、政工干部忽视军事技术与战术的现象，强调了“从政治工作上保证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提高”，“用军事科学与实际战斗的经验与教训来重新教育每个红军干部”。他特别重视加强连队党支部的建设，强调指出:“党的支部工作，对于巩固红军与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具有决定的意义，恰好在这一方面我们工作还表现薄弱。”他认为“支部是直接接近战士的，是政治机关与红军战士群众联系的枢纽”，必须“使支部真正的能成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他要求改进政治工作的领导作风和方法，“要把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刻板的工作方式从工作中洗刷出去！……要用具体的活的领导来真正的进行政治工作”。

贺昌同王稼祥主任在干部工作上，对“左”倾的干部政策是有抵制的，对被错误批判为犯了“罗明路线”的邓小平、肖劲光、余泽鸿等，在他们被撤职后仍然安排在总政治部、红军大学上干大队担负重要工作。对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张如心、贾拓夫、李子芳等没有排斥和歧视，而是委以宣传部、破坏部、组织部领导的重任。一九三三

年十一月，粤赣军区下属几个军分区的领导干部吕赤水、邓飞等六人，被批判犯了“右倾退却逃跑主义”的错误，撤职后送交总政治部讨论党籍问题。贺昌同王稼祥主任和组织部部长李弼庭等，十分慎重地召开总政党务委员会会议，一个一个地找六人谈话，当面听取本人意见，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公正处理，除个别同志受到轻微的处分外，其余均免予处分，并安排了工作。贺昌在实际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为红军政治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毅在一首诗中赞誉贺昌:“主政见威严。”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年三月，贺昌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抚恤委员会主任。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一方面军奋战一年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以前，贺昌听到主力红军转移的消息后，曾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那里要求随军走。李维汉问过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不同意。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贺昌被留下坚持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了由项英任书记的中共中央苏区分局，陈毅、贺昌、陈潭秋、汪金祥等为常务委员，瞿秋白、梁柏台、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曾山、毛泽覃、李才莲等为委员。十月二十二日中革军委电令，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贺昌任政治部主任，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

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红二十四师和红十军。贺昌接受任务后，立即组建中央军区政治部，由史犹生负责组织部；被“左”倾错误撤职的原总政破坏部部长李翔吉任宣传部部长，袁血卒负责破坏部，林中伯负责秘书处，还新设立了地方游击政治部。贺昌领导政治部迅速开展各项工作，尽管他有腿伤，行走不便，仍然带伤坚持工作。袁血卒在《红军长征以后》一文中回忆说：“他待人很诚恳。由于操劳过度，营养不足，他的脸色焦黄，显得更严肃。我第一次到政治部开会，只见他躺在椅子上，合着眼象睡熟了。待大家汇报完，他扼要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却是那样的深刻而明确。因此，大家都很尊重他。”

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红二十四师和三个独立团。十一月十日，国民党军攻占了瑞金，十七日和二十三日，于都、会昌相继被占。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县城全部陷入敌手。中央分局和军区等机关，撤至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城之间的三角地带。由于“左”倾影响的严重存在，项英仍然命令红军部队进行大兵团作战。红二十四师在会昌谢坊打伏击，击溃敌军一个旅，虽然延缓了敌人的推进，却暴露了自己。敌人大举进攻，形势明显不利。十一月底在一次中央分局会议上，贺昌支持陈毅的意见，坚决主张转变作战思想，迅速把部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项英当时口头上也讲“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但指导思想仍未根本转变。在这种情况

下，贺昌主持政治部部务会议，对当前的形势和处境进行了讨论，在十二月下旬接连发出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节省子弹和收集子弹壳的通令》、《巩固我们的部队》（政治课教材）等文件。这几个文件都是由贺昌和李翔吾起草的，他们天天工作到深夜，眼睛熬得血红血红，真够辛苦。贺昌在上述的《讨论提纲》中明确指出："中央苏区党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游击战争是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他提出：为适合游击战争的环境，党要缩小机关，派遣大部分干部到游击队去……使党的领导机关成为精悍而有能力的机关，在被占领区域党要随游击队行动，领导游击战争。为了动员教育部队把思想转变到游击战争上来，贺昌曾对干部部门说："剧团的小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重句）。你去告诉他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很紧张的，任务是艰巨的，过分乐观的宣传脱离实际，没有好处。告诉他们，要准备吃苦，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打仗。"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项英命令红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十一团进攻驻守牛岭的国民党军，结果遭受严重损失。国民党军立即分兵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机关及部队封锁在西江、宽田、黄龙（今黄麟）之间狭小地区一举歼灭。面对危险的形势，经过陈毅和贺昌的说服，项英转变了思想，同意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中央分局多

次讨论，对具体行动方针始终没有定下来。项英仍“表现迟疑和犹豫”，决定报告中央经批准再执行。会后将中央分局等机关人员分发到各地和各部队中去，只留项英、陈毅和贺昌三人保持领导，派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到闽西，派毛泽覃到福建，派李才莲到闽赣。随后项英、陈毅、贺昌率分局机关和部队转移到赣南进行整顿。在此紧张严峻的形势下，贺昌表现坚定、沉着，他常拄着拐杖，拖着受伤的腿，深入到干部、战士和伤病员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启发同志们决心为革命接受最严峻的考验。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有准备迎接大风暴到来的思想，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准备打它三年、五年的游击。”

二月五日，苏区中央分局收到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书记处的电示，指出:“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指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五人组成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项英为主席。由于敌情紧迫，项英、陈毅、贺昌等先安排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周月林等向福建长汀转移，随后率中央分局离开黄龙井塘村向于都南部转移到达禾丰地区。二月十三日和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接连来电，对如何坚持游击战争作了详细指示，项英、陈毅、贺昌等对分散突围去各地的人员作了

调整与部署，尔后转移至上坪山区。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十一条，批评并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贺昌在听到中共中央几次来电后十分高兴，深受鼓舞。他对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表示了衷心的拥护，他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迅速将这一喜讯转告给周围的同志。同志们听后都异常振奋，增强了坚持斗争的决心，坚定了革命最后必胜的信念。在这期间，贺昌认真派了巩固部队，反对逃跑现象和失败主义的思想斗争。他针对曾任中央代表的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曾宏毅（即曾洪易）散布的悲观、动摇的取消主义论调，参与了组织党内开展反“宏毅路线”的思想斗争。中央分局还作出决议，撤销曾宏毅职务并告省委。不久，原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谢然之叛变投敌，贺昌立即要李翔吾部长撰写了一篇社论：《给叛徒们以无情的打击》，在《红色中华》报专号上发表，斥责叛徒的可耻行为，教育革命者坚定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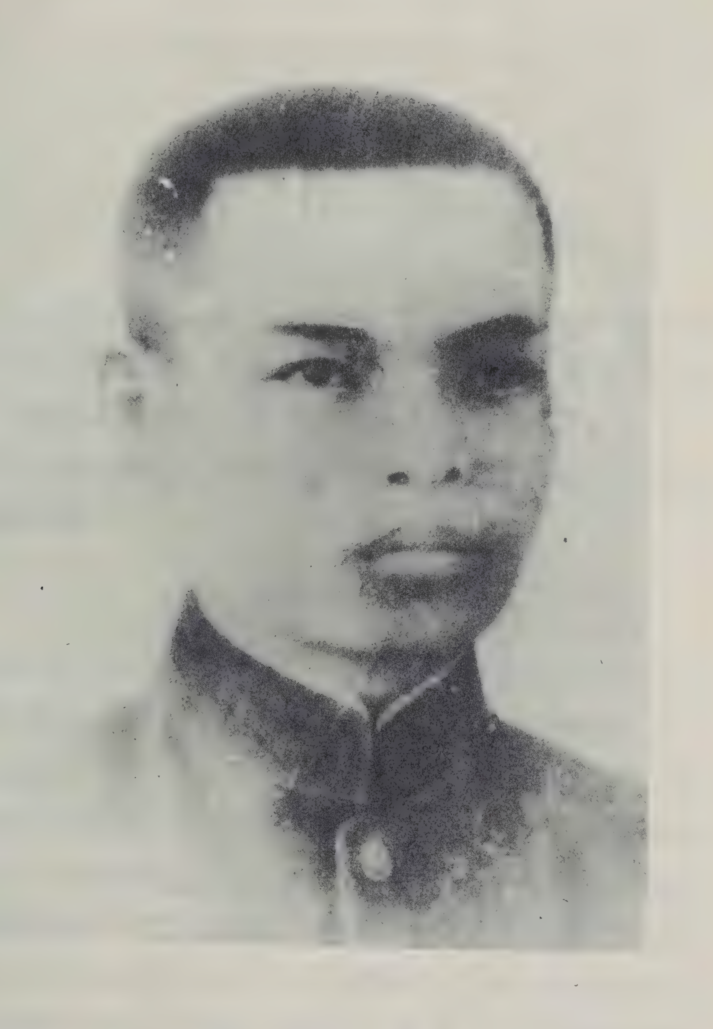
自二月中旬开始，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近万名红军部队和地方干部，根据苏区中央分局的部署，陆续出发，分头突围。贺昌对一批一批离开的领导干部谈话、嘱托，告别了许多长期在一起战斗的共患难的战友。驻在黎板桥的赣南军区，认真组织干部们学习中央军区政治部的动员报告和贺昌主任的指示。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向袁血

卒关切地询问贺主任的伤腿，让袁挑选一匹好骡子给贺主任骑。三月上旬末，各路突围部队全部离开于南地区，最后剩下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及军区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七十团，他们决定穿过会昌封锁线，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转移。突围前，中央军区直属队同七十团整编为四个大队，贺昌同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等编在第三大队，李翔吾、袁血卒等编在第四大队担任掩护任务。项英、陈毅等编在第一、二大队。为了给突围的同志充饥，贺昌不顾腿伤行动不便，带头杀掉赣南军区特意送给他的那匹骑骡。在山上一间破烂棚子里，贺昌召集首先行动的第三、四大队的干部开会，布置了突围的任务，作了突围的动员。贺昌扶着他那残废的右腿翘在长凳上向大家说："同志们！主力红军已经胜利地进入贵州的第二个大城市，并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中央在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并给了我们今后斗争的指示。现在，我们是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弹缺粮缺，特别在这深山之中，孤军作战，形势是严重的。这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干部，对党对人民忠心的时候，也是考验每个同志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的时候……。"他激励大家说："我们不仅要当胜利时的英雄，也要当困难时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在困难中考验出来的。"

一九三五年三月九日下午三时许，贺昌带领第三大队从于南上坪的山上出发先行突围。李翔吾、袁血卒等率领

第四大队随后跟进负责掩护。当天晚上，第三、四大队安全渡过濂江（安远河），到达会昌晓龙的天门嶂。不料过河后，国民党军察觉到红军突围部队的去向，立即从仁风调来第八十九师一个团，将安远河封锁了。这时，天下大雨，河水猛涨，项英、陈毅率第一、二大队没有赶上先行大队，被阻于河西。贺昌率第三、四大队在天门嶂等了一阵，一直没有同项英、陈毅联系上，很快受到第八十九师的包围和猛烈的攻击。贺昌指挥大队果断地突围，从山上冲杀下去。第四大队在掩护战斗中大部分牺牲，贺昌带第三大队余部冲出敌人重围，离开天门嶂山区，连夜转至会昌晓龙的归庄。三月十日凌晨，贺昌率少数人在归庄被国民党军第八师包围。在抗击作战中贺昌身负重伤，但仍然顽强地向敌军射击。敌军逐渐逼近，叫嚷要捉活的。宁死不当俘虏的贺昌，面对一群敌军疯狂扑来之际，高呼“红军万岁”的口号，用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的贺昌，用一生的奋斗，生命最后时刻的浩然正气和英勇壮举，表现了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悼念在突围中牺牲的这位战友，陈毅挥泪写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五言史诗：“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王 健 英）



俞　作　豫



# 俞 作 豫

“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长俞作豫在一九三〇年英勇就义前写下的绝笔诗。遗墨仅十余字，但字字千钧，铮铮有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耿耿丹心和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

## 一

俞作豫（1901—1930），字备予，参加地下工作时，曾化名刘慈；因排行十三，后来人们又亲切地称他“十三叔”。公元一九〇一年四月十日（光绪二十七年农历二月二十日）出生于广西北流平政石梯口村（今平政乡岭垌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农庭。父亲俞璧阶是个塾师，半耕半教，娶妻陈氏，先后生四子：作孚、作佑、作颂、作柏。作柏在母体孕育足足十个月，待到降生人间，陈氏即去世了。俞璧阶续娶俞作豫生母刘氏，又生三子，取名作恒、作丰、作豫。

俞作豫自幼勤奋好学，天资聪颖，记性很强，又是晚

子，深受长辈的喜爱。母亲刘氏更是宠爱这个方头大额、聪明伶俐的小儿子。俞作豫对纯朴善良的母亲十分孝敬，小时就懂得为母亲分担家务劳动，他到河里捉到鱼，煮熟了首先端给母亲吃，读中学以后，他学会了缝缝补补，衣服破了，扣子掉了，也从不要母亲操心，所以在他参加地下工作时，化名刘慈，不是没有缘由的。

俞作豫四岁开始描红认字，还没有正式上学，他就跟着十一哥俞作恒到学校去听大哥们念书。一次，他的表哥李明瑞念岳飞的《满江红》，李明瑞念一句，他也跟着念一句，没两天，李明瑞念熟了，他也能背诵如流，可是他还未认字呢。俞作豫一年比一年长大了，父兄又陆续教他读完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故事琼林》、《论语》等书。当他七岁正式入学以后，便逐渐养成爱读小说的习惯，《三国演义》、《水浒传》、《岳传》、《说唐》等书，一读就是一个通宵。他对中国历史上那些英雄人物和民间侠义之士，十分仰慕，表示长大了要象他们那样保国爱民。在学校里他曾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每天除了读《古文观止》外，还读过“国家之文野，观其道路可知也”，“英国伦敦，异常之富，屋背地底，皆有铁路”之类的课本，使他对自己祖国的落后、贫弱十分焦急，开始立下强国富民的抱负。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俞作豫的童年，是在旧中国黑暗社会中一个典型的南

方山区农民悲惨生活中度过的。由于家庭人口多，生计越来越难，一年到头都是喝稀的，遇到荒年，还得充以野菜填肚。他自五六岁起，就帮家里干零活，放牛、割草、打柴、晒谷等农家杂活他都做，有时整日与穷困的孩童为伍，爬山、游泳，练就一身好体魄，养成勇敢刚直的性格，使他以后参加革命当了“官”，还带上了浓郁的“乡土气味”。

俞作豫身材不高，但敦实，口音略讷，但完全不影响他说话的频率和机智勇敢、豁达威武的军人风度。一九一四年，他刚十三岁，小学还未读完，便和比他年长六岁的十一哥俞作恒步行一百多里到县城投考刚刚开办的县立中学。那时，全县应考人数四百多人，只择优录取一百二十名。入学考试时，他的成绩本来可观，但因年纪太小，竟未取录。放榜那天，他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觉得委屈，便径直去问校长，校长见他年纪虽小却有胆识，就当面考了他，他对答如流，校长又查阅了他的试卷，成绩也佳，便把他作为第一名备取生予以录取。十一哥俞作恒笑他是“不幸中之有幸”，作豫却不在乎地说:“不对，是不幸之不幸，不是吗，本应上正取的，反而弄到个备取。”他又风趣地说:“虽然我在榜上列名备取，但也得了个第一，那么，我的别号就叫‘备予’吧。”从此，他就一直沿用“备予”这个别号。

## 二

一九一八年，俞作豫中学毕业。四年的学校生活，使他受到民主革命新思想的熏染，积极参加讨袁和反帝爱国示威游行。这时，社会上曾掀起一股留洋热，但俞作豫却选择了尚武救国道路，决心护法从军。他得到七哥俞作柏的资助，到当时革命大本营的广州，考入广东西南护法军二军广州燕塘讲武堂学习军事。在广州，他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目睹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并且阅读了《新潮》、《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他的视野开阔了，见识也广了，但他毕竟是个军人，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一九二〇年，他以优异成绩在讲武堂结业后，便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他历任桂军排长、连长、营长，在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驱逐云南军阀唐继尧、龙云，以及讨伐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等战斗中，皆以少胜多，表现足智果断，英勇顽强，屡立战功。那时，他的军事才能在桂军中已崭露头角。一九二六年初，他率部从钦州到南宁整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旅第三团团长（旅长李明瑞）。当时他的七哥俞作柏（国民党左派）在广西省政府任职，与中共有联系，曾到广州结识苏联顾问鲍罗廷，鲍赠予他一批"宣传革命主义的书籍和文件"带回南宁。俞作豫把这些书籍几乎都

翻阅了一遍。当时，中共在广西的负责人黄日葵、陈勉恕、谭寿林等和一些左派进步人士，经常到俞作柏家聚谈，由于这个关系，俞作豫和他们相识后，来往甚密。在这些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启发下，俞作豫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 ABC》以及《向导》、《政治周报》等一批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刊物，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同年六月，他参加中共领导和推动的北伐战争。他率领的一个团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先头部队，配合担任主攻任务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行动，深受共产党在军队中开展革命政治工作和倡导勇敢战斗作风的影响。汀泗桥是粤汉铁路上的军事要隘，东面崇山峻岭，南北西三面环水，唯有一座铁路桥可通，易守难攻。北伐军发动攻击，曾四次易手，战斗十分激烈。俞作豫团配合叶挺独立团觅小路绕到敌后，猛袭敌阵，北伐军终于占领了号称武汉天险门户的汀泗桥。在夺取贺胜桥的战斗中，当叶挺独立团与敌正面主力激战时，俞作豫团赶到，李明瑞"即令先头部队俞作豫团参加作战，增援第四军右翼"。俞作豫义无反顾地率部涉水渡过湖泽地，猛烈袭击吴佩孚部的后侧，吴佩孚虽亲自督战，终经不起北伐军首尾夹击，很快大败，北伐军一股作气突破了吴佩孚精心设计的十余里纵深的防御阵地，直逼武昌城下。这一仗，俞作豫团配合叶挺独立团打得非常出色，立了大功。后来，周士第（当时独立团参谋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贺胜桥的胜利，虽

然独立团起了决定作用，但如果没有友军的配合，吴佩孚主力是不能消灭的，贺胜桥是攻不破的。”贺胜桥大捷打开了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为北伐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这时，蒋介石亲临南昌前线指挥北伐军与军阀孙传芳作战。孙传芳凭着手下几十万军队，固守南浔铁路一线(九江至南昌)，恃强顽抗。蒋介石攻城日久未下，军心逐渐消沉，遂令七军增援。作为七军主力李明瑞部，在武汉未得休息，又日夜兼程出发，选准孙传芳的后勤给养重地德安作为突破口。孙传芳虽在德安设有重兵把守，但没有估计到北伐军的行军速度如此迅猛，当他方醒将要作出反应时，俞作豫团已打他个措手不及占领了德安。孙传芳组织十倍兵力进行反扑。李明瑞、俞作豫这次孤军深入，前有敌重兵，后无援军，为了避免无谓牺牲，便主动撤出德安。孙传芳紧追不舍。部队刚撤到箬溪，孙传芳的部队已包围了李明瑞师部驻地王家铺，切断了退路。李明瑞和俞作豫组织部队与敌鏖战一昼夜，俞团减员很大，弹药也消耗殆尽。这时李明瑞找俞作豫研究处置方案，最后决定把全旅士兵每人打剩的子弹收集起来，武装两个突击连，每人配足二百发子弹，由李明瑞亲自指挥。俞作豫临危请命，亲率突击队冲出重围，打回德安去。顿时全军士气大振，把包围王家铺的孙传芳部冲垮，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把全旅重新武装起来，并乘胜歼敌于箬溪，继而进占德安。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消灭了孙传芳的大部兵力，

截断了孙传芳对南昌的供给，使南昌变成“孤岛”，很快被北伐军攻破。

德安一役，化险为夷，解全军之危，俞作豫立下赫赫战功，但由于其兄俞作柏亲共等原因，不但没有受赏，反而遭到桂系军阀白崇禧的排挤。战后，白崇禧召集俞团官兵训话，对俞作豫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谩骂。随后，又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俞作豫提为副师长，削其实权，并令其移师武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作豫更加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加之身受桂系新军阀头子的排斥和打击，使他深感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已靠不住，在国共分裂的情况下，革命何以成功，同志何以出力！他想起北伐前夕在南宁时共产党人黄日葵、陈勉恕、谭寿林同他交谈的情景，以及叶挺独立团英勇战斗的场面，促使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他认定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真正为群众谋福利的政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决心不再为军阀卖命，便借口回家探望母亲，毅然脱离桂系军队到上海寻找共产党。

## 三

一九二七年七月，俞作豫为了迷惑桂系新军阀，故意从驻地黄梅取道武汉南下株洲，然后再绕道江西至上海。国民党清党后的上海，虽然到处是白色恐怖，但中共在上

海还继续进行地下斗争。俞作豫在上海找到广西人经常出入的“寰球旅社”，遇到当年熟识的共产党员谭寿林，这使他万分高兴。他坦率地讲述了这次脱离桂系军队的经过，倾吐了对共产党的崇拜和信仰，表示了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共产党的决心。由于谭寿林的鼓励和帮助，使他增添了革命的信心和勇气。不久，他便从上海直奔香港，稍后又到广州，找到了共产党员陈勉恕和朱锡昂，有幸认识了李立三、恽代英、杨殷、聂根等中共中央和广东、广西党组织的领导人。就在这白色恐怖的严重时刻，他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月，由陈勉恕、朱锡昂介绍，他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而使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转折。

当时，中共在香港组织领导了“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俞作柏、陈勉恕、俞作豫等都是该会会员。他们受党组织的委派前往汕头一带，组织力量支援“八一”南昌起义的南下大军。俞作豫在参加这一活动中，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抢先集结汕头进行堵截，以及敌众我寡等原因，起义军遭受挫折，俞作豫遂经厦门转回香港，途中又与共产党员雷经天相遇，他们互相勉励，一路同行。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俞作豫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广州起义，与工人赤卫队一起，在西关附近（今文化公

园）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巷战，在敌人反扑的危难时刻，他奋不顾身，掩护同志们撤退。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毫不气馁，又转移到香港，在悼念牺牲同志的会上表示“绝不为敌人吓倒”，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 四

著名音乐大师贝多芬讲过这样一句话：“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俞作豫短暂的一生就具备这样的优点。他总是在艰难危险的关头乐于接受任务，勇挑重担，百折不挠。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派遣一批以桂籍为主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返广西恢复发展党团工作，开展农运、工运和兵运。在派遣的第一批人员回桂时，遇到国民党的关卡，刚到赤坎（广州湾）便折了回来。这时，广东省委在港领导人找朱锡昂和俞作豫谈话，朱、俞二人主动请战，他们表示：“不怕任何危险，坚决闯过关卡。”就这样，俞作豫化了装，率领第一批参加起义的留穗学生（大都是共青团员）十余人，几经周折，巧妙地避开了国民党的军警盘查，安全地回到预定集中地——北流县城。接着，朱锡昂率领的第二批人员也相继到达。俞作豫和朱锡昂选择了城郊黎家庄（共青团员黎衍家）作为党的办事机关，并立即召开了党团骨干会议，部署工作。那时，北流和广西各地一样，正处革命低潮，要打开局面，相当困

难。一开始便遇到联络机关和活动经费的问题。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集资，在北流县城永兴街（今大兴街）开设“华丰”号货栈，亲自为货栈写了招牌，为党筹集活动经费，并且设法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开展联络工作。在开设“华丰”号货栈之后，他还在高第街先后建立了“华兴隆”、“彭任甫医务所”两个地下联络站。这期间，朱锡昂负责广西党的工作，俞作豫先后担任中共北流县委委员、县委书记。由于他积极协助朱锡昂开展工作，使北流、郁林等县党的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并且建立了一些新的党组织。与此同时，俞作豫和朱锡昂又从北流派人到贵县、芦圩、宾阳、南宁等地联络，又在南宁找到了雷经天（当时南宁地区中共负责人），从而使这些地方的中共秘密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加强了中共对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从此，大革命失败后受到严重破坏的广西各地党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为召开全省特委扩大会议准备了条件。

为了促进农民运动的开展，中共北流县委出版了《工农小报》，俞作豫、朱锡昂亲自为小报撰写文章。小报篇幅不多，但文章短小精悍，对宣传马列主义，分析国内外形势，唤起工农群众觉醒起了很大作用。俞作豫在北流工作期间，有时化装成商人，有时化装成地理先生，头戴斗笠，身穿长布衫，背着罗盘，经常奔赴城郊以及边远山区，深入农民群众之中，同农民兄弟促膝谈心。他还抓住

当地青年喜爱拳术活动的特点，开设武馆，请拳师教练，以团结教育青年农民，鼓励他们参加劳农会组织。在朱锡昂的直接领导下，俞作豫的足迹遍及县北的九代坡、油甘塘、牛骨垠、竹围村、水头垌、牛窝田头、塘岸、金城、民乐，以及县南的白米、岭垌、大伦等地，他在这些地方建立了秘密劳农会，发展会员达五百多人。

农民运动是武装斗争的基础，武装斗争又促进农民运动的开展。俞作豫是军人出身，是当时桂籍中共党员中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他懂得抓武装的重要性，非常重视建立和发展农民武装。由于农民运动的顺利开展，俞作豫在北流很快建立了一支有二百多人枪的农民自卫军。为了提高这支农民武装的战斗素质，俞作豫亲自抓操练。一次侦悉黄绍竑从玉林返容县，并有车队随行的情报，俞作豫亲自率领农民武装十四人到北流和容县交界处的西山容北公路旁设伏，埋伏了一夜，由于黄绍竑临时改变了时间，这次伏击行动未达目的，但却使农民武装受到了一次夜间军事行动的教育。还有一次，在秋收季节，从义村一个姓何的地主，以收回租佃为由，强硬收回九代坡一家姓蔡的佃农的佃耕田，并沟通县署无理抓了两个佃农作人质，借以打击刚刚成立不久的劳农会。对此，俞作豫进行了调查，弄清了情况，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于是他组织农民武装和劳农会员为骨干，发动了有二百多群众参加的反夺佃斗争，并派了一名有作战经验的中共地下党员参加现场

指挥。这是一场武装的反夺佃斗争，从早上打到黄昏，结果农民武装和劳农会获胜，轰动了全县。北流县的县长怕把事情闹大，被迫乖乖释放了在押的两名佃农人质，并且判了何姓地主赔偿这场斗争中的损失。武装反夺佃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地主土豪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农民群众，使农民武装得到了壮大，劳农会也得到迅猛发展。

俞作豫重视并适时地开展对敌军的策反和瓦解工作。当时，驻北流的反动武装有桂系军阀正规军刘志忠团的一个连和县署的城防警备队一个中队。起初有些同志曾认为，这些反动军警是顽固派，不愿意去同他们打交道。俞作豫便耐心说服大家。他说：反动军队表面看是顽固的，但真正顽固的只是少数的反动军官。士兵都是劳苦大众出身，其中一部分是受蒙骗的，而大多数是被强迫当兵的。他们同样是过着被压迫的牛马生活，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地去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调转枪口成为革命的力量。在俞作豫的说服教育下，使同志们提高了瓦解敌军的信心和决心，都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到敌军中去进行秘密策反工作。俞作豫负责中共北流县委的全面工作，虽然担子很重，工作很忙，他还抓紧机会亲自与敌军的一些班长和士兵接触，教育启发他们不要做军阀欺压民众的工具，不要为反动派当炮灰。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争取，敌军刘志忠团的三个班长和一部分士兵逐渐有所觉悟，表示不再替军

阀卖命，愿意听从中共党的吩咐，服从指挥。正当俞作豫做第四个班长的争取工作准备举行哗变时，不幸机密泄露，那三个班长被抓，使哗变受挫。但刘志忠唯恐引出事端，再生变故，只好把驻北流的这个连调回玉林。

在北流的大容山、玉林的六万山一带，有几股“绿林军”，他们打家劫舍，扰乱治安，影响农民运动的开展。对这几股“绿林军”，俞作豫作了社会调查，了解到大容山一股是绿林头目“烂豆豉”的徒弟，枪不多，只不过二十来人；而六万山则有几股，最大的一股有上百人枪，为首的叫邱宏才，此人略识文墨，偶尔干过劫富济贫的事，颇有点江湖侠义思想。于是，俞作豫以邱宏才部为重点，认为这支“绿林军”都是些破产农民，为着温饱，离乡别井，占据山头，落草为寇。他们不是顽固不化者，他们和国民党军警有着深刻的矛盾，只要晓之以理，明之以义，行之以实，把思想工作做好，是很有可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营垒方面来的。而对于较为顽固的几股，其作恶多端不听劝告的为首者，则采取镇压手段，逼其解体。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俞作豫对六万大山的情况比较熟悉，大革命时他当连长就驻防在这一带。中共北流县委决定争取、改造“绿林军”并征得朱锡昂的同意后，俞作豫便带领黄嘉谷、邱桂馨等人多次深入山寨，做“绿林军”头目的工作。起初这些绿林头目对当国军团长解甲归田的俞作豫和工农力量抱怀疑态度，俞作豫就同他们谈心，耐心开导，说明利害

关系，指出光明前途，诚恳地希望他们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要看重农民的利益，团结四万万人民的大多数，要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土豪劣绅的道理，解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并在一次“绿林军”将被国民党军警消灭的危难时刻，俞作豫指挥农民武装以实际行动支援了他们，他们非常感动，终使他们成为当时靠近中国共产党的一支武装力量。

不久，一个更重要的兵运任务又落在俞作豫的肩上。在一九二八年的秋天，蒋桂战争正在酝酿着。中国共产党为避免这场殃害人民的战争，通过隐居香港的俞作柏密约桂系骁将李明瑞到港聚会，李明瑞遂从武汉前线借省亲之名到香港，然后又回到北流。这时，俞作豫早已收到中共广东省委的密电，要他利用这次机会做李明瑞的工作。他和李明瑞分别已有一年，两人一见面就谈得格外亲热，从北伐战争谈到大革命的失败，从“四·一二”后的形势谈到即将爆发的蒋桂战争。俞作豫气愤地说，北伐时我们奋不顾身去打前锋，为的是国民革命早日成功，殊不知消灭了老军阀，又出现了新军阀。德安一役就很清楚，我们孤军作战，李宗仁、白崇禧迟迟不增援，就是想借刀杀人嘛。回忆往事，引起李明瑞的共鸣。其实俞作豫不说，李明瑞心里也是明白的，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他们都违背孙总理的遗训，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最后，李明瑞、俞作豫商定，利用蒋桂战争的机会实行“先倒桂，后反蒋”的策略。

一九二九年春，俞作豫接到党的指示，重返武汉，到李明瑞部做兵运工作。他欣然接受任务。那时，蒋桂双方调兵遣将，战争如箭在弦。俞作豫不顾个人安危，满怀信心地协助李明瑞开展倒桂兵变的准备工作。在他们周密策划下，李明瑞以第四集团军第三路代总指挥的权威，在武汉前线突然宣布倒桂，使蒋桂战争以桂系失败而告终。

桂系第四集团军的瓦解，是中共在统战工作中的胜利，是爱国将领李明瑞勇敢果断的结果，但这里面确有俞作豫的一份大功劳。

## 五

一九二九年五月，李明瑞率领两个师从武汉取道上海、广东回广西，就任广西编遣区主任军事特派员兼绥靖司令。俞作柏任广西省主席。俞作豫随李明瑞的十五师返至南宁。

俞作柏、李明瑞执政广西后，面临十分困难的局势。当时新桂系的势力还相当雄厚，表示降驯的蒙志仁、吕焕炎、梁朝玑等桂系旧部，还未改编，财政枯竭，又没自己的“干部班底”。特别是蒋介石对俞、李早有戒备，在回桂途中就一直派人监视。汪精卫也派人趁机活动。但是，俞作柏、李明瑞同中共素有接触，受过中共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曾表示执政后要执行孙总理的遗训，实行“三大政策”。所以，虽然面对这些困难，他们早有思想准备，

一开始就主动提出与中共合作，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军队和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共受俞、李之邀，迅即派出邓小平（化名邓斌）、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冯达飞、李谦、袁任远等一批党员干部到广西政权机关和部队中工作。俞作豫利用俞作柏、李明瑞的特殊关系，协助邓小平、张云逸等对俞作柏、李明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俞作豫既是俞作柏的亲弟，又是李明瑞的表弟，中共可以通过他获悉俞作柏、李明瑞的动态和情报，也可以通过他向俞作柏、李明瑞提出有利于革命运动的政策和措施，促其实现。俞作豫在为实现中共在广西这一历史时期的斗争任务中，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实，俞作豫提出的许多建议，都是迎合俞作柏、李明瑞的口味的，而俞作柏、李明瑞心里也明白，俞作豫提出的建议是代表共产党的，所以大多都依办了。当俞作柏、李明瑞刚到梧州通电就职，俞作豫便直率地对俞作柏、李明瑞说："关在牢里的'政治犯'，都是'四·一二'事变中黄绍竑一伙搞的，现在还关他们做什么？"俞作柏、李明瑞立即下令把全省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全部释放了。在被释放的政治犯中，有中共南宁区委书记罗少彦、南宁工运领导人何建南以及陈万沅（漫远）、谢鹤寿、莫文骅、吴西、陈可禄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使他们得到营救，增强了中共在广西的骨干力量。

为了彻底推翻桂系的地方势力，中共又通过俞作豫的活动，促使俞作柏和李明瑞采取措施，逮捕了一批桂系军阀安排在地方政府中的反动骨干分子，宣布解散了为黄绍竑所把持的各级国民党党部，任用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到各级军政机关中工作，其中有的出任南宁公安局长、省政府的机要秘书、教导队教官或连排长以及果德、恩隆、河池、奉仪、左县、东兰、养利、崇善、龙州各县县长职等。

俞作柏、李明瑞想依靠工农群众，开放群众运动，俞作豫就因势利导对俞作柏说："开放群众运动，光口讲行吗？有枪就给枪，有钱就给钱嘛！这比口头上讲讲好得多！"他又进一步说："韦拔群现在很需要点武器，你要给他一点才好啊。"俞作柏果然满口答应。同年八月中旬在南宁召开了广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共产党人雷经天为主席、韦拔群为副主席的广西农民协会，宣布实行"二五"减租，同时恢复了工会、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农代会期间，俞作柏接见了韦拔群，并商定以"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装备东兰农军一个营。韦拔群连夜写信调农军三百多人到南宁领了三百多支步枪，两万发子弹，编成三个连，在南宁进行短期训练。不久开回东兰。俞作豫趁热打铁，征得俞作柏的同意，拨出枪支弹药武装南宁郊区和左江地区的农军。由此，左右江地区农民武装声势大振，为后来建立武装斗争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俞作柏、李明瑞都是军人出身，懂得抓武装的重要。中共为了掌握武装，训练基层军事干部，通过俞作豫建议创办军校并组建两个警备大队，俞作柏、李明瑞欣然同意，立即任命共产党人张云逸为南宁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为李明瑞兼），俞作豫为南宁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红八军老干部吴西回忆说："党在俞作柏、李明瑞部队中能够掌握部分领导权，主要是通过俞作豫的关系。"张云逸回忆说："我们到南宁后，经过党的活动，并通过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并且活动由我去负责。李明瑞果然答应了。"俞作豫和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部队和教导队领导之后，按照中共的指示，在部队中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士兵委员会，一个月时间，仅在教导总队便从倾向革命的进步官兵中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从而使部队的各级领导权逐步掌握在中共手里。

## 六

在中共的帮助和支持下，俞作柏、李明瑞执政广西三个月，广西政貌大有改观。反动派惊呼："俞作柏、李明瑞来捣乱，左右江的赤焰滔天，原住东兰的共匪死灰复燃。"这时，蒋介石也派出一批特务极尽造谣之能事，对俞作豫、李明瑞进行恐吓，并且断绝了"中央"直接供给广西的军饷。在这种情况下，俞作柏、李明瑞于九月底公开举兵

反蒋。宣布由俞作柏任南路讨蒋军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兼第一路指挥。同时发出"反对独裁，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贯彻三大政策"的通电。中共中央认为俞作柏、李明瑞这次反蒋军事行动是冒险的，必将招致失败。但俞作柏、李明瑞决心已定，中共虽从多方做工作未能说服俞作柏、李明瑞，不得不采取应变措施：为了保存中共在广西的实力，借口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刚刚建立，不能上前线作战和维护后方治安为由，通过俞作豫向俞作柏、李明瑞建议把这三支部队留守南宁。俞作柏、李明瑞明智地采纳了中共的建议，并任命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这样，中共便顺利地接管了南宁军械库。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广西前委决定把留守南宁的三支队伍开进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征得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后，便从第四、第五大队各派出一个营分赴左右江地区，把辎重物资先行运走，在中共地方组织的支持与配合下，作好了进军左右江地区的准备工作。

俞作豫在南宁三个月时间里，担负着中共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和联络工作。他深感责任的重大，不遗余力地日夜奔波，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朝气。他们兄弟之间早已分家，他除了分得的两间房子外(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什么产业也没有，就连他自己的薪俸也慷慨地赞助革命了。这期间，他的父亲不幸在家病逝。但他为了紧迫的革命工作而未能奔丧。这都表现了他

对中国共产党坚贞不渝的忠诚。

## 七

一九二九年十月，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在中共广西前委的及时决策下，邓小平和张云逸率南宁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开往右江；俞作豫率领南宁警备第五大队开往左江，并负责护送俞作柏、李明瑞到左江，为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作准备。

龙州起义是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举行的。龙州是我国南疆重镇，地处中越边境。早在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之后，曾列为法帝国主义的通商口岸。是法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一个重要桥头堡。在那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地主民团武装，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扰民作乱的土匪，数量大，分布广，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支持下，与中共为敌。而且，从当时整个广西的战略考虑，前委把主要领导力量放在右江，重点在右江的百色地区，随俞作豫到龙州的党员干部不多，党的领导力量比较弱，同时左江的群众基础也比较差，刚恢复起来的农民运动时间不长，范围不广，基础不牢。俞作豫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接受党交给的重任，独当一面，缜密地筹划着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俞作豫率领第五大队一千多人到龙州后，遵照中共广西前委的指示，立即采取果断措施：首先，宣布接管龙州

督办，以行政长官的合法身份，控制龙州的边防大权和地方各级行政权力，同时控制了筹集革命活动经费的税收权。原红八军纵队参谋长袁振武回忆说:“龙州起义，正是俞作豫同志利用其督办的地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高举革命红旗，继我党在右江百色起义之后，在左江龙州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次重大的革命行动。”第二，扩大武装力量，收缴了国民党军吕焕炎师驻防龙州的教导队四百多人的武器，控制了弹药仓库，收编、改编了边防、地方的反动武装，将警备第五大队扩充为六个营共二千多人，编为旅的建制，辖两个团，俞作豫担任旅长。第三，对当地大大小小的股匪，剿抚兼施，把他们改编为三支游击部队，作为地方武装，并抽调南宁郊区的农军加以充实，还派一批政工人员做思想工作，对这些部队进行革命改造。第四，武装群众，把收缴的几百支枪和弹药全部拨给共产党人何建南领导的下冻区农民自卫军。第五，处决了一些恶贯满盈的反动土司，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使长期陷于混乱的龙州趋于稳定。

在准备举行龙州起义的过程中，俞作豫十分重视争取表兄李明瑞参加革命。李明瑞是北伐名将，骁勇善战，在军界中有较高的声誉，争取了他就将影响一大批人。中共广西前委认为，李明瑞受过民主革命的熏陶，有强烈的爱国心，同中共有过合作关系，此次讨蒋失败来到龙州后，

虽然俞作柏去了香港，他却留了下来，协助俞作豫收编队伍，因而争取他参加革命是完全可能的。俞作豫受前委的委托与李明瑞促膝谈心，帮助他认清形势，使他从失败和挫折中吸取教训，进一步领悟到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俞作豫还开诚布公地把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介绍给他阅读。此时，蒋介石生怕李明瑞参加共产党，派其心腹唐海安带了六十万巨额支票和十五军军长、广西省主席的委任状到龙州游说李明瑞通电就职。李明瑞一派爱国军人正气，严词斥责了说客唐海安，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收买和拉拢。中共广西前委对李明瑞的进步十分关注，不久趁李明瑞前往百色联络之机，邓小平、张云逸代表前委动员李明瑞参加红军，并真诚地向他表示，待左右江建立红军之后，请他担任总指挥。在中共正确政策的感召下，李明瑞毅然投身革命，决心跟共产党走。南宁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多系李明瑞的旧部，当他参加革命的消息一传开，都纷纷说:“特派员革命了，我们也要革命。”后来发生了警备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叛乱，李明瑞旗帜鲜明地反对蒙志仁的叛乱，并与俞作豫一起指挥部队，坚定果断地平息了这场叛乱。中共广西前委根据李明瑞的表现和要求，批准他的入党申请，使这位同中共患难与共的爱国将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中共广西前委领导人邓小平部署百色起义就绪后，即带领何世昌、严敏、袁振武等从百

色到达龙州，与俞作豫、李明瑞等一起研究部署龙州起义。遵照邓小平的意见，俞作豫与李明瑞、何世昌、严敏、袁振武、宛旦平、何建南等一起，根据右江改造警备第四大队的经验，吸取蒙志仁叛乱的教训，把对部队的改造放在重要地位。他们首先抓了纯洁队伍的工作。俞作豫所辖警备旅第一团团长何凤川，一贯贪污腐化，不服从领导，打骂士兵，克扣士兵粮饷，屡教不改，俞作豫抓住这个典型，向士兵进行民主主义教育，宣布官兵平等、不允许任何人虐待和侮辱士兵的纪律，以启发士兵觉悟。在广大士兵的一致要求下，俞作豫和李明瑞解除了何凤川等反动军官的职务，礼送出境，消除了龙州起义前的一大隐患，使第一团成为龙州起义的主力。

俞作豫在处理何凤川等人之后，大力加强中共对部队的控制和领导，他尤其重视对军事骨干的改造和积极培养新的军事骨干，把团的各级领导都安排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担任。根据当时共产党员少的具体情况，在部队中秘密地开展建党活动，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发展了党的组织，在每个战斗营都建立起中共基层支部，每个连队还建立起士兵委员会等组织。在建党整军的同时，俞作豫抓紧时间，主办了军事政治学校，亲自兼任校长，为部队培养了军政干部百多人。

龙州起义前夕。俞作豫领导部队开展了思想教育运动，俞作豫和李明瑞、何世昌等领导同志亲自讲课，对广

大官兵进行革命任务和革命前途的教育。在一次讲课中俞作豫对官兵们说:“我们要革命了，我们的革命就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官僚军阀，要分田地，要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房住、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他还向官兵们指出:“革命不是很容易的，反革命的力量还很大，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他们要和我们拚个死活，我们要准备流血牺牲，要准备作长期的艰苦奋斗。我们干革命，不要怕牺牲，不要怕艰苦。”李明瑞以自己抛弃高官厚禄决心投身革命的事实，现身说法，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决心跟共产党干革命。此外，他们还整顿了宣传出版机构，占领了宣传文化阵地，把原来的《群众报》改为《工农日报》，创办了《左江红旗》(三日刊)，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宣传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提高了广大官兵的革命积极性，激发了革命热情。在抓好军队工作的同时，俞作豫还十分重视抓好地方工作，在严敏、何建南、麦锦汉等同志的一致努力下，通过加强地方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发动了群众，筹建了地方革命政权，整顿、恢复和发展了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

在中共广西前委的领导下，较顺利地完成了龙州起义的准备。继百色起义胜利之后，于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在俞作豫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举行了龙州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地区革命委员会，颁布

了《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宣布了李明瑞任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任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政委兼八军政委，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兼左江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任，何世昌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此时，李明瑞根据前委的指示，率随员和卫士队到右江成立总指挥部去了。）在庆祝龙州武装起义胜利的大会上，俞作豫带领红八军全体官兵撕下军帽上的国民党党徽，面向红旗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惜任何牺牲，坚决革命到底。”龙州起义与百色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广西的敌人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广西各族人民。

龙州起义，不仅具有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特点，而且具有鲜明的反帝特点，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龙州起义在红八军《实施政纲》中明确宣布:“扩大反帝运动，用群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撤销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俞作豫等领导左江各族人民实践了这一政纲。龙州起义后，在龙州城内召开了群众大会，无情地揭露和控诉了法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发动群众没收了法帝国主义在龙州非法掠夺的财物，收缴了土豪劣绅藏在法国领事馆的金银财宝（仅光洋一项就达十五万元)，火烧了法帝国主义窃踞的海关楼，驱逐了作恶多端的法领事嘉德夫妇及“传教士”出境。枪毙了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大土豪谢秋和“清党”委员欧文俊、闵玉

达等。对此，法帝国主义恨之入骨，发出"照会"诬蔑说："现今龙州的地方全陷匪掌握中，专事种种出轨行为，加以实行公产，公然于城市散布激烈传单，鼓动民众作过激行为。"照会还威胁说："敝领事唯有立请越南政府派遣指定之武装卫队来署卫护。"跟着又派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蓄意进行武装挑衅。俞作豫等共产党人领导左江人民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号召全国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不要徘徊观望"，"赶快团结起来，为解除我们的痛苦和争中国的权利，必须准备同一切反动派奋斗"，"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与此同时，俞作豫命令红八军对侵犯中国领空的法国空中强盗给予迎头痛击，将一架侵入凭祥上空的法国飞机击毁，给了法帝国主义以应有的惩罚。

## 八

龙州起义后创建的红八军，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帮助地方建设，把大队人马开赴左江各县剿匪，打土豪，恢复和建立革命政权，准备开展土地革命。俞作豫亲自率领一个营和军校学员到下冻，发动群众镇压了匪首黄飞虎的叛乱，恢复下冻因叛乱而被破坏了的革命政权。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去中共中央汇报后由上海回到龙州。邓小平分

析了左江形势，估计敌人决不甘心失败，必然会进行疯狂反扑，而红八军人数少，群众基础尚不巩固，因此他指示红八军在必要时向红七军靠拢。俞作豫积极执行邓小平的指示，进行兵力收缩，准备向红七军靠拢，并立即派出主力第一纵队去打靖西，以便打通前往右江的要道，同时负责护送邓小平去右江。正当第一纵队攻打靖西的时候，桂系军阀梁朝玑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大举进犯龙州。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时刻，俞作豫率留守龙州的红军战士（二纵一营）与敌人浴血奋战，大量杀伤了敌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俞作豫率一营主动退出龙州，与驻凭祥的二纵二营会合，再向十万大山转移。一路上敌人尾追不舍，屡遭袭击，到钦州（大寺）时，部队只剩下五六百人。这时，部队士气低落，在大寺召开了军事会议，俞作豫责令刘桂廷率二纵队一营留驻十万大山待命，并对今后的军事行动作了部署。第二天俞作豫率领卫队三十余人向红七军靠拢，前往右江。可是，刚到邕宁的马村，又遭敌人的包围和袭击，军政治部主任何世昌不幸被捕，壮烈牺牲，俞作豫幸得当地农军抢救脱险。此时，俞作豫了解到敌人大部队已开往左右江一带，留守南宁的驻军很少，他便与农军领导人莫俊峰等人商量，决定调回刘桂廷部配合当地农军袭击南宁，以牵制敌人向左右江的袭击行动，破坏敌人的“围剿”计划。恰在这时，农军与邕宁的反动县警打了一场遭遇战，引起南宁守军的注意，把邕

江南岸的船只强行北靠，致使红军部队没法渡河作战，攻打南宁的计划只好作罢。面临这样复杂的情况，俞作豫为了取得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派莫俊峰到香港联系，但没有回音。八月间，俞作豫亲自赴香港找上级党组织。在此期间，红八军第一纵队因与军部失去联络，转战桂、黔、滇边境，历时半年之久，终与红七军会师，并归红七军建制。

俞作豫到香港后，因误与叛徒接头，不幸在深圳遭敌特诱捕，被押至广州。在狱中，敌人对俞作豫威逼利诱，百般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始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农历七月十四日），年仅二十九岁的俞作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广州红花岗。就义前他挥笔写下了“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豪迈诗句。在刑场上，俞作豫神色自若，视死如归，昂首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革命成功万岁！”壮烈就义。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俞作豫作了很高的评价。聂帅说：“俞作豫同志一九三〇年被捕牺牲。在香港时，我与他曾有接触，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对广西工作的开展和左、右江起义是有重要贡献的。”

（蔡 有 芳）



饶　守　坤



# 饶守坤

## 一

饶守坤（1915—　　），江西省德兴县人，一九一五年九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全家四口人，靠父亲饶世林给地主当长工、母亲李桂莲给地主当佣人维持生活，常年过着不得温饱的日子。饶守坤九岁就给地主放牛，经常挨打受骂，从小就体会到贫富的差别和人间的不平。

一九三〇年，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农民革命运动的浪潮，波及到德兴县，饶守坤的家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时年十五岁的饶守坤就在党的秘密工作者的教育启发下，逐步懂得了什么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等革命道理。一九三一年，红军打到了德兴县，饶守坤的家乡解放了，父亲参加了农民协会，他也参加了儿童团，并于同年二月由蒋结标、饶守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和宣传革命的活动。一九三一年八月，他被选送到赣东北省委

在江西葛源举办的学兵队学习，踏上了革命征途。

一九三二年二月，饶守坤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德兴县独立营一连当战士。他参军的第二天，就参加了打击国民党保安队的战斗。同年八月，德兴县独立营编入红十军五十六团一营，他在该营一连当班长，参加了贵溪县上岗岭等战斗。同年十二月他任排长。一九三三年六月，饶守坤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七月他升任连长。他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作战勇敢，冲锋在前，特别是在一九三三年秋季的江西浒湾战斗中，他担任尖刀连连长，带领尖刀连猛打猛冲，后又奉命坚守阵地一天一夜，连续打退敌一个营兵力的三次反扑，仅以伤亡三十余人的代价，歼敌一百余人。随后在攻打建宁县城的战斗中，敌人依托城堡顽抗，红军攻城部队没有火炮等重武器，饶守坤便带领战士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底下，用棺材装上炸药，把城墙炸开一个缺口。接着他又带领部队首先冲进城去。由于敌人居高临下，集中兵力反击，红军部队几次攻坚均未奏效。后来上级命令采用撑竹杆爬城墙的办法登城，饶守坤奋勇当先第一个登上城墙，被敌人推下来之后，他又连续爬上两次，虽然也都被敌人推下来，他不顾腰部摔伤，顽强地坚持到战斗结束。此后，他还参加了金溪、黎川、黄陂等战斗。在历次战斗中，他都身先士卒，机智果断，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

一九三四年九月，饶守坤被任命为红十军五十六团一

营营长。同年十月，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长征。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红军部队，在项英、陈毅等组成的中央分局领导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饶守坤这个营也被留了下来。当时，红十军五十六团团长黄东良向饶守坤和教导员孙斌当面交代：留下你们营的任务，是与其它被留下的红军部队一起，保卫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拖住敌人，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黄团长还明确指出：留下的红军部队是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斗争，要尽快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接受领导。但是，主力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形势急转直下，项英、陈毅等领导人也转移到粤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因此，饶守坤带领的这个营，未能与上级联系上。他们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在江西资溪、贵溪、牛田和福建的邵武、建阳一带，坚持敌后斗争。当时，这支孤立无援的小部队，在敌人疯狂“围剿”下既得不到上级领导的指示，又没有兄弟部队的配合，较长时间隐蔽活动在深山老林里，风餐露宿，伤员、病号逐日增多，粮食、弹药都无来源，面临着死亡与瓦解的严重威胁。面对这种恶劣形势，饶守坤沉着机智地处置了各种复杂问题。他一方面团结全营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树立坚定的胜利信心，在斗争中求生存；一方面率部与敌人周旋，趋利避害，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在斗争中求胜利。同

时，他还不断派人四处寻找党的组织。十二月中旬，他们终于和中共闽北分区委取得了联系。根据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的指示，饶守坤将所部带到福建崇安县大安街，归闽北独立师直接指挥，被派驻在江西和福建交界处的分水关，负责保卫大安街的安全。大安街是闽北分区委和闽北军分区所在地。不久，国民党军刘和鼎部一个营由崇安县向大安街进犯。饶守坤奉命率部协同闽北独立师五十八团两个连，在大安街南面的路口阻击敌人。这次战斗在师长黄立贵亲自指挥下，同敌激战半天，把敌人击溃。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敌人又派重兵向大安街进攻。饶守坤率全营指战员参加了保卫大安街的战斗，在给予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同闽北红军部队一起主动撤出了大安街。同年二月，撤出大安街的闽北红军在长涧源进行了整编，重建闽北独立师，饶守坤所部被编入该师二团。团部直接指挥连队，中间没有设营，饶守坤担任六连连长。四月，闽北独立师攻打江西甘溪镇，六连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由于饶守坤指挥灵活，作战勇敢，任务完成得出色，歼敌数十名。甘溪报捷后，二团团长经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丧失立场，叛变投敌，饶守坤升任二团团长。

一九三五年入秋以后，形势更趋紧张，斗争更加艰苦。敌人纠集了四五个师的兵力，在地方保安团队配合下，开始对闽北红军和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清剿"。敌人采取三分军事、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和烧杀抢劫等毒辣手

段，妄图把闽北红军消灭在武夷山区。在这危急的形势下，中共闽北分区委研究确定，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保存有生力量和闽北根据地，调动和消灭敌人，命令饶守坤和王助率第二、三两个团（共五个连）到闽东北开辟新的游击区。饶守坤、王助带七百余人，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向闽东北的建（阳）、松（溪）、政（和）地区挺进。他们在开进途中，连遭敌正规军和反动民团、刀会、土匪的阻截和追击，一个月内打了大小几十仗，迂回行军七八百里，才到达目的地。到达新区后，成立了闽东北军分区，饶守坤为司令员，王助为政治委员。初到新区，群众因长期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一见红军就躲开，部队行军找不到向导，宿营找不到住处，吃饭筹不到粮米，伤病员无处安置，还时常遭到地主武装和反动会道门的偷袭。在此艰苦的条件下，部队内部有少数同志对开辟新区产生了动摇，也有的主张打回根据地去。饶守坤针对部队的思想状况，号召大家要团结在党组织周围，要求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他耐心地对大家说：党和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开辟新区，我们不仅要在这里站住脚，而且通过开展游击战争，把敌人拖住，支援闽北根据地的斗争。为使部队能在新区站稳脚跟，他又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集中以应付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的原则，白天把部队集中起来迎击来犯之敌，夜间把部队分散开来做群众工

作。他亲自带领一个便衣侦察班，到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乌地村，挨家逐户地向群众宣传红军是为穷苦人打仗的道理，解释共产党的为民政策。群众听了他的宣传都说："早知道你们是这样的队伍，我们就不跑了。"随后群众便自动把村里跑出去的人找回来。这样，该地区的群众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影响扩大了，部队有了依靠，吃住和伤员安置有了着落，使部队有了耳目，取得了行动的主动权。

当部队在新区站稳了脚跟之后，饶守坤又与政委王助一起，领导部队开展对敌斗争。他们通过调查闽东北地区的敌情和社情，发现当地会道门组织"大刀会"与国民党正规军和地主武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大刀会"受国民党顽固派的煽动，以红军为敌，经常向红军进行袭扰。为了削弱敌人营垒的力量，决定争取"大刀会"，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大刀会"首领林熙明，曾与黄立贵喝过鸡血酒，结过盟。但他依仗拥有一万多会徒，后来又常与红军为敌。饶守坤与王助研究确定，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段，促使"大刀会"与红军再次谈判。一次，"大刀会"来犯，饶守坤指挥部队在乌地北山设伏，活捉其会徒一百余名。饶守坤利用这批俘虏作"人质"，亲自带上一个连，找会首林熙明谈判。当他抵达"大刀会"的"圣地"时，村前村后都布满了人，会众们手执大刀，身穿法衣，簇拥着林熙明走上前来，呈现出一派杀

气腾腾的紧张气氛。饶守坤临危不惧，坦然地向林熙明宣传了全国的革命形势，阐明了红军的政策和结盟的好处，并开导林熙明说:“一切坏根子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说别的，单是纳税、抽丁这一项，就害苦了穷人。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免除人民的负担，对你的徒弟们也有好处。”他进一步说:“你身为一教之长，不能眼看徒弟们妻离子散、吃苦受气不管呀!”林熙明连忙答话说:“管，管!你说该怎么办?”饶守坤向他指出:“我们联合起来，背靠背地和国民党反动派干!”林熙明当即表示:“一言为定，背靠背地干!”谈判成功了，部队和“大刀会”结成了联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国民党福建保安团一个营由政和出发，向“大刀会”驻地前宝岱和后宝岱进犯，妄图消灭“大刀会”和闽东北的红军。饶守坤得到情报后，和林熙明商定，由红军在正面迎击敌人，诱敌深入，“大刀会”隐蔽在大路两侧山上打伏击。这一仗，由于配合密切，毙敌几百人，缴枪上百支，鼓舞了军民的斗争信心。在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基础上，饶守坤和王助又把部队分散到各地去，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开辟了以浦城和松溪交界处的九仙山为中心，以政和前、后宝岱为中心，以建瓯的乌地为中心和以迪口为中心的四块新游击区。红军部队也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壮大了，由原来的七百多人扩大到一千余人。闽东北新游击区的开辟，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减轻了闽北根据地中心

地带的压力。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虽然国共谈判成功，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南方各游击区，却进入了更加艰苦的斗争岁月。十二月下旬，蒋介石背信弃义，调动了国民党军七十五师、十二师、刘和鼎的两个旅及几个县的保安团，上万人的兵力拥进闽东北游击区，使形势急趋恶化。开始，饶守坤为了改变被动局面，连续组织了几次战斗，袭扰敌人，迫敌站不稳脚。一次，他亲自带了五六十人，在乌地以南山区，对敌人的一个连实施伏击，消灭一个排，其余也被打散，缴枪十余支。又一次，他获悉敌人的一支运输队要从古田到迪口去，便带领两个连在中途设伏，打垮了敌人的运输队，缴获了一批粮食和弹药。这种斗争方式虽也能挫伤敌人，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却改变不了被动的斗争局面。到一九三七年一、二月份，敌人更加紧了对游击区的"清剿"，叫嚣要把红军"困死、饿死、杀净"。闽东北的红军开始了更艰苦的斗争阶段。部队的生活供应完全断绝了来源，吃穿极度困难，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等充饥，有时猎获到野猪、野羊，算是改善生活了。大家穿的是破旧的单衣和短裤，后来只能穿草编的蓑衣。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为保存革命力量，饶守坤提出了"藏、走、打"的三字策略。所谓藏就是钻深山，叫敌人找不到；走就是经常转移驻地，叫敌人摸不着；打，就是尽量避免和敌人的正规军接触，不得已时才打。饶守坤

还经常鼓励大家要同舟共济，团结互助，克服困难，战胜饥饿，增强信心，咬紧牙关，等待时机，迎接胜利的到来。他非常关心战士们的疾苦，经常同政委王助带着煮熟的野菜和兽肉，到安藏伤病员的山洞里探望，掩埋牺牲的烈士，领回病愈的同志。他们还经常在夜间深入农村，告诉群众“红军还在，游击队还在”，鼓励群众坚持斗争。为了能早日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饶守坤把干部们召集起来，研究找省委的办法。大家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红军家属的心是向着共产党的，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与上级组织保持联系。于是，饶守坤决定派人到崇安等老区，从找红属入手，再找省委。通过这个办法，终于知道省委在建阳和光泽交界处的猪母岗一带山区坚持斗争。饶守坤遂带领一个连八十多人，从建瓯的迪口出发，经南平、顺昌、邵武，一路翻山越岭，昼宿夜行，连续战斗，倍尝艰辛，终于在九月间找到了省委。岁末，根据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新形势，饶守坤奉省委书记黄道的指示，把从艰难中保存下来的几百名红军战士带到江西铅山县的石塘街，准备北上抗日。

## 二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奉军部命令，闽北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任团长，曾昭明任政委。五团在

石塘街整编后，于同年二月，由饶守坤等率领，告别了闽赣根据地，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一九三八年三月，饶守坤被调到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八月，他回新四军军部任教导总队二大队大队长。

一九四〇年三月，饶守坤任新四军五支队八团副团长。八月二日，八团奉命从安徽天长县渡三河，向苏中开进，开辟淮宝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八月五日，部队刚刚到达三河北岸的新集，国民党顽固派秦庆霖，乘八团立足未稳，煽动当地“小刀会”一万余人，在反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突然向八团发动进攻，妄图把八团赶回淮南去。当时，淮宝地区的“小刀会”遍布所有村镇。他们被反动派欺骗和利用，以新四军为敌，加之迷信“刀枪不入”，盲目冲阵。这天，当八团的队伍路过时，埋伏在大路两旁的“小刀会”和地主武装，从高粱地里窜出来，蜂拥而上。在此危急情况下，饶守坤当机立断，带领一个警卫连和一个机枪连，抢占了新集街上的一个土围子。经过喊话宣传和武力打击，“小刀会”四处逃命，大部分被瓦解，剩下的会首和土顽也被打垮。八月六日，八团与八路军南下的六八七团，在洪泽湖东南岸的蒋坝地区并肩作战，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秦庆霖旅。随后于八月八日至十日，八团又多次击溃了打着“防匪保家”旗号的“小刀会”的连续进犯。八月十六日，饶守坤率领八团，在洪泽湖以东的万集、仁和集一带，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

主力三十三师两个团。从而迫使顽固派退出淮宝，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同年九月八日，日军出动“扫荡”淮南地区，新四军军部受到威胁，饶守坤奉命率八团赶赴淮南保卫军部。九日拂晓，八团乘坐的木船队行至蒋坝附近，与从高邮湖开出的十五艘日军炮艇相遇，日艇以密集火力阻击八团渡河，八团奋勇还击，边打边渡，终于到达淮南，保卫了新四军军部的安全。

一九四〇年九月，饶守坤升任五支队十五团团长。他指挥十五团指战员，与日、伪军作战多次。一九四一年春，在江苏六合县金牛山战斗中，饶守坤率十五团配合十二团作战，经过激烈拼杀，毙、伤日、伪军五百余名。同年五月，十五团奉命西进。饶守坤率部队从高良涧出发，渡洪泽湖，一路行军、剿匪，六月间开至半城以西郑家集一带，担负了开辟泗五灵凤地区的光荣任务。泗五灵凤地区，是当时淮北抗日根据地的“西大门”之一。它北靠日、伪重镇灵璧县城，西接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南傍水上要道淮河，东联苏皖的洪泽湖，在地理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担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曾指示一定要开辟出这一地区。但是，该地区气候恶劣，地形条件复杂，日、伪、顽、匪和反动会道门组织活动猖獗，加上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开辟根据地的任务面临着许多困难。饶守坤同政委朱云谦及地方党政机关一起，根据敌情和地形特点，研究制定了部署，并成功地运用长途奔袭的

作战方法，率部队转战于淮（河）、浍（河）、沱（河）之间，大量地消灭了敌人。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他还注意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做宣传发动群众和建立抗日政权的工作。他在皇墩庙园宅集一带，多次召开了群众大会和乡、保会议，并组织人教歌、演戏，揭露日、伪、顽、匪的罪恶，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还帮助地方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组织了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他率领十五团，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基本上开辟出了这块新的抗日根据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得到了解放，并建立了抗日政权。这一新区的开辟，对当时整个淮北地区的抗日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九四二年秋，饶守坤被调到新四军苏北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一九四二年底，饶守坤任新四军二师五旅十三团团长。时值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年月，日军向解放区进行频繁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经常向根据地发动进攻，新四军部队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地，随时都要准备对付来犯的敌人。一九四三年三月中旬，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亲自出马，率八十九军、保安三纵队、独立六旅等部队，由苏北渡过运河，进犯淮北根据地金锁镇山子头一带，企图消灭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建立新的反动基地。饶守坤奉命率领十三团，从汉涧镇出发，冒雨行军，昼夜兼程，提前到达淮北山子头附近的王圩；十三团在十四团四个连队

的配合下，经过激战，全歼了韩顽的独立旅旅部及其直属队，共三百余人，击毙该旅旅长李仲寰，缴获了大批武器。同年五月，十三团奉命开赴津浦路西，开展反桂顽斗争。六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桂系李品仙的一个团，从马场出动，进攻定远县占鸡岗。十三团和十四团提前埋伏在占鸡岗东西两侧，当桂顽进入伏击圈时，两个团同时迅猛出击，断其退路，歼灭了先头营，打死打伤顽军三百多人。

一九四三年八月中旬，驻南京日军出动五百多人，与六合县伪军三百多人纠合一起，在日军大队长小田的指挥下，企图到根据地"扫荡"、抢粮。饶守坤奉命率十三团由天长县赶赴六合县，执行反"扫荡"、保卫秋收的任务。八月十七日，他获悉敌已出六合县城，经八百桥正向东北方向的桂子山一带进发，当即率部队分两路跑步前进，围歼该敌。战斗中，饶守坤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指挥部队向前冲击。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敌顽先后发起了多次冲锋，几次施放毒气阻十三团前进。十三团指战员猛打猛冲，最后许多连队的子弹打光了，战士们端着刺刀，挥舞大刀，冲上山头与敌人展开肉搏，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死伤三百多人。日军撤回据点后，第二天召开了所谓"雪耻会"，指挥官小田不得不承认"皇军"在桂子山伤亡惨重，是一个奇耻大辱。这一仗，尽管十三团伤亡很大，但打败了日军，鼓舞了部队和广大人民，发展了淮南的抗日斗争

形势。

一九四四年四月，饶守坤调任淮南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一九四五年八月，又调任新四军苏中独立旅副旅长，同年九月升任该旅旅长。

##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的新形势，新四军各部队进行了整编。一九四六年三月，饶守坤所在的新四军苏中独立旅，与华中六纵队合编，组成华中野战军第六师，饶守坤任该师十八旅旅长。整编后，他根据上级统一部署，领导部队开展“百日大练兵”活动，提高了指战员的军事素质，为完成艰巨的作战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调集十二万兵力，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华中野战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奋起抗击，举行了著名的苏中战役。此战役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歼敌五万余人。饶守坤与政委刘文学，率领十八旅参加了苏中战役的全过程，先后作战六次，除配合兄弟部队歼敌外，该旅共歼敌六千八百余人（内俘敌三千三百余人）。其中打泰兴，是苏中战役的首战，守敌是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三师十九旅五十七团。这个团是经美国教官训练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系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且有坚固城堡做依

托。新四军十八旅改编不久，装备较差。为了保证首战告捷，饶守坤教育部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要求各级指挥员靠前一级指挥。他亲自到一线阵地观察地形，了解敌情，与主力团指挥员研究攻城的办法。七月十四日黄昏，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发起总攻，战至午夜，攻破泰兴城，歼敌两个营，俘敌六百五十多人。首战获胜，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坚定了"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心。十八旅受到师首长的嘉奖，华中野战军粟裕司令员也给饶守坤打电话表示祝贺。之后，饶守坤又率领十八旅参加了如南战斗中的杨花桥攻坚战和李堡战斗的洋蛮河伏击战。特别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的六天中，他率领十八旅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行程一百五十公里，接连参加了林梓、分界、加力三次战斗，同兄弟部队一起，共歼敌两个半旅、两个交通警察大队和一个保安团。毛泽东主席曾把这三次战斗作为战例阐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思想。经过苏中战役的锻炼，十八旅的战斗力增强了。

同年九月中旬，华中野战军主力奉命北上，敌人乘机集中了三十一个旅二十七万余人，向苏北解放区进犯。为掩护华中野战军领导机关战略转移，饶守坤和政委张闯初奉命率十八旅急速赶赴涟水，配合五旅和十纵阻击敌人。二十二日，敌七十四师先头两个团沿黄河故道由西向东进攻，占领了涟水城南门上河堤，并有约一个营的兵力突入

城内。十八旅于二十三日晨赶至涟水后，饶守坤立即和五旅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取得联系，共同商定了协同作战方案。黄昏时分，饶守坤指挥各团以隐蔽的行动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夜激战，十八旅和五旅一起把入城的敌人全部赶出城外，并将敌先头团全部赶下河堤，给号称国民党“王牌”、“御林军”的七十四师以沉重打击，保卫了涟水城。

第一次涟水战役结束后，敌人误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仍在涟水附近，于是，桂系第七军军长赵敦义即以两个团的兵力由王里庄、汤集出发，企图占领沭阳，打通淮沭公路。这时，十八旅奉命歼灭曹家花园守敌桂系一个主力团。面对这个装备优良的主力团，饶守坤灵活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针对曹家花园外围地形平坦、不便于集中主力围歼的实际情况，果断地集中八个炮兵连的火力，采取步炮协同、小群出击的战法，经七个小时激战，取得全歼桂系第七军一个团一千八百余人的胜利。

十二月初，蒋介石指使其“王牌”七十四师再度进犯涟水。华中野战军决定由六师守卫涟水。具体部署是：十六旅和十纵的一部分守城；十七旅和十八旅在黄河以南钦工、谢家荡、王家口一线阻击敌人。为了便于协同，有利于战斗，师领导决定，十七旅暂归十八旅指挥。战斗从四日起打响。饶守坤指挥部队采取梯次配备，用一个团和敌人交手，打到一定程度再换一个团上去。用这种“车轮战

法"，节节抗击敌人，挫其锐气，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十八旅和敌人浴血奋战，坚持十天之久，为守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后因敌七十四师从侧翼偷袭奏效，华中野战军的部队放弃涟水城。两次涟水保卫战，打破了国民党的军事计划，掩护了华中军区机关和后方部队的转移，使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华中野战军主力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同时，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戳穿了敌七十四师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尔后在山东大量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七年一月，华中野战军第六师十八旅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饶守坤任师长。蒋介石集中十六个整编师的兵力向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十八师奉命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在新泰、莱芜地区聚歼国民党济南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集团的战斗。饶守坤率十八师，冒着严寒，昼夜兼程，向莱芜疾进。一路上，他不断激励干部战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北上歼敌的任务。二月二十日，部队到达莱芜地区，随即配合十六师攻歼口镇之敌，经两昼夜激战，完成扫清外围和突破敌防御的任务。二十二日下午，获悉李仙洲集团企图由莱芜向北突围，饶守坤根据上级命令率部迅速抢占口镇以南有利地形，阻敌北窜，协同友邻部队歼敌于运动之中。这次堵歼战斗是全歼莱芜突围之敌的关键。饶守坤和政委张闯初商定，以少量兵力担负正面堵击，将主力布成袋形阵

地，以主动出击的手段，完成堵歼任务。二十三日凌晨，莱芜地区之敌分三路沿公路两侧向北突围。敌四十六军先头部队进到张家洼，饶守坤指挥十八师五十三、五十四团，以密集火力阻击，敌多次突围均未得逞，伤亡惨重。不到一小时，敌五万余人全部被包围在长五公里、宽三公里的堵歼地区。处于绝境中的敌人，以百倍的疯狂向公路东侧十八师五十三团阵地发动猛烈进攻，并有一个营的敌人迂回到五十三团侧后，使该团腹背受敌，伤亡较大，请求退守。饶守坤命令五十三团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固守阵地，同时命令担负预备队的五十二团全团出击，务将五十三团背后一营敌人全部歼灭。饶守坤不顾个人安危，亲临五十三团阵地指挥。在十八师的坚决堵击下，被围之敌未能前进一步。这时，友邻四个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由南向北，猛烈追击，使敌指挥瘫痪，溃不成军。饶守坤抓住战机，指挥全师以营为单位，由北、东、西三面同时出击，与华东野战军其它兄弟部队一起，猛插敌阵，边打边割，战至十七时，李仙洲集团五万余人全部被歼。此役十八师俘敌一万九千余人，受到上级的表扬。

同年五月，饶守坤奉命率十八师北上，参加围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十五日三时，十八师行进间奇袭垛庄，歼敌一个连，占领垛庄，关上后门，封闭了战役缺口，对敌七十四师完成了战役合围。天亮后，十八师迅速投入总攻孟良崮的战斗。饶守坤身先士卒，带领

部队从敌侧背发起攻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攻击的友邻部队。战至十六日黄昏，号称国民党“王牌军”的七十四师被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此役十八师歼敌三千余人，其中生俘二千多人。

同年九月，十八师随纵队南渡黄河，参加沙土集战役，协同第三、第八纵队围歼沙土集之敌五十七师。饶守坤率十八师冒雨涉水向沙土集急进，一昼夜强行军一百三十华里，按时进入攻击位置，协同友邻部队向敌发起总攻。经七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九千五百余人，战后受到野战军总部嘉奖。九月下旬，十八师随华东野战军指挥所向豫皖苏蒋管区挺进，担负野战军指挥机关的警卫任务。十一月，饶守坤奉命指挥十八师转战三百里，连续作战十八天，顽强地阻击了敌新五军及七十五师北犯，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平汉路破击战的顺利完成。

一九四八年六月，饶守坤奉命率领十八师参加豫东战役。自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的五天时间内，十八师和十六师并肩作战，在定陶至兰封一百三十华里的纵深地域内进行艰苦的运动防御，阻击敌新五军的疯狂攻击，有力地支援了开封攻城部队。六月二十九日，十八师奉命配合中原野战军十一纵攻歼涧岗集守敌。是夜，饶守坤直接指挥五十二团连续爆破成功，首先突入敌阵，五十三团、五十四团也相继突破，激战至次日拂晓，全歼守敌一个旅部、两个团部和一个山炮营。七月一日，饶守坤率部参加总攻

龙王店战斗，部队以迅猛的动作连续爆破成功，突入敌阵，展开巷战，敌伤亡惨重，兵团司令区寿年、七十五师师长沈登年企图乘坦克突围，均被活捉。战至次日拂晓，全歼敌兵团部、七十五师师部及四十六团全部，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一九四八年八月，中央军委根据战局的发展，决定组建渡江先遣纵队，任命饶守坤为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七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拟执行先行渡江南下的任务。后因形势变化，先遣纵队未能先期渡江。同年十一月淮海战役开始，先遣纵队奉命参加淮海战役。饶守坤率第七支队顽强作战，接连攻克桐城、舒城，尔后又阻击安庆之敌北援，配合主力部队全歼了杜聿明集团。

一九四九年二月，饶守坤调任三十军副军长。三月初，三十军进抵棕阳镇、裕溪口地区，奉命参加渡江作战。四月八日，三十军以四个团兵力对西梁山、裕溪镇守敌发起进攻，控制了棕阳镇、裕溪口两点之外围阵地，逐个肃清敌江北桥头堡。四月二十日晚，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饶守坤于二十三日晚，率领八十八师攻占了芜湖。此时，军长谢振华奉命带八十八师留守芜湖，饶守坤同军政委李干辉率三十军主力向上海进发，参加解放上海战役。军长率八十八师与李干辉、饶守坤所带领的军主力部队会合后，一路猛攻猛打，接连攻克平湖、金山、奉贤、南汇和松江等敌据点。五月十五日，又一举攻占川

沙，十六日占领白龙港，全歼国民党第五十一军，生俘军长王秉钺。尔后三十军与三十一军并肩作战，十八日将国民党第十二军围困于高桥地区，二十五日攻占高桥，进而肃清浦东地区残敌。上海解放后，三十军进驻南汇，担负沿海防御，保卫上海的安全。

## 四

建国后，饶守坤奉中央军委命令，于一九五〇年三月由陆军调到海军工作，任华东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员。当时，华东海军组建不久，装备基本上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干部战士多数来自陆军，还有一部分是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面对海军建设的种种困难，他一方面刻苦学习海军知识，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一方面努力培养新的海军干部和技术人员，并按照党的政策积极团结教育和改造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经过艰苦努力，他较快地熟悉了海军情况，取得了领导工作的主动权。同年十月，饶守坤调任华东海军吴淞要塞区司令员。他全力抓舰艇部队建设和海防工程建设，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情况，亲随舰艇出海指挥，完成了海上训练、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和肃清海匪等任务。一九五二年七月，吴淞要塞区改称淞沪基地，他任淞沪基地司令员。

一九五三年二月，毛主席从武汉乘坐“长江”号军舰到南京视察工作。饶守坤随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赴南京，

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同年五月，中央军委抽调海军部分师以上干部组成赴朝实习团，饶守坤任实习团团长。他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赴朝后，一方面虚心向朝鲜人民军学习，一方面帮助朝鲜人民军组建海军部队，圆满完成了任务。一九五四年二月，他进政治学院高干文化班，以后又进海军第二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文化。一九五五年九月，饶守坤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入军事学院海军系高级速成班学习，并兼任该班班主任。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他被任命为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分管作战、国防工程建设和司令部工作。他经常带领机关干部跋山涉水，逐个海岛勘察地形，组织指挥海防施工，深入舰艇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善于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在战场建设、作战指挥、海防施工、军事训练以及反小股匪特袭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饶守坤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一九六七年五月，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停职反省，经常受到批斗。一九六八年九月，他被下放到洛阳柴油机厂劳动。一九六九年八月，又被下放到哈尔滨海军三所下属单位劳动。他在下放劳动期间，一直受人监视。当时篡夺海军领导权的李作鹏规定他不准抽好烟，不准吃细粮，不准和群众接触，失去人身自由。

一九七一年七月，饶守坤重新出来工作。同年九月，他担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领导并亲自组织研制海军舰艇装备。“九·一三”后，他积极参加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九七五年八月，他任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他到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舰队其他领导一起认真传达贯彻当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组织各级党委和干部认真学习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密切联系舰队实际，坚决贯彻落实“军队要整顿”的指示，认真解决部队的肿、散、骄、奢、惰等问题，抓紧领导班子的调配，整顿组织纪律，清除派性影响，积极开展教育训练。他亲自领导新建古镇口军港工程建设，组织进行新型舰艇的试验，扎扎实实地抓舰队的整顿和部队建设。一九七七年，饶守坤被选为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七八年，他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带头学习会议精神，组织部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一九八〇年一月，饶守坤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他和军区其他领导人一起继续积极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抓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带头拨乱反正，清理“左”的思想影响，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他深入实际，深入部队，多次带工作组到沿海、岛屿、边防、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他重视机关思想、作风、业务建设，建立健

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自己带头学习，还对部队宣讲，用《决议》精神统一部队的思想。一九八二年九月，饶守坤出席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十二月，他任济南军区党委书记。他同军区党委常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并针对当时精简整编、调整领导班子后面临的新情况，研究制定了"新班子怎样以新姿态带领部队开创新局面"的措施，从而加强了军区党委自身的建设和全区部队的建设。他认真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把党委一班人的思想统一到中央军委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上来，组织渤海方向战役勘察，研究渤海方向作战问题，并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组织本区陆海空三军进行演习准备工作，使部队得到了实际锻炼，有力地促进了本区的战备工作。他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关于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位置上的重要指示，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制定落实措施，并亲自下部队检查教育训练情况，推动了教育训练工作的开展，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一九八三年，他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发表后，他同军区党委"一班人"认真贯彻整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较好地完成了军区党委和军区机关的整党任务。他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并根据《决定》规定的改革方针政策，积极领导部队进行改革。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

年，他和军区党委其他成员一道，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和“把胜利油田建设成第二大庆”的号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两次派出上万名指战员支援胜利油田建设，在军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饶守坤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决定，带头愉快地服从退居二线的决定。同年九月，在中共第十二届四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蒋延庆　刘百昆　蒋荣芳）



钟 期 光



# 钟期光

## 一

钟期光（1909—　　），乳名钟昱明，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生于湖南省平江县。

钟期光的父亲钟开寿原是佃农，靠租种地主田地生活；母亲徐巽贞是农家妇女，终生俭朴勤劳。由于家境不好，钟期光的五个姐姐两个妹妹都是很小即出嫁了。随着家庭吃饭人口减少，父母又很勤劳，后来买了十二担谷的自耕田，加上父亲负责管理部分族产，到钟期光记事时已是自给有余的家境。父亲弟兄两个，伯父叫钟臧寿，是个中医，长于外科，医术高超，远近闻名，人称“臧神仙”。伯父没有儿子，将钟期光一半过继给他。按照封建宗族关系，钟期光家为一大房，他又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所以从小受到家长的宠爱。一九一三年春，钟期光刚四岁，父亲和伯父就送他去读书。除了伯父的资助和父亲种田的收入，母亲每年还喂养四头肥猪，两头卖掉给他做学费，两头留作家庭应酬。钟期光读了八年私塾，从《三字经》读

到《幼学琼林》，又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 等书都读完了。有位叫朱其昌的老师教他诗词歌赋，十分认真，非常严格，从用词达意到格式押韵，一丝不苟，还耐心帮他修改习作，使他终生难忘。钟期光十岁时做的一首《燕子歌》写道：

喜燕来时乐汝居，
忽闻门外一声叽。
呢喃恰恰山人意，
汝筑新巢我读书。

他还在《远眺》一首中写道：

学生课毕出门行，
忽听林中小鸟鸣。
旷野春耕农时急，
万物复苏喜天晴。

钟期光从小酷爱书法，虽然当时条件差，连毛边草纸都很难得，但他坚持不懈，学写书法家赵孟頫的字，甚有功夫。这为他后来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和军事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直到晚年，他始终坚持主要用毛笔写字。

一九二一年，钟期光十二岁考进了平江县天岳书院。在这里，他读完了三年高小，三年中学，在经受古典教育的基础上，又系统地接受了中国早期的现代中等教育，直

到一九二六年他十七岁时中学毕业。这期间，他认真学习，勤于思考，奋发向上，不仅完成了中小学的全部课业，而且天岳书院成了他后来从事职业革命工作的摇篮。

一九二〇年前后的数年间，在中国历史上是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革命风潮四起，从“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切，在钟期光幼小的心灵里激起了滚滚波澜。当时，平江县国民党党部和县政府里有不少共产党员。掌握团防武装的团防局局长余贲民和县教育局局长吴黑撑等都是共产党员。县立中学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多数青年学生思想倾向进步。钟期光读高小时，就十分热心参加校内外各种政治活动。管伙食，当学生代表，闹学潮，总有他的份。放假回家，他就走向社会，了解民情，观察时政，思考未来。对当时纵赌索贿的警察机关，他敢于联名控告。旧社会的官僚，一怕兵，二怕学生闹事，所以称兵为“丘八”，称学生为“丘九”。钟期光常以充当“丘九”而自豪。一九二三年三月，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钟期光积极参加了平江工人、学生等各界的游行示威，热烈响应。一九二四年在平江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洋奴黄栋材和钟坦然的斗争，钟期光等一批进步师生，以愤怒的激情将奸商贩运洋油的船只，打翻在落星滩河中。一九二五年钟期光和张纯清等许多进步师生加入了湖南抗敌后

援会，勇敢地投身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的斗争。钟期光还和同学们一起利用暑假参加讲演团的工作，深入乡村进行化装宣传活动，演出《二七惨案》、《朝鲜亡国惨》和其它改革社会习俗的剧目，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推动了平江正在兴起的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的发展。钟期光还参加了提倡民主，搞地方选举和竞选县议员的活动。在争民主的爱国运动中，钟期光经老师介绍于一九二四年他十五岁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平江各界隆重举行追悼活动，钟期光以悲痛的心情和学校师生一起参加吊唁，送挽联。通过参加这一系列活动，钟期光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由一个好强向上的少年，转变成一个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追求进步的国民党员。在这同时，他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钟期光中学毕业。同期同学中，有的考入黄埔军官学校，有的进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钟期光则由同学介绍到平江南乡爽源镇白马庙小学教书。他白天教学生，晚上兼办农民夜校，帮助农民扫盲。从此，钟期光更多地接触农民，组织农民，开展农民运动，使他的思想和追求进一步靠近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钟期光荣幸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投身党领导的大革命的洪流中。

## 二

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人民大革命遭致失败。五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敌人的屠刀也伸向了平江，钟期光被土豪劣绅控告为“宣传共产，私擅捕杀”的罪名，而被反动政府悬赏通缉。当地部分开明士绅惜其教书育人，乐为大众谋利，主动为他具禀担保。而反动政府却批示：“钟某确系暴徒分子，铁证如山，务须缉拿归案法办，所请保释一节，应毋庸议。”革命暂时遭受挫折，但是反动派的政治迫害，并没有使钟期光屈服。他义愤填膺，决心投笔从戎，立志拿起枪杆子。一九二七年六月，钟期光毅然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队伍之一——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一大队。不久，这支队伍由共产党员余贲民率领开赴江西修水之渣津，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钟期光被派回平江发展游击武装和开展地方工作。

长沙“马日事变”后，中共平江县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发动群众，开展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在暴动总指挥罗纳川的指挥下，钟期光参与组织领导了这几次武装暴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八日，首先在平江东乡的献钟和南乡的思村发动了农民暴动，消灭了反动的武装挨户团，捣

毁了区公所，镇压了土豪劣绅，并且策划了于九月二十日攻打平江县城。钟期光亲自到长寿、九岭、黄金、龙门等几个区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暴动武装。这次攻打平江县城，原定于午夜以城里善慧庵的钟声为号，城里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人暴动，城外由农民武装按预定路线攻城，以期城内城外协同动作，占领县城。不料，负责撞钟发攻城信号的游击队员未按时执行任务，参加暴动的群众一直等到天将破晓，大部退却，只有部分群众队伍冲入岩山李家巷以后撤出，致使这次攻城计划未能实现。但是，这次行动却显示了工农群众的力量，给反动派以很大震慑。

一九二八年二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司令部。这时，平江的游击武装发展到拥有三百多支步枪和大量梭镖等土造武器的队伍。三月，中共平江县委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扑城暴动。暴动总部密令各区乡编好农民自卫军队伍，做好动员和各种准备工作。每个乡编有搜索队、破坏队、敢死队、肃反队、救护队等，各队在竹竿上扎条草龙当战旗，队员以棕绳或稻草绳系在腰间作标记。在暴动总部的号召下，全县动员了二十多万群众，带着三天干粮，分四路包围县城。但由于当时缺乏组织指挥达数十万人大队伍的经验，武装游击队员和手持土造武器的农民队伍混杂在一起，各路队伍未能密切协同动作，北乡少数游击队员已经攻进城里与敌巷战，而东乡和南乡的攻城队伍则刚到城边，有的

队伍离城尚远，没等发起总攻，敌人的援兵已经赶到，致使第二次扑城暴动计划又未成功。但是，全县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了，许多基层反动政权被摧毁了。

这次平江大规模的农民扑城斗争，震惊了湖南的反动派。他们赶忙从南县调遣湘军独立第五师到平江镇压农民革命。就在这时，以共产党员彭德怀为团长的独立五师第一团来到平江，他们坚决站在工农群众一边，支持革命运动。为发动彭德怀任团长的第一团武装起义，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前往平江。钟期光受党组织的重托，亲自安排轿子，将化了装的滕代远送进县城与彭德怀、邓萍会见。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彭德怀和滕代远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武装起义，一举占领平江县城。在平江武装起义的胜利声中，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接着，中共平江县委与红五军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借起义胜利的东风，组织了全县总暴动，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和区乡两级苏维埃政权，革命红旗很快插遍平江全县。这时，钟期光担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和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以后他兼任军事部长。不久，红五军主力撤离平江开赴江西中央苏区，反动派卷土重来，钟期光等率领红军游击队以献钟、嘉义、钟洞三个区的山区为根据地，坚持斗争，革命红旗始终不倒。

一九三〇年五月，红五军回到平江。七月，在彭德怀、王首道、杨幼麟等指挥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钟期光

调任红五军秘书长，参与组织红五军攻打长沙的战斗。红三军团以红五军为主力，由数万农民赤卫队配合，自平江西出，在瓮江歼敌前卫旅后乘胜追击，过浯口，经长乐街，到金井，直逼长沙，槊梨激战，夺取了浏阳门和小吴门，迅速占领了长沙全城，敌军溃逃湘江西岸。红军打开长沙后，在市中心教育坪隆重召开群众大会，锣鼓喧天，红旗飞舞，火铳齐鸣，热烈庆祝胜利，宣告湖南省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战前，钟期光主要负责组织农民赤卫队支前，进长沙城后，他负责组织和宣传群众，肃清反革命残余，维护市内秩序，巩固胜利成果。红三军团占领长沙九天，大量农军和农民进城，市内秩序井然，商店照常营业，只有大商店的老板跑掉了。湖南的反动派不甘失败，勾结在湘江上的帝国主义军舰反扑长沙，红三军团退出长沙城。农民队伍先撤出城，三军团在后面掩护，平安地撤回平江。红军占领长沙，是红军战争时期夺取的唯一省城，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镇压人民的有力回击，大壮红军的军威，使国民党军闻之丧胆，并为以后粉碎国民党军多次“围剿”鼓舞了军民的胜利信心。

一九三四年春，钟期光由中共湘鄂赣省委秘书长调任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这是一项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湘鄂边中心县位于长沙至武昌铁路线之间，包括湖南的临湘、岳阳和湖北的咸宁、蒲

圻、崇阳、通城、通山等县各一部的广大地区。境内崇山峻岭，又有粤汉铁路通过，既便于隐蔽，又可机动，而且地处湘鄂两省边界，反动统治比较薄弱，是发展游击战争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良好环境。但当时整个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正受到国民党军六个师的重兵"围剿"，红十六师日夜苦战，损失很大，仅剩二百余人，编成了一个独立营，继续与敌周旋；各地红军游击队也遭受敌正规军和保安团队的袭击，平、浏、修、铜、万等县的基本阵地，多数已经不能立足，省委被迫指派钟期光向湘鄂边区发展，并派省工会负责人施济向修、铜、宜、丰边区发展。钟期光到湘鄂边区后，很快发现从省委带去的干部由于不是本地人，语言习俗不通，开展工作困难，不能生根落脚。他大胆启用和培养当地干部，迅速沟通了与群众的联系。为了广泛发动群众，他提出"下畈去"的口号，改变了主要在山上躲藏的被动局面，主动深入到群众比较密集、田地较多的山谷地区开展革命活动。他还提出：依靠正确的政策发动群众；依靠觉悟高的群众保护革命力量。他清醒地认识到，有了干部和群众，还必须有武装，革命才有力量，根据地才能巩固。他把红军游击队扩编为红军独立团。为了进一步扩大红军武装，他通过各种渠道，对敌军发动政治攻势，进行策反，变敌人的"义勇队"组织为苏维埃的赤卫队组织；他还主张用战斗从敌人手里夺取枪支弹药。当他得知通城县

的地主武装到武汉买军火，并有驻洋楼洞的国民党军三十三师一营正规部队帮助押运的情报，便亲自指挥独立团埋伏在敌人押运武器必经之路的方山洞，两头部署了红军游击队控制险要地带，还组织了一个手枪队近战突击。敌人一个营的押运队伍进入伏击圈后，红军独立团和游击队居高临下，犹如猛虎下山扑向敌人，一营敌军被活捉大半，其余除少数逃跑外尽数被打死打伤。一个营的武器和押运的两箱三保险新式驳壳枪，以及两箱手枪，全被缴获，敌营长和参谋长被活捉。这一仗，使红军独立团声威大振，武器装备得到改善，队伍扩大了，成为湘鄂赣根据地战斗力很强的红军团队之一。这时期，湘鄂边中心县的各项工作也获得很大发展，武装工作团十分活跃，保秋收，打土豪，毁铁路，夺火车，为省级机关筹措了大量粮款，缴获了敌人很多重要文件，还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筹措了大量粮款，有力地配合和保障了整个根据地的斗争。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独立团编入红十六师建制，钟期光随调该师任政治部主任。胜利以后，钟期光先后发表了《平江扑城暴动》、《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点滴体会》等回忆文章。

##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下

山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钟期光任团政治处主任。由中央军委派来的李涛、赖传珠向部队传达了中共中央“东进杀敌”的指示，随即部队向敌后进军。

一九三八年四月，陈毅组织抗日先遣支队，粟裕任司令员，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率部挺进江南敌后，调查敌情，发动群众，建立统战关系，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先遣支队直辖三个连队、一个文工团。当时的形势，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国民党大批正规军不战远逃，华东主要城镇陷落敌手，而广大乡村兵匪为患。江南人民具有很高的民族意识和战斗意志，为了对付日军入侵和匪患，各地群众纷纷成立“红枪会”、“大刀会”，组织起来，自己保护自己。先遣支队乍到江南，人地生疏，群众也对这支队伍不了解，开始连向导都找不到，有时走近村庄，“大刀会”不让过，要绕路而行，加之江南水网地带，霉雨季节，路窄道滑，部队连续行军，十分疲劳。钟期光负责政治工作，他要提高指战员的战斗意志，还要宣传群众争取群众，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讲群众纪律，很受军民的欢迎。他和粟裕比指战员们都要辛苦。每天出发前，他们都要集合部队讲话，宣布任务与要求，进行鼓动工作。行军时，他们带着警卫排走在部队前面，比连队战士们走得还要快。一到宿营地，就得马上研究敌情和我情，部署第二天的工作。三个月时间，从安徽到江苏，经过当涂、繁昌、金坛、句容、溧阳、溧水等地，道路迂回曲折、犬牙

交错，都是夜间通宵行军，天亮才宿营。每到一地，几乎没有住两天以上的，遇到紧急情况，宿一次营要搬几次家。走了上千个村庄，住的村庄有几百个。有时宿营不进民房，到高淳县东坝镇就没有叫醒老乡，睡在街道屋檐下，老乡很感动。钟期光教育部队，对群众不能直呼“老百姓”，要亲切地尊称“老乡”。群众听到“老乡”喜出望外，纷纷向部队赠送食物。这时钟期光又向部队强调纪律，他说：群众越热情，我们越要严明纪律。秋毫无犯。热情的群众找到政治部，主动把各家各户送的东西集中起来，作为慰问品送给部队，部队收下了慰问品，但都按市价付了钱。先遣支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使江南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存在。当时也有人提出了另外一个疑问：“你们这样的武器能打鬼子吗?”先遣支队每连编有一个全用驳壳枪装备的短枪班，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其余都是马枪，每人几十发子弹和两枚广东造无柄手榴弹。虽然这是新四军最好的武器，但比日军的武器差得太远了，而且在群众的心目中，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还有飞机大炮都跑掉了，你们新四军行吗？韦岗一战，歼灭日军一个汽车队，六辆汽车被打毁五辆，最后一辆掉头逃跑了，打死日军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泽武四郎等十余名，打伤日军数十名，缴获长短枪十余支和满载车中的军需物品。这下群众看清了，新四军不仅对群众好，而且会打仗。不久一团又把朱永祥土匪部队消灭了，群众对新四军更加拥

护和信任。先遣支队圆满完成了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的任务，为陈毅率新四军大部队迅速在江南扎根，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起了开路先锋作用。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一师及其前身部队和后来的苏浙军区，是新四军的强劲主力之一。它战斗在大江南北，黄海之滨。从韦岗战斗，车桥战斗，苏中反“清乡”、反“扫荡”战斗，到攻占姜堰，黄桥决战，浙西三次反顽战役，威震江南；挺进苏中，横扫苏北，转战东南，使日伪军闻风丧胆，使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挑起的“磨擦”败北，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是陈毅、粟裕、叶飞和钟期光等。钟期光长期主持政治部的领导工作和部队战时政治工作，对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粟裕曾指出：“钟期光同志工作很实际，很实在。从江南到苏中，政治工作实际上是由他主持的。”

钟期光长期生活在战斗部队，从红军时期起一直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对部队的战时政治工作有较丰富的经验，在抗日战争中，他经常强调，要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把政治工作当作人民军队的生命线。他尤其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主张通过政治工作来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施 。一九四二年苏中反“清乡”、反“扫荡”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部队实行精兵简政，有人主张砍掉师、旅和分区各级政治机关，只留一两个人处理党委日常事务。他反对这种主张，认为人数可以减少，但政治机关任何时

候也不能取消；精减以后政工人员少了，但政治工作更要加强。他强调政治工作要适应情况的发展，要有创造性。他根据从红军到新四军、从内战到抗日、从山上到平原、从较为单一的斗争到复杂的三角斗争等实际情况，对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对象、依靠力量和工作方法等各方面，都有新的建树。他一贯坚持抓好思想教育是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他提倡思想教育主要是“正面灌输”，即对指战员进行经常性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和人民军队建军宗旨的教育；同时又要“扶弱为强”，即鼓励先进，表彰典型，帮助和改造“后进”，共同进步；还要“见事就教”，即各级领导和政工干部要深入群众，发现问题，抓住苗头，及时谈心，防微杜渐，不拖不欠，提高思想教育的成效。他强调在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中，政治工作要有战斗性，一是树榜样，正上梁，领导和领导机关要做好样子；二是敢于反对不良倾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搞报喜不报忧；三是对有错误的同志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不蓄意整人。他还强调，政治工作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钟期光不仅投身于政治工作建设，而且重视总结经验，他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对改进目前连队政治工作意见》、《在整训中力求改善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问题》、《改造思想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师的五年》、《论部队中政治工作建设》、《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一切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

——新四军一师政治工作回顾》等十余篇论文和回忆录。

钟期光关心干部，知人善任。在调配领导班子时，他慎重地配好两个军政一把手。从思想水平、工作能力、文化程度到脾气性格，他都进行全面衡量，科学组合。当发现矛盾的时候，他迅速调整，不使矛盾激化而贻误工作。新四军一师战斗在苏浙地区，邻近宁、沪、杭等大城市，科学文化比较发达。在民族危亡时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参加坚持抗日的新四军。钟期光对他们的到来热情欢迎，大量吸收，并且对他们关怀爱护，积极培养，严格要求，大胆使用。据一九四一年十月统计，新四军一师营以下干部60%是二十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连队指导员中则占70%，以后达到80%以上。师团职干部中有不少是留学生和大学生。在干部工作中，钟期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善于了解干部。他对干部的了解非常细致，从工作特长到家庭情况、个人爱好，都清清楚楚，而且他以宽宏的胸怀团结各方面的干部，给干部以政治上的关怀、工作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体贴，所以广大的下级干部都感到温暖，心情愉快，愿意同他接近，同他谈心，同他通信，向他反映意见。

钟期光以实干家著称。他的工作作风深入扎实，一九四二年他曾提出“缩小机关，充实连队，一切工作在基层，政治工作在前线”的工作方针。他重实际和实效，不

搞形式主义；工作要求针对性强，反对不痛不痒；工作方法喜欢生动活泼，既有思想性，又有群众性。他的讲话稿多是自己起草，他自己动手写战斗动员命令、工作指示、宣传提纲和经验总结，很少要别人代笔。

## 四

在苏中，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开始是紧紧相连的。苏中解放区位置突出，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京沪腹心地区隔江相望。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全面内战，矛头首先对准苏中解放区。并梦想在三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这时，钟期光担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委领导下工作。当时，华中野战军辖第一师（六个团）、第六师（六个团）、第七纵队（四个团）、第十纵队（三个团）以及新二师第五旅、华中军区特务团、华中军区炮兵团，共三万余人。而进攻苏中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有五个整编师共十五个旅十二万人。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正确领导下，华中野战军发挥解放区的优势，党政军民齐动员，在百里战场上发动了大规模的备战热潮。部队开展了军政大练兵运动，“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政治思想教育深入人心。地方党和政权机关动员青壮年参军，在扩大和加强地

方武装的基础上，又动员部分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建立了支前司令部和民兵参战团以及伤员转运站、粮草供应站，并在华中解放区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斗争，大大激发了贫苦农民和人民子弟兵的阶级觉悟，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七月上旬，华中野战军在如皋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粟裕司令员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和“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的指示，并具体进行了作战部署和动员。钟期光主持华野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开始打》的战时政治工作指示，各级政治机关和全体政工人员紧急行动起来，对部队深入地进行了战斗动员。他们在战区村庄的墙壁上写满了醒目的大标语：“军民团结，提高警惕，粉碎反动派的进攻!”营地、街头荡漾着嘹亮的“狠狠地打”的战歌声。针对军队数量敌强我弱的情况，为了争取主动，粟裕在策略上果断地采取了先发制人、大胆试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手段，于七月十三日首先发起宣家堡、泰兴战斗，旗开得胜，三天歼敌三千余人。七月十八日，再挥师奔袭如皋东南之敌，又获胜利，三天时间再歼敌一万余人。战役继续发展。在粟裕、谭震林的意图下，钟期光具体负责组织协同战斗，开展对敌政治攻势，训练俘虏，协助后勤补给和联络民工支前等工作。他时而在野战军指挥部参与作战指挥，时而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指导帮助部队解决问题。他不顾辛劳和安危

奔波在肩负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部队越打越勇，仗越打越活，至八月二十七日，七战七捷，一个半月歼敌五万余人。毛泽东主席对苏中战役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并转发全军；延安《解放日报》指出：中原突围、苏中战役和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定下来了。”

苏中战役后，华中野战军根据全国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不顾一城一地之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北撤，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先后在涟水两次与国民党军七十四师作战，予敌以杀伤。接着在淮阴、宿迁歼灭国民党军六十九师戴子琦部。从苏中撤到鲁南，形式上是“败退”，给国民党军以错觉，促其轻敌冒进；实际上每战都歼灭与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兵力，而自己却不断获得补充与锻炼，战斗力不断提高。

这一时期，钟期光在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上，运用从群众来和到群众去的工作方法，集中群众的智慧，及时总结了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使整个野战军的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创造与发展。一师一旅二团七连在苏中战役中，根据解放战士的要求，首创以《功劳簿》、《功劳证》、《功劳状》为形式的“功劳运动”，对部队士气鼓舞很大。团政委赵荣、政治处主任郑克（不久为政委）和副主任赖少其先

后总结了七连开展功劳运动的经验，在二团推广后效果很好。特别是二团在涟水县大桥镇整训时，赖少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群众的经验，建议二团党委讨论通过了《关于开展功劳运动的决定》，在全团进一步深入开展了功劳运动，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使二团在涟水保卫战中被评为先进团。一旅领导重视这一经验，在全旅开展功劳运动后，反映强烈。钟期光发现这一群众性创造性的政治工作方法，便积极投身其中，抓住不放，组织指导政治部总结了开展“功劳运动”的经验，编成小册子，下发部队，钟期光亲自为这本小册子题写了书名。不久，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功劳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野战军开展起来，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杀敌热情，推动了部队各项工作的发展。延安新华社报道了华东部队这一经验，《解放日报》发表短评，称“这是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以后“功劳运动”命名为“立功运动”，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普遍推广，并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钟期光后来在《瞭望》周刊发表了《“立功运动”表现了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回忆文章。

一九四七年一月取消新四军番号，一律称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下辖十个纵队共约二十七万人。

解放战争的规模越打越大，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华东野战军在最高统帅部的正确领导下，同其他野战军紧密配合，先后取得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西南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一系列伟大胜利。这期间，钟期光参与华东前线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鲁南枣庄战役中正式实现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钟期光领导了“团结会师”的教育和撤退华中以来的形势教育工作，增强了合并后部队的团结，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莱芜战役后，部队打了大胜仗，在移驻淄博矿区整训期间，钟期光不失时机地领导了严格整顿部队纪律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巩固和发展两支野战军合并后的团结成果，钟期光号召原来的两支部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于是便在部队中开展了互学活动，华中部队就向山东部队学习爆破，山东部队就向华中部队学习勇猛的战斗作风和溶化俘虏的经验，使华东野战军部队上下之间和兄弟团队之间的团结得到极大增强，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仗越打越好。刘邓大军执行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华东野战军派出一、四、六，三、八，十共六个纵队组成两个兵团与之配合，发起鲁西南战役。所有留在黄河以北的各个纵队后方机关、教导部队、炮兵部队、医院等七八万人，统由钟期光和副参谋长刘先胜负责领导，组织输送兵员，补充黄河以南的部队。钟期光特别重视整顿部队的纪律，密切参战部队与冀鲁豫军区的军政军民关系。

他还负责接收了后方补充兵员三万名。平汉线战役胜利后，部队集中濮阳整训。陈毅等野战军领导人亲自参加“三查三整”，对高级干部教育很大。在“三查三整”的大会上对钟期光的结论是：“积极负责，直爽坦白，斗争性强，爱总结经验（如溶化俘虏、立功运动等），但也爱冲动，有时没有掌握以正确对错误的原则。”濮阳整训后，华东野战军在豫东战役中全歼蒋军七十五师，而后转兵东向济宁，准备围攻济南孤城。

在睢杞战役中，一纵队团长栗亚向钟期光报告说：战斗很激烈，虽然取得很大胜利，但部队伤亡减员也很大。为了保证连续作战，又尽量保持原来的建制，不失老传统，他们采取了一边战斗一边将俘虏补充到部队的办法。因基层骨干强，老战士觉悟高，补入的俘虏兵都能听从指挥，很快被溶化，连队兵员有了保证，战斗力得到增强。钟期光及时总结推广了这个团“火线扩军，随补随打”的经验，在各纵队普遍实行后，都获得成功。为打好济南战役，钟期光为华东野战军起草了《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在指示中明确提出了“随俘、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并响亮地提出“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钟期光起草的这一文件，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中央军委将这一文件转发全军时改为“即俘、即补、即战”。济南战役发起后，钟期光率巡视团驻宋时轮兵团，组织各纵队之间的协同动作。国民党军吴化文部火线起义后移驻黄

河以北，钟期光又担负起领导该部整编训练与改造的工作。

济南战役胜利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前委召开曲阜会议，总结作战经验，整顿与加强全野战军的组织纪律性，部署新的更大规模的战役。会后全野挥师围攻海州至徐州之国民党军，并将这一作战行动逐渐发展成为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期间，根据总前委的部署，钟期光一直在前线指挥部，负责主持华东野战军的政治动员、俘虏的训练与调配、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等工作，他克尽职守，昼夜操劳，做出了显著成绩。在总前委的正确领导下，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紧密配合，歼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解放战争的战局，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召开大矿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遵照中央的指示，全军实行统一番号，部队进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部队加强渡江作战前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集中时间和精力，重点贯彻落实如何接管大城市和实行军事管制问题，并在部队中普遍进行管理城市的常识和城市政策的教育。随即，钟期光率工作组赴第十兵团，传达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动员部队再接再厉，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钟期光随第十兵团一起行动，比三野机关早一个月到达长江北岸，主持前线部队渡

江作战的政治工作。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迅速摧毁国民党军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直捣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红旗插上总统府大楼，结束了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为了歼灭残敌，第三野战军各部队乘胜追击，挥戈东进，攻常州，克苏州，战上海，用战斗迎来了华东全境的解放。钟期光通过积极的和不断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保证，对第三野战军的胜利和华东的全境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解放后，钟期光协助陈毅参与上海市军管会政工部的领导，具体贯彻落实中共的城市政策与城市纪律。他为此深入调查研究，肃清散兵游勇，清理流氓阿飞，设立专门机关维护城市革命秩序，保护党政军机关和公共场所的安全，负责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动统治的机关的接收管理工作。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年并庆祝上海解放，组织了数十万人的大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上海的工人和市民，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他们载歌载舞，浩浩荡荡地通过上海繁华街道和所有原来帝国主义的租界，长期以来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七月八日，上海市军管会政工部的工作宣告圆满结束，钟期光等率三野机关移驻南京。

## 五

上海解放后，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建设国家和发展国防需要大批干部。为此，还在三野机关移驻南京之前，陈毅就在上海主持三野前委研究决定创办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华东军大)。校长、政委由陈毅兼任，调三野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任副校长，钟期光任副政委同时担任校党委书记，聂凤智任教育长，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领导华东军大的筹建和培训工作。校址设在南京。

华东军大以“广泛罗聚人才，适应国防建设和国家建设发展需要”为目的，经三个月紧张筹备，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来自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共招收了三万余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知识分子，编为三个总队，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革命人生观教育、政治形势教育和基础军事训练。还从部队中抽调了一批营团级干部，编成两个“上级干部训练队”，为部队培训中级军政指挥人才。钟期光除了主持军大的党务和政治工作，还亲自参与讲课，给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将一批最优秀的学员分配到正在创建的海军、空军和其他特种兵部队，加速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军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发展的进程。一九五〇年底，因军事教育体制变动，华东军大一部分并入人民解放军军

事学院，一部分改建为华东军区高级步兵学校。华东军大虽然只有一年多历史，但因其创办于新中国建设伊始的历史转折时期，华东地区文化又较为发达，广大知识青年通过军大投身革命，所以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华东军大毕业的学员，在全国解放后，分布在国防、外交、经济、政法等各条战线，不少人成为党政军骨干力量，有的成为中高级领导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央军委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军事学校的基础上，改建成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时，命名为“军事学院”。中央军委任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为院长兼政委，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三月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七年十月任政委，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离任），刘忠为院务部长，并组成军事学院党委常委。

军事学院是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它以原华东军政大学和华北军政大学的部分干部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该院的各级机构。当时的训练方针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习参谋勤务与通讯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为此，周恩来总

理曾向刘伯承等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基础上，认真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毛主席为军事学院亲笔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毛主席还为军事学院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帮助工作。

在刘伯承的领导下，钟期光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办学方针，具体负责学院的政治工作建设。他主持制定了军事学院的第一个《政治工作大纲》，报经总政治部批准，为建院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学院政治工作要掌握在我军现有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国防的指导思想。提高联合兵种的作战知识，必须是和总结我们过去的作战经验相结合。应当强调学习新东西，但不脱离我们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在军事学院发展的不同时期，钟期光重点抓了学院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政治、文化教育等工作。

建院初期，最大量的是组织工作。担任院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的钟期光还兼任学院干部部长。在刘伯承"组织起来"的号召下，钟期光着手建立三支队伍：机关队伍、教员队伍和学员队伍。选调干部严格以"选贤任能，五湖四海"为标准。钟期光主持制定了具体选调方案，经总政治部干部部批准后，向全军各个野战军下达选调任务，学院负责逐个审查核定。学院首先配好了四大部和各二级部、系、教授会的主要负责人，这些人的选调集中了全军的精华，反映了全军的军政素质。与此同时，选调了

一支较强的教员队伍。这支教员队伍，以原华东、华北军大部分优秀教员为骨干；从部队选调了一批经实战考验的知识分子加以补充；后来又从毕业学员中选留二百五十六人担任军事教员；并从当时人民解放军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还启用了近六百名起义、投诚或被俘的原国民党军的军官担任军事教员，对他们施以教育改造，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又从地方教育界聘请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和讲师担任文化教员；还特邀了一些军内外知名的政治与理论工作者进行专题课程讲授。先后组建起战役、战术、战史、司令部工作、后方勤务、通信联络、政治经济、文化外语等五十个教授会，教员达一千三百余人。除此还有军事学术研究室、翻译室。学院的各级干部来自全军各个部队或地方单位，不分山头，一视同仁，亲密无间。到一九五二年底，学员系已建成基本系，情报系，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政治速成系以及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高级函授系；一九五四年九月又开办战役系，中央军委调杨得志、廖汉生等五十二名军队高级干部到战役系学习。一九五六年又建成化学兵系。至此，军事学院已有十二个学员系，是一所既有陆军，又有海军、空军；既有军事，又有政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综合性军事学府。

军事学院的思想建设，最核心的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在现代化正规化教学中的地位

与作用。钟期光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落实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第一，他认真贯彻执行了建国初期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了学院的正规化现代化军事教学任务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相适应。他在院党委集体领导下，执行党的政策是坚决的，稳妥的。他主持的学院政治教育，贯彻了以启发诱导为主，以提高思想认识为主，先后进行了十次思想整风，保证了全院人员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旺盛的革命意志。他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成绩也是突出的，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员队伍的成长。在学院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慎重对待少数人的问题。因此，对少数人的组织处理，除个别问题外，经历史检验没有发现大的偏差。第二，他认真贯彻了军事训练方针，他主持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学院训练指导思想的落实。教学工作是以我军经验为主的，同时也学习外军的经验。特别是战略、战役和党史、军史等教学，完全是探讨我军的传统经验如何在现代战争中的运用。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军事学院同苏联军事顾问的相处是正常的，总的关系是好的，对于他们工作作风上的某些问题，刘伯承院长和钟期光等是坚持了原则的。但在学习苏军经验的方法上和教学实践中也有某些教训。第三，他重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及时解决学员和教职员工中的现实思想问题。建院初期，战争刚刚结束，成员多数来自胜利之师，骄傲情绪比较突出，享乐思

想有所滋长，组织纪律有些松懈。他针对这些情况，认真贯彻刘伯承“团结会师”的要求，运用大会报告、小会座谈、个别谈心等多种方式，具体宣讲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指示，耐心地热情地进行启发教育，保证大家的思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实施政治思想教育中，他重视自己的言传身教和模范带头作用。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特殊。军事学院的办公室、宿舍及其设备，都是因陋就简，勤俭办学，坚决反对随便开支公款，同时又注意帮助大家解决可能解决的实际问题。

钟期光不仅投身政治工作的实践，而且非常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研究和文化教育的开展。尤其在军事学院的文化教育方面他浇灌了许多心血。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我军的中、高级干部大都是工农出身，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影响了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知识。为改变这种状况，他花了很大气力开办文化学习，使学员通过半年至八个月的文化速成补习，一般达到初中程度，原基础较好的获得高中程度，个别的晋升大学水平，少数基础差的也摘掉了文盲或半文盲帽子，掌握了学习军事科学“入门的钥匙”。这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和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五二年春，毛泽东主席在南京接见了钟期光等同志。接见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

紫金山。”将延安“抗大”比喻南京“军大”，对军事学院的工作既是希望，又是肯定。同年七月，毛泽东主席给军事学院的训词又指出：“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一九五四年四月，朱德总司令莅临军事学院，对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毕业学员主持国家考试后，致训词指出：“军事学院创立三年以来，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先进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这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有重大贡献的。”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建院五周年时，军事学院已有基本系、情报系、高级速成系第一期和第二期、上级速成系、政治速成系第一期共一千四百零八名学员毕业；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各系，战役系和高级函授系第一期，政治速成系第二期，基本系、情报系和高级速成系第三期，共一千二百名学员即将毕业。军事学院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通晓马列主义军事科学，通晓毛泽东军事思想，通晓组织与指挥现代化作战，负责训练与培养高级指挥员的光荣教育任务。不仅为部队建设输送了一批高级指挥人才，而且为发展全军各类专业军事教育创造了条件。不久，以南京军事学院的战役系和高级速成系、基本系、情报系、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为基础，分别建成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

等六所高级军事指挥院校，促进了全军军事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主席率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视察军事学院，接见部系以上领导干部，对学院的工作表示满意。然而，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反对教条主义”运动中，却把办校实践中的某些问题和教训，当成“建军方向”问题追究个人责任，对军事学院，特别是对刘伯承、钟期光等学院领导人进行了极不公正的批判。钟期光坚持原则，对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主动承担责任，不上推下卸，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刘伯承院长离任时，他代表院党委致词时高度评价了刘伯承建院办学的业绩和勋劳。他说：“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六十高龄，常带头学习；他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他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以身作则；他特别关心与指导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尤注意检查效果，开展了十次整风。他常称‘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好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警语来教育干部。他这些模范行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事隔十七个月，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军事学院召开欢送钟期光大会，新任院长廖汉生致词说：“钟期光同志是军事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军事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我军

培养了大批干部。八年来，钟期光同志在工作中是贡献了力量。”二十年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说：“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历史是公正的。

## 六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钟期光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在院长兼政委叶剑英领导下工作。该院初创，为了加强领导，各学术研究部的部长，均由院领导分别兼任，钟期光于一九六一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七月兼任了战史研究部部长。

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当时军事科学院的主要任务，一是以编写人民解放军战斗条令为中心的各项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二是计划协调全军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钟期光代表院党委在全军第二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重点阐述了叶帅提出的科研方针：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军委规定的战略方针为依据，在总结我军经验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学习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认真研究敌人，充分依靠群众，大搞学术民主，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使之服务于我国的国防建设和适应未来的战争需要。并对“研究机构系统化、研究干部专业化、研究工作经常化”作了

具体阐述和逐项提出要求。他还以通俗的语言，“别人吃饭自己不饱，人家喝水不解你的渴”作比喻，提倡学术研究工作要深入实际，不凭主观臆断，用亲自摸索、点滴积累的方法，以求得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并且强调学术成品的质量：“好的不用多，一个胜十个。”

一九六三年九月四日，院党委常委会分工，钟期光负责党委的日常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兼管战史部的学术研究工作。

钟期光在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上，在当时“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头脑比较清醒，观点鲜明，不随大流，力排时弊。他指出：“我们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单纯引用语录。”“学习毛泽东思想要与创造相结合，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当教条。”“不要光是马克思怎么说，恩格斯怎么说，列宁怎么说，斯大林怎么说，毛泽东怎么说，还要看你怎么说！”“用不上硬用上，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勉强用上是牵强附会。”“所谓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是实用主义。”

在学术思想领导上，钟期光主张实事求是。他针对一份关于战史资料选编中“反党分子”名字是否出现、有“反党分子”名字的史料是否选用的报告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事实。我们自己应该清醒，有个主宰。原始材料有他们的名字，我们把它选入史料选编，作为编写战史军史的资料，不算宣扬他们。我们要尊重史实，有什么就

是什么，不增不减，实事求是。历史总归是历史，不能歪曲。至于涉及到作战、建军、工作上有分歧的东西，怕影响团结、怕影响威信而不列入选编，我持保留意见。对政策能否怀疑？要不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不要党内民主？如果要，那么选编有这些内容的材料就不能算做问题，选上这些有争论、有分歧、有斗争的东西就没有什么。”他要求对历史资料进行严格的真伪鉴别：是原始档案材料，还是后来回忆材料；是群众鸣放材料，还是分析批判材料；是个人检查材料，还是揭露检举材料。各种材料的可靠性不同，准确性不同，选用时要注意区别真伪。

钟期光主张研究干部应尽量减少行政兼职，研究工作要有时间保证。在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全院政治工作要点上，他突出地增加了“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作为政治工作一项重要任务，要求政治机关和政工人员，把落实这一条作为整改的重要内容。他说：“科研单位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在坚持政治方向和建军方向的前提下，主要是要调动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使大家心情舒畅，多出研究成品。研究人员的政治学习和各项政治运动，除特殊情况外，应在六分之一的时间内进行。今后一般不组织他们去支援农业帮助收割，业余时间应由他们自己支配。不用更多的时间钻研学术研究工作，就专不起来，红就是空的。做不到这一点，政治工作就不落实。”他要求政治工作要鼓励多出人才，多出成果。他有一句名言：“我们军事科学院

靠研究成果吃饭。”一九六五年改薪定级时，他竭力主张照顾科研人员中的业务尖子。他主张对稿费的处理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钟期光的工作作风以务实著称。他反对隐恶扬善，主张及时揭露和改正工作中的失误与不足。他提倡进行个人岗位职责教育，认为不进行职责教育，就不能各执其事，团体就不能成为统一的灵活的机器。他要求各级各类人员，都要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原则标准，重视做好每项具体工作。他强调，不能把做好日常的具体工作当作事务主义来反对，不能全院人员都只讲原则，都是“原则干部”，而不做具体工作。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二日，他在院常委谈心会上作自我检查说:“我的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的；但由此也带来考虑不周到的毛病。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的同志看文件只画圈不表态，我就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上面，怎么想就怎么写，白纸黑字，不怕抓辫子。”

军事科学院是一九五八年三月成立的。钟期光于一九六〇年底调院工作，至一九六六年五月，正是该院初创与成长时期。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钟期光和其他院领导组成强有力的一班人做了大量具体的领导工作。他们带领全院人员进行了创造性的努力，使全院的组织机构和编制体制渐趋完善，人员由二百余人发展到一千一百余人，科研工作蓬勃开展，人民解放军当时迫切需要的第一代各级各类战斗条令与共同条例先后定稿出版，各个时期的战史

编写完成近百本，两千五百余万字的《史料选编》编辑成册，还拟定了《编写全军战史方案与战史目录》送审稿，编写出《战役学》十四个课题的初稿，以及其它专题研究与译著等丰硕成果。除此，还承担了组织指导全军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拥有二千二百余名专职研究干部的科研网络在全军师以上单位建成，科研形势喜人。钟期光作为军事科学院领导成员之一，为人民解放军建立和完善军事学术研究机构、培养研究干部和开展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从理论上指导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积极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七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一伙妄图打倒叶剑英元帅。但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保护，林彪一伙的阴谋一时难以得逞，于是他们便向叶帅在军事科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两位主要助手宋时轮和钟期光下毒手。

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给人定“罪”易如反掌。林彪一伙把钟期光曾提倡的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与个人创造相结合的主张，诬陷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钟期光曾不赞成抛开其他元帅单独编辑林彪军事文选的作法，被诬陷为“反对林副统帅”；钟期光曾强调科研单位的政治工作要保证科研任务的完成，被诬陷为“反对突出政治”、“与政治工作捣乱”；钟期光在红军

初创时期曾以地下党和游击队领导人身份支持和协助过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并在建国后与彭德怀有过工作关系，又被诬陷为“与反党集团关系密切”，“是彭黄漏网分子”；钟期光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时，曾与苏联军事顾问有过工作关系，也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如此等等。一九六六年六月，钟期光被停职。钟期光靠边站后，又被逐步升级，接受“群众专政”，遭受“喷气式”、游院示众、强劳等批斗和折磨，至一九六八年六月，再次升级为关押，以“中央专案组”名义“隔离审查”。林彪一伙采用这种封建法西斯式的专政，不仅在事实上颠倒了是非，而且对钟期光从政治上、思想上、人格上进行了全面摧残。从“隔离”之日起，钟期光突然“失踪”，与世隔绝，连犯人享有的亲属探视权也被剥夺。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自由与解放浴血奋斗、忘我工作了大半生的六旬革命老人，却在自己的队伍里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身心遭受了无情的折磨与摧残。

在此乱世期间，尽管邪恶嚣张，但党内军内真理正义犹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叶帅明确表示：“关于宋、钟的问题，不讲停职反省，不罢官，回避一下，指定几个人，运动的领导还是常委。”叶帅还写条子送给钟期光夫人：“凌奔同志，为革命受气，真金不怕火炼！”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指出：“钟期光‘里通外国’的材料要分析。在一九五八年以前‘一边倒’，对苏联专家，什么材料都给。……钟期光在南京军事学院一段，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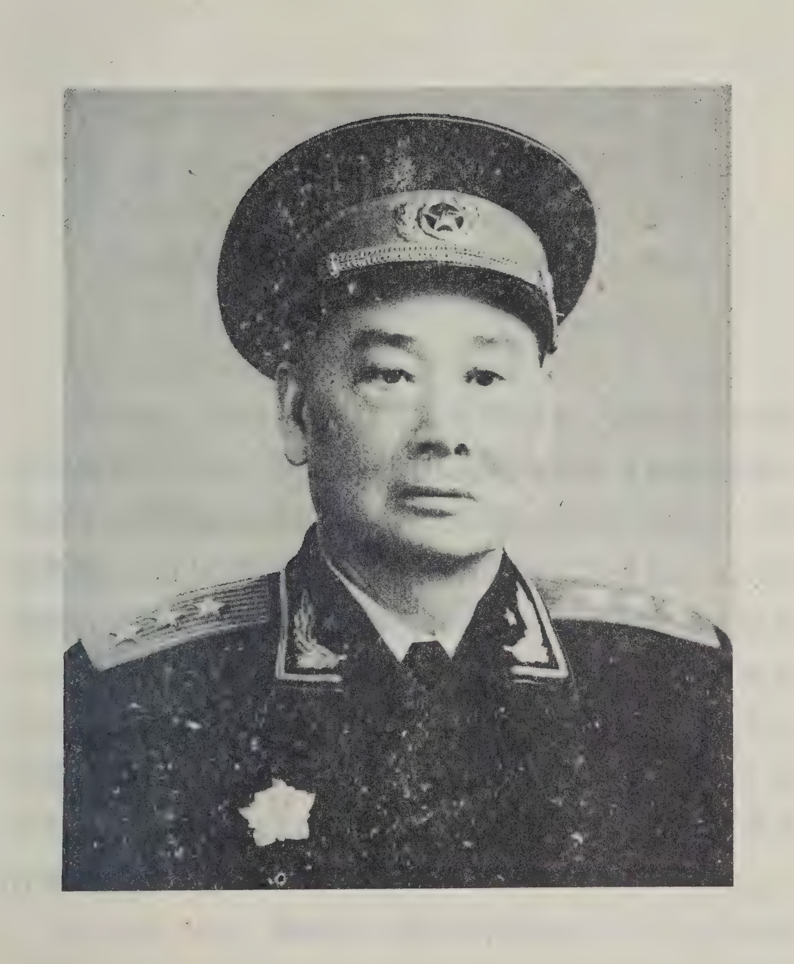
能由他主要负责，已经做过结论了。”一九六七年四月，钟期光正被残酷专政时，周恩来总理批准他上天安门参加五一观礼。钟期光接过红光闪闪的帽徽领章，热泪滚滚。在天安门城楼上，陈毅元帅紧紧握着钟期光的手，满腔热情地说：“我了解你，你没有问题，不要怕，我保你!”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自取灭亡之后，诬陷钟期光为“三反分子”的主要证据已不复存在。但由于“四人帮”继续残害老干部，钟期光专案又一直与彭德怀专案挂钩，对他的政治迫害仍在继续。这时，在毛泽东主席关于“废除法西斯审查方式”的批示下，钟期光被允许回家，但仍由一个班的兵力看守他，隔墙为牢，毫无人身自由和安全保障。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日，钟期光在软禁中突患脑血栓病，叶帅及时批示：“请科学院党委指派人关心病人治疗情况。”可是在“医疗服从政治”的年代，叶帅的批示并没能使钟期光逃脱厄运，耽误了治疗，从此造成他半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位体格魁梧、战争年代不曾被枪林弹雨击倒的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就这样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终身致残。一九七三年九月钟期光荣幸地被解除隔离审查，一九七五年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但是，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钟期光仍然戴着“犯有政治错误”的帽子。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由军事科学院党委作出《关于为钟期光同志平反的决定》，才为他彻底平反公正地恢复名誉。

钟期光于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曾当选为第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一九七七年他出任军事科学院顾问，一九八二年被选为第一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由于健康原因，他无法参与工作，长期在医院休养。一九八五年九月他带头响应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愉快地退出中顾委，离职安度晚年。但他身退心不退，在医院休养仍不忘共产党员奋斗终身的志愿，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

（刘　旭）





陶　峙　岳



# 陶峙岳

## 一

陶峙岳（1892—1988），原名陶纪常，字岷毓，曾用名陶锄，一八九二年九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城南郊仙凤乡狮子山下陶家新屋的一个殷实家庭。陶峙岳出世时，陶家新屋的人口增至四十余人，年收租谷二千余担。父亲陶福生在父辈兄弟中居长，膝下有五男三女，陶峙岳在兄弟中排行第三。陶福生为人直爽，自奉俭约；其妻秉性慈祥，待人和蔼。陶福生夫妇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做为人称道的好人，对于财货要取之有道。"父母的这些教导，对陶峙岳的影响很大，在他从军后便成长为一个典型的中华民族的爱国将领。

一八九八年，陶峙岳入私塾启蒙读书，从《三字经》读起，一年内四书五经全部能够背诵。那时塾师只要求学童背诵章句，很少讲解文义。陶峙岳感到枯燥乏味，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自行探索，另找一些塾师教授以外的书籍。因他聪明好学，吸取了不少经史之外的知识。他的眼

界逐渐开阔，仰慕历史上的忠臣良将，向往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在排行兄弟中其成绩斐然，常常受到长辈和兄弟的一致夸奖，对他的期望也尤为殷切。

一九〇四年，陶峙岳赴长沙考入城南师范附属小学，一九〇六年冬毕业后考入求忠中学。求忠中学的学生年龄悬殊，最大的近三十，而陶峙岳最小，才十四岁，人称“陶伢子”。但是，学校管理不严，长辈们对陶峙岳的学业尤为担心。时在湖南陆军小学教修身课的叔叔陶刚岚，于是多方设法让陶峙岳报考陆军小学。按当时规定，报考陆军小学，各县考生有限额，而且须经县里预考，取录后才有报考资格。而陶峙岳不具备报考条件，陶刚岚遂为他另找门径，诡称为南州厅（今南县）人，找关系谋到南州厅一纸公文，取得报考资格。但是，此事终于被人识破传开了。学堂总办汤鲁璠闻知后，即召见陶峙岳，见他外貌清秀，举止不凡，印象好，便允许他应考。陶峙岳考试成绩优秀，文笔也通顺，汤鲁璠对他刮目相看，便把他列为备取第一名。恰巧在学堂办文牍的人与陶刚岚关系甚好，正额出缺，一九〇七年春，陶峙岳得以即时递补进入陆军小学。此后，陶峙岳便开始了漫长的军人生涯。

陆军小学肄业为期三年，文武两科兼重。在陆军小学，陶峙岳刻苦学习，立志富国强兵，干一番事业。当时革命浪潮此起彼伏，革命党人的秘密宣传鼓动，萍浏醴等地会党起义，长沙抢米风潮等，使他的思想不断受到冲

击。

一九一一年六月下旬，陶峙岳从陆军小学毕业后赴武昌考入陆军第三中学。学习课程仍分文科和军事两部分。当时武汉形势日趋紧张，“驱除鞑虏”的革命风声不时传入学校里来。十月十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十一日，陶峙岳等军校学生怀着一股强烈的民族仇恨，自动集合起来，拿起枪杆子加入起义队伍。他们意气昂扬，冲街而过，荷枪实弹勇气百倍地飞奔制台衙门。两天后，陶峙岳和另外一些军校同学被派去担任都督府的警卫工作。一周之后，陶峙岳希望在革命事业中有所作为，不甘长期在督府当一名警卫队员，遂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湘籍学生结伴回湘，十月下旬抵长沙。当时长沙早已响应义举，起义领导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已遭杀害，立宪派推谭延闿督政湘省。政局变换，这批军校学生只得各自散去，陶峙岳也悻悻地回到家乡。辛亥革命推翻了历经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给陶峙岳灌输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使他的眼界再次开阔起来。

一九一二年春，陶峙岳又回武汉，谋求复学。由于辛亥革命的洗礼，到武汉不久，陶峙岳即加入了同盟会。是年秋，学校完成筹备工作，改名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迁往北京。

一九一四年秋，陶峙岳在预备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驻北京北苑陆军第八师受入伍训练，充任军官候补生，由二

等兵起，递升为一等兵至上等兵，每隔两个月升一级。

一九一五年春，入伍训练期满，陶峙岳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复辟称帝。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首先在云南通电讨袁，在全国掀起了护国运动。陶峙岳等青年军官学生义愤填膺，声讨袁世凯。袁世凯非常注意这些军官学生，特派亲信张怀芝率中外医师来校为学生检查体格，实则处理学生运动。他们要把陶峙岳等进步青年解除学籍。因陶峙岳在学校享有名气，经过巧妙的斗争，才免于被除名。

一九一六年六月初，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考试完毕，陶峙岳即与一些进步同学潜赴天津，密谋组织讨袁军。六月六日，袁世凯在一片惊恐中病死，组织讨袁军一事也就终止了。

## 二

一九一六年秋，陶峙岳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回到长沙，在湖南省督军公署参谋处任上尉参谋。此值谭延闿二次督湘，但好景不长，被北洋军阀逐出湖南，陶峙岳也随之去职。

一九一七年秋，谭延闿由广州返湘，以湘南总司令名义驻节零陵，招抚流亡旧部。同时为了扩充实力，命陈嘉祐招抚湘南绿林合编为一支队伍，称作“护字营”，由陈嘉祐任该营营长，陶峙岳任营参谋长兼第一支队教导员。不

久，陈嘉祐被任命为湘军第一师第七区守备司令，陶峙岳升任“护字营”营长，率领“护字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护法战争”（即第一次护法战争）。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湖南人民发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护字营”奉命北调，参加了这次驱张军事活动。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二日，谭延闿率部攻占长沙。二十六日张敬尧逃往汉口，谭延闿第三次主政湘省。谭延闿对湘军进行整编，“护字营”被改编为湘军第六混成旅，由陈嘉祐任旅长，陶峙岳任该旅独立工兵营营长，驻防郴县。不久，工兵营改称为该旅第十九团第一营，陶峙岳仍任营长。

谭延闿第三次督湘未站稳脚，被时任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逼走广东。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赵恒惕接主湘政。第六混成旅是谭延闿的旧部，暗中接受广东政府的指挥，赵恒惕视之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甘心。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湘鄂战争爆发，九月湘军节节败退回湘，岳州失守。后来，陈嘉祐通电主张出兵收复岳州，谭（延闿）系军人一致赞成，而赵（恒惕）的左右极力反对，至此，谭赵两军人之间的斗争更加明朗化。

一九二二年三月，孙中山在桂林誓师北伐，发起了第二次“护法战争”，陈嘉祐奉命为讨贼湘军第一路军司令，率第六混成旅挺进江西战场。六月十六日，广东陈炯明叛

变。七月初，第六混成旅回师广东，准备讨伐叛军。此时，暗中与陈炯明勾结的赵恒惕趁机下令解除陈嘉祐旅长之职，又派兵讨伐陈部，企图解决第六混成旅。陈嘉祐拒不受命，陶峙岳坚决拥陈率师投向广东。这时，回师广东讨伐叛乱的北伐军失利，退却广东，陈嘉祐、陶峙岳等失去依托，便率部折往湘西。八月，第六混成旅被湘西沅澧镇守使蔡钜猷属下旅长刘叙彝所收编，陶峙岳仍任营长。

一九二三年六月初，蔡钜猷不愿跟着赵恒惕依附于北洋政府，于是，组织讨赵军，反对赵恒惕执政。八月九日，奉孙中山之命，谭延闿在衡州（今衡阳，下同）就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联蔡讨赵。这时，陶峙岳随蔡钜猷行动，由新化进击湘江两岸。九月，谭蔡联军把赵恒惕赶出长沙。十月，赵恒惕得到吴佩孚支援，转兵反扑，谭蔡联军失利。赵恒惕乘机将湖南各军收编，整理为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祖因与陶峙岳是同学同乡关系，有旧交，故陶峙岳被留在第一师任上校团长。

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政府决定北伐。三月初，雄踞湘南的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突然倒戈反赵（恒惕），主政湖南，响应北伐。六月，唐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九月贺耀祖的第一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仍任师长，陶峙岳在该师第三旅任团长。

是年十月十八日，贺耀祖奉命率独立第二师由平江经

修水到达王家铺，归李宗仁的左翼军指挥，驰援江西战场。担负进攻涂家埠至九江之线的左翼军首先向德安和马回岭进攻。十一月一日，独立第二师向马回岭靠拢，其他友军部队向德安靠拢。马回岭的得失关系着整个江西战局。次日，北伐军下令总攻，马回岭方面战斗异常激烈。守敌颜景崇旅，依托坚固工事，凭险顽抗。战斗打响后，颜景崇调来上官云相的第七师第三旅和马登瀛旅共同抵抗。北伐军左翼军总指挥李宗仁也抽调第七军第一旅和第四军第十二师增援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至三日晨，北伐军向马回岭之敌发起了全线攻击，守敌即向黄老门、沙河、九江溃退。马回岭之战，截断了敌南浔路通道，断绝了南昌外援，打开了九江外围的门户。强行攻占马回岭之后，独立第二师未等休整，即于当日奉命单独向九江追击前进。除以第六旅何培基部攻瑞昌之外，攻击九江的主力第一、二、三旅又兵分两路，一路由马回岭横出莲花洞，陶峙岳所在的部队则由马回岭向黄老门、沙河前进，五日攻克九江，七日又克湖口。由于陶峙岳所在的独立第二师的有力配合，北伐军于八日攻克南昌。至此，江西各地残敌全部被歼，孙传芳十万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了。在江西战场上，陶峙岳率领的部队虽然是一支地方杂牌军，而且是在北伐军进抵武汉三镇时参加革命的，然陶峙岳治军有方，平时军纪较好，一经革命洗礼，作战也很英勇。一九二七年三月初陌镇一战，陶峙岳率领的团队极为顽强，一

举击溃守敌。战后，陶峙岳因功晋级为少将团长。

是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在南京，独立第二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贺耀祖任军长兼南京卫戍司令，陶峙岳升任第三师少将副师长，师长是毛炳文。当时陶峙岳还不是国民党员，贺耀祖劝他加入国民党。陶峙岳不愿只慕虚名，但作为国民党军的师长，不参加国民党是说不过去的，又碍于贺耀祖的情面，于是陶峙岳加入了国民党。

四月十八日，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衡。这时，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阀张宗昌等部见国民革命军内部不和，便集结反扑，南京告急。南京政府遂决定继续北伐。四月下旬，贺耀祖的第四十军奉命渡过长江，开赴北伐前线。陶峙岳因病不能随军行动，留在南京代任南京卫戍区司令一职。直至十二月上旬，陶峙岳才被调往前线，升任第四十军第三师师长，参加了复克徐州之役。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正式改组北伐军，陶峙岳在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第四十军仍任第三师师长。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扰乱了帝国主义的安宁。帝国主义势力力图阻止北伐军前进，挑衅事端。同年五月一日，陶峙岳率部随第一集团军进驻济南。五月三日，日军突然对济南发动袭击。陶峙岳率部奋力反击，一度把日军压制下去。但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下令撤出战斗，陶峙

岳被迫率部绕开济南。八日，济南沦陷，日军在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死伤达一万人以上。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陶峙岳等将领对此愤愤不平。因陶峙岳的第四十军在济南城抗击了日军，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而受到蒋介石的仇视。一九二八年九月，第四十军被削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师，蒋介石派其亲信担任师长。原军长贺耀祖从此完全失去军职，陶峙岳也降职为第二十四旅旅长。

## 三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为了消灭全国各大军阀的势力，首先下令讨伐桂系李宗仁集团，致使李宗仁兵败下野。尔后，又把张发奎集团、唐生智集团等势力挫败。一九三〇年五月，蒋介石把目标指向冯玉祥集团和阎锡山集团，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在绵延数千里的中原大地上掀起军阀大混战。九月十八日，雄踞关外的张学良集团通电拥蒋，出兵平津，中原大战终以蒋介石得势而告终。

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从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死伤士兵四五十万人，荒芜土地和毁坏房屋无数。陶峙岳所属的第八师也未能幸免，被卷入混战之中，驰驱于豫、鄂、湘、桂、粤各省，无役不从。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的注意力就转移到江西红军上来了。一九三〇年十月，第八师被推往江西参加对红军的“围剿”。此时，第八师师长是毛炳文，陶峙岳任少将副师长兼二十四旅旅长。十二月十六日，按照国民党的作战部署，毛炳文、陶峙岳率第八师经洛口、南昌、临川、宜黄到头陂，因不知红军踪迹，便空扑一场，次年元月五日退往南城。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蒋介石调集了十八个师又三个旅共二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兵分四路发动了对江西红军的第二次“围剿”。毛、陶的第八师奉命活动于南城、南丰、广昌一线，又一次扑了空。

一九三一年六月下旬，鉴于先后两次“围剿”败绩，蒋介石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共三十万人，自任总司令，并请来德国、日本、英国军事顾问，部署了第三次“围剿”计划。六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发表告民众、官吏、将士、党部人员四书，制造反共舆论。七月一日下达“总攻命令”，开始正式合围红军。毛、陶的第八师奉命开到宁都县北黄陂寻战，一直得不到一点有关红军的消息。八月十一日，第八师突然被红军包围，仓皇应战，被歼灭四个团。陶峙岳的第二十四旅也损失大半，团长陈作舟阵亡。溃兵无法控制，毛炳文、陶峙岳遂落荒而逃。陶峙岳原以为红军只不过是逐鹿中原的另一旗帜罢了，没想到红军先声夺人，灵活善战，遂改变了对红军轻视的看法，对蒋介

石的宣传有些怀疑，产生了厌战情绪，便告假回长沙休息。

一九三二年，毛炳文升任第三十七军军长，因平日与陶峙岳共事，深信陶的才干，遂力保陶接任第八师师长。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陶峙岳盛情难却，从长沙返回南丰就任第八师师长。当时第四次“围剿”已经开始了，第八师奉命作为总预备队的部队留守南丰。二月十二日，南丰被红军攻克，第八师退至城郊理塔圩待援。时任“剿匪”前敌总指挥的陈诚急令驻南城第二十四师驰奔南丰，欲意吸引红军主力于南丰城下；同时又令中路各纵队挺进南丰，想以优势兵力把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地区聚而歼之。但是，红军于十三日主动弃城而去，第八师得以重守南丰。陈诚兴冲冲地聚兵而来，却被红军甩掉，又急忙寻找红军主力，最终败绩而归。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兵力，发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专门对着苏区和红军 采取“步步为营，层层筑垒”的围困战术，划分三路大军，由北路军担任主攻。陶峙岳的第八师被派到北路军，但陶峙岳对攻打红军失去信心，遂请求担任守备任务。次年，他又索性要求调往总预备队，负责后方工作，没有与红军直接交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蒋介石获悉红军主力早已突围西征，立即停止“围剿”，拟定追堵计划。第八师奉命进入苏

区，执行“清剿”任务。

陶峙岳的第八师是一支湖南杂牌部队，蒋介石不予以重视，只是需要时把它推上前线当炮灰。部队既得不到物资装备上的补充，经济上也甚为拮据。但是在陶峙岳的带领下，这支部队也勉强维持下来了，正如朱绍良所言，第八师若不是陶峙岳的关系，早就完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时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把陶峙岳的第八师从江西调往甘肃，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当时红军主力西征北折，已离开草地，决定经甘肃往陕北开去。第八师奉命在陇西武山、华家岭一带阻击红军北上。陶峙岳对连年内战十分不满，在江西参加“围剿”时，只因上司督战，暗恨没有机会，这次碰到了红军主力，便虚张声势，主动让路，红军得以安全通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留，陈诚、朱绍良等军政要员也被软禁。当时第八师驻防海源，陶峙岳闻讯后十分高兴，他希望蒋介石能停止内战，致力抗日。虽然海源离西安很近，但陶峙岳没有派兵出击西安去解救上司们，因为他不愿去干自己不情愿的事。事后，陶峙岳受到指责，说他对蒋委员长没有诚意。陶峙岳嗤之以鼻，只当作是耳旁风。

一九三七年，陶峙岳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被调往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

##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陶峙岳出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军中将军长兼第八师师长。当时，他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惊闻卢沟桥事变，立即赶回部队驻陕西防地，请缨抗战。长期的内战烽火，使他十分迷惘和苦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他激愤不已。他向部队讲述倭寇侵华的惨痛史实，以历史上抗倭名将戚继光、林则徐、左宗棠等激励将士们的爱国热情，教育部队怀着必死之志，英勇抗击外来侵略。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陶峙岳立即率部南下上海。九月十九日部队刚到上海，官兵在陶峙岳的影响下求战心切，连夜发起了蕴藻浜战役。此后，在激烈争夺的淞沪战场上，陶峙岳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虽然在物资装备补给困难的情况下作战，但由于官兵上下士气振作，与日军激战了二十一个日日夜夜。直到十月十日，陶峙岳的部队奉命撤出战斗时，除后勤人员外，战斗兵员还剩有七百余人，就连胡宗南这个顶头上司也颇为满意地对陶峙岳说:“想不到你们几杆破烂枪，打得这样不错!”

一九三八年九月，胡宗南为了扩充自己实力，排斥异己，突然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名义，下令陶峙岳与第一军军长李铁军对调。这个李铁军是胡宗南心腹，对调时

根据胡宗南的意图，把所有第一军军部班底都带走了。陶峙岳知道胡宗南借调职的幌子吞去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内心极为气愤，但他从抗战大局着想，不计个人利益，接任了第一军军长之职，重新组织军部。经过陶峙岳的精心整训，第一军上下官兵团结一致，士气颇旺，多有求战之心。在陶峙岳的指挥下，第一军成为一支抗战劲旅。陶峙岳因治军有方，备受同僚们的尊敬。

一九四〇年夏，胡宗南见陶峙岳领导部队做出了成绩，深恐危及自己的权力，即派心腹丁德隆接任第一军军长，调陶峙岳充任三十四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陶峙岳身为堂堂一名副总司令，但一切军政大事问不到讯沾不上边。实际上他被置于闲散之位，深感报国有心而无用武之地，遂题一首七律，借以寄意：

偷得闲时出帝城，攀登无处不心惊。
投书泪洒苍龙岭，拒召名传落雁峰。
瓦釜雷鸣谁独醒，金瓯璧碎赖群英。
身经太华千重险，敢说长安路不平。

一九四一年四月，洛阳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他调，司令长官卫立煌指定陶峙岳接任此职。同时，陶峙岳还奉命兼任了陕西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长、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但是，陶峙岳只主张抗日，不主张内战，无论如何也不愿做昧良心的事，因此声明对上述职务只挂个名义，不负实际责任。

一九四二年八月，胡宗南扩军，把他的部队扩充为三个集团军，任命陶峙岳为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又派其亲信蔡棨担任三十七集团军参谋长，以监视和左右陶峙岳的言行。陶峙岳心里明白，这只不过是胡宗南在耍花招罢了，当集团军总司令几乎是徒有虚名。

一九四三年秋，陶峙岳又被无端解除了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一职，调往酒泉担任河西警备总司令。胡宗南还特意派他的参谋长罗泽闿向陶峙岳解释，免不了要说一些工作的“重要性”和“推崇”之词。其实，河西警备总部所拥有的武装力量，只有一个特务营而已，其余入境部队又不能调遣。陶峙岳自知没有应付各方面关系的“天才”，闲在胡宗南身边反而遭人白眼，去远方倒可以安静自在一点。直到全国解放，陶峙岳还挂着河西警备总司令这一空衔。拿胡宗南的话来说，无非是置陶峙岳于永世不得翻身之地。

## 五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四月四日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同）就职。张治中早就听说过陶峙岳的所作所为，赏识他的才干，并为他的处境深表同情。当时新疆局势比较复杂紧张，原主政者盛世才、吴忠信等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统治，激起人民的强烈反

抗，曾经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爆发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武装起义，长时与国民党军队相对峙。新疆地处边境重地，在国内外和平呼声高涨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才勉强同意张治中出使新疆。张治中主张对新疆实行“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方针，需要一个既主张和平又有才干的得力助手。在张治中看来，陶峙岳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于是，张治中即任命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到职后，积极支持和协助张治中工作，参加了张治中召开的各次大小会议，并由他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各部队，要求各部队遵照执行。在张治中严格要求“驻军不许干涉地方事务”的嘱托下，陶峙岳主管驻军的整训，维护地方秩序，从不介入政治。由于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努力，新疆三区代表到迪化举行正式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于六月六日成立新疆省民族联合政府。这样，新疆紧张复杂的局势，逐渐得以缓和。

陶峙岳十分关注国内局势，对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破坏国内和平的行径极为愤慨，他赞成共产党提出的正确主张，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表示友善，他还关怀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被盛世才囚禁在新疆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六年五月中旬，张治中根据周恩来的委托，郑重地与陶峙岳商量护送这批共产党员回延安的问题。陶峙岳立即表示赞同，并找来总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向他说明情况，请他拟出一个详细的护送计划。计划安排十部十轮大

卡车，配备有军医人员、军需人员、通讯人员，每车又配加一个照料人员。为了确保安全，还配备了一个排的武装。在派谁担负护送任务的问题上，陶峙岳又向张治中保荐了刘亚哲。因为刘亚哲办事稳重，认真负责，而且护送计划是由他拟出的，更重要的是他对沿途情况比较熟悉。张治中听陶峙岳这么一说，也就放心了。六月十日，重获自由的方志纯、杨之华、马明方等一百三十余名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在刘亚哲的武装护送下，从迪化向兰州进发。当时，陶峙岳为这批人员的安全问题而担心，因为去延安的必经之地由胡宗南势力把守。但是，刘亚哲没有辜负张治中、陶峙岳的重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化险为夷，七月八日安全抵达延安。

一九四六年夏，陶峙岳被调到兰州，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身为军政长官的张治中因多数时间不在兰州，遂委托陶峙岳代理处理军政长官公署的日常事务。西北情形比新疆更加复杂，陶峙岳以他清醒的头脑和公正的态度，周旋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四省，平息了一件件棘手的案子。他在兰州主政期间，西北局势比较稳定。

陶峙岳赴任兰州后，宋希濂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一九四七年五月，新疆省府改组，张治中免兼了省主席一职，另一主张和平的副主席调往南京，由原省府监察使麦斯武德接主新疆。宋希濂主张“以游行对付游行，以请愿

对付请愿”来反对三区人民政府；麦斯武德推行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青海马家集团又指使阿山专员乌斯满常常挑起事端。这样，新疆省民族联合政府为之夭折，新疆各民族间关系又紧张起来，新疆局势复呈动荡不安状态。在此险恶的情况下，一九四八年八月，张治中还是选定了陶峙岳，令他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入疆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立即入疆，挑起了扭转新疆局势的重担。为了使矛盾更快地得到缓和，是年十二月，张治中电令改组省府，复命包尔汉出任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就职前亲自前往陶峙岳处，向陶表白自己要安定全省、团结各民族实现和平的决心。陶峙岳为能与包尔汉重新搭档而高兴，立即许诺应允。

平津战役后，国民党政府江河日下，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推出李宗仁代行总统，自己则幕后操纵。

一九四九年二月，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电令陶峙岳将新疆驻军除留一个旅担任边防之外，其余全部调入关内，并召陶峙岳赴南京面议大计。率兵入关，意味着去参加内战，素来以民族事业为重的陶峙岳，不想再为国民党政府充当鹰犬。而且，新疆为祖国边陲要地，外有强邻，内有多民族杂居的复杂关系，军队就是保障边陲局势安定的决定因素。当时驻疆部队，计有警备总部，驻疆联勤总部系统的物资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近十万人，师旅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历来各持政见。其中，警备总部副总司令赵

锡光，总部参谋长陶晋初等力主和平。他们常与省府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市长屈武等爱国人士联系，暗中商谈和平解放新疆问题，并经常试探陶峙岳对新疆前途问题的想法。陶峙岳虽然与他们的想法一致，但不好明确表态。因为陶峙岳身边有胡宗南和青海马家势力安插的亲信。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是马步芳的外甥，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为了镇压三区人民起义，受马步芳派遣而入疆，并且控制了一定的军权。第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是胡宗南的嫡系，掌握着北疆的全部兵力。第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是一个军统特务，也是胡宗南的嫡系。罗恕人与马呈祥的关系很好，叶成则倾附其间。他们三人结成联盟，以马呈祥为中心，罗恕人为主谋，反对和平起义。陶峙岳为慎重起见，以整编部队为名，召集师旅长以上军官会议，实际讨论部队入关问题。陶峙岳借机试探一下部队上层骨干的意向，结果是意见分歧，无法作出决定。以赵锡光为代表的一批军官坚决反对入关，而以马呈祥为代表的一批军官则极力主张入关，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僵持不下，最后把决定权交给陶峙岳。陶峙岳脑子里所想的就是一条：稳住军队，以保证新疆和平事业的顺利进行。但是，南京的召唤，如不应命，则有抗命之嫌，部属也可能不服。因此，陶峙岳果断采取拖延应付的办法，以便对付南京政府和主张入关的将领，借以赢得时间。同时，他抽调驻哈密的一个团东移至安西、酒泉一线，虚张声势，说是作为入关的

先行。实际上这个团是为保护玉门油矿而去的，并没有继续东移。

为了达到拖延应付的目的，陶峙岳亲自执笔拟了一个详细的部队开拔计划。计划强调，十万人的大军，要经过数千里又极少人烟的戈壁滩上行军，必须作好充分准备，沿途需要设补给站，需要大量运输车和汽油，以及其他物资，并需要开拔费用八百万元。开拔计划报得大，行动经费要得多。国民党南京政府正行将土崩瓦解之时，无法满足这些要求；而且计划也是合情合理无可驳辩的，李宗仁无法指责，部队将领也不能怪三怪四。开拔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陶峙岳这一着乃万全之策，从容不迫地解决了新疆局势这个举足轻重的“难题”。如果不是陶峙岳的远见卓识和超人的谋略，以后新疆和平解放的实现就比较困难了。

## 六

随着关内局势的转变，新疆军政人员拥护起义和反对起义的斗争越来越具体化。

陶峙岳与包尔汉互相配合，共同努力，遵循张治中对内和平，对外亲苏的一贯主张，秘密进行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准备。在关内的张治中也常常通过刘孟纯，把最新的消息转告给陶峙岳。作为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的一举一动都会对新疆的政局引起极大影响。所以，他对新疆和平事

业的态度十分稳重。事情未到临头，若有不慎，个人生死不要紧，新疆千万人遭受灾难，那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稳定军心。因此，陶峙岳不发表露骨的议论，常常保持缄默，以严守机密。

当时，陶峙岳还与驻兰州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兼一二〇军副军长彭铭鼎和驻张掖的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等爱国将领常有联系，他们内外相互呼应，但外表则极为冷漠。就是同他关系密切的参谋长陶晋初，陶峙岳也是守口如瓶。陶晋初是陶峙岳的族弟，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跟随陶峙岳。他时常看一些进步书刊，同情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并且会见过徐特立、叶剑英等著名的共产党人，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和平事业忠心耿耿，因而一直受到陶峙岳的信任和器重。陶峙岳这样保持缄默，陶晋初有些不解，甚至误认为这位警备总司令对和平事业途中变卦了。一九四九年五月，陶晋初给陶峙岳写了一份意见书，其内容主要是就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发表了他个人的看法，最后又劝说陶峙岳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新疆近十万官兵的生命，不要再为独夫效劳了。陶峙岳读后十分佩服，为有这样的鼎力助手而感到由衷地高兴。而陶晋初见总司令仍然缄默，一度失去信心，后经陶峙岳诚恳相待，坚决挽留，才把他留下来，继续致力于新疆和平事业。

而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人，是新疆和平道路上最

大的障碍。他们经常在陶峙岳面前软磨，要求入关。陶峙岳以超然的态度，从许多利害方面对他们恳谈，既表示对他们的关心，又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这年七月，在北平的张治中给陶峙岳发来专电，指示应根据形势的发展与包尔汉、屈武共商对策。并在电文中说，新疆军政人员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心。陶峙岳十分高兴，对新疆和平事业的前景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决心。

七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任命马步芳接任西北军政长官。此人忠于国民党，骄横跋扈，根本不把陶峙岳放在眼里，直接指挥其亲信马呈祥等人。这时，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北，兰州形势日趋紧张，新疆也随之更加动荡。但陶峙岳对和平事业的决心丝毫未减，暗中为和平而奔劳。

为了相互呼应，采取一致行动，陶峙岳决定去南疆，同驻南疆的副总司令赵锡光商量。八月中旬，这两位爱国将领在焉耆赵锡光的第四十二师第一七八旅旅部举行秘密会谈。两人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对和平没有诚意，为人民所唾弃，必然会彻底崩溃。他俩都真诚地表示，不能背叛人民，不做历史的罪人，要把维护新疆局势的稳定、保障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当成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俩还交换了南疆和北疆的情况。最后相约三条，大意是：一、待解放军接近，派员去接洽，把部队交出去接受和平改编；二、事成之后，两人都解甲归田；三、部队改编时，

要求不能惊动三区民族军。其中后两条说明他们当时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三区民族军的性质还缺乏全面的认识，但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长期处于封闭式的旧军垒中，能作出这样的决策也就难能可贵了。这次会谈，没有第三者插手，所谈内容，当时没有局外人能够知道。

陶峙岳在积极准备走上和平道路的同时，闻讯共产党将于九月在北平组成新政府，苏联方面即将予以承认。他认为局势已进入了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再有犹豫了。于是，他授意物资供应局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克浔等将领，分别联系部队中有关系的中下级军官，作一些走和平道路的思想工作。

八月，国民党特务造谣，说三区政府要进攻迪化，弄得人心惶惶。陶峙岳、包尔汉立即派代表前往三区谈判。三区代表说，三区政府未曾有进攻迪化的预谋，这纯属国民党特务造谣和挑拨。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双方都表示愿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保证不动用武力。

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战事逼紧新疆，新疆内部局势随着关内的急剧变化而更加紧张混乱。为了控制军队，陶峙岳与参谋长陶晋初等商议，决定把骑兵第一师送走，其他部队不动，以免日后把马步芳引入新疆招来更多的麻烦。这时，罗恕人坚决要带部队跟马呈祥的骑一师一同入关，并怂恿叶成也跟马呈祥走。八月底，陶峙岳召开会议，研究马呈祥等入关方案。会上一致认为，单是骑一

师开拔，可以集中车辆一次送完，如果罗恕人，叶成的部队一起撤走，那就比较困难。马呈祥挂念关内家属，迫切要求入关，并力主在星星峡设防，阻止解放军入疆。但是，入关之路遥远，物资没有充足的供给，他们一起走又走不动，又使他们坐卧不宁。罗恕人则急得跺着脚说："我老早就主张撤退，总是迟疑不决，现在弄到这个地步，真是欲哭无泪。"

这时，关内大部分地区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九月五日，继兰州之后西宁获得解放，马步芳乘飞机仓皇逃往香港。马呈祥失去了上司，入关无依托，不入关则解放军日益逼近，一时慌了手脚，竟不知所措。为稳住马呈祥，陶峙岳每天都用自己的卧车把他接到家中，备下清真饭菜，做说服工作，但毫无效果。

九月上旬，马呈祥、罗恕人、叶成三人决定孤注一掷，要把主张和平的包尔汉、陶晋初、屈武等杀害，并要绑架陶峙岳，在新疆制造动乱，挑起民族分裂，破坏新疆的和平事业。一天深夜，他们三人集于老满城，布置要在九月二十一日进行暴乱。但是，叶成平日觉得陶峙岳对他相处甚好，不主张绑架陶峙岳，遂建议征求总司令的意见。马呈祥、罗恕人当时尚未察觉陶峙岳另有打算，经过慎重交换意见，勉强同意叶成面见陶峙岳。时已就寝的陶峙岳被频繁的敲门声惊醒，急忙披衣而起。叶成闪入房内，气喘吁吁地对陶峙岳说："马呈祥、罗恕人认为您近来

态度变了，一定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君侧’，决定要把主张起义的包尔汉、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您，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陶峙岳不动声色，待叶成说完，用十分和蔼的口气问道：“你们第二步又该怎么走呢？”陶峙岳的高度镇静和博大胸怀压倒了叶成，使他惊慌失措，语无伦次。陶峙岳趁势稳住了叶成，并立即摇通电话，用极恳切的语言约马、罗前来。他们二人慑于陶峙岳的威望，又见叶成已被扣留，只得驱车而来。陶峙岳即以商量的口气直接问他们：“你们要抓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做，于你们有什么便宜？”这话击中了他们的要害，他们相顾默然。接着，陶峙岳因势利导，与他们一直谈到东方发白。他们也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只得悻悻告别。

为了防止危机的复发，次日下午，陶峙岳以过人的智勇，只身闯入老满城马呈祥驻地。马、罗、叶正在开会，一见到陶峙岳都惊异不安。但见陶峙岳连一个随从人员也没有带，就消除了顾虑。陶峙岳若无其事地与他们打招呼，随便往会议桌边一坐，参加了他们的讨论会，缓和了紧张气氛。随后，陶峙岳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的前途着想，以爱憎、是非、利害关系相劝慰，比先晚说得更为详尽透彻。他们既拿不出好办法，又驳不倒陶峙岳的说理，于是问道：“你是不是想拿我们作政治资本呢？”陶峙岳说：“对于

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所想的是近十万官兵及家属的安全，是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经过半日长谈，陶峙岳自始至终以诚恳态度相处，他们似乎感到陶峙岳对他们颇为信任，处处为他们着想，精神武装也就动摇了。

正在这节骨眼上的时候，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从伊犁秘密来到了迪化，会见了陶峙岳、包尔汉，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向他们表示慰问并给予鼓励。同时，他带来了由毛泽东主席发来的张治中给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张治中电示:“……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当时国民党李宗仁政府已迁往广州）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希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布置……兄意如何？盼即电复。”张治中还单独给陶峙岳发了一个电报，详细询问了新疆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民族等许多实际问题。陶峙岳热情地接待了邓力群，就新疆军事方面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并表示不顾个人安危和誉毁，决心义无反顾，不辜负毛泽东主席的德谕和张治中的期望。他即与包尔汉给张治中复电，电称要“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军队“即由陶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同时，陶峙岳以个人名义就新疆形势另拟了一份详细电报回复张治中。为了确保邓力群出入

新疆的安全，陶峙岳亲自选派自己的警备部队妥为保护。

九月十八日，陶峙岳亲自下令派曾震五乘吉普车星夜奔赴兰州，协同彭铭鼎部署河西局面，有机会则迅速与兰州解放军联系，与新疆取得一致行动。

新疆和局初定，但形势仍旧比较复杂，尤其是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反对派掌握着很大一部分军权，危机仍有可能发生。陶峙岳继续对他们间接或直接做工作，劝他们选择一条比较明智的路，把部队交出来，以排除起义的最后障碍。这时，马呈祥已获知其关内家属安全逃往广州，而且马步芳逃走时一直没有发给骑一师应得军饷银洋五万元，使他感到马步芳太无情谊。而叶成是一个惧内的人，他的老婆闻知他要暴乱，又哭又闹，害怕死无葬身之地，这使叶成左右为难，迟疑不决。马、罗、叶三人欲谋暴乱的意见没有取得最后的统一。同时，陶峙岳、包尔汉派人牵制马、罗、叶三人，请他们赴宴，与他们摸牌打麻将，使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最后，他们三人在内外因素的夹击下都灰心丧气，表示愿意交出部队，但要求离疆出国。陶峙岳为了争取他们，劝他们留下来为和平事业出力，并表示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由于他们对和平缺乏认识，坚决要走。陶峙岳宽以待人，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最后礼送出境，并欢迎他们什么时候思想通了就什么时候回来。事后有人不理解，说是放走了反革命分子。王震将军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给予澄清：这件事做得对，与共

产党统一战线的道理是相通的，不但不要指责，而且应该给予表扬。

九月二十二日，张治中再次给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除嘉勉外，指示立即派人与解放军接洽。而陶峙岳早已派曾震五去了兰州。

九月二十三日，胡宗南给陶峙岳来电，骂他跟共产党走太糊涂，要他明白答复。陶峙岳坚定沉着，根据新疆特殊的地理条件，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便托辞处境困难，分别给蒋介石、胡宗南拍了电报，敷衍了事。

九月二十四日，彭铭鼎以陶峙岳的名义（当时陶峙岳仍领有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河西警备总司令的头衔）在酒泉通电起义。同日，曾震五代表陶峙岳在兰州会见了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商谈了新疆、河西的和平问题。同日下午，陶峙岳派刘孟纯与包尔汉商量，军队要比政府早一天起义，以便能以军队稳定人心，当即得到包尔汉的同意。

一切准备就绪，九月二十五日，陶峙岳率领全疆近十万官兵通电起义，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加入人民阵列。陶峙岳通电起义的消息立即飞遍迪化，全城为之沸腾。用各民族文字书写的彩色标语贴满大街小巷，人们走上街头，庆祝的人群自动组织起来，传出一阵接一阵的热烈的欢呼声。

次日，根据陶峙岳事先的预约，新疆省政府以包尔汉等领衔也发出了起义通电。至此，新疆全省宣布和平解放。

九月二十六日，为了使起义后的新疆很快稳定，陶峙岳从实际情况出发，致电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请求迅速派人民解放军入疆。

九月二十七日，在省政府西大楼前的广场上召开了和平大会。陶峙岳、包尔汉等军政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并向全疆各地发了通电。邓力群也应邀到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给全体新疆起义人员复电慰勉，称赞他们“立场是正确的”，“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并希望他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彭德怀副总司令还给陶峙岳发来专电，表示热烈的慰问。

新疆起义，是陶峙岳戎马一生中最光荣的一页，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他走上了光明大道。

## 七

新疆历来情势复杂，长期受封于边关，大多数人对共产党缺乏真正了解。正如陶峙岳所预见的那样，新疆和平

起义后，局势还不太十分稳定。一些起义官兵对共产党颇不信任，对起义有些不满；少数顽固分子从中捣乱；特务分子乘解放军未入疆鼓动闹事。他们散布谣言，说："陶峙岳怕人刺杀，坐飞机跑到内地去了"。"三区民族军要与解放军打仗了。"到了晚上又乱放黑枪。骚乱终于发生了。迪化、哈密出现了抢劫银行、商店现象；南梁出现军人抓、打无辜群众的现象；一些反动军官对士兵进行裹胁，甚至策反闹事……陶峙岳深知事态棘手，但是头脑仍旧保持高度的冷静。他认为，稳定军心，消除军民顾虑，是整顿社会治安的关键。因此，他把宣慰工作摆在首位，自己以身作则，经常深入部队，向官兵说明为什么要起义的道理。有一次，他到玛纳斯县城对起义官兵讲话。当时官兵思想混乱，有些不法分子企图在会场暴乱，弄得会场纷纷扰扰。这时许多人为陶峙岳的安全捏一把汗，劝他赶快离开。陶峙岳面临严重事态，从容不迫出现在大会上，大义凛然地拍着胸脯说："谁要开枪，就向这里打吧！"他的无私无畏的气概镇住了哗乱。

在宣慰工作的同时，陶峙岳对各地发生的骚乱事件严格把关，及时处理。他派警备总部的检察课长刘尊贤组织军法组，授以处理全权，到各出事点深入调查核实，视其情节轻重，适当给予惩处。他又派刘敦为救济组长，携带钱财被服等物资救济灾区人民，从而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起义部队的声誉赖以提高。他还采取断然措

施，派高级参谋银豫章负责处理和制裁新疆境内的特务，对其中罪大恶极者予以镇压。

在平定骚乱期间，陶峙岳没有忘记与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他驰奔酒泉。七日，他在酒泉会见了彭德怀和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彭德怀极其诚恳地对他说："陶将军，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彭德怀的开场白，消除了陶峙岳紧张的心理状态。陶峙岳介绍了起义的经过，汇报了新疆的复杂形势，商谈了起义部队的整编和改造，以及迎接人民解放军入疆等重大问题。彭德怀对新疆起义作了正确评价，赞扬陶峙岳弃暗投明，做得很对。彭、王、陶三人都是湖南同乡，乡音未改，格外亲切。他们畅所欲言，无所不谈，虽是初次面晤，却象碰见了老朋友那样无拘无束。陶峙岳在酒泉呆了三天，参观了人民解放军军容，了解到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严明的纪律，对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工作、生活等方面作了细致的观察。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倍受感动。十日，陶峙岳回到迪化，继续领导平定骚乱的工作，同时又积极筹备迎接人民解放军入疆。

由于通过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接触，十月中旬，陶峙岳即发布了著名的《告全疆将士书》。文中首先就利害、是非关系对官兵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指出："忘掉了利害和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只要弄清了利害

是非，就不会有愤慨，就不会有牢骚，就不会有忿恨，更不会有任何不幸事件的发生。”他从新疆特殊的军事、地理、环境、民族关系等方面分析，指出只有走和平的道路，才不致于“十万军队盲目的牺牲和地方秩序的紊乱，人民流离失所乃至引起民族的仇杀”，从而“保全了国家的元气，拯救了人民，保护了袍泽。”“我们动机是纯洁的，我们行动是光荣的，大家不要上反动分子的当。”他又运用中国历史自辛亥革命以来政局动荡的对比，指出以往的政府“违反了人民的利益”，“失掉了人心，士气不振”，才遭致失败；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有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有代表人民的党。”文中还特别提到他去酒泉会谈三天三夜的情形，指出:“我们今天认清了共产党，认清了人民解放军。以往的宣传确有错误，知道他们的内容实在太少了，就受了一些无稽的诳话的欺骗，把共产党描绘成一个暴戾的集团，……”他还谈到，人民解放军开驻新疆，“完全是因为国防的需要和努力新疆的建设，不是来解决任何部队，对我们只有合作，绝无其他恶意”。在文章的最后，他向全体将士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严守岗位，遵守纪律；二，免除恐惧心理，改变态度；三，和人民解放军合作，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告全疆将士书》发布后，引起全疆将士的极大反响，澄清了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消除了他们的顾虑，骚

乱明显地减少了。

按照酒泉会谈的计划，十月二十日，王震率领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大部队陆续进入新疆。陶峙岳早就作好了迎接的准备，并满怀激情地作了《迎王震将军入疆》一诗，表达了他和塞外军民对人民解放军的热烈感情。诗云：

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度玉关。

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迓尽开颜。

人民解放军入疆后，立即接管了各大城市的防务。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骚乱一天天地被平息了。

十二月二日，彭德怀、张治中分别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十二月九日，两人到迪化，受到热烈欢迎，并在陶峙岳、包尔汉的陪同下在南大街商业银行大楼的阳台上检阅了“三军”入城式。彭、张就部队整编和地方政事，与陶峙岳、包尔汉等进行了商讨，并作了具体部署。经研究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并报请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彭德怀还指示，从第一兵团抽调一千五百六十余名干部到起义部队，加强各级领导力量。

十二月十七日，根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指示，新生的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彭德怀兼任司令员，王震、陶峙岳担任副司令员，三区民族军首领赛福鼎也担任了副司令员。此时，陶峙岳还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十九日，起义部队开始集中改编。陶峙岳以起义最高

指挥官名义发布了《为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要求全体起义官兵根据新政协共同纲领军事制度一章中的精神，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并强调指出：一，部队实行合理编并；二，人事作公正合理调整；三，政治工作制度要确实建立；四，劳动生产要尽力做到。新疆起义官兵近十万人，其中参加起义的警备总部计有三个整编师又两个独立旅及边卡部队共六万八千余人，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参加起义的还有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系统驻疆支部和空军地勤人员共三万余人，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其他部队。三十日，第二十二兵团在迪化宣布正式成立，陶峙岳担任兵团司令员，王震担任兵团政治委员，原警备总部副总司令赵锡光任兵团副司令，原总部参谋长陶晋初任兵团参谋长。

## 八

第二十二兵团成立后，陶峙岳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造起义官兵的世界观，使部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在中共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的直接领导下，二十二兵团建立了各级军政委员会或军政小组。兵团军政委员会由兼司令员陶峙岳、政治委员王震、副司令员赵锡光、参谋长陶晋初和政治部主任李铨五人组成，从而加强了党与非党的军事干部的合作共事关系，以便更好地改造部队。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二兵团在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民主运动和诉苦运动，特别是通过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党、人民政府和反动政府两个政府、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两种军队的对比，联系部队和个人的实际，使官兵们进一步分清了是非，提高了阶级觉悟，加强了官兵之间的紧密团结，从而树立起爱国主义和主人翁思想。在这个阶段，陶峙岳惟恐跟不上形势，处处以身作则，从我学起，从头学起。他开始认真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理论书籍，常常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并且身体力行，努力实践，给部队树立了风范和榜样。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新疆军区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给二十二兵团下达了一年垦荒二十万亩的任务。由于部队开展了民主运动和诉苦运动，使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陶峙岳的率领下，兴高采烈地奔赴生产前线。垦区都是万古荒原，人烟极少，既无民房，又缺少帐篷，遍地杂草丛生，繁殖着各种野生动物，不经意就会踩上一条蛇，入夜时常常会看见豺狼的眼睛瞪着蓝绿色的凶光，一到夏天，蚊虫和牛虻多得令人难以忍受。在戈壁滩上，有时会狂风忽起，飞沙走石。运输时常中断，物资供应困难。所用的工具是原始的十字镐、砍土镘、土犁铧等，就连这些原始工具也不容易做到人手一件。在这极其艰苦的环境里，陶峙岳毫不畏

惧，与年轻的战士同甘共苦，而且他亲自带头参加垦荒、开渠、植树等繁重劳动，为广大军垦战士作出表率。在繁重的垦荒劳动的同时，他经常做部队的思想工作，殷切地“希望大家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乐观地对待各种困难。根据部队的实际思想情况，他有针对性地指出:“有极少数的人，对生产意义的认识还不够，或者还有根本就没有认识的。”他要求广大官兵心里存着一个“锦标主义”，不要有“本位主义”；要“做长期打算，不仅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要准备在这里建家。”他还着重强调:“要站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上，发挥自己的力量，努力改造做新人，建设新中国。”经过广大干部战士的辛勤劳动，陶峙岳领导的第二十二兵团，在一九五〇年这一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垦荒二十三万余亩，超额完成了军区布置的任务，实现了蔬菜、肉食和粮食的自给或大部自给，打赢了军垦第一仗。

“铁臂银锄，屯垦戈壁；雄心壮志，挥汗荒原。”陶峙岳领导第二十二兵团，在农工牧商的生产热潮中，创造出许多新疆有史以来的奇迹。

千里戈壁，历来被认为是不能种植棉花的，事实上也从未有人在那里种植过棉花。一九五〇年八月，在陶峙岳的直接领导下，小拐却出现了新疆有史以来的第一块棉花地，并且获得了丰收。鉴于这一经验，一九五一年冬，新疆军区向第二十二兵团提出了在一九五二年玛纳斯垦区

植棉二万亩，实现亩产籽棉二百公斤的任务。为了确保这个任务的完成，陶峙岳立即会同王震、陶晋初和前来新疆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迪托夫等，在石河子签订了一份分工负责的合同，由陶峙岳和陶晋初具体负责，保证生产承包单位将牛羊厩肥等物资及时运到棉田，迪托夫负责技术指导，王震负责组织进行统一领导。陶峙岳满怀信心地在合同上签了字。合同签订后，陶峙岳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争夺棉田丰收的斗争，经常深入各团场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一九五二年冬，兵团在石河子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植棉技术训练班，陶峙岳又经常与普通战士一起，参加听课。在兵团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终于使棉田获得了丰收，亩产籽棉超过四百斤，创造了当时全国棉花产量的最高纪录。玛纳斯垦区一举成为全国产棉基地之一。

生产如同作战，指挥官同样需要讲究指挥艺术。垦区地势平坦，耕地多系自流灌溉，便于机械化作业。于是，陶峙岳毫不保留地拿出了多年积蓄的一千元现大洋和几条“黄鱼”（金条），来购买农垦机器设备。在陶峙岳的倡导下，一九五一年春成立了兵团机耕队。一些机耕事宜，陶峙岳亲自处理。于是，新疆又出现了机械化操作，给农业大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二十二兵团军垦一开始，陶峙岳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得到国家的重视。这样，新疆的各条大河流从此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同时，

陶峙岳还重视植树造林工作，克服了风沙灾害，升高了地下水位，维护了生态平衡，保证了生产建设的发展。

生产离不开交通运输，离不开经济贸易。为此，陶峙岳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进行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工作，不长时间，就在新疆的土地上出现了一座座“戈壁明珠”。著名的石河子、奎屯市等垦区变成了绿树成荫、道路整齐、工厂林立、农工商综合发展的新型城市。

在新疆军民屯垦生产的同时，以谢尔德满为首的一伙人拒绝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继续与人民为敌，时常骚扰军民。谢尔德满的父亲乌斯满，因反对新疆和平解放，组织叛乱，最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谢尔德满为了替父复仇，纠集一批乌合之众，袭击人民解放军，抢劫财货，引起全省军民极大愤恨。为了使全疆人民生活安定，陶峙岳一边指挥生产，一边组织部队进行围剿。一九五三年元月，谢尔德满势穷力竭，被迫投诚。

为了加强新疆生产建设的统一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一九五四年八月六日，总参谋部电复新疆军区，同意将第二十二兵团与其他部门合并，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陶峙岳继续担任兵团司令员，同时他仍然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在陶峙岳的领导下，继续发展生产，使垦区出现了一座座正规化国营农场，使新疆一天天走出贫困落后的古道，跻身于繁荣昌盛的行列。一

九五九年十一月，国家农业机械技术会议决定，新疆东排子二场，列为国家新疆地区棉花生产机械化、系列化试验农场。一九六〇年六月，全国农业机械化、系列化会议在东排子召开。同年，东排子二场获国家国营农场标兵称号。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王震、贺龙等前来新疆视察。一九六三年，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也慕名前来参观。《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新民晚报》以及港澳各报刊，对新疆农场的建设开发情况多所报道，所制农场模型曾送日本展览。开发后的新疆，正如贺龙元帅所说："赛过当年的南泥湾，成为名副其实的塞外江南。"这是新疆全体军民的光荣，也是陶峙岳的光荣。

"如带农场，豺狼不敢窥马；高原牧野，军民更好放羊。片片绿洲，行行林带，莫非血汗浇成；矗矗烟囱，锦装城郭，都是英雄建树。"这就是塞外新疆的景色。

新疆自和平解放以来，在陶峙岳等领导下，创造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奇迹。新疆的开发，更是一大奇迹。陶峙岳在参与创造这一奇迹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呕心沥血，是继新疆起义之后，又一次为人民为国家立下巨大的功勋。

## 九

陶峙岳少年从戎，追求真理，以身许国。他敢于冲破家庭的束缚，但又不愿为追求个人温饱和家庭的安乐而碌

碌无为，而是顽强地选择了自己要走的道路，曾写下了“男儿志四方，安敢事株守”的豪迈诗篇。

为了实现自己远大的抱负，陶峙岳力求练就一身扎实的本领。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就是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还经常利用余暇时间工诗词，练书法，研究历史，切磋军事。由于他有较高的文化品德修养和军事理论修养，在国民党军队中享有较高的声望。早在护法战争时期，他受命组建“护字营”，把一群肆野成性的土匪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正规军，初次显露了他的才华。抗日战争时期，他能够在情况生疏的第一军里，把这支军心涣散的部队整顿成一支士气旺盛的抗日劲旅。就是在胡宗南几度夺去他的兵权的时候，也只能是对他的官衔有加无减。因为胡宗南也在利用陶峙岳的声望作招牌，表明他胡某能“兼收并蓄，善用人才”，从而达到既不招致诸将的愤懑，又置陶峙岳于有职无权之地的用心。陶峙岳从亲历的事情中看到国民党军阀及官僚们的积弊，决心不同流合污，常常以史实引申为鉴，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人称他是一个洁身自好、有勇有谋的“儒将”，他是受之无愧的。

然而，陶峙岳并没有以“有勇有谋”自居，更没有以“高级将领”自诩，在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队中独树一帜。他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官场嗤之以鼻，对高官毫无兴趣。他的部下说他没有官架子，在行军中有马不骑，有

轿不坐，与士兵们一样草鞋赤足。有一次，他回家省亲，家乡人见这位堂堂的师长大人一身蓝布长衫的穿着，朴素得如同平民，惊讶不已，纷纷议论开了，说与常见的国军师长威风阔绰之举相比不伦不类。解放后，陶峙岳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司令员，却不愿图个虚名，处处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战士来对待，与官兵同甘共苦，扎扎实实地工作。

陶峙岳为官清廉，对婚姻与钱财也同样清廉。一九一一年他与周庆仪结婚，由于他戎马南北，驻无定所，夫妻俩长期分居。而陶峙岳不象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有大妻小妾一长串，他并没有抛弃结发之妻，解放后仍与周庆仪团聚。老两口互敬互爱，一直白头偕老。对于钱财，他曾经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钱财之好，是人之常情。我非不好财也，不过在名誉与钱财两者之间，要权衡轻重，更不能见利忘义。”他这种态度，在国民党要员中是极少见的。而陶峙岳一贯严律于己，认为自己还不太清廉，属于“伪善者之流”。解放后，他通过对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朴素生活的观察，不无感触，写下“抚今追昔，能不为之汗颜”之语。他深感自己不及人民解放军之俭朴，于是更加克勤克俭，从未向组织提出过物质上的要求。同时，他以自己的言行来教育他的子女，使他们没有染上纨袴习气。

陶峙岳与国民党军阀“不伦不类”之举，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思想上。他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干一番有

益于人民的事业。他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赞成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对内战，力主和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攘外必先安内”之气氛所充斥的国民党军营垒中，陶峙岳的思想明显地不太“合群”，因而他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和打击，曾一度被胡宗南置于闲槽，使他怀才不遇，忧国忧民。就在陶峙岳坐困愁城的时候，他得到了同路人张治中的帮助和合作，遂戍兵西北，挑起了保卫祖国边陲、维护民族团结的重担。

陶峙岳追求真理的道路是崎岖而又艰险的，但他一直在苦苦地探索。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日益溃败，为陶峙岳扫清追求的道路上的障碍带来了契机。经过精心酝酿，克服重重困难，他毅然率部义举，弃暗投明，把五星红旗插上了昆仑山、帕米尔和阿尔泰之巅，实现了他要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的崇高愿望。为了表彰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所立下的巨大功勋，一九五五年九月，他被授予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军衔，荣获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一九八八年七月，他又荣获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

新疆起义之后，陶峙岳通过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接触，消除了以往在国民党长期歪曲宣传下所产生的错觉，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认识大为改变。于是，他很快地打消了义举前曾与他的副总司令赵锡光相约引退的念头，决定跟共产党走，投身到人民解放事业的阵列中

去。从此，展开了他戎马生涯中全新的一页。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的才干得以充分发挥，他的荣誉得到高度珍惜，他的品德得到真诚敬重。他不再遭受嫉妒和排斥，相反，他得到的是高度谅解和信任。就拿职权来说吧，当时他是一个党外人士，但仍然被邀请参加由共产党所主持召开的各种军政会议，并欢迎他在会上发表意见，这使他有职也有权，丝毫没有空衔之感。逐渐地，他对共产党产生了感情，开始向往共产党，追求共产主义真理。

一九五〇年一月，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热情地与陶峙岳交谈，要他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陶峙岳则把加入共产党看成是自己一生中最严肃的课题，虽然向往共产党，但认为自己改造得不够，还不太符合条件。

同年二月，陶峙岳第一次谒见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与他亲切交谈，态度诚恳，平易近人，勉励他："要好好学习，自我改造，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这使陶峙岳想起了一九三〇年蒋介石在蚌埠火车上接见他的情景，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哼而已，那不可一世的态度与毛泽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事实证明，陶峙岳经过自己不懈地努力，过好了这"三关"，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也是这一年六月，陶峙岳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上，他看到的是和平、民主、团结的气氛。这与他一九四五年五月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次大会，他看到的是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一片乱哄哄之态。

经过一系列的对比，陶峙岳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一九五二年七月，王震又一次关心陶峙岳的组织问题，陶峙岳内心十分激动，但仍认为应该继续接受考验，诚恳地表示："是所愿也，不敢请也。我不敢轻易启齿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跟着党走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直到一九六五年，他才通过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的张仲翰向党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不久，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陶峙岳的入党问题被搁了下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重新确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路线，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陶峙岳看到了各条战线出现的喜人成绩，便在一九八二年五月，再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入党申请书上第一句话就写道："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有益于人类社会事业的实践。"表达了他要求入党的崇高目的。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陶峙岳正式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他万分感动，好象自己也年轻了。

陶峙岳还担任过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

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九七九年在湖南省第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他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九八三年在第六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陶峙岳在他的晚年，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抱病参加各种会议，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军队建设，一直兢兢业业地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实现了他晚年所愿:“但在有生之年，仍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竭尽绵薄之力。”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陶峙岳，走完了他追求真理的一生。享年九十七岁。

陶峙岳永别了，他的亲密战友国家副主席王震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撰文致以深切的怀念:

“陶峙岳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爱国爱民的革命军队的高级将领。他率领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很大功绩；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屯垦戍边所创立的功勋是永垂不朽、丹青有著的。”

（铁　石）



曾 日 三



# 曾 日 三

## 一

曾日三（1903—1937)，字恙男，出生于湖南宜章曾家湾一个书香门弟之家。父亲曾宪周，早年在旧县府当职员，民国后当了郴州一所中学的校长。曾宪周铭记祖训，对曾日三管教十分严厉。曾日三天资聪明，小学时即熟读四书五经，知书达礼，人称“才子”，被父母视作掌上明珠。十五岁时，他考入衡阳三师，成绩出类拔萃，但对“五四”运动后兴起的新思潮却漠然处之。有一次，宜章籍学友高静山邀集他参加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斗争，他怕开罪校方丢了学籍，婉言推脱。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个十足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子。

一九二二年夏，曾日三从三师毕业，父亲把他送到宜章县税捐局作职员，并按乡间陋俗，叫他和九岁时早已上门的童养媳成亲。秉性软弱的曾日三对此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是叹着气对父亲说：“如果要我这样过下去，我一辈子都不会快活的。”从此，他对这牢笼般的生活产生反

感，既无理财兴趣，也不愿在仕途上竞争，又不想按父亲安排的道路走下去，每日应付了税捐局差事，便闭门读书。不久，他辞去厌恶的差事，到近城第一区高小执教。由于他治学严谨，无官吏气，被推举为第一区学务委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曾日三的许多同学都投入了革命洪流。他开始时仍然抱着“唯有读书高”观念，游离于社会活动之外。北伐军经过宜章后，工农运动迅速兴起。他的堂姑曾朴是女子学校教员，担任宜章县妇女会长，对他影响很大。曾日三先是主张婚姻自由，进而支持妇女解放，并不顾父亲反对，支持妹妹素娥上了女子学校，颇有些革新气息。他对旧礼教的不满进一步滋长，过去的信念开始动摇，在革命浪潮冲击下，开始认识到了“久受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土豪劣绅之压迫”的现实，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加入了国民党。

大革命失败后，曾日三对政治再度表示冷淡。凭着“办教育”的热情，他在宜章教育界有了些名气。国民党右派势力拉拢他，委他为县劝学署督学官员。对此，他并不推辞。他的同学吴仲廉、吴汉杰、彭晒都是共产党员，他们通过曾日三的关系，把湘南特委派任宜章县委书记的胡世俭安排到碕石村承启学校任教，此后碕石村成为县委活动的中心。曾日三受吴仲廉的影响很大，他渐渐同情被惨杀的共产党人。有好几次，隐蔽在碕石的革命者有暴露身份的危险，都在曾日三的暗中帮助下安全转移到外地。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乔装智取宜章，把反动县长杨孝斌等县城头面人物在宴席上一网打尽。曾日三出来作陪，亦被当场逮捕。次日，县城召开万人公审大会，杨孝斌等被处死刑。吴仲廉将曾日三的平日为人和表现介绍给朱德，认为他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使他获释。在吴仲廉说服下，徘徊不定的曾日三打消了顾虑，答应“帮共产党办事”，开始协助县委编印宣传材料。一次，他随毛科文到西乡发动群众时，得知这里的土豪劣绅在大革命失败后以杀人吃肝为乐，并以各种“公局”名义，压榨农民血汗。曾日三义愤难平，一改平日文质彬彬的书生气，当即写下“猪公、狗公、猫儿公，公也不公，公道安在，公理何在，都是欺民之昏公；赌局、嫖局、洋烟局，局又分局，局内者甘，局外者苦，今日农工戳骗局”，号召农民起来斗争。二月六日，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接着，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组成，曾日三担任师部秘书。他随部队直接参加了对反动武装的战斗，多次跟师长胡少海、副师长陈东日分散到白石渡、梅田等地发动农民参军，开展土地革命。火热的实际斗争生活，使他的思想感情同工农更加贴近，他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是代表正义的力量。他不仅要摆脱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的桎梏，并且已决心抛弃优适安逸的“绅士”生活，跟着共产党走下去。四月初，他奉命到梅田通知龚楷、肖克率领的三师独立营向东撤退。在艰难的转移中，

有人哼起“低头思故乡”，曾日三为激励战士们斗志，带头引亢高唱《国际歌》。

曾日三随湘南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不久即由毛科文、胡少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到参加湘南起义，曾日三经历了人生重要的转折。他是个正直有为的知识分子，切身体验了旧制度对人的摧残，在共产党人启迪下使他看到新的出路和希望，终于催促他从旧营垒里杀出，离经叛道，走到革命队伍里来了。

## 二

井冈山会师后，宜章农军被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四军）二十九团。曾日三起初为团部秘书，不久又做组织干部，协助彭祜健全二十九团党的组织。在七溪岭战斗中，他腰揣两颗手榴弹，与宣传队员一起爬到前沿阵地喊话，瓦解敌军斗志。战斗中，他用缴获的枪支武装了自己。一次，部队打开遂川县城，曾日三带领一个班去清理敌人的军事仓库。有的战士主张把房子烧了，他却认为可以分给群众住，保住了房子，受到军部赞扬。一九二八年秋天，曾日三任红四军警卫连党代表。

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曾日三任军部秘书随军行动。他与曹里怀、吴仲廉等人一起，冒着漫天风雪，身上挂着几个墨水瓶行军。沿途，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他们以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出布

告，写标语，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一九三〇年八月，在浏阳永和镇成立红一方面军，曾日三担任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之后，他跟随毛泽东转战在“赣水苍茫闽水碧”的辽阔战场上，并在这时，他与引导自己参加革命的红军女将吴仲廉结为伉俪。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曾日三调红三军继李涛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一起，率领红三军接连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屡立战功。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敌二十五师企图逃向吉安，在方石岭遭到红三军迎头痛击。曾日三亲自指挥红八师炮兵连向敌人发炮，战斗激烈时，他跃入前沿阵地指挥战士们冲锋。这一仗全歼敌五十二师，俘敌五千多人，胜利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随后，红军在转移东固途中，路经渡坳峡，突遇敌人飞机狂轰滥炸，军长黄公略不幸中弹，牺牲前叮嘱身边的曾日三和毛泽覃等人代为指挥全军工作，并号召全军同志绝不可骄傲轻敌，应继续努力革命，以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红三军在曾日三和周子昆等人率领下，与兄弟部队并肩投入攻打赣州和漳州等战役，多次充作主力。一九三二年七月后，曾日三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立即投入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他随同周恩来、王稼祥一起，遵循北上作战计划，参加了乐安、宜黄战役和闽北的黎川、建宁、资溪等一系列重要战斗。

一九三三年一月，曾日三调任新建立的福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不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福建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被调离军区，由曾日三继任军区政委。他同司令员叶剑英一起，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统一了闽西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军区下设了岩永杭、汀清连、宁清归三个军分区，并且将上杭、南阳、旧县一带红军游击队组成红十九军。六月，红十九军改为十二军之三十四师，曾日三亲手起草了《关于三十四师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的请示报告》。不久，彭德怀率东方作战军入闽，福建军区所辖的各红军部队归彭指挥。曾日三带三十四师协助东方军作战，相继收复清流、宁化、归化、连城各县被敌侵占的城区要镇，军威大振。接着，红军又在朋口、连城、羊口等地歼灭敌十九路军中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七十八师三个团，给敌沉重打击。八月中旬，东方军主力挥师北上开始第二阶段的闽北作战，曾日三与三十四师等地方红军留驻连城，负责闽西防务，保卫中央根据地的东方前哨。一次，他率领独立第八、九团在上杭地方武装配合下攻打白砂团匪的土围子，有的干部战士临阵害怕，不敢攻坚。曾日三便在前沿阵地召集二营的党团员会，分析敌我态势，确定进攻步骤。随后他领头向敌人猛攻，战士奋勇冲上，迅速扭转了战机，取得俘敌二百多人，红军只轻伤两人的辉煌战果。曾日三把自己经历的这类战斗，常常写成文

章、通讯，发表在中央军委主办的《红星报》上，鼓励红军战士们的斗志。

一九三三年十月，曾日三参加福建省第三次党代会，并和郭滴人等组成编委会出版大会日刊。年底，他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跟随彭德怀投入第五次反“围剿”的血战。一九三四年一月，他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大”，并参加了大会主席团的工作。以后，他又担任过红五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从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到转战中央革命根据地，曾日三浴血奋战了七个春秋，聪明才智得到充分施展，锻炼成为坚强的共产党员，优秀的红军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 三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被迫长征，曾日三接替刘伯坚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与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等一起，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

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红军先头部队和中央机关开始长征后，曾日三等率红五军团仍在兴国高兴圩顽强抗击敌陈诚部的六个主力师，以迷惑敌人。直到红军主力过了信丰河，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曾日三才随后卫三十七团向赣南转移。一路上，他们既要迟滞敌人，打退敌人进攻，又要跟上主力，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部队不仅没受损失，也没有掉队的。进入湖南后，蒋介石调集

四十万重兵，采取前堵后追、两侧夹击、空中飞机轮流轰炸的战法，继续“围剿”长征的红军。曾日三边走边对大家说：“不要怕天上的敌人，在这大山区，它起不了多大作用”。部队士气高昂地继续前进。在冲破敌人于湘江布下的第四道封锁线时，红五军团打得异常艰苦。曾日三与战友们扼守东岸的每一个山头，挡住如潮的追兵，激战三昼夜，终于掩护庞大的中央机关和后方辎重队伍渡过湘江。此时，八万红军已减员过半，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在陈树湘师长率领下，在文水河南岸为掩护全军左侧安全，来不及过江而全部损失。眼见这支自己亲手组建的部队遭如此挫折，曾日三痛心疾首，对“左”倾机会主义者产生更加强烈的怀疑和不满。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在危急中挽救了红军。曾日三脸上的愁云为之一扫，和李卓然陪同中央代表陈云，连日向红五军团所属部队传达会议精神。在毛泽东调遣下，红五军团接连打了许多漂亮的阻击战，掩护全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五月初，又在绞平渡以南的石板河一带咬住敌人，鏖战九天九夜，保证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此时，吴仲廉正值分娩，曾日三顾不得照看妻子，将生下几天的孩子取名曾吴送给当地老乡，自己依然在前沿阵地上进行政治动员，带领战士们痛击敌人。不久，李卓然负伤，由曾日三代理红五军团政委职务。

红一方面军于六月到达懋功，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北进。八月六日，曾日三代表红五军团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会议决定把红军编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抗日。在一家藏民房子里，曾日三向红五军团团以上干部传达了毛儿盖会议精神，他反复强调要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克服困难，坚决北上。随后，他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作左路军的前锋踏上了茫茫草地。曾日三随前卫三十七团进至噶曲河边时，眼看只有三天路程就能到达班佑与中共中央及右路军会合了。可是，张国焘却借口噶曲河"水深流急，无法通过"，擅自命令红五军团南返阿坝，并叫左路军停止北上，企图挟中央南下，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曾日三对此极为气愤，在张国焘召集红五军团营以上干部的会议上，他怒不可遏上台讲话，当场抵制张国焘的南下命令。九月中旬，张国焘又在中阿坝大喇嘛寺召开有省委和各军干部参加的会议，自恃人多，大放厥词，攻击中央北上的方针。会场上骚动起来，有的人小声嘀咕。张国焘逼着朱德、曾日三等人表态，朱德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中央北上方针，曾日三与董振堂则以沉默表示反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会后，曾日三与董振堂等红五军团领导人拒绝向部队传达分裂党和红军的所谓"阿坝会议决议"。

张国焘恼羞成怒，竟制造谣言挑动红四方面军少数受蒙蔽的人寻衅闹事，把红五军团一些零星掉队战士当作反

革命武装抓起来。曾日三挺身而出予以制止，并及时与董振堂和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开会研究，联名向朱德总司令写报告反映情况，避免事态扩大发生冲突，并派欧阳毅去调查平息了冲突。当时，红五军团有部电台仍能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曾日三把从电台听到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以及红一方面军走过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挺进陕北等消息悄悄告诉大家，使困境中的部队受到极大鼓舞。张国焘察觉此事，更加恼火，指责曾日三等人“造谣生事，扰乱军心”，下令没收了电台的密码。从此，红五军团便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指战员们对张国焘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强烈不满，有的激愤提出要跟它干。曾日三总是深入细致地给同志们做说服工作，并几次请朱总司令来红五军团，教育大家顾全大局，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维护红军的团结。

张国焘为了能控制红五军团，不断地精心策划对红五军团的所谓“改造”，强行调走红五军团不少干部。到年底，曾日三也被强行调离红五军团，派往红四方面军所辖的第九军任政治部主任，想陷他于孤立的境地。由于曾日三老成持重，一身正气，既有才识，又能团结同志，到红九军后，很快便得到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及广大指战员的信任和尊重。

曾日三在长征路上转战二载，三过草地，三翻雪山，呕心沥血，先后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的右倾分

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高度原则性，也体现了他在政治上和斗争艺术上的成熟。

## 四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军和五军（一九三六年一月由红五军团改编）共二万余人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西进。红九军开始随总指挥部在左翼行动，经干柴洼时，歼灭了前来阻挡的国民党军马步芳部骑兵第五师，直奔河西走廊的门户古浪。敌马元海部闻讯大惊，从后路包抄上来。曾日三留一支部队阻击，然后率主力进至城下。十一月十五日，他派四个小红军入城送信，大意是：西路军要打通国际路线，请允许借路通过。但守敌残忍地杀害了送信的小红军，不肯让路。曾日三义愤填膺，下令攻城。守敌仅一个团，抵挡不住，弃城逃跑。盘踞凉州的敌马步青对古浪失守极度惊慌，急率五个旅的重兵争夺古浪。古浪两面临山，地势低洼，加上地震使城墙坍塌，易攻难守。双方搏斗三昼夜，一寸土地一寸土地的反复争夺，敌人每占领一块石头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敌军如潮水般上来，杀退一批，又涌上一批，并以轰炸机狂轰滥炸，以山炮击毁城防阵地，成营成团的骑兵舞着马刀嚎叫着突入城内，军部机关许多女同志手无寸铁，被敌人马队劈砍践踏。曾日三与政委陈海松组织军部警卫连和交通队与敌人展开巷

战，幸得红二十七师从东北面杀开一条血路接应过来。敌人受到两面夹击，阵脚大乱，狼狈地退出城去。此役，歼敌二千余人，但红九军也损失过半，参谋长陈伯稚等两千将士阵亡。十八日晚，军部连夜突围转移。部队撤出古浪时，把一些重伤员集中在几间大屋子里，每人发给三块白洋。陈海松政委还特意让曾日三给敌人写一封信留下，希望他们以人道主义的精神，不要杀害我们的伤员。然而，惨无人道的敌人后来把他们全部杀害了。

红九军冲出重围到达永昌，曾日三即带人到红五军联系，取得了给养和物资。这时，西路军已全部进入河西走廊蜂腰部，即从永昌至山丹绵延一百多公里的狭长地带，敌马步芳、马步青利用红军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等弱点，集结十个旅连续发动进攻。红九军挫败敌军数十次攻击，坚守永昌一个多月。战斗正酣，突然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曾日三立即带领敌工干部深入前沿阵地向敌人喊话：“不要打了，你们的主子蒋介石被活捉了，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要打内战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可是，地方军阀部队麻木不仁，丝毫不理会红军的政治攻势。十二月下旬，曾日三随红九军奉令从永昌突围，到达梅家营子。西路军总部在此开会，特为解决红九军领导关系问题。红四方面军过去曾有个规定：丢失阵地主官是要杀头的。总部不分青红皂白便责备红九军失守了古浪，并对红九军主要领导作了组织处理。军长孙玉清调三十军，由副总指挥王

树声兼任军长，政委陈海松被撤职，曾日三也受到错误批评，调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一说敌工部长）。

红军继续西进。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红五军攻占高台，随后又与前来包围的六、七倍于己之敌决战，军长董振堂以下三千余人壮烈牺牲。二十四日，敌人又攻陷临泽。西路军余部集中屯驻倪家营子，敌人又以六个步骑兵旅及反动民团武装七万余人三面包围。曾日三这时率总部的后勤部门参加战斗。红军改变战术，苦战一个月，虽歼敌有生力量，但自己也伤亡十分惨重，被迫向南突围。三月十二日，在梨园口又与追来之敌骑兵进行殊死搏斗，陈海松牺牲，红九军损失殆尽。曾日三率余部三百多人断后，掩护总部及三十军主力部队向西转移。三月十四日，总部在石窝山顶召开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组成西路军工委，将余部两千多人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转入祁连山区与敌周旋。午夜，部队按计划行动，王树声、孙玉清带领右支队往东行，李卓然、李先念等带领左支队向西走。两天后，左支队摆脱了尾追之敌，又以原总指挥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为队长，曾日三为政委，钟立彬为政治部主任，与欧阳毅、吴仲廉、张琴秋等二百多名总部干部和伤病员，汇合组成第三支队（又叫干部游击队），向东游击。途中，又接连收留一些散余游击武装。

巍巍祁连山，白雪皑皑，朔风肃杀，没有人烟，没有花草，飞鸟也很少。指战员们衣衫褴褛，许多人赤着脚，

爬冰踩雪，搀扶着伤病员，出入荒山野漠，疲惫不堪。粮食吃光了，连树皮草根都很难找到，生活比过雪山草地时更艰难。曾日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几次下山找粮，都因遇敌人马队而忍痛回还。困难时刻，曾日三与钟立彬主任把几个连队的党支书叫来开会，布置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共产党员在战胜严寒、战胜马匪的战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每一个干部、战士都要做钢铁战士。他还满怀信心地鼓励大家说:“我们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党中央和中央主力红军还在陕北，革命无疑是要成功的。”茫茫征途中，他带领同志们一遍又一遍唱起激越的《巍巍祁连》壮歌:“饮马弱水未能忘，寒风似刀志如钢，黄沙冰雪埋忠骨，笑看二马命不长。”队伍在祁连山里跋涉了四十多天。

一天清晨，曾日三从西路军工委赶回，兴奋地对大家说:“好消息！我们的电台和党中央联系上了，党中央、毛主席叫我们到新疆去，还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接应我们哩！”部队的情绪立即活跃起来。有个战士问他:“曾政委，到新疆还有多远?”曾日三自己也说不清，仍乐呵呵地说:“不远了，我们脚板底下要加油呀！”那个战士拍拍干瘪的肚子说:“就是有点唱空城计。”曾日三幽默地笑道:“空城计可以吓退敌人，我们扎紧皮带再唱几天，到新疆去庆功吧！”而后，他眺望前方：山高路险，敌情不明，不免有些忧虑，走到钟立彬面前低声说:“我们的担子更重了啊！”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部队攻打安西不克后撤到了红柳园子，马匪军策马又包抄上来，把第一、二支队分割开了。曾日三立即命令一部分队伍掩护伤病员和妇女顺着电线杆子往西北的星星峡方向突围，自己带领一部分队伍用火力吸住敌人，利用残墙断垣作掩护，向敌人马队射击。战斗持续到傍晚，阵地上布满尸首。曾日三与吴仲廉及百余名红军指战员弹尽援绝，不幸落入敌手。

祁连山下，暮霭沉沉，北风瑟瑟，敌人在红军四周架起森严的机枪，气势汹汹地如野狼般嗥叫着:“当官的，出来！不出来，把你们通通都杀掉！”曾日三面对灭绝人性的刽子手，身系百余名优秀红军的生命，昂首挺胸走出了队伍，横目怒视敌人道:“我就是当官的！”咆哮的敌人都把目光盯着他，狞笑着追问还有谁是官长。曾日三摇摇头，从容不迫地说:“这里只有我是官长，他们都是没冲出去的士兵。”敌人凶狠地把马刀架在曾日三脖子上，逼他说实话，曾日三毫无惧色，厉声喝道:“放了这些士兵，要砍，要杀，都由我担当！”气急败坏的刽子手惊慌地举起屠刀，曾日三仰天大呼“红军万岁”！英勇就义。

曾日三从一个旧时代的白面书生，在革命的熔炉里百炼成钢，成为优秀的红军将领。在西路军的最后战斗中，他用自己殷红的血，为英勇悲壮的西征历史写下了最后最壮丽的一笔，为庄严的军旗增添了新的火红的光彩。

(李 安 牛)



续 范 亭



# 续范亭

## 一

续范亭（1893—1947），名培模，字范亭，别号恕人，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农历十月二十日），出生在山西省崞县城东南西社村（今定襄县）一个中农家庭。父亲续维政，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母亲李氏，是农家妇女，终年操持家务。续范亭姐弟五人，上有两个姐姐，在兄弟三人中他排行第二。家有四十多亩薄田，每年收获仅供自给。少年时代的续范亭就在这个劳动家庭里参加田间劳动，使他养成了爱劳动、爱人民和不畏艰苦的倔强性格。

续范亭自幼喜爱读书，十岁时父母把他送入本村私塾求学。他勤奋刻苦，思路敏锐，学习成绩在同学中出类拔萃。他优异的学识被族兄续西峰发现，在续西峰的劝导下，他十四岁考入邻近的宏道镇川路两级小学就读。

续西峰比续范亭年长十五岁，是反清、反袁、反北洋军阀的著名战士，川路两级小学堂就是由他创办的，并自

任校长。创办这所小学的目的，是培养和造就革命人才。学校的主课是操练兵法。续范亭是该校第一批学生，深受族兄续西峰的赏识和器重。在续西峰的影响下，续范亭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并且常和一些同学随续西峰和老师到邻近各村作救国讲演。在川路两级小学读了两年，十六岁时续范亭考入太原一所中学，第二年转入山西陆军小学，接受初级军官训练。这时续范亭继续得到续西峰的关心和帮助。

太原陆军小学，是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夕创办的，培养初级军官，充当镇压人民的鹰犬。但是，与清政府的愿望相反，这所陆军小学成为培养革命军后备力量和发展革命势力的阵地。辛亥革命在山西发动后，这所陆军小学的很多学生成为起义军的骨干。

续范亭转到太原陆军小学后，积极追求进步，思想上更加趋向革命。在学业上，他一贯勤学苦读，考试成绩总列第一，成为模范生。他每获第一名，一次可得奖银五两。他手中有钱，从不随意乱用和挥霍，而把大部分奖银节省下来，捎回家接济家中的贫困。

续范亭在陆小学习期间，亲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外国人在中国的横行，使他懂得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只有自强御侮的道路才能独立富强自己的祖国。因此，他以极高的热情努力学习军事知识，提高自己带兵打仗的能力。他同时注意研究、探讨和观察中国的现状与世界形势的发

展。在陆小他结识了进步学生张德枢、史宗法等人，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等人创办的同盟会，与校内外的革命党人、进步青年建立了较为广泛的联系，更增强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续范亭进入山西陆军小学的第二年，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清廷上下异常震惊。十月二十二日陕西的新军第三十九协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在西安起义，直接波及到山西。为防止起义军入晋，山西巡抚、督练立即召集军政要员开会，决定调兵太原镇守省城，同时派兵防堵陕西起义军东渡入晋。当时，担任山西清军第八十六标标统的阎锡山，看到起义军势力大，来势猛，于十月二十九日，他和八十五标标统黄国梁等在太原起义。推翻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之后，在咨议局推选督军的会议上，阎锡山被推选为山西都督，夺得了全省的军政大权。

早在这年夏天，黄花岗起义的消息传到山西，续西峰就着手准备起义。当武昌起义的胜利消息传到山西，续西峰立即在家乡崞县招募义勇，集中旧部，积极开展活动。不久，阎锡山发布命令，续西峰为忻（州）代（州）宁（武）公团长，协同第四标进军大同。这时，续范亭所在的太原陆军小学学生，在太原起义后编为学生军，巡逻放哨，维持秩序。当续范亭得知续西峰组织公团进军大同的消息后，便约集同学赵承绶等前去投军，面见了续西峰。

续西峰任命续范亭为公团司令部副官，负责办理联络和传递命令等事宜。以后续范亭又任卫队长、镇远队队长。

忻、代、宁公团三千余人，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誓师出发，向晋西北军事重镇大同进军。公团多为民勇，步枪仅三四百支，战斗力不强。但由于续西峰巧妙用兵，他率公团出敌不意于十二月三日一举攻占应州。接着马不停蹄向大同攻击前进。这时，续范亭被任命为镇远队队长，带领一营部队担任前锋。他率前锋营不畏艰险，奋勇前进，连续三天三夜爬山越岭，步行五百余里，如期到达大同城下。不久，续西峰带领大队人马亦赶到。守大同清军未料革命军会来得这样快，一战即溃。公团乘胜于十二月五日下午攻入大同城内。但是，由于革命军在城内的兵力少，被退守城外的清军包围，正面临危机，公团大队人马开来，就在续西峰率部队进入大同西门时，清军增援大同的先头部队已逼近东门。续范亭得到这一紧急消息，率先锋营抢先由大同西门进入城中心，公团大队也相继冲入城内。公团三千多人守城四十余天，英勇打击了清军的围攻。在攻克大同的战斗中，年仅十八岁的续范亭，肩负重任，初显身手，得到续西峰的赞赏。

一九一二年一月，公团撤出大同，续范亭率部进驻五台，不久南北议和，清帝退位，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统治的历史。

阎锡山就任山西都督后，对拥有数千武装的续西峰放

心不下，迫使他解散公团。一九一二年十月，续西峰前往太原，就任山西巡警道。在续范亭驻防五台期间，续西峰将自大同新招募的部队交给续范亭整编。新招募的部队中，有一支土匪出身的张拔贡的部队，驻罗堠寺，匪性不改，正在酝酿哗变。续范亭当机立断，亲自带队包围了罗堠寺，活捉了张拔贡，粉碎了一次哗变阴谋。后来，迫于形势，公团解散了，续范亭回到家乡，暂到母校川路两级小学教书。在课堂上，他把自己的革命经历讲给学生们听，讲到悲壮处常是声泪俱下。他在实践着教育救国的尝试。但是，这条路毕竟太缓慢，而突变的风云和紧迫的革命形势召唤他站起来，重新投入如火如荼的战斗。为此，他特意找续西峰商量，在续西峰的支持下，他再次离开家乡，前往保定，考入了陆军中学，准备投身到革命风暴中去。

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巡游各省，一九一二年九月到达太原，经续西峰引见，续范亭会见了孙中山。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续西峰辞官返乡闲居。一九一四年，金永与阎锡山勾结，要密捕续西峰。续西峰获悉出逃，扮成叫化子、小商贩辗转到榆林，会同革命党人南下陕西蒲城。续范亭在保定陆军中学得知续西峰被追捕的消息后，深为愤慨和忧虑，立即偕友奔走，由潼关入陕，同续西峰会见于蒲城。在这里，他们共同参与了声讨袁世凯的走狗、陕西都督陆建章的活动。之后，他们与胡

景翼、井勿幕相继到华山隐居。在华山又与孙岳、邓宝珊、史可轩相聚，共议秦晋政局和讨袁之计。此举，史称“华山聚义”。在华山聚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北方新的政治学习集团，这个集团成为后来国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山聚义”过程中，续范亭深得教益，他的思想境界更开阔了，他的革命意志更坚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华山数月居，胜读十年书。”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华山聚义”的志士分赴各地联络反袁力量，组成西北护国讨袁军，誓师出征。一九一六年四月，护国军由续西峰统率，续范亭和李岐山指挥进攻山西。虽入晋部队只有千余人，但官兵士气高昂，进展神速，十数日内连克猗氏、临晋、荣河、万泉四座县城。深夜途经虞城地区时，突遭袭击，全军被包围，虽经奋力反击，终因众寡悬殊，部队大部被冲散，损失惨重。续范亭被冲散后，几经艰难回到山西。袁世凯死后取消党禁，恢复参、众两院，续西峰被推为参议员。续范亭也获自由，与续西峰偕伴回到久别的故乡和家人团聚。

续范亭回乡不久，经与续西峰商量，前去保定附近的清河军官教导团深造。一九一九年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华山聚义”志士井勿幕遭杀害，推于佑任为靖国军总司令。于不善军事，任命续西峰为靖国军总参议，代为策划。续范亭应续西峰信邀自保定来陕，被派到靖国军第四路司令部任参谋，协助岳维峻与北洋军阀部队作战。这期间，续

范亭还与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相识，并且合作策划军事，成为知己。

一九二〇年十月，北洋政府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率部进入陕西，续西峰、续范亭、胡景翼同去晤面冯玉祥。胡景翼率靖国军在冯玉祥等部的配合下，彻底消灭了军阀陈树藩部，陕西政局得到初步稳定。

续范亭在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涯中，还写下了不少诗作，抒发爱国情怀，记录自己的革命实践。他在经郑州时写下《郑州忆关中诸友》一诗：

茫茫大地将何之？落拓中原忆故知。
七年浪迹悲羸马，十载洪涛恨睡狮。
兴市春花灿烂日，蒲城夏雨连绵时。
渭树嵩云多感慨，征鸿日望到旅羁。

这是续范亭自参加辛亥革命十年来的回顾和总结。他为自己多年征战而感叹，同时又把革命的出路挂在心上。他要继续探索。他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国革命孙、黄以中华民国共和政体倡之于先，康、梁以虚君共和开明专制之于后，然康、梁终以不得国人大多数之赞助，故败。""办事之服从大多数者得胜利，其以少数人支配多数人者终归于失败也。是以知办事以服从众意为原则。"这里所指孙即孙中山，黄即黄兴，康即康有为，梁即梁启超，他们都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寻求真理的历史人物。他们曾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救国方略，然而都

失败了。但是，续范亭在十年革命生涯中悟出一个结论：共和比专制好。他同时找到一个真理：胜败的关键，在于为大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为大多数人者必胜，为少数人者必败。这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有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几经艰险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一九二〇年冬，由续西峰介绍，续范亭加入了国民党。此后，他在华北和西北为国民革命而努力奋斗。他在保定奔波了两年，历经坎坷，身体也累垮了，肺病和胃病常常发作，但他从不灰心，意志愈坚。他从反反复复的实践中，逐渐领悟到，要反对手拿武器的敌人，革命者必须拿起武器，任何时候也不能放下武器。只有用自己手中的武器才能制服、打倒、消灭武装的敌人。这使他的救国思想发展到了武装革命的阶段。

一九二四年的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同共产党实行合作，时任北洋政府陆军巡阅使的冯玉祥转向革命，在北方集合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部队组成国民军，准备与南方的革命势力相结合，以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在北京病逝后，续范亭应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的邀请前往保定，出任该军第二混成大队参谋长。当时国民军已处于困境，兵力有限，面对的敌人强大，续范亭等极力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攻打敌人的薄弱

点，冲出包围，摆脱困境，移兵西进，求得在山西立足，建立根据地，养兵蓄锐，壮大实力，这样退可守，进可攻，取得攻守的主动权。冯玉祥却坚持先攻京津，攻击奉军，然后回师对付吴佩孚。孙岳也持同样看法，认为得了天津胜过几个山西。鉴于意见分歧，续范亭和续西峰决定独自进兵山西。这时续范亭已任国民军第三军第六混成旅旅长，他率部由河北涞水、涞源进军晋北。由于未能得到樊钟秀和高自清从河南和陕西向山西进兵的配合，续部进占广灵、应县一带之后，形成孤军之势，而在这时冯玉祥的主力进兵天津也未能得手，局势遂起恶化，因此，续范亭等入晋部队相继退出。正当国民军受到阎锡山和吴佩孚夹攻之时，胡景翼不幸病逝，使国民军二、三军顿失主将，陷于困境。这时，续范亭率所部及国民军二、三军余部，历经艰难困苦，辗转抵达陕西五原，得到暂时休整的机会。续西峰因悲愤交加，旧病复发，一病不起，不久病逝于天津。续西峰的逝世，使国民军失去了一位良将，更使续范亭失去了一位尊师和益友。

在斗争的实践中，续范亭的思想不断升华，尤其在遭受挫折之后，他痛切地觉悟到，广大民众是革命的主体，革命军队不能脱离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他力弃偏重于军事而忽视民众的倾向，时常深入民间，关心民众的忧患和疾苦，把军事的斗争与民众结合起来，因而他和他的部队受到民众的欢迎。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举行五原誓师，响应北伐，继续革命，成立国民军联军。联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共产党人李大钊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大钊未到职，由刘伯坚代理主持。联军确定了“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并计划在郑州与北伐军会师。续范亭拥护五原誓师的方针，积极支持冯玉祥及其统率的联军的行动计划。

冯玉祥很器重续范亭。续范亭的思想道德和军政才能，非联军一般将领所比，冯玉祥很想将他拉为自己的亲信，并一再劝说他撤销第三军番号编入第一军。续范亭不愿做任何个人的工具，引起冯的不满，五原誓师的部队援陕途中，冯指使石友三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剥夺了续范亭的兵权和实力。续范亭遭此打击，又加上续西峰病逝的悲伤，内心极度痛苦。这年冬天，他只身回西安，称病抵三原，不愿再与冯玉祥共事。对此事，冯玉祥也深感有愧，多方托人找续范亭道歉、说情，恳请续范亭出山，助冯工作。续范亭以大局为重，回到西安就任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为联军培养干部人才。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军校召开了声讨大会，续范亭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慷慨激昂，态度鲜明，谴责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北平遇害后，续范亭以极其沉痛的心情，为李大钊等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他愤然登台讲话，怒斥北洋军阀和帝

国主义的野蛮罪行，鼓吹大力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

中国共产党为支援国民军联军五原誓师，先后派出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安子文、宣侠父等二百多名党员干部到这支部队工作，续范亭和这些共产党人常有接触，特别是他同担任联军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来往较多，也很熟悉，一九二七年四月刘伯坚与王叔振在西安结婚时，续范亭与邓小平及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等一起前往参加了婚礼。

续范亭对共产党人的认识逐渐加深着，在他的心中，中国共产党是诚实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是真正革命的政党，他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 二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经老友杜斌丞介绍，由邓宝珊夫妇主婚并与杨虎城夫人谢葆真共同操办，续范亭和许玉农女士结婚。婚后情投意合，互敬互爱，生活十分美满。这年冬天，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续范亭偕夫人离西安到了南京。

一九二八年春，续范亭在南京，经国民党中委丁惟汾介绍与蒋介石见面。他当面谏蒋，不要再干反共内战的事，劝蒋急速改弦更张，万万不可再行不义之举。蒋介石自高自大，不肯入听。蒋以为续范亭求见只为谋一官位，

只要委个差事便可堵住续的嘴。于是，蒋派专人给续范亭送去一张国民政府高级参议的委任状。续范亭见此状，哭笑不得，推辞“体弱不能胜任”，将委任状原封退回。蒋连续两次送状，均被续范亭碰了回去。续范亭看到蒋介石不能纳谏，非常气愤，又目睹南京政风腐败，使他大失所望。他悲愤交集，离南京返北平留居。

留居北平期间，许多进步青年，经常聚集在续范亭的身边，探讨救国的途径，评及国共分裂后的战乱局面和民众遭受涂炭之苦，每当谈到痛处，续范亭往往声泪俱下，痛哭失声，他深恨自己空拳，没有军队，难以施展救国救民的伟愿。他整日忧国忧民。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纵容下，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很快沦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续范亭急起赴西安会见久别老友杨虎城，倾吐为国效力的强烈愿望。杨虎城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并兼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当时西北正值用人之际，杨虎城热情欢迎续的到来，要续在西安帮助训练军队，以发展西北爱国进步力量。在续范亭的推荐下，杨虎城启用邓宝珊与续携手经营甘肃，筹划军事，并呈请南京政府加委。一九三二年春，邓宝珊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续范亭为参谋长。此后，续范亭积极奔走，开展筹建工作。他从河北、山西军界的老同学处筹集到一批兵员和弹药，又邀请了过去一

些老部下共同奋斗。续范亭深知军队的重要，因此，他在筹建行署的同时，即着手组建新编第一军的工作。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多方奋斗，建成新编第一军，邓宝珊任军长，续范亭任总参议。

蒋介石知道邓宝珊、续范亭、杨虎城的政治倾向和他们之间多年的友谊，对他们经营西北很不放心，深恐他们得势，将会造成后患。于是，蒋使用了“以回制汉”的手段，启用马家将领，对甘肃形成包围。一九三三年蒋介石亲到兰州，委其嫡系将领朱绍良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对邓宝珊进行监视。一九三四年，蒋又下令撤销甘肃行署，对邓、续进行压制，邓宝珊只专任新编第一军军长，续范亭仍为总参议。

续范亭在甘肃期间，广交朋友，他曾对友人说：做一个人就要有民族气节，要做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无论干什么也好，都不能忘本。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是一个中国人，就要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同胞，必须随时地反抗外来的侵略，为国家、民族出力，为国家、民族牺牲，才不愧为一个中国人。当一九三五年蒋介石调动大军跟踪“围剿”长征北上的红军时，续范亭非常气愤，他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央军将领都是草包，打日本还需靠红军。”

续范亭身在兰州，心系祖国安危，他时刻关注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所至，联络各方爱国志士，共同谋求

早日实现武装抗日收复失地的伟愿。一九三四年秋天，冯玉祥的察北抗战被蒋介石扑灭后，冯隐居泰山普照寺，秘密进行爱国活动。这使续范亭捐弃前嫌，主动上泰山看冯玉祥，共商抗日大举。他们志同道合，见面后彻夜长谈。冯玉祥委托续范亭起草了正在创办的抗日团体——"中国人民抗日团"的纲领，并在续范亭的协助下，秘密创办了这一抗日团体。不久，续范亭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进谏，希望蒋顺应民意，停止内战，抗日图存，并告诫蒋介石不要做千古罪人。蒋介石表面上采取应付态度，实际上不予理睬，使续范亭再次大失所望。

一九三五年夏，张学良偕赵四小姐到兰州，在邓宝珊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续范亭结识了张学良。虽是初次相见，但两人交谈十分投机，相互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奠定了友谊的基础。

一九三五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进兵，继续扩大侵略。在华北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一手继续"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一手搞媚敌外交。到这年秋天，华北事变之后，国难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北上红军发表了愿与国民党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的宣言。时任新编第一军总参议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续范亭，再次进谏邓宝珊、杨虎城，敦请他们与红军停止内战，举起抗日旗帜，共赴国难。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声势浩大爱国运动之

后的第六天，续范亭自西安到南京，当时正值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全大会之际，他以一个老国民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中央和五全大会呼吁救国。然而，续范亭看到的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遭镇压，蒋介石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媚敌卖国勾当，五全大会也无动于衷。他的一腔爱国热情，遭此冷遇，深感爱国无门，救国无用武之地，党已堕落，内心极度痛苦和惆怅。为唤起国人抗战救国，他决心剖腹明志，欲一死惊震全国。他在极度悲愤中垂泪写下了五首《绝命诗》：

(一)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

(二)

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

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

腼颜事仇敌，瓦全安定贵？

(三)

剑有锋芒刃，士有智勇仁。

自古人与物，体用若君臣。

霍霍小匕首，锐利似军兵。

无术施东海，宁肯刺国人！

(四)

三岛切腹士，东海大和魂。
悲壮牺牲者，不出王侯门。
宇宙谁为贵？大地我独尊！
无畏精神在，身死国犹存。

(五)

灭却虚荣气，斩删儿女情。
涤除尘垢洁，为世作牺牲。

就在这同时，他还留下了《敦促抗日绝命书》。书中激愤写道："余北方之鄙人也。革命三十载，半生颇自爱。慨呼国已不国，我犹醉梦，魂无以对我同胞，更无颜见我总理。此次入都，两谒陵园，忧愤交并，拔剑穿胸。然犹冀领振臂，万众敌忾，为世界打不平，为人类振人格，和平之神，自当降临，有以救我民族于万一焉。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勿效余之怯馁。"

续范亭写完绝命之笔，即与友人狂饮，并背着友人竟自上街买一把匕首。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续范亭清晨起床，神色自如，谈笑如常。中午，他整理好衣服，独自一人乘出租汽车去中山陵。下午四时，他长跪陵前，痛哭诵读《总理遗嘱》，愤然剖腹，昏厥于地，倒在血泊中。幸得出租汽车司机报信，执人相救，急送院就医，方脱险还生。

续范亭在中山陵前剖腹明志的壮举，立时轰动南京全城，各报纷纷作了报道。随后，京沪及全国各地其他报纸，也相继作了报道。许多敢于申张正义的报纸，给予续范亭此举以高度评价。

续范亭剖腹后，引起友人的极大关注，许多同仁志士前往探望，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邓宝珊等，或派人探视，或汇款相助，或特电奉慰。续范亭伤愈后将出院时，张学良亲往医院探视，两人促膝长谈良久，倾吐报国之志。

续范亭陵前剖腹的壮举，表现了将军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忧国忧民的牺牲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激励了无数爱国志士奋起抗日；同时也表明他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共卖国政策的决裂。在他的思想深处，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动。

## 三

一九三六年，续范亭在静养的日子里，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读了《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及《大众哲学》等著作，使他的思想第一次进入马克思主义的领域，打开了他的眼界，萌发了新的信仰，他急欲迈向新的阵营，开辟新的天地。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他回顾了自己沧桑的经历，总结了坎坷的人生，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步得到深化，进而产生对共产党的向往和追

求。

一九三五年的秋冬，在大西北高原上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大事件。这年的十月，中共中央率领长征的红军到达陕北。十二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性决策；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首先在西北，很快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中国的政局，中国的阶级关系，都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续范亭不仅被这种形势所鼓舞，而且被它所吸引。当时已在杭州的续范亭，决心回到西北，尽自己之所能为抗战效力。为表示矢志不移，他挥笔写下了“不怕死，不怕疼，不怕辛苦不怕穷，养成一身大无畏，誓死与倭寇决雌雄”的誓言。当他途经南京再次拜谒中山陵时，又感慨地写下“羞见先生面，陵园我又来。何时擒海寇，献捷祭灵台。”续范亭充满着革命的活力和战斗的激情，于十一月中旬回到西安。最能表明续范亭心志的，是他离杭州北返时写下的一首壮言诗：

烈士英雄西子言，山川草木并昆虫。

西湖拜别从军去，征讨将军逐犬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活捉了蒋介石，迫蒋抗日。续范亭于当日早八时，便从报纸上看到了张杨领衔发表的兵谏通电，提出了八项爱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续范亭为兵谏大振，为张、杨两将军爱国精神所感，为通电沉痛愤慨地呼号所动。他敬佩张、杨两将军此次伟举，赞扬他们高举中华民族大义的旗帜，为救世之功臣。

十二月十二日早九点，杨虎城委托续式甫接续范亭到杨公馆。在杨公馆，续范亭得知了事变的原委和经过。他钦佩张、杨两将军的破天胆识和浩气大度，不禁为之大兴，当即表示对兵谏的全力支持和对张、杨两将军的万分同情。但他也预感到，张、杨的八项主张很难为蒋所接受，内战危险迫在眉睫。于是，他问杨虎城，是否已联络共产党，能否与共产党一致行动。杨虎城告诉续范亭，蒋介石已被活捉，张汉卿同我团结一心，坚如磐石，今晨已向陕北发去电报，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前来，共同协商，共筹抗日救国大计。续范亭听后甚为满意。他顿时感到，抗战有望，抗日必兴，中华民族的危亡有救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续范亭精神焕发，活跃政坛，同挚友们高谈阔论抗日救国振兴中华之宏愿。他在事变后的日记中写道:“此次西安事变，实为四千余年之大转机，因与世界革命、民族存亡有直接之关系，值得吾等努力到底。”他作为忧国忧民的志士，积极投身于这革命洪流之中，热

情帮助张、杨出谋划策，为抗战大业竭尽全力。为防张、杨两军之间发生矛盾，加固张、杨两军的团结，他草拟了十条建议，当面呈递给张、杨，以供参考。当时西安有人对事变不满，写诗咒骂。他立即写诗："仍将领袖当皇帝，无怪独裁祸水胎。侮蔑张杨血谏事，此人必定是奴才。"态度鲜明地予以驳斥。

十二月十六日，事变的第四天，续范亭同张学良会面。他以坦诚的态度对张将军说，"蒋之领袖欲太重，尚是虚荣未退，果能决心为四万万人作奴仆，则自然成唯一领袖，此道惟甘地先生为彻底而纯洁。"张学良很重视续范亭的这个意见，表示明日即向蒋当面陈谏。

十二月十八日，续范亭又倡议："吾等革命应组织一学术团体，大家研究有得，可以随时贡献。"当日，他草拟一个文件"供献当局"主张：社团太多，努力恐有分歧之处，宜组织一最高指导机关以一致步伐之效。并于当晚面呈张、杨。

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以后，同张、杨及各界人士进行了紧张而频繁的接触和交谈，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实现逼蒋抗日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就在这同时，亲日派何应钦以南京政府名义，发布讨伐令，调动军队进攻西安，讨伐张学良，狂称要"炸平西安"。西安的局势顿起紧张，战云密布，内战大有一触即

发之势。

为蒋介石的“脱险”，其英籍顾问端纳和宋子文奔走于南京西安之间。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端纳等到西安进行谈判。在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和张、杨两将军的共同努力下，终使谈判达成六项协议，迫使蒋介石做出放弃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许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续范亭为谈判成功而高兴。他盛赞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英雄气概。他更从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之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见识之高远，政策之明智，伟力之深厚。他为共产党中能人聚集而满怀激情。他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达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的日记中写道:“一致抗日为全国人民之意识，而共产党人实运用之。绥远抗日捐款之后，闻二千七百万，亦诚可惊，然便无人运用必难到此程度。吾人身为国民党员，此后应如何奋发？共产党此刻之有助于中国亦颇令人感佩。”

西安事变后，张、杨在西北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措施，撤销了“西北剿总”，成立了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改组了陕西省政府，释放了政治犯，消除了内奸分子；同时解散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了民众指导委员会，并迫使国民党在西北的各党部的活动陷于停顿。

在这同时期里，以续范亭领衔，偕其志同道合的老国民党员，发起组成“中国国民党西北临时党部筹备委员

会”，以“实现各党各派伟大联合，一致对外，肃清党内亲日分子，遵行总理（孙中山）遗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西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这一组织成立的消息，同时发表了《争取联合战线胜利与国民党的新生》的社论，表示祝贺与欢呼。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放走蒋介石，并随蒋飞抵南京。对此，续范亭深感震惊，心中难以理解，及至听到张学良被囚的消息，他才如梦方醒。他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无比愤慨。他经多日思索，将其对时局突然逆转而激起的无限忧愤，汇成了《续范亭掬诚敬告国人书》。

全文如下：

人祸中国，党国俱非，世有正义，有志者应有所依，是非不彰，千古同悲，吾人流血，应有代价也。范亭去年此时适在南京，痛心国亡之无日，复凛人心之颓坠，冀欲牟动于万一，启迪国人之国情，因有陵园切腹之举。自愧牺牲未洁，神灵不享，几死者再，偷生至今日。及归西安，适有张杨二公兵谏之举，动机纯洁，意义伟大，确为中华民族找出路，为弱小民族争公理，永息内争，共同抗日，天经地义，人神共鉴。范虽羸弱，然亲见亲闻，良心上实予以万分之同情也。今日国家危局，一言难尽，谨引阳明先生《陈言

边务疏》一则，以为鉴戒。其文曰：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内为顾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结壅塞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逛，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正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也。其言哀且直，发之衷肠，痛切陈词，而安所避忌，为人辟国家者，不能顾一身利害生死也。政治黑暗，千古同慨，亡国惨痛，有史皆然。呜呼，君非甚愚孤立而蒙蔽甚多，今乃民主共和之国，而有专制流毒之苦，何以致此，虽愚者亦当窥其病之所在矣。蒋先生欲趋独裁，而国人未能有以矫正之，或私心利禄以助其长，或因循苟安以观其败，然人情不远，有心者固早已决其必至误国而亡国。此五年以来，革命者之所以牺牲奋斗而不辞也。西安事变后，张副司令本其革命之认识，坦白之心理，毅然亲送委员长返京，以谋永息内争，共抗敌人。委员长此后有内战我负责之言固在，乃何应钦以叵测之心理，媚日之下策，进兵二华，意欲蹂躏西北，遂其野

心。在此局势之下，西北数千万军民固已早知是非曲直之所在，决秉其爱国之精诚，革命之正义，以千万人头撞彼炸弹而毁灭之。所可惜者，弹尽，而敌弹掷来，人人头上有一颗也。吾知坐镇关疆之雄与夫爱国之士，自能本其时代之认识，良心之裁判，有毅然之主张出现，以定国是。则少数媚外之野心家，不但不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亦且不能使其部下爱国分子，甘心自杀而降敌，则亦徒见其心劳日拙，自趋绝境而已。果使何应钦为领袖，吾甘愿蹈东海而死，而不愿见中华民族，黄帝子孙，四五千年之结晶，土地人民财产断送于小小倭寇之手也。病躯未健，本其良心与认识，籍奉一二于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之前，书短情长，未能尽意，区区之辞，希垂察焉。

这是续范亭用血和泪写成的一篇声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檄文。他的一颗赤子之心，伟大的爱国情感，欣欣跃然纸上，以磅礴正气和高尚情操激励着国人。

## 四

西安事变的发生，震撼着续范亭的思想，推动着他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急速地向新民主主义者转变。在这期

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列宁传略》、《甘地传》、《中山先生传》、《王阳明集》、《外国名人志》等许多中外名人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取甘地精神为基础，中山主义为骨干，共产社会为归宿。”最为可贵的是，他把共产社会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归宿。这使他的思想境界发生了质的飞跃。

续范亭推崇甘地精神，并非为做虔诚的佛教徒。他最为欣赏的是“心物不二”的教义和把自己看成人类卑微的仆人的精神，对人不作恶，对压迫者不妥协。他把中山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骨干，就在于他推崇中山的“愈知革命者非鞠躬尽瘁之决心，不为功，若自己有虚荣欲享高名，亦可致败”。他的共产归宿，已成为他的人生观的核心，他真正认识到“共产党革命之目的为解除人民贫乏困苦，其意诚善”。而当他同共产党人周恩来和老友南汉宸接触之后，并在他们的启发影响下，他对共产党的性质、纲领、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终于认定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抗战才能兴起，打败日本侵略者才能实现，人民革命才能胜利，中华民族才有真正的希望而获得彻底解放。他选择了跟着共产党走这一正确革命道路。

一天，续范亭到九府杨虎城公馆找南汉宸，南汉宸动员他回山西，以杨虎城代表的身份，推动和协助阎锡山抗日。续范亭刚回到家里，南汉宸又兴冲冲跑来。南汉宸告诉续范亭:“周公希望和你见面谈谈，本想登门来看望你，

因许多事缠绕，一时不得脱身，再三让我表示歉意。”续范亭听说周公约见，心情无比兴奋，遂即同南汉宸一起乘车前往七贤庄一号红军联络处。

续范亭久已仰慕周恩来。在这次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他更目睹了这位知名的中共要人周恩来临危不惧，力挽狂澜的革命家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政治家的风度，光明磊落，坦诚相见的为人，从心底里十分敬佩。他们一见面，周恩来就热情地对续范亭忧国剖腹，奔走抗日的事迹表示钦敬。他们促膝长谈达六小时。周恩来耐心诚恳地向续范亭解释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的政策，分析了西安事变后时局的发展，同时谈到山西形势的变化。他指出：目前寇深祸亟，华北危机日趋严重，日本侵略军的触角现已深入到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绥远，行将叩打山西的门户，严重地威胁到他本身的安全。在此形势的逼迫下，阎锡山也打出了抗战救国的招牌，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这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即将出现国共合作的抗日局面，这对阎锡山也是很大的影响和推动。说到这里，周恩来向续范亭表示了同南汉宸一样的心情，请他考虑回山西工作的问题。

这次长谈，使续范亭深受教诲，并为之深深感动。在他面前的周恩来，胆识过人，智慧超群，调察敏捷，豁达大度，坦诚待人，哲理严密，扣人心弦，是一位极难得的

尊师和谊友，给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周恩来虽然没有具体回答续范亭返晋的种种疑虑，然而，由于他对全国政局和山西形势的精辟剖析，却使续范亭看清了抗战大局，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若干年后，续范亭在《赠周副主席》这首诗中赞誉："站正立场理不穷，樽俎折冲难重重，奸雄满腹欺凌意，早在周郎一笑中。"

续范亭在西安同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尤其同周恩来的长谈，是他一生奋斗中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走向共产主义的政治生涯的伟大起点。这对他的思想发展和他的后半生坚定地走上正确革命道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后，他把自己生平的理想同共产主义的伟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一九三六年底至一九三七年初，蒋介石组织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审判，以"首谋伙党，对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剥夺公权五年。接着又宣布"赦免"本刑，"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便被蒋介石软禁终身。对蒋介石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续范亭极为愤慨。他挥笔著文痛斥蒋介石集团。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他发表了《敬告国人书》一文，一月八日，又发表了《对于中国现在时局应有之认识》等文章。他呼吁全国奋起，一致杀敌，永息内战，抗日图存。他在《对于中国现在时局应有之认识》一文中写道：

"当此帝国主义之没落时代，法西斯回光返照之日，

中国处于日本倭寇铁蹄之下，应如何与各弱小民族及同情于我者结成坚固之阵线，一致奋斗，以图挽救亡国之惨。而乃丧心病狂者流，为虎作伥，与虎接吻，吾见其必至噉头而吞之，一一同归于尽也。五年来南京政府之盗窃国民党，培养汉奸，一味恐日而亲日，残杀爱国同胞，压迫抗日运动，致使我民族无一线正气，同为日人之奴隶牛马而任其宰割，千古惨痛，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然摧残愈甚，民气愈高，对于南京政府之措施，爱国者早认其为日本之外府矣。亲日派欲遂其私图，而不惜将委员长拥上断头之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而蒋先生执迷不悟，竟欲上其死当而到底，此张、杨二将军之所以拯救委员长，使得免于断头之祸，而扶之上民族英雄高台，盖成就蒋者则所以拯救国家民族之灭亡惨祸也。乃蒋、张二先生返京，亲日派之毒焰愈高，受日寇之指挥，劫持政府，迫蒋消极，尚欲以此卖国政府之乱命，行之西北，此徒见其不识时务也。吾等革命为中华民族找出路，与日本军阀拚死命，所谓日本之外府南京政府者，早已认其有改组之必要，今日既未能改组，复变本加厉，为日寇作先锋，致将十年来准备抗日之人才、武器，倾注于西北爱国之身，此诚寻之宇宙而征诸世界未有之奇耻大辱。当此民族自决解放之新时代，中国有此无耻现象，为世界人类所窃笑，黄帝子孙，实未肯甘心焉。然人情不远，悔祸者仍是男儿，望我国人，用全副精神与精力，消弥此万古之奇耻大辱

也。努力！努力！”

历经磨难和坎坷求索的续范亭，终于在中国的大地上，找到了革命的真理，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一旦找到了真理，就勇往直前，永不回头。诚如他自己所述：“世界上除了真理以外，再没有任何权威可以使我屈服。”确是如此。是马克思主义使他在征途上豁然开朗，是中国共产党使他在艰难跋涉中找到“共产归宿”。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帮助，终于推动着他从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朋友。

一九三七年二月下旬，续范亭肩负杨虎城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重托，离西安前往山西，推动阎锡山抗战。就在他临行前，杨虎城遭到蒋介石的迫害，被蒋介石下令撤了职。续范亭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前往芷园杨公馆向杨虎城辞行。二人相见，互相策励。续范亭说：“过去我们说革命路上无坦途，而今天我们更应做到革命路上旗不倒。今天我们的旗，就是抗日的旗，正义的旗，我们应生死以之。”二人都含难舍之情分手。

生在山西、长在山西的续范亭，在被阎锡山迫害、通缉几十年之后，深怀无限感慨的心情，肩负重托，踏上回归故乡的征途。他马上就要同多年来一直被视为不共戴天的宿敌阎锡山打交道了。斗争的形势将是复杂的，工作的开展将是艰难的。

续范亭对阎锡山的发迹和为人是非常清楚的。阎锡山所依附的历届统治者和军阀，从袁世凯到吴佩孚，一个个都垮台了，但他二十五年来却始终统治着山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的哲学思想，就是“在存在中求生存”，“一切为了存在”。一九三六年前后，由于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山西受到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三种力量的包围，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要进入山西发动人民逼阎、联阎抗日；蒋介石进入山西，企图乘机挤掉阎锡山，把山西变成自己控制的地盘；日本侵略者，逼阎投降当汉奸。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只有抗战一条出路，不抗战没有活路，只有死亡。而要抗战，他也只有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严峻的形势是无情的，阎锡山必须在包围他的三种力量中做出迅速的抉择。要么当汉奸，他不完全情愿，要么被蒋介石吃掉，他不甘心；最后的选择，只有同共产党结成暂时的联盟，这样，既可以不被日本侵略者消灭，又可以不被蒋介石吃掉，但他又怕同中共搞统战被削弱。经过权衡和比较，他清醒地看到，他必须组织力量对付对他威胁最大的头号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二号敌人蒋介石。至于共产党，既是他竞争的对手，又可做暂时的盟友，至少暂时不会影响他的生存。因此，他打定主意，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一面反抗日本侵略，一面同蒋介石抗衡，顽强地保住自己的阵地，于是他表示同共产党合作，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主张，提出了“联共”、“抗日”的“新政策”，喊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

一九三七年三月，续范亭回到太原。阎锡山要打抗日的旗子，对这位在全国声名显赫的著名爱国将领、他往日的宿敌的到来，表示了欢迎。这时的太原，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工作委员会早已恢复活动，中共中央也派有正式代表作为阎锡山的客人常驻太原，牺盟会等群众性抗日组织迎刃而出，工人，学生，各界进步人士，开始联合起来，进行抗日活动，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续范亭为山西这一群众性抗日初起的大好形势非常高兴，也受到鼓舞。他到太原不久，就同中共代表和组织取得联系，先后同周小舟、彭雪枫进行了接触，还同薄一波、侯外庐、武新宇等共产党人经常交往。他还接见了太原各方的进步人士。他的老友刘安定也常同他来往。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着重于广泛接触，广交朋友，调查研究，观察动向，输通各方关系，筹划并准备着工作的开展。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八月一日，阎锡山奉召到南京。八月十五日南京政府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驻山西、绥远两省的部队进行抗战，阎锡山所属的晋绥军编为第六、第七两个集团军，分别由杨爱源、傅作义任总司令；当时驻绥远的蒋系部队编为第十三集团军，汤恩伯任总司令；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并兼任第二战区副司

令长官。不久，续范亭被任命为第二战区高级参议。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和天津，接着分兵四路向华北大举进攻。日军把太原做为战略进攻的重点，调集重兵直指太原。八月二十五、二十七日，日军相继攻占南口与张家口两个战略要地，掐断了平绥线。日军继续南下，直指大同、太原，山西面临十分紧张的形势。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阎锡山亲到晋北代县太和岭口，布设行营，指挥作战。续范亭以第二战区高级参议的身份，与阎锡山同赴前线行营指挥作战。九月上旬，日军侵入山西，十三日一路日军攻占了大同。九月十四日，日军主力板垣师团向平型关进犯。这时，阎锡山调集了两个军又三个师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等部队，共约六七万人，准备同日军在平型关会战，将日军围歼于关内。九月二十四日，敌板垣师团发动了全面进攻，因城口被突破，担任正面出击的晋绥军节节败退，惟有八路军一一五师英勇奋战，坚决抗击，并于二十五日在平型关全歼日军一千余人，获抗战中首次大捷，给予疯狂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战役紧张的时刻，续范亭陪同阎锡山等到前线第六集团军杨爱源的指挥所督战。这里的军官们，都被“保存实力”所笼罩，之后阎锡山又交给傅作义进行指挥，但终因阎锡山的失败情绪所致，丧失了在平型关全歼进犯日军的有利战机，最后竟下令撤退。

跟随阎锡山一同回到太原的续范亭，目睹了国民党军在前方的这些令人失望的情景，非常气愤。续范亭提议惩办避战、逃战的军官，但他的提议被置之不理。

晋绥军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在抗击日军进攻的作战中壮烈殉国，续范亭十分敬佩这位忠勇之士，他出面和战动总会的同志商定，联合太原各界召开追悼大会，表彰烈士的忠勇牺牲精神，同时鞭挞那些民族败类和失败主义者，以增强军队和人民的抗战信心。他亲自参加了追悼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揭露并痛斥了那些逃跑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和“保存实力”，避战消极，违抗军令，贻误战机等丧失民族气节的丑恶行径。他的讲话得到与会群众阵阵热烈掌声。在他的鼓动下，会议结束时，与会群众拥向太原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反对消极抗战”等口号，行进到绥靖公署向阎锡山请愿。面对斗志高昂的群众，续范亭深感群众之伟力，并从群众身上更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但他同时也为自己这个空头参议没有兵权而感慨。此后，他即被阎锡山的特务盯上了。

追悼会数日之后，续范亭应邀向五百多青年学生作报告。他畅谈了八路军和前线战士英勇抗战的事迹，他教导广大热血青年参加神圣的保卫祖国的抗日战争，他号召把单纯的军队抗战转变为全民族的抗战，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正在续范亭讲话的时候，混在人群中的一个特务递上一张条子，对他进行恫吓。他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续

范亭愿意跟着新生的一代，一直到死！我们要坚决抗战到底，决不妥协投降，争取中华民族彻底解放！”

## 五

一九三七年九月初，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前往山西太原，就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等问题，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与周恩来同行的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〇师副师长肖克，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等。周恩来一行于九月五日抵达太原。七日，周恩来一行前往太和岭口阎锡山的前线行营，同阎锡山举行了会谈。经多次长谈，阎锡山同意八路军入晋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在前线行营的续范亭参加了会谈。九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又偕朱德前去太和岭口同阎锡山会谈，就八路军入晋的部署取得了阎锡山的同意。此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开进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晋东北，第一二〇师开进以吕梁山脉为中心的晋西北，第一二九师开进以太行山脉为中心的晋东南，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进山西战场，实施战略展开，对山西战局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大胜利，周恩来为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做出了杰出贡献。续范亭也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

为动员民众，支持抗战，周恩来在同阎锡山会谈中，

提议建立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其任务是实施战争的全面动员及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由共产党、国民党、晋察绥三省政府，战地各军及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共同组成。经与阎锡山多次磋商，阎锡山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并就建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的问题达成协议，委员共二十一人，其中中共方面的代表有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四人，以及续范亭等。委员会的分工是，在周恩来的极力推荐下，由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共产党人程子华、南汉宸、武新宇分别担任了人民武装部部长、组织部长和动员分配部副部长。战动总会管辖地域和动员范围达三十个县。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大会由续范亭主持，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参加了，请周恩来向大会做了报告。会上宣读了战动总会成立宣言和《工作纲领》。这两个文件都是经过阎锡山同意批准后公布的。战动总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阎锡山抗战的成功，把阎锡山从“守土抗战”推到“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

战动总会成立后，在续范亭的主持下，大力开展活动，派出大批工作人员，进行抗日爱国宣传，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点燃抗日烽火。还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战勤服务队，进行战地服务。吸引了全国各地要求抗日的进步知识

青年和大批平津爱国学生，也吸引了各方面人士和社会名流前来参加，从而使战动总会成为全国最早出现的模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组织，最广泛地团结了各方面的爱国力量集合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程子华亲自领导举办了战动总会“游击战争干部训练班”，历时四个月，办了五期，培训了一千多名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在战动总会的领导下，在雁北、晋东北、晋西北、晋中等地，以八路军总部和一二〇师派出的军事骨干，组建了群众性的抗日武装。

为巩固和发展战动总会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周恩来经常与阎锡山保持接触，不断调整关系。在此期间，周恩来同续范亭进行过两次长谈，周恩来那种肝胆相照的真诚精神，使续范亭毕生受益，深为感动。

在领导战动总会期间，续范亭非常注意同共产党成员的融洽配合，他尊重共产党人，虚心向共产党人学习，共产党人也非常尊重他，支持他。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当日军兵临太原城下时，阎锡山撤走了，战动总会就是共产党一家了。在此重要关头，续范亭态度坚定、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共的主张，毅然拒绝了阎锡山的拉拢，率领战动总会挺进敌后，带头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决心把战动总会的工作在敌后开展起来。

战动总会撤出太原转到晋西北时，八路军一二〇师已

在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续范亭在共产党人的指导和帮助之下，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在晋中、晋西北、绥远、察南等地区，组建了十四个抗日游击支队和察绥四个游击支队，共一万六千人。与此同时，还建立了几十个县的战动会，开辟了广大地区的抗日局面，达六十八县和拥有数百万人口，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战动总会在所属交城、太原、文水三个游击支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抗日游击第一路纵队，纵队司令由原红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担任，谢因车祸身亡，由程子华兼任。

战动总会动员人民参加支前，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不到一年，就在晋西北地区动员了七万多名青壮年参军，仅续范亭的家乡崞县一个县，参军的新战士就组成了八路军两个团，六千余人。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至二十一日，在续范亭主持下，战动总会召开了第一次各县代表大会，总结了总会成立八个月来的工作，分析了斗争的形势，研究确定以后的工作方针。会后，战动总会派出干部和游击部队，深入敌后之敌后，进行宣传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聚集力量。

战动总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改造旧政权并使其起到革命政权的作用，发展人民的抗日武装，动摇了阎锡山

的统治基础，引起阎锡山对战动总会和续范亭的忌恨。但是，续范亭依靠共产党的支持和民众的拥护，坚定地按照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续范亭靠近共产党，把共产党人当做自己最真诚的朋友。而共产党人也没有把他当外人，把他看做尊敬的先躯和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在战动总会中共党团举行会议时，总把他请来列席会议，倾听他的意见，和他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战动总会势力的迅猛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使阎锡山心神不宁。一九三八年六月，阎锡山秘密召集高级军官会议，决心取消战动总会，并策划了取消战动总会的阴谋。阎锡山的这一图谋，受到续范亭和战动总会副主任杨集贤的抵制。为保持战动总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续范亭同阎锡山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斗争。

阎锡山下令对战动总会领导的游击队进行整编。为稳住这支队伍，阎锡山不得不任命续范亭为保安二区司令。续范亭就任保安二区司令后，率所属各支队继续坚持抗日斗争。续范亭深入部队，给干部们讲课，同战士们谈心，与官兵们相处如同亲人。有一次向所属没有见过面的一支队三千多人讲话，他声音宏亮地向大家说："一支队的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就是你们的司令续范亭。"战士们马上向他行注目礼。他接着说："你们在晋中平川同日寇、汉奸战斗了一年，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鼓舞了民众，

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战动总会和保安司令部，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欢迎。”战士们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就欢呼起来：“向续司令致敬！”“拥护续司令！”续范亭继续说：“我们是统一战线的抗日武装，是山西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神圣责任是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黄河，抗日救国。我们要和抗日的友军一起，把吕梁山，大青山筑成一座钢铁长城，誓与日寇决雌雄！”他的讲话，坚定地鼓舞着指战员的抗战决心。

续范亭治军是严格的，他尤其注重部队的纪律建设，对于遵守纪律好的，适时给予表彰，对于违犯纪律的人，即使是他的老部下，他也不留情面，以维护纪律的尊严。

一九三九年三月，在“秋林会议”上，阎锡山表示了准备投降和准备反共的意向。续范亭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同新军代表一起，驳斥了阎锡山准备投降和准备反共的言论。在这次会议上，阎锡山又抛出《军事统一方案》，妄图用“统一”的办法消灭新军。为消灭新军，阎锡山提出取消决死队的番号，把决死队的四个纵队各改编为两个旅，直属阎锡山指挥，取消各纵队政治委员。阎锡山同时宣布撤销战动总会。续范亭和新军代表一起，对阎锡山这些反动措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会议进行中，阎锡山问续范亭：“你那里有没有进步分子？”续范亭朝阎锡山点点头，坦率地回答说：“我那里都是进步分子。”阎锡山说：“危险啊！你不害怕吗？”续范亭说：“我续范亭为什么要害怕抗

日的进步分子!”顶得阎锡山难以对答。

一九三九年五月，秋林会议刚刚结束，续范亭来到延安。他受到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参谋长曹里怀在延安南门外大路上的热情迎接。当晚，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和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设宴为续范亭洗尘。宴会一结束，续范亭便郑重地提出:“我要单独拜会毛主席。”在和毛泽东畅谈之后，他受到极大鼓舞，他衷心敬佩毛泽东。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写下了延安之行的巨大收获。他写道:“有了革命的总方向，有了革命的好武装，有了革命的好舵手，从此不怕风和浪………”他那颗追求真理的心，更紧密地靠近了中国共产党，他对革命的前途更充满了胜利信心。

一九三九年六月，阎锡山在强行解散战动总会的同时，下令将保安二区的部队缩编为山西陆军暂编第一师，仍任命续范亭为师长。在部队改编中，续范亭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与支持，同阎锡山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坚持了中共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坚持部队各级领导干部不得更换。续范亭还借机任命共产党人、参谋主任张希钦为师参谋长，并把晋西北区党委和一二〇师派来的一批骨干，派到各团、营担任军政主管干部。既抵制了阎锡山消灭新军和削弱共产党力量的图谋，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了部队的革命性。

暂一师编成后，在续范亭的指挥下，继续坚持对日军

作战和进行反顽斗争，与此同时，续范亭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同阎锡山瓦解、破坏暂一师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续范亭革命立场坚定，高举坚持团结、坚持正义、坚持抗日的旗帜，为保存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部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了“晋西事变”，充当了反共的急先锋。阎锡山调动了六个军，大举进攻新军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继而又调兵向晋西北的新军暂一师、决死纵队、工卫旅和八路军三五八旅发动进攻。暂一师等新军和八路军部队进行了英勇反击。接着，阎锡山又策动他派往决死四纵队的反动军官独七旅旅长卢宪高和二〇三旅旅长刘武铭，于十二月十二日夜率两个旅叛变，捕杀共产党人，打击进步分子，瓦解决死四纵队。决死四纵队中共领导人得知阎锡山这一阴谋后，决定先发制人，率独七旅和二〇三旅一起行动，向反共顽固派发动反击，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

续范亭对阎锡山妄图消灭新军和向日军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十月五日续范亭以暂编第一师师长的身份发表声明，揭露并谴责了阎锡山唆使第四十四团团长冀聘之叛变脱离暂编第一师的反动行径，他坚决表示:“暂一师是国共两党和无党无派的热血青年所共同缔造的，它的统一战线

的特殊性，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顽固分子所分裂、破坏”;“我们认为，暂一师今天的不幸事件，是顽固分子整套把戏的开始，这一毒计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假如我们对这些顽固分子让步、妥协，不但出卖了暂一师统一战线的光明前途，也是出卖了整个的进步力量!”十一月二十八日，续范亭再次向社会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我们认为暂一师是相当进步的统一战线武装，分裂或取消暂一师是日寇汉奸的阴谋和愿望，都是根本于我们民族不利的，所以不管这种主张出自有意无意，都是帮助了敌人，有形无形地起着汉奸作用。”“我们希望这些人，要觉悟、反省，无论如何不要做一点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抗战的事。如果这些人继续顽固，再要破坏我们，阻碍我们抗战，不让我们团结和进步，那我们也只有以加倍的力量来教训这些顽固分子。”十二月中旬，当阎锡山的旧军准备向新军和八路军发动进攻时，续范亭愤慨地说:“顽固军是决定要给日本人当孙子了，对他们再不能客气了。咱们再不能等着被敌人消灭掉，要积极准备迎战，毫不留情地打击投降派，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正在这时，阎锡山集团密谋召开了反共高级军事会议。续范亭参加了这个会。当他听到阎锡山决心反共及其进攻新军、八路军的部署后，冒着生命危险，立即中途逃席，迅速将其所属部队部署在阎锡山部队和八路军部队的中间地带，首挡阎军的进攻，同时他又亲赴八路军指挥部报告，为八路军集中部队准备反击争取了

最宝贵的时间。续范亭这一系列壮举，最充分地表现了他大智大勇的钢铁般意志和他那浩然正气的伟大精神。

为延缓在晋西北发生武装冲突，续范亭出面建议赵承绶召开一次统战会议。续范亭也想利用这次机会再作一次努力拉一把幼时的同学和多年私友赵承绶在反共投降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赵承绶被迫接受了这一建议。续范亭亲去赴会，积极进行了争取工作，从而使新军和八路军在政治上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为反击阎锡山在晋西对新军和八路军的进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西北区党委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召开军政干部紧急会议，成立了"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治委员。当时阎锡山虽已走上反共道路，但尚未公开投降敌人，为争取他继续抗日，所以仍打出"拥阎"的口号。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日，续范亭指挥各部向赵承绶等顽军反击，经几天连续作战，给予顽固派军队以沉重打击，取得重要战果，迫使赵承绶等顽军退缩到临县城内。

在紧张的工作和异常的劳累中，续范亭的肺病和胃病复发了，咳嗽、气喘，连续高烧不退，使他吃不进饭，睡不好觉。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之苦，夜以继日地坚持指挥作战。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滕代远到达晋西北，组成晋西北行动委员会，在滕代远统一指挥下，八路军和新军联合作战，把赵承绶顽军赶出了晋西

北。续范亭为打退阎锡山在山西发动的反共事变，保卫新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六

为加强晋西北的革命政权建设，加强党、军队和政权的统一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相继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晋西区党委、晋西北行政公署和新军总指挥部，续范亭被推举为行署主任和新军总指挥。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了西北军区，贺龙为司令员，续范亭为副司令员，周士第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至三日，在续范亭主持下，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即不久后改称的晋西北行政公署）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行署成立，续范亭就任行署主任。在行署成立大会上，续范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古今中外有两条路线，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路线，进步与倒退的路线，革命与反革命的路线，生与死的路线。今天是革命路线与顽固分子路线。有人不懂这个道理，想走第三条路线，于是中途动摇。我们看见好些人叛变了，失节了，这在此次晋西事变中看得非常明显。有些人动摇失节吃了大亏。"他进而指出："晋西北事件不是局部的事，而是全局的事。每个同志都应抱定中华民族不会亡，统一战线不会破裂，抗战一定胜利的信心，让投降分子滚出抗

战阵营，今后的统一战线不能允许暗藏的汪精卫存在了。”他在结束讲话时还强调说：“革命是艰苦的长期的伟大事业，不要被某一阶段的胜利冲昏头脑。我们要继续奋斗，加强军政民三方面的工作，迎接反投降的彻底胜利。最后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这样认识：一，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抗战才是民族抗战。二，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团结才是精诚团结。”这次会议还讨论通过了《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行政实施大纲》。

续范亭出任行署主任以后，特别注重和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他曾比喻说：“共产党是牛，牛总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因此，我们应该向共产党学习，要和他们一样甘愿做一条牛，为人民服务。”外界人士曾向他提问说：“你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在一起，你不害怕吗？”他反问道：“我怕什么呀？第一，世界上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强大很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摆在那里，人民生活很幸福，这证明共产党不象有人说的那样是‘胡闹’；第二，共产党讲道理，讲辩证唯物论，这是顶好的科学。最重要的是，当前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日，实行孙中山总理的遗嘱，因此我相信他。正因为我是国民党员，更要忠诚地执行孙总理的‘三大政策’；第三，我自己是穷人，没有钱，没有财产，不怕共我的产。你们说，我怕什么呢？”

一次，有个驻榆林的《大公报》记者突然向续范亭提

问:“续先生是国民党员，为什么住在延安?”续范亭答道:“我孤立好多年了，因为不愿意加入一个小圈子做奴才，所以宁愿孤立。古人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我今天是宁为牛后，不做狗头。请你把这些话告诉重庆的朋友们吧!”记者走后续范亭对秘书说:“共产党是牛，因为牛吃的是野草，又给老百姓流着奶汁，因此我乐于追随共产党，国民党的反动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憎恶它!”

为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一日，在续范亭主持下召开了晋西北第二次行政会议，确定了晋西北地区三大中心工作:（一）健全新政权;（二）开展生产建设;（三）加强教育工作。晋西北区党委书记林枫在会上讲了话。这次会后，续范亭领导行署，致力于晋西北民主政权的巩固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并为军队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在此期间，续范亭还受中共的重托，致信阎锡山，做阎的统战工作。他代表新军表示了同阎锡山自“晋西事变”后的和解，他用自己切身感受到的事实，恳请阎锡山相信中共的统战主张是真诚的，是长期的方针，他敦请阎锡山继续同中共合作，坚持统一战线，和八路军、新军团结抗战。

续范亭还以相当的精力关注着新军的建设和作战指挥。他爱惜这支部队，他以极大的热情按照八路军的榜样建设新军，使党对新军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都得到极大

的加强，从而使这支部队在艰苦的反“扫荡”和多次反围攻的征战中，打败了敌人，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愈战愈强，为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和根据地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一九四二年底新军指挥部撤销，新军部队完全划归八路军建制。续范亭为新军的创建、成长和在战斗中胜利发展，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续范亭的廉政之风是有口皆碑的。在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他就倡导建立廉政的政治和革命的工作作风，规定政府人员供给标准：行署最高负责人的每月津贴不过五元，专员四元，县长三元，一般工作人员一、二元。每人每天供给二十两小米（十六两为一斤的小两）及六分钱菜金。在根据地财经困难时，他发出增产节约和反贪污浪费的号召，在全区开展群众性的以增产节约粮食为重点的运动，以克服暂时的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身体力行，带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过艰苦的生活。在他的领导下，尤其在他的风范作用的影响下，引导全区抗日军民渡过了困难岁月。

环境的艰险，生活的艰苦，工作的繁忙和劳累，更锤炼了续范亭一颗革命的心。他俯首于人民，倾心于共产的神圣社会，抱着衰弱的病体，孜孜不倦，任劳任怨地努力奋斗着！他为光明的前途和未来的新社会奋勇地拚搏着！

一九四〇年的重阳节，续范亭感怀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当晚写下了《秋夜不寐忆张杨》的诗篇，抒

发了他对张、杨忠心救国反遭陷害的痛惜之情：

中国革命历艰辛，前赴后继多英雄。
辛亥崛起孙中山，乘风破浪毛泽东。
显赫一时蒋中正，倒行逆施失民心。
西安兵谏力转舵，中共决策贵英明。
团结抗战资群力，同舟共济少二人。
君子之行如日月，况复张杨系知音。
阳明洞口云深处，爱国将领鬓森森。
出师未捷先囚弃，多少英雄泪满襟。

在这首诗里，也包含着续将军自身饱经风雨和坎坷征程之苦，更使我们看到了续将军那不屈的形象和他那巍然的浩然之气。续将军这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心是和共产党相通的，他的品德和气节甚为楷模，他的思想觉悟早已同共产党员为伍。他就是这样无私无畏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人民大众的解放，做出不朽的奉献。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日本侵略军对晋西北进行冬季大“扫荡”的艰难日子里，续范亭的病体已难以支持，但他仍顽强地跟贺龙一起在前方指挥作战。高度紧张的战争生活，使续范亭的病情加重了，他终于卧床不起了。即使卧床，他仍支撑着，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关心着战局的发展，工作的进程，批阅文件，处理各种急迫的问题。他的病情在不断地恶化，躺在床上不能移动，经常昏迷不醒。周围的同志，都为他伤心落泪。他也知道自己的病情严

重，难以治愈，但他对前来看望的同志却说：“我不怕死，可是我现在还不会死，我要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失败才甘心。”

中共中央得知续范亭的病情后，专门打电报要他到延安去医治。他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同意前往延安治病。临行前他写了一首诗留给贺龙，诗中写道：“四年成绩一身病，惭愧中途掉队人。”表达了他留恋多年战斗过的晋西北和同生死共患难的抗日军民。

## 七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旬，续范亭来到延安。当担架抬着他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特地到山坡等待迎接他。续范亭到延安后，住在杨家岭与毛泽东邻近的窑洞里，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毛泽东亲自过问续范亭的治疗和所需医药。在这里，续范亭生活上也受到优待。在杨家岭稍住不久，续范亭便住进延安城东十五里柳树店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受到精心的治疗。中央领导同志常来看望他，毛泽东也专程来看望他。他感到无比的温暖，深深感动。经过半年的医疗，在当时聚集延安的中外名医的精心诊治下，他的肺叶溃烂部分有了钙化点，病情明显好转，健康情况也日趋稳定。这年十月，中央办公厅派人接他出院，到延安交际处休养。

续范亭在晋西北五年的战斗历程中，同贺龙、关向应以及王震、彭绍辉、罗贵波等结下了亲密的深厚友谊。他到延安休养不久，贺龙便在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常去看望续范亭，他们之间交谈至深夜，更加深了炽诚的友谊。续范亭敬重贺龙，曾作诗把贺龙的忠诚以赵云相称颂，把贺龙的气概以李牧、廉颇相比拟。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开幕时，特邀续范亭参加。这天，续范亭的心情特别愉快，很早就来到了喜气洋洋充满节日气氛的延安大礼堂门前。他同熟悉的人一一握手，笑脸颔首致意。突然朱德总司令迈着稳健的步伐乐呵呵地穿过人群向他走来。续范亭急忙迎上前，紧紧地握手问好。朱德亲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关怀他病体的康复。两位老将军不时发出充满豪情的笑声。续范亭崇敬朱德，把朱德看做自己效仿的老一辈革命家。他在《赠朱总司令》的诗中赞道："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大会在一派欢快的气氛中开幕，雄壮的歌声过后，朱德和林伯渠等在雷鸣的掌声中讲话。这时，毛泽东乘车赶来，狂热的掌声震荡着整个会场。身着灰色军装的毛泽东向全体议员、来宾颔首为礼，立即被请上主席台讲话。毛泽东说：参议会的惟一目的，是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今后实行三三制，有义务与党外人士

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共产党员绝对不许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毛泽东在讲话结束时热切地希望参议员们同共产党精诚团结，共同奋斗，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接着，大会主席邀请续范亭登台讲话。续范亭怀着激动的心情说道：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大会，感到非常荣幸。记得民国十三年，孙总理在北京的时候，就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但是，由于许多人妥协投降，结果把孙总理气死了！孙总理在遗嘱中说：最短期间，召开国民会议。这“最短期间”，离开现在已经十六年了。续范亭心情沉重地说：未能实现民主，最应该负责的就是我们这些总理的信徒。我们对不起孙总理，对不起为民主斗争而牺牲的先烈！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参议会闭幕式上，续范亭聆听了毛泽东发表的《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的演说，使续范亭感动得热泪涌流，他一生奋斗所追求的孙总理的遗愿，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很快就要实现了，在他眼前立刻展现出一幅中国革命的壮丽图景和未来新中国无限光明的前途。他敬佩中国共产党人，他从共产党人的奋斗中看到了人类最伟大的真理，他更为自己能同共产党人长期合作并走上跟随共产党人生死与共的奋斗道路感到自豪。正在他心潮感慨之时，大会主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请他登台，发表讲话。续将军无限地激动着，含着热泪走上讲台。他说：“我奔走了几十年，始于今日目睹边区广大

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将来的中国是光明的，幸福的，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的保障，中国劳苦群众先进人士的保障。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一九四〇年的盛夏，朱德总司令邀请续范亭和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到南泥湾休养。之后，续范亭等人应朱德之邀游览了风云庄。在南泥湾和风云庄参观游览期间，续范亭激情满怀，写下了不少壮丽的诗篇。

一九四三年夏天，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向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挑衅。七月七日，国民党顽军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妄图发动大规模内战。当续范亭听到顽军进犯的消息，他撑着病体，穿好军服，武装整齐，就叫警卫员备马，要到百里外的王家坪去见朱总司令。他要去参加打顽军的战斗。由于他过分激动，心里一急，口吐鲜血，昏倒过去。在医生的劝阻下，他才卧床，但他又挣扎着振笔直书，迅速写出向全国发表的通电，呼吁制止内战，反对进攻陕甘宁边区，痛斥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内战的罪行。他的这篇充满正义呼声的通电，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广播了。同时他写了一篇《警告中国抗战营垒内的奸细分子》的文章，警告内战挑动者悬崖勒马。续范亭写完这篇文章，病情突然恶化，又被送进延安国际和平医院诊治。

一九四四年夏天，阎锡山大放厥词，向中外记者团发

表谈话诬蔑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毛泽东看到中外记者的有关报道，提出请当年山西新军的领导人续范亭和薄一波、韩钧写文章予以驳斥，向公众说明真相，以粉碎其造谣诬蔑。续范亭欣然接受，他向中共中央隐瞒了自己较重的病情，躺在病床上，在秘书的帮助下，写就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这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他痛心疾首地揭露了阎锡山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并且苦口婆心地劝其悬崖勒马。文中感人至深地写道:“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十分同情并拥护共产党的办法，因为他们真正实行三民主义。我所以反对你，是因为你背叛了三民主义，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结日寇，背叛国家，压迫山西的人民。我实在告诉你说吧，我这个人是毫无私人恩怨的，谁对得起国家民族，我就拥护谁，谁对不起国家民族，我就反对谁。我给你的这一封书信还是在病床上口述的，并且又流了我的多少泪，吐了我的多少血。但我的泪是与世界被压迫人民，中国被压迫人民和山西被压迫人民同情之泪，我的血是与世界被压迫人民，中国被压迫人民和山西被压迫人民共流之血。你们的特务们，尤其榆林的特务们，常常向西安和山西报告说:‘续范亭已经死了，千真万确地已经死了。’两三次了，这大概是你们那些小狗子们一方面向你们报功，一方面和我仇视。你们这一类的人，一样不愿意教世界上再有这一个人存在。但是我实在告诉你吧，我现在还活着，并且还了解些

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听了毛主席的许多高论，他解救了我不少忧闷与烦恼，他说世界人类的惨剧，都是由于不良的制度产生的，中国尚在半封建的阶段，所有一切人民的痛苦比欧美国家还要残酷，中国必须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方能走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道。人类社会制度之向前发展是必然的，不是少数人的意愿所能做成的。我听了这些高论，知道你们这些害国害民倒行逆施的东西，必然要崩溃，是无所幸免的，使我轻松了许多。我的死也许三月五月，也许一年半载，但也许死在你的后面，因为谁也没有开真正的人寿保险公司，但我和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阀一同死掉，和你一同死掉，和那些势力小子卖国贼一同死掉，我是很甘心情愿的，并且是很舒服的。呜呼！'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大概是被压迫人民对独裁统治者的共同心理吧！"续范亭的这些话，义正词严，淋漓尽致，力透纸背，象钢刀一样锋利。

八月十九日，续范亭将文稿送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后当即批示："陆定一同志，这是一篇奇文，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毛泽东"。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亲笔致信续范亭，对其讨阎檄文倍加赞许，对其病体表示亲切关怀。毛泽东的信使续范亭感到无限欣慰和鼓舞。讨阎檄文发表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以后，续范亭又抱病撰写了多篇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文章。

续范亭的这些文章，充满着战斗精神，具有强烈的人

民性，是他浩然的民族气节、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必胜的坚定信念的真实写照，强烈地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和他那不凡的傲骨英姿。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延安交际处设宴庆祝续范亭五十寿辰。贺龙、林伯渠、谢觉哉、南汉宸、邓宝珊等都来参加寿宴，为续范亭祝寿。续范亭对大家说："不管寿不寿，将此余年完全贡献国家、贡献革命、贡献革命斗争，心中亦有幸福也。"

一九四五年十月，西北宿将高树勋在邯郸起义，成立民主建国军。第二年，高树勋先后从部队里选派两个参观学习团，分别由聂志超、范龙章率领前来延安。民主建国军的许多军官是西北军的旧部，对续范亭十分景仰，曾分批到柳树店晋见续范亭。续范亭以西北军的革命传统和自己的亲身感受劝勉他们追求进步，跟随共产党走。他的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民主建国军军官们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等，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来延安。他们要求能同久已敬慕的续范亭见一面。续范亭在医院亲切地接见了刘善本一行，同他们共进午餐，并赠诗给刘善本，赞扬他"第一等的爱国行为，开辟了中国航空界的新纪元"。

同年十月，胡宗南命令其驻榆林的第二十七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该军第十七师师长胡景铎反对内战，率部在陕

北横山前线起义。胡景铎是续范亭当年华山聚义的老朋友胡景翼的六弟，而这支起义部队又是老西北军的一部分。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即刻在病床上给胡景铎和全体起义官兵写了一封贺电。贺电写道：

欣闻将军等拒绝蒋胡乱命退出内战，举行起义，誓充人民公仆，不为蒋氏奴才，忠贞为国，昌胜兴奋。此今日救国之第一有效方法也。我西北军自辛亥革命以来，即以反专制争民主之革命传统精神著称。此次义举，更使其发扬光大，革命先烈井公勿幕可谓有继，胡公景翼可谓有弟，世界潮流之所趋，国内人心之所向。独裁好战，定归失败，和平民主，终必实现。

不久，胡景铎率部分起义部队军官来到延安。胡景铎带着胡景翼的儿子胡希仲，专程前往柳树店拜会了续范亭。续范亭和胡景铎叔侄热情相见，并即兴写诗相赠。

这时，续范亭又抱病给动摇不定的邓宝珊写信，以老友之情和焦虑之心，劝说邓宝珊早日高举义旗，站到人民一边。他的信对推动邓宝珊走上人民革命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 八

续范亭到延安后，特别是他参加整风学习以后，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有了更深邃的了解，也有了更挚诚的感

情。他在许多诗文中都表达了自己对共产党的热爱和信赖，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赞扬。他把延安称做推动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是自力更生进行经济建设的模范。他在"'七七'抗战之周年寄晋西北同胞及诸同志并以自勉"这篇文章中，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

近代中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巨人，这个巨人足抵长江，头在延安，两只巨手把握了泰山与恒山，他的脊骨就是南北贯通两千里的太行山。他有新鲜进步的思想，有大公无私的气概，有英勇斗争的精神，对于国家民族无限的热爱与忠诚。共产党就是他的骨干，我们人民就是他的血肉，他的骨干血肉是紧密相连，利害相同，生死与共。

这时的续范亭，由于长期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和影响，他的思想日趋成熟，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几乎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共产党已成为他的依靠和奋斗的力量。他在同敌人和顽固派做斗争的同时，能够果敢无情地解剖自己，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在战场上，始终是一位无所畏惧的勇者。他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又总是一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丝不苟的人民公仆。他在重病缠身的数年中，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思想上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在追求共产主义的大道上，目标明确，步伐坚实，用自己一身血肉，谱写着最壮丽的凯歌。

续范亭在延安，同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及延安著名的“五老”，不仅都有密切交往，而且都建立了真挚的友情。他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把他们当成良师和谊友。他和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用他的心唱在他写下的众多赠诗中。

续范亭与多年并肩战斗的贺龙、关向应的友谊，更是永记心中。当关向应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于延安不幸病逝时，续范亭无比悲痛，他以哭师之情在《悼关向应同志》的四言诗中写道：

抗战初期，晋西相会，沉默寡言，满腹智慧。
益我良多，启我愚昧，与君谈话，徐徐而醉。
三言两语，辞令不费，点头会意，神交默契。
同甘共苦，备尝滋味，何意中途，先后病肺。
延安养疴，互相策励，辗转五载，先我而去。
科学医疗，千方百计，苦无专药，不能治肺。
革命先锋，工人领队，忠诚无间，再接再厉。
既不为名，又不为利，为党牺牲，鞠躬尽瘁。
奋斗终身，四十四岁，布尔塞维，当之无愧。

续范亭同这样众多共产党领导人的亲密交往和深厚的友情，决非仅仅个人之间的交往和友谊，而是他信赖、热爱、追随共产党的最真诚的坦怀。他是一位国民党的老党员，著名的爱国将领，他之所以如此倾心而又炽烈地追求着，正是一个爱国者向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转变的伟大之所

在。

一九四七年，当国民党反动派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时，续范亭同中国共产党紧紧地站在一起，抱重病之躯，转战陕北，顽强地战斗着。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续范亭突告病危。谢老闻讯偕诸老立即前往看望。续范亭自知将一病不起，紧紧握住谢老的手说:“大局我看清了，我很乐观，望转告中央各首长珍重!”谢老说:“你放心养病吧！现在前方打得顶好，人民解放的日子快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前线都很健康!”这时，毛泽东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纷纷来信慰候，以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告慰他，殷切地希望他病情好转，能够亲眼看到全国的胜利。

在病情危重的日子里，续范亭自感危在旦夕，有一桩平生的心愿在激荡着他，他要实现崇高的愿望——请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临终前的遗书里正式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其实，早在延安整风时，他就坦然地向党组织表示了要求入党的殷切愿望。中共中央也十分了解续范亭的这一迫切要求。当时中共中央认为，续范亭并非一般的党外进步人士，他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人士及全国人民中影响很大，入党后反而会影响在这方面的作用。他仍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同反动派作斗争，比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作用更大。这层意思他是理解的。他知道，这是共产党需要他这样，是从整个革命利益的需要来考虑

的。一九四四年伟大的战士邹韬奋逝世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遗嘱传到延安，当时续范亭也在病中，他以十分沉痛的心情著文哀悼，文中有“我志如韬奋”的字句。如今，当他即将走完人生征途之时，他日夜牵挂，他耿耿于怀，他最迫切的心愿，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续范亭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最忠诚的朋友、同志和战友，终因病情极度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与世长辞了。夫人许玉侬含泪奉上续范亭的遗嘱：

敬爱的毛主席和中共中央：

范亭自辛亥以来，即摸索为民族和人民解放的真理，奋勇前行，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道路。七七抗战之后，即欣然接受领导，参加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建设工作，想从此更好为人民服务，以偿平生夙愿。孰料范亭方奋力以赴之时，竟以身染重病，去延休养。在延数年，蒙党百般爱护。尤觉欣幸者，得以时常听聆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教导。范亭奋斗一生，始于今日目睹解放区广大人民的真正翻身，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每自不禁感奋，热泪夺眶而出。屡欲请求入党，

作一名革命军的马前卒，以终余年，但以久病床褥，迄未提出。现范亭已病入膏肓，恨不能亲睹卖国贼蒋介石之行将受审，美帝国主义之滚蛋，与全中国人民之彻底解放，是为憾耳。范亭数年来愧无贡献，然追求真理之志未尝一日或懈也。在此弥留之际，我以毕生至诚敬谨请求入党，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历史，是否合格，如承追认入党，实平生之大愿也。专此谨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续范亭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党政军领导机关并转续范亭的家属，接受续范亭的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致哀悼：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军区司令部并请转范亭同志家属：

接电惊悉范亭同志病故噩耗，至深哀悼。范亭同志于早年参加同盟会，即献身民族民主的革命事业，百折不挠，在抗日民族战争期间，领导山西新军为坚持山西抗战与山西民主化而斗争，功在国家。范亭同志在弥留之际，遗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革命忠忱，实令人感奋。本党决定接受范亭同志的要求，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以此引为本党的光荣。望我晋绥边区党

政军民各方同志一致努力，继承范亭同志遗志，与晋绥人民团结前进，发展与巩固晋绥解放区，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并望范亭同志家属节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十三日

为悼念续范亭同志的逝世，毛泽东亲自送了挽词：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伟大的爱国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续范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国　栋）



谢　　嵩



# 谢　嵩

## 一

谢嵩（1903—1938），又名谢晓云，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九日出生在湖南宝庆东路范家山上车桥（今祁东县范家山镇上车桥村）一个农民家里。父亲谢荣田，母亲冯氏，生有二男三女。由于家境赤贫，大姐十二岁，二姐十岁，三姐八岁，先后给人当了童养媳。谢荣田夫妇带着谢嵩和谢继凯度着艰难而困苦的生活。一九一一年，时值八岁的谢嵩向父母诉说了读书的心情，谢荣田为了让谢嵩能识几个字，经常披星戴月，靠砍柴、帮工，挣些钱来送他读了四年私塾。一九一五年，母亲不幸去世，父亲积劳成疾而长期卧床不起，谢嵩只得含泪辍学，在家供养父亲，并跟随叔父谢林生苦习武功。一九一九年，谢嵩经大伯介绍到新宁去学染工，尽管他起早贪黑，忘我劳动，凶恶的师娘对他还是十分苛刻，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甚至用饿饭的办法来威胁他。别人学徒三年，他要学四年，再帮两年。"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波及新宁县城，谢嵩犹如旱苗

获甘露，决心追求自由解放。一天，他因和一些徒工们举行了罢工斗争，惹怒了老板，当天深夜就被老板赶出店门。后来他又在家乡附近一个地主家里染布，虽然处处小心，勤劳努力，仍经常遭到地主的刁难、凌辱甚至打骂。谢嵩从小秉性刚强，对此恶劣境遇，忍无可忍，他气急了，打破了地主家的坛坛罐罐，不辞而去。

一九二三年，军阀混战，谢嵩被抓去当夫，每天挑着沉重的担子，随军辗转各地，饱尝了皮鞭之痛，看到了人民惨遭涂炭之苦，心中积聚了对这黑暗势力的仇和恨。一天深夜，部队来到隆回县桃花坪，趁夜深人静，他三拳两脚把哨兵打翻在地，逃出虎口，决心去寻找自己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四月，湘军二师六团由洪江去湘潭途经宝庆时，谢嵩告别了父老乡亲及小弟，毅然投入湘军一营二连当兵（彭德怀为一营营长）。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该部编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谢嵩得到彭德怀和李灿的器重。一九二七年初，谢嵩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秘密士兵会”。同年秋他随军参加讨蒋抵安徽。十一月回师湖南，在南县驻防。次年六月，部队在团长彭德怀率领下开往平江，秘密着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谢嵩，李寿轩等曾多次跟随连长李灿到县政府和监狱等地进行侦察，搞清了敌人的部署、进攻的路线和退却路线。七月二十二日中午，在彭德怀和滕代远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平江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了，谢嵩随部队直扑县政府和“清乡”队，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解决了保安队哨兵和警察局的武装，活捉了“清乡”督察员杨鹏翼、警察局长黄夕度、财政征收处主任向玉霞，抓获县长刘作柱，并打开了临时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阶级兄弟。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起义部队在平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从此，谢嵩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开始了革命生涯。

## 二

红五军成立后，在湘鄂赣边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七年八月底，谢嵩跟随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主力，从平江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转移。在转移途中，部队遭到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行至万载大桥时又遭伏击，伤亡很大，一些不坚定的分子趁机逃跑，有的甚至拖枪投敌，出发时二千多人只剩下五百多人了，第一次上井冈山没有成功。部队进行了休整。在这严峻的形势下，谢嵩经受了考验，他和李寿轩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谢嵩随彭德怀第二次上井冈山成功，接着他又投入保卫井冈山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一九三〇年三月，谢嵩担任红五军军部特务大队大队长，李志民任副政委，他们率部随军部行动，参加了攻占江西安福、分宜、袁州（今宜春）等县城的战斗。五月，部队从江西撤回湖南途经路口镇时，与国民党军朱跃华旅

遭遇，谢嵩、李志民率领特务大队配合红五军主力，英勇作战，将朱跃华旅打垮，并有很多缴获。六月，红五军与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谢嵩率所部随红三军团相继参加攻占通山、崇阳、岳阳的战斗，接着进入平江、浏阳一带活动。七月二十七日，红三军团粉碎了湖南军阀何键的进攻，乘胜占领了长沙。在战斗中，谢嵩负责指挥攻打长沙小吴门，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他以小的代价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显示了他的指挥才干。敌人旋即组织反扑，红三军团于八月五日撤离长沙，转移到浏阳、平江一带进行修整。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三日，红一、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部队整编以后，在朱德、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下，谢嵩参加攻占吉安和解放赣西南广大地区的战斗。十一月上旬，谢嵩奉令率部从赣江以西地区出发，向西南方向移动，渡过赣江，准备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进入预定地区。十二月二十九日深夜，红一方面军主攻部队奉命从君埠连夜秘密西进，包围龙岗之敌。三十日上午，红三军与敌展开了激烈战斗，在胜负难分之时，谢嵩率部随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主力从龙岗北面高山直冲而下，配合红三军以优势兵力将敌两个旅分割包围。敌军顿时大乱。随即敌十八师的两个旅和一个师部共九千余人全部被歼，敌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活捉。

蒋介石不甘心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失败，对中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五月，谢嵩率部参加红三军团攻击南团消灭国民党军高树勋部的战斗，给敌以猛烈打击，敌军受损后退守乐安、宜黄，红军又乘胜追歼，敌军惨败。紧接着谢嵩又投入建宁战役，参加了红三军团围歼拥有七千人的国民党军刘和鼎师，歼其大部，致使蒋介石、何应钦精心策划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又遭到失败。

一九三一年七月，红一方面军编制序列及领导人陆续作了一些调整，谢嵩担任红三军团十二团团长。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他参加了三战黄陂和兴国高兴圩、老营盘一带伏击战，均获胜利。

一九三二年春，谢嵩带领十二团随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城，久攻不克，部队被迫撤出战斗。四月，部队渡赣江西进，在湘赣根据地红八军的配合下，解放了崇义、遂川、汝城、桂东、茶陵、营前等广大地区，先后占领崇义、汝城、桂东等县城，消灭了国民党地方部队和民团，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面开辟了大片红色游击区，使湘赣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八月中旬，红三军团从兴国等地出发北上，十五日到达乐安县招携和宜黄县境内。乐安战斗后，又挥师攻打宜黄县城，谢嵩率领十二团由黄陂河向宜黄进击，参加了对困守孤城的高树勋部的总攻，破城而入，俘虏一千余人，缴枪一千余支。部队在黄陂集结休整后，又投入重占黎

川、夺取硝石、解放资溪和金溪等战斗。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国民党军为夺取金溪、资溪等战略要地，再次调动部队向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谢嵩指挥十二团，随红一方面军主力于一月四日开始投入战斗，消灭国民党军一个旅，收复金溪、光泽，逼近浒湾、南城、吴家洲一带。随后又在金溪黄狮渡以西将国民党军第九十师和第二十六路军击溃。一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南移至金溪东南部，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谢嵩所在的红三军团被编为左翼部队，参加了黄陂战役，经过两天激战，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分割围歼，取得了黄陂战役大捷。

黄陂战役后，国民党军为挽回败局，南下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三月二十日，谢嵩奉命率领十二团跟随红一方面军主力进入草台冈、东陂地区设伏。三月二十一日拂晓，红军趁着大雾发动突然袭击，经过一天激战，大败国民党军，红军又获全胜。黄陂、东陂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五月，红三军团在江西乐安以南之大湖坪进行了改编，将原一师改为四师十团，二师改为四师十一团，三师改为四师十二团，谢嵩担任十二团团长，钟赤兵任政委，苏振华为政治部主任。七月一日，经中革军委决定，红三军团和红十九师、红三十六师组成东方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入闽作战。谢嵩率领十二团由江西广昌的头陂

地区出发，七月五日到达宁化以西地区集结。七月九日，福建军阀卢兴邦急派旅长张兴隆率三〇九团从清流南下赴援，被红三军团的第十团、第十一团和谢嵩率领的十二团在离泉上三十里的延祥设伏围歼，击毙敌一百余人，敌旅长、团长、营长及其以下官兵三百余人全部被俘，无一漏网。接着又进占清流东北的嵩溪，在兄弟部队协助下，切断了清流与泉上敌军之间的联系。

泉上战斗胜利后，谢嵩又率领十二团随红四师向驻守朋口、营溪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两个团发起包围夹击，全歼该敌，敌团长被俘。随后又乘胜追击向东逃跑的区寿年部另两个团和师部直属部队，又将其全部消灭，并解放连城。同年十月，谢嵩率领十二团随东方军主力部队奉命撤兵回江西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一九三四年一月，谢嵩率领十二团随红三军团第二次入闽作战，一月中旬，经宁化、归化县境进入沙县县境，二十五日参加了攻破沙县县城的战斗，全歼守敌卢兴邦新编五十二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获甚多。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倾军事路线，搞“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结果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谢嵩对此十分痛心。他在战斗中力排“左”倾军事路线的干扰，既英勇善战，又灵活机动，多次掩护红军主力转移，

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做出了贡献。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谢嵩奉命接受大洋嶂阻击战的任务。大洋嶂位于泰宁境内，山高千多米，控制着去南丰和去广昌的大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制高点。战前，谢嵩召开了团、营、连干部会议，根据大洋嶂的地形和敌兵力情况，部署了作战方案，决定由模范红五连迅速占领大洋嶂，对南丰方向进行战斗警戒，以保障红军驻泰宁一带主力安全转移；六连担任抢占大洋嶂后坚守大洋嶂的任务。为粉碎敌人进占大洋嶂连接泰宁封锁线的企图，谢嵩动员部队，要发扬英勇无畏和宁死不屈的精神。在战斗中，模范红五连指战员英勇抗击，打垮敌人两次进攻后，敌又集中两个团的兵力，排成纵队在二十多门迫击炮的支援下，又发起轮番进攻。红军战士寸土不让，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用大刀砍，与敌人展开肉搏，不退缩，不动摇，同进攻的优势敌人血战终日。谢嵩调集兵力，支援模范红五连向敌人进行猛烈反击，将十倍于我之敌打得溃败下去。这次战斗毙敌五百余人，伤敌八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九门，轻机枪二十多挺，步枪一千余支，其它军用品无数，战果辉煌。胜利完成了阻击敌人、掩护红军主力安全转移的光荣任务。

战斗结束第二天，红三军团召开了祝捷大会。军团政委杨尚昆在祝捷会上赞扬十二团说："这次大洋嶂阻击战打得很漂亮，血战一天，打退了敌三个团的多次进攻，消灭

了大量敌人，取得了重大胜利，特别是红五连在正面打得很顽强，为粉碎敌人企图、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作出重大贡献。红五连这种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的牺牲精神，值得全军学习！”他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授予红五连“以少胜多，顽强防御模范红五连”锦旗。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为这次战斗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火线上的一年》，赞扬“这一伟大的胜利，应该占着中国工农红军以少胜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这充分表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是铁一般的坚强，同时表示了没落阶级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无能。”

谢嵩率领十二团在东华山战斗中，连续打退敌一个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四次进攻，终把敌人击溃。特别在马鞍寨的战斗中，谢嵩命令模范红五连固守马鞍寨，敌人以三个团的兵力在七架飞机掩护之下，疯狂地争夺这一阵地。经过整天的激战，模范红五连虽然遭受严重伤亡，仍顽强坚守阵地，英勇抗击，敌人发动的几次集团冲锋，均被击退。战至黄昏，乘敌人撤退时，谢嵩又组织全团兵力，实施反冲锋，把进攻的敌人打得溃败下去，缴获子弹万余发。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红星报》以“英勇善战的十二团”为题，高度赞扬“这一伟大光荣的胜利，充分表现了铁的红军的英勇无敌，值得每一指战员敬仰和学习。”

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旬，谢嵩奉命接受攻打饶家堡高地的任务，他仔细研究了地形和敌情，决定派第一营夜袭饶

家堡高地。他找来一营领导，认真研究确定了夜袭的作战方案。战前，一营营长带领各连连长秘密地到现场侦察，具体分配了各连、排前进的道路和攻击的目标。一个漆黑的夜晚，一营指战员无声无息地摸到敌人的工事前面，突然枪声大作，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一、三连佯攻，吸引敌人火力，二连从侧面向敌人猛烈突击，战士们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硝烟，冲进堡垒，把正睡大觉的敌人打得蒙头转向，象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有的穿着裤衩，抓起枪乱打一通，有的提着裤子，慌慌张张的逃命。一营很快将守在饶家堡高地上的一团敌人击溃，占领了敌人的阵地。

在攻打石城高虎脑的战斗中，谢嵩带领十二团坚守高虎脑以东阵地，与国民党军队对峙。面对气焰嚣张的优势敌人，谢嵩动员部队，沿山修建防御工事，防止敌人炮击，又在战壕上加盖七层大树，作好迎战准备。敌人凭借强大的陆空优势，集中飞机、大炮轮番轰炸，将工事两端炸塌，并占领了部分阵地。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谢嵩保持着高度沉着，一面指挥反击，予敌重创；一面有步骤的组织部队安全转移，保持了有生力量。

谢嵩作战勇敢，指挥机敏、果断。他处处身先士卒，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时，经常是白天打完了仗，夜晚带领战士到阵地前沿，从敌人死尸上卸下弹药补充自己。在大洋嶂和饶家堡等战斗中，他都能出色完成任务。他在战斗中曾五次负伤。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中革军委授予谢

嵩三等红星奖章。

英勇善战的红十二团，在谢嵩的指挥下，作战非常勇敢，不管什么硬仗、恶仗都能打，是红三军团的一个模范团，不仅在红军内部有很大影响，敌人也畏之如虎。

长征前夕，中共临时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战略意图十分机密。为了引开敌人对红军北上的阻力，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突然下令，要谢嵩、钟赤兵带领部队向广东方向出发。十二团的突然行动，惊动了敌人。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向广东方向集结，便调动主力追赶，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广东境内。谢嵩、钟赤兵带领部队达到诱敌目的之后，发现自己周围几乎没有兄弟部队，便带领十二团东躲西闪，巧妙地将敌人主力甩开，迅速返回根据地，赶上了北上的主力部队。彭德怀看到十二团圆满完成牵制、诱惑敌人的任务，部队完整无损地回来了，对谢嵩、钟赤兵非常满意，他高兴地说："你们真机灵，我万万没想到你们还能回得来。"当初，彭德怀已下决心，以十二团为代价，来换取和保证红军主力北上这一英明决策的实现。

## 三

一九三四年十月，谢嵩率领部队随红三军团开始长征。首先渡过雩都河，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随即渡过章、贡两河，到达湖南边界，围攻汝城，掩护野战主力通过，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十一月攻占宜

章，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随即进入广西边界，渡过湘水，进行界首掩护战斗，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接着越过五岭乌蒙，通过苗族地区，进入贵州，占领黄平，击溃黔军犹国才部，渡过天险乌江，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达遵义以南之懒板橙，部队进行了七天休整和改编，谢嵩仍任十二团团长。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准备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发现了红一方面军的意图，急忙调动部队沿江设防。为甩开国民党军的阻截，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北渡计划，乘贵州境内敌人空虚之际，出其不意，突然回师东进，再渡赤水河，拿下桐梓，重向遵义进军。谢嵩率领十二团担任前卫任务，东渡到赤水河附近时，贵州军阀王家烈闻讯，急调侯之担一部向赤水河急进，企图阻截红军东渡。谢嵩立即命令部队火速行动，先敌赶到赤水河。先头营背水迎战，将正在行进中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胜利渡过赤水河。占领桐梓城后，得知王家烈部一个师正由遵义向桐梓急进，彭德怀即令十三团星夜兼程，力求先敌进占自桐梓通向遵义的要隘——娄山关。王家烈的一个师（四个团）已于二十四日先期占领娄山关，尚无工事，仓促防御。其两个团扼守关口，师部率一个团守关南约三十里处的板桥镇，另一个团正出关企图增援桐梓，与十三团在娄山关遭遇。十三团经反复冲杀，占领了关口，但又遭到敌人猛烈反击，

伤亡较大，与优势的敌人形成对峙。这时，彭德怀急令十二团、十团、十一团在二十六日拂晓赶到关口，十二团接替十三团担任主攻任务。

谢嵩接受命令后，立即和政委召集三个营长开会研究，部署夺取娄山关的围歼战。会后，谢嵩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兵分四路纵队，浩浩荡荡沿桐遵公路向娄山关开进，经过几小时的急行军，部队在拂晓前赶到了娄山关下的南溪口。谢嵩对部队进行了简短的政治动员，他号召全团指战员："为了粉碎敌人的尾追和堵截，为了消灭遵义守敌，为了北上抗日，我们一定要打下娄山关！"他提出"夺取娄山关，再战遵义城"的战斗口号。部队的求战情绪十分高涨，纷纷表示不拿下娄山关誓不罢休。根据娄山关的地形，谢嵩决定：一营担任主攻，从中路突破，二营在右协同一营攻取关口，三营为预备队。

二十六日凌晨，天正下着小雨，谢嵩命令部队向守敌发起猛烈的攻击。一营沿公路猛扑过去，一举冲上了关口，敌人为了守住这个要隘，拼命抵抗，组织反击，敌我双方展开激烈格斗。由于道路狭窄，担任主攻的一营队形密集，伤亡较大，攻击受挫。谢嵩立即从各连抽调了三十名拼刺、投弹、射击技术较好的青年战士，组成突击队，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勇猛向前冲击，接敌时，挥起大刀，与敌展开激烈拼杀。这时，从右侧迂回敌人的二营，冲上了右侧高地，占领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用步枪、手榴

弹集中火力侧击敌人，很快把敌人压了下去。谢嵩又率全团沿公路猛追逃敌，在十团、十一团、十三团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对敌南北夹击，经十多小时血战，敌大部被歼，残部向遵义方向溃逃。娄山关战斗胜利后，谢嵩又率领部队随红三军团乘胜追击向遵义方向溃逃的残敌，并于二月二十八日占领遵义城。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正从贵阳前来增援，被红军打得节节败退。为了紧紧咬住敌人，谢嵩带领部队从左翼沿公路，成多路纵队飞跑过去截住正面退却的敌人。敌人一看被围，纷纷举手缴械。这次战斗，红一、三军团主力共歼敌两个师，俘敌三千余人，其中十二团俘敌数百人，缴获不少武器弹药。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红军三渡赤水。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于是调动部队堵截，而红军则向东经太平渡四渡赤水后向南急进，二渡乌江，直逼贵阳。谢嵩率领十二团负责掩护红三军团部队通过乌江，由贵阳城东北向城东南前进。彭德怀亲自向谢嵩交代任务："你们要做两手准备，一是，军团部队通过后，你们紧跟先头部队前进；二是，万一被敌截断，你们要单独行动，向贵州西南、云南东北方向寻找主力。"谢嵩受命后，立即向团、营、连主要干部作了传达，并提出具体要求："第一，要坚决完成任务；第二，要指挥掌握好部队，急行军要注意联络，注意收容掉队人员。"在谢嵩的指挥下，十二团胜利地完成了掩护红三军团主力通过乌江的任务，并跟上部队前进。接

着，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占领天全、芦山后，休息了七天，准备粮食，然后越过夹金山，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在夹金山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部队休整几天后，跨越马堂雪山，到达黑水芦花。在芦花部队生活的困苦达到了极点。九月，部队从芦花出发继续北上，过打鼓山（雪山），以五天行军，通过草地，到达巴西、阿坝。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谢嵩任第二纵队十二大队大队长，苏振华为大队政委。第二纵队司令员由彭德怀兼。九月十三日，谢嵩、苏振华率十二大队随陕甘支队由俄界北上，十六日，击溃敌一个团，逼近腊子口，十八日占领哈达铺，进入甘肃省南部地区，随后翻过六盘山，在青石咀地区歼敌两个骑兵连。十月十九日到达陕西省北部吴旗镇。至此，谢嵩带领部队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委方正平回忆谢嵩在长征中写道："无论情况多么艰险、紧急、险恶，谢嵩团长总是十分沉着冷静，应付自如，表现出优秀指挥才干。谢嵩同志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作战勇敢，不怕困难，团结同志，以身作则，有许多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革军委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一、第十五军团，谢嵩任第一军团第四师十二

团团长，苏振华任政委。同年冬，谢嵩调任陕甘省军事部参谋长。

## 四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西北军委为准备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决定组建红二十九军，军长由陕甘省军事部长肖劲光兼，政委为李富春，谢嵩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并担任组建红二十九军的主要工作。谢嵩不畏陕北严寒，不惧跋山涉水，带领一个参谋，一个警卫员，一个马夫，先后深入到延川等县城，把富甘红军独立营、延安红军独立营、延清红军独立营和地方游击队组成红二十九军，下辖二五五、二五六、二五七团。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一方面军准备东渡黄河，谢嵩率红二十九军担任扫清根据地内的敌人据点，牵制东北军、西北军，使其不能北向根据地进攻和东向黄河接近，确保红军主力安全东征。他亲率二五五团和二五七团，先后袭击了店头镇、牛武镇，给敌以重大创伤。尔后他又率部辗转到羊圈、太白、黑水一带，对敌五十七军展开袭扰和围困战，咬住敌人不放，使红一方面军第一、十五军团于二月二十二日胜利渡过黄河，向晋中地区深入发展。谢嵩率领红二十九军在张村驿、直罗镇一带集结休整。在休整期间，健全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做到班有党员，连有党支部，团有党总支，党团活动和政治工作十

分活跃。

三月十日左右，谢嵩奉命率领红二十九军二五五、二五六团（二五七团返回陕甘边），首先在宜川、韩城沿黄河一带阻击敌人东渡黄河，保证红军主力东征任务的顺利完成。然后他率部越过黄龙山南下直插关中，开辟根据地，扩大红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月十八日，部队经过三天行军到达红泉县政府所在地临镇。为了迷惑敌人，谢嵩把部队兵分四路：一路向秋林镇，二路向云岩、阁楼方向，三路向南河沟，四路向罗子山前进。故意白天行军，并派出前站人员到处号房子派粮草，造成数万红军要过黄河打山西的大声势。这一行动，惊动了国民党西北"剿总"，派飞机侦察。接着，谢嵩把部队秘密地集中到宜川以北高树梁、蜂王庙一带，派出部分部队把敌人一个营诱到高树梁、蜂王庙之间，突然发起攻击，歼敌二百三十余人，少数逃窜。诱歼战吓得敌人只好固守城寨，不敢出来抢劫骚扰。

谢嵩趁敌人尚未摸清红军虚实，秘密率部向临镇、金盆湾集结，趁敌不意，通过黄龙山。此后，以黄龙山作依托，石甫草甸为后方，向合阳、澄城、白水等县发展，西边与洛川根据地取得联系，这样东有黄河做屏障，北有黄龙山作依托，西有洛川根据地相呼应，部队大胆地向南开展工作。此时，谢嵩代理红二十九军军长，甘渭汉代理军政委。

为了牵制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向根据地的进犯，配合东征红军主力作战，保障根据地人民生命安全，三月底，谢嵩率部出征韩（城）、合（阳）、澄（城），准备开辟新区。为了避开宜川敌人发现红军行动方向，谢嵩采取迷惑敌人的迂回路线，他率部从临镇出发，过麻桐川，穿九龙泉，进入富县的白区牛武镇，到达宜川边界，再过梁子家，进入韩城白马川，歼敌民团六十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没收了恶霸地主的粮食和财物，开展了济民活动，召开了村民大会，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宣传红军政策。正在此时，国民党军一个团和部分反动民团向西庄、昝村一带逡巡前进。为避免与敌在平原地带交锋，谢嵩命令部队挥戈沿山脚向合阳县境内移动，到了韩、合交界处，他亲自带兵侦察敌情，查明黄甫庄驻有守敌一个连，于是决定拿下这个东靠黄河、北依黄龙山南麓、西接洛川根据地、直通陕北根据地的大镇，以便向澄城、合阳、白水、蒲城方向开辟新根据地。谢嵩决定由二五五团一连为主攻，二连为二梯队，三、四连为预备队。四月二日凌晨，由二五五团政委刘永源率一连和骑兵排伪装送粮民夫，叫开寨门，猛扑进去，趁敌不备，予以突然袭击，歼敌两个排后又紧追逃敌，不料与敌增援部队遭遇，在激战中，谢嵩急令二五六团从左翼投入战斗，把敌人右翼压到村边，二五五团乘势发起猛攻，歼敌一个连又两个排，俘敌一百余人，缴步枪一百三十支，机枪四挺，短枪四支。

四月四日上午，谢嵩指挥部队攻下界头庙，红二十九军在这里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谢嵩作了前一段的军事总结，并部署下一步任务。他号召全军同志，要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在国民党西北"剿总"的大后方闹它个翻天覆地。甘渭汉政委在会上作了政治工作报告。

四月下旬，部队在洛川地区攻下了几个村镇和两个土围子，然后进占虎头庙、石头等十多个大小村庄，消灭反动民团数百人，没收了十家大地主的粮食和钱财。

谢嵩率领红二十九军，自三月下旬以来，先后在宜川、韩城等七个县内，打了二十多仗，歼敌六百余人，建立县以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盟四十多个，筹集抗日经费五万多银元，对敌人震动极大。五月下旬，敌西北"剿总"调集七个师的兵力，企图南北夹击，把红二十九军围歼在黄龙山以南地区。此时，红军主力已胜利完成东征任务，正准备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

根据敌我情况，为了避免与敌人大部队作战，谢嵩命令部队带足七至十天粮食，把敌人诱入大稍山里，时而东向进入林区，时而又出现在平原上，使敌人对红二十九军的行动摸不清，只好缓缓尾随于红二十九军之后，深恐陷于红军埋伏之中。红二十九军则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五月二十六日拂晓，谢嵩把部队集结在壶梯山以北，占领有利地形，打退敌人三次冲锋，毙伤敌百余人，残敌退回冯源。此后，狡猾的敌人每天只前进二十里，就构筑工

事，埋地雷，设路障，采取步步逼进，企图用堡垒战把红二十九军消灭在大稍山里。一连七天，包围圈越来越小，红二十九军的粮食基本吃完。谢嵩、甘渭汉认为，牵制敌兵力的任务已经完成，必须设法突围回到根据地。

六月一日夜幕降临，大雨下个不停，谢嵩发布命令，二五五团二、四连向敌三个营的阵地发起佯攻，一面猛烈射击，一面呐喊，吸引敌人注意，军主力则隐蔽地沿着指定路线突围。两小时后，二五五团二、四连撤出阵地，直奔英王镇，一、三连抢占镇外北大山，使主力部队安全通过最后一道封锁线。凌晨三点，红二十九军全部到达红泉县临镇，受到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六月三日，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谢嵩为红二十九军军长，甘渭汉为政委。电令赞扬红二十九军圆满完成了南下任务。部队就地休整了十天，抽调两个连组成了抗日支队，归红二十九军建制，准备留宜川、红泉一带执行任务。

一九三六年六月，敌人趁红军主力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时，陕北军阀井岳秀、高桂滋的部队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发动了猛烈进攻。谢嵩和甘渭汉在子长县贺家湾接周恩来紧急电令：瓦市被困，万分火急，速解重围。为消灭进犯瓦窑堡之敌，甘渭汉对部队作了政治动员，谢嵩对部队进行了调整，随即带领部队连夜驰援瓦窑堡，第二天拂晓投入战斗，不到四个小时，就打退了进犯

之敌，保卫了中央机关的安全。

六月二十四日，红二十九军从瓦窑堡返回贺家湾一带，正碰上从延水关过黄河寻找红军主力部队决战的汤恩伯兵团。谢嵩当即指挥部队机动防御，诱敌深入，分散敌人力量，把气焰十分嚣张、扬言一月内全部消灭红军主力的汤恩伯部拖得疲惫不堪。并在延川县刘家圪塔设伏，歼敌一个营，击溃两个团又两个营，迫敌后退三十里。这一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收复了大片根据地。战后第二天（即七月一日），部队在文安驿召开中国共产党建党十五周年纪念大会，谢嵩在会上强调说：这次战斗是对我们的一次大考验，说明我们红二十九军不仅可以打小仗，取小胜，还可以打大仗，打恶仗，取大胜，是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武装。打仗那能没有伤亡，捡柴火还有碰伤手脚的。伤员好了就可以归队，跑散的可以回来，俘虏兵训练后可以动员补充队伍，部队很快会得到扩大的。

会后第二天，谢嵩又率领部队投入对敌人尾追袭击，三天后把敌人迫退回清涧县城十五里的申家渠，又收复了大片根据地。为使根据地人民重整家园，谢嵩命令部队，不准吃青，不准吃种籽粮，部队要自己动手，挖野菜，找草根，和群众同甘共苦，帮助群众恢复生产，抢种晚秋作物，争取在三个月，让群众能喝上稀饭，睡上热炕。

七月下旬，甘渭汉负伤，繁重的担子全压在谢嵩的身上，他夜以继日的工作，身体日益消瘦，但他仍保持旺盛

的革命斗志。在谢嵩提议、主持下，部队一面积极筹备庆祝“八一”建军节，一面寻找战机，以军事上的胜利庆祝“八一”。此外，他还通过统战关系，在敌占区购回一批物资，活跃当地经济。经过努力奋斗，所有根据地都得到恢复，赤白交界游击队也大都恢复战斗，统战工作亦有新的发展，形势基本稳定，秋收大体结束，群众有了粮吃，窑洞都装上门窗，生活日趋安定。红二十九军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和帮助根据地人民的任务。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十九军从安塞向西开拔，配合西征主力红军作战。部队出发前，出现了有些战士不愿离开家乡的思想波动，为了稳定部队情绪，谢嵩配合甘渭汉作了很多思想工作。他耐心地教育战士说：我们本乡本土的人，想想家是应该的，但我们是革命的部队，为了革命胜利，随时离开家乡是必要的，现在的离开，是为了将来的回来。他的话对稳定部队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十月九日，部队到安塞县进行冬季换装。二十二日又从安塞出发。二十五日路过中共中央所在地志丹城，受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毛主席亲切地握住谢嵩的手说：“谢嵩同志你辛苦了！”谢嵩说：“我们的任务没完成好。”周副主席满意地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随后毛主席鼓励部队到定边更好地完成任务，周副主席向大家宣布了三大红军主力已会师三日的好消息。部队在欢呼声中离开了志丹城，向定边进发。

十一月上旬，红二十九军到达定边城，谢嵩、甘渭汉领导部队与地方党政群一起，同心协力，整治定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与安边驻军十一旅和内蒙鄂托克旗、王星旗敌保安部部队相安无事，坚决打击了马鸿逵部对盐池的进犯，拒敌于盐池以西百里之外，歼灭了作恶多端的土匪范玉山的骑兵营，为民除了一大害。为了围歼胡宗南部，谢嵩命令部队全力以赴投入修筑防御工事，在定边、盐池等地修起了坚固的堑壕、地堡、火力点和单人掩体。

十二月初，胡宗南部已进至盐池西南四十里的红柳沟一带，并派飞机狂轰滥炸。一天夜晚，谢嵩带领二五五团主动向敌出击，跑到盐池县牛毛井，利用漆黑的夜晚，给敌突然袭击，打散了敌两个骑兵连，缴获了几匹战马牵了回来，使敌摸不清红二十九军到底有多少人马，未敢出击。尔后，得到情报，胡宗南部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或十二日以全部兵力发起向三边进攻。谢嵩向全军干部传达了这一敌情活动，他要求部队做好一切准备，严阵以待，把三边变为埋葬胡宗南的坟地。红二十九军各连很快作了政治动员，并做好一切迎战准备，擦拭了武器，补发了弹药，加强了值班和哨兵岗位的检查，部队处于高度战备状态。十三日上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谢嵩召集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西安事变消息，张学良、杨虎城在陕西临潼活捉了蒋介石，胡宗南坐飞机逃跑。顿时全军上下一

片欢腾，胜利信心百倍高涨。西安事变后，形势进一步好转，实现了以定边为中心的定边、安边、靖边的“三边”的统一。

谢嵩除带兵打仗外，对干部的管理非常严格，经常强调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团结。例如，有一个连长没有粮吃了，跑到当地县政府骂了一顿，影响很坏。谢嵩知道后，立即把这个连长禁闭起来，并亲自到当地县政府赔礼道歉。对友军团结他也很注意，是一个很顾全大局的人。

谢嵩最使人感动的，是他那种对待伤残的乐观精神和战胜病痛的惊人毅力。在江西广昌会战中，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肺，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所限，未能治愈，对此，他无所顾忌，一往直前，带着伤照样行军打仗，忍着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仍不停的工作，但他很少向人谈自己的伤情，与他共事的同志，一直认为他是个体魄健壮的人。在他后来牺牲时，胁下的出弹孔一直没愈合，留下钮扣那么大的窟窿，仅仅靠抹点药水，蒙上块纱布，硬挺过来，每当揭开纱布，随着他的呼吸可听到“嘟嘟”出气的声音。他这种刚强的性格，使人深受感动。

一九三七年七月，谢嵩和胡耀邦、康克清、何长工、杨得志、姚喆等人一起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八月他奉调到太原，任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武部作训科科长，十二月任晋西游击第一路纵队司令员（后程子

华)。随后日本侵占太原，谢嵩率部队由太原到洪洞，路经临汾遭车祸负重伤，后运往陕北治疗，于次年初在绥德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时年三十五岁。遗骸安葬在陕西省绥德县烈士陵园。

(谢 德 明)





谢 振 华



# 谢 振 华

## 一

谢振华（1916—　　），原名谢振伴，一九一六年九月出生在江西省崇义县上堡镇十五里外的一个偏僻山村。世代贫穷，以耕种山地竹木为生。由于官家、地主残酷压榨，催租逼税，全家劳累一年，仍得不到温饱，刚满十岁的谢振华不得不去替地主家放牛。由于受地主的压迫和凌辱，激起谢振华的愤慨，他一怒之下把地主家柚子树上硕大橙黄的柚子扯落满地，又把地主家菜地里的瓜苗全给毁掉。

一九二八年春天，朱德、陈毅和中共湘南特委领导发动的湘南暴动，声势浩大，鼓舞人心，直接影响到毗邻的崇义山区，为崇义革命的兴起，播下了火种。

崇义山区，早在南昌八一起义前后，就有中共地下组织，谢振华的父亲那时就是秘密党员。湘南暴动失败后不久，一位身穿长衫、头戴礼帽的年轻人来到谢家。这位年轻人操湖南口音，彬彬有礼，和谢振华的父亲如兄弟，是

湘南暴动中有声望的领导者之一、正被敌人通缉追捕的谢焕文。谢焕文住在谢振华家，组织农民，准备再次发动农民武装暴动。父辈们的革命活动，强烈地影响着激励着幼年的谢振华，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当时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革命口号，牢牢地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

一九二九年的夏天，谢振华的家乡成立了暴动队。他的父亲谢世骙当上了上堡暴动队队长，率领农友们在上堡和附近的几个乡竖起暴动大旗，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消灭乡政府反动民团、焚烧毒害人民群众的鸦片烟等革命活动。穷苦的劳动人民，喜气洋洋，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张贴革命标语，演文明戏，还十分威风地押着地主恶霸戴着高帽子游街。崇义和赣南地区的反动派，被这一革命形势所震惊，他们纠集反动势力，疯狂地进行反扑。

年仅十二岁的谢振华，受暴动队和父亲的指派，也投入了革命武装斗争的行列。一九二九年七月，他第一次执行到古亭镇侦察敌人保安团动向的任务。古亭镇驻扎着赣州地区数百人枪的民团武装，由当地反动土匪头子胡凤章和地头蛇周文山直接掌握指挥，又有赣州军阀马混的支持。这支反动民团武装，实力雄厚，随时都能发动突然袭击，对暴动队威胁极大。谢振华以走亲戚为掩护，来到古亭，紧盯着敌保安团的一举一动，以便及时向父亲和暴动

队通报情况。

初夏的一个夜晚，谢振华从熟睡中突然惊醒，他听说反动的保安团出动了，这可把他给急坏了，他翻下床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拼命地向上堡镇飞奔。古亭与上堡相距六十里，即使急步小跑，最少也得半天才能到达。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汗湿，还没有赶到上堡，敌人却早已抢先赶到，对上堡进行血腥的镇压。母亲哭诉着告诉谢振华，暴动队被打散了，打死打伤了三十多人，父亲和暴动队政委郭树声已被捆绑着押送到县城。面对上堡镇遍地血泪，家乡重陷日月无光的惨景，他肝胆欲裂，牙齿咬得咯咯响，泪水止不住喷泉似的往外涌。泪水伴随着自责的悔恨，使他更增强了革命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敌保安团为了斩草除根，借口收缴枪支，凶残地抄家搜家。为了保护谢振华这棵革命幼苗，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接连好几个月，他在亲戚朋友家过着担惊受怕的难熬日子，终于避开敌人的搜查追捕。他有时在夜深人静之时，或在浓雾弥漫的拂晓之前，悄悄溜回家，叩开母亲的门，打听父亲的近况。他千方百计地找暴动队的队员联系，商讨营救父亲和郭树声政委的办法。

敌人疯狂的屠杀，并没有吓倒上堡的革命人民。就在上堡暴动队和农民协会遭到残酷镇压他父亲谢世骙和郭树声政委被关进牢房以后，在闽浙赣地区，在赣南地区的十多个县、区，农民暴动队一支接一支，有如雨后春笋，争

先恐后，纷纷建立起来，农民运动，农民武装起义，农民武装的游击活动更加活跃，如火如荼。崇义县游击大队传出"要以万人攻打县城，救出被关押的暴动队员"的消息，使敌人十分恐慌，不敢再死硬到底了，终于也放出口风：只要拿出二百块银元，就可赎回谢世骙和郭树声。谢振华的母亲信以为真，到处求借，找遍了乡里的亲朋好友，好不容易凑足一百块银元，送到官府衙门。谁知白花花的银元换来的却是反动派对父亲谢世骙和郭树声政委的杀害。他更看透了敌人欺骗、狠毒、凶残的反动本性。穷人要活命，要求解放，只有拿起刀枪和反动派拼杀到底，彻底把这些吃人的"野兽"埋葬！

一九三〇年四月，谢振华参加了家乡附近的麟潭游击队。七月，他经排长何伟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十月，在游击队和当地反动武装的一次激烈战斗中他负了伤，伤愈后被派到中共河西特委举办的工农干部青年班学习。经过学习，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不仅对革命的性质和目标有较深刻的理解，而且对当时的形势和前途也有了明确的认识。毕业后，他被组织上分配到崇义县少共县委担任县少先队长。

一九三一年夏秋之间，革命形势突飞猛进，上级党组织向各县、区、乡发出了扩红号召，暴动队员、游击队员被调去加入主力红军。谢振华遵照县委决定，带领一百多名少先队员也去参加主力红军。他把带去的少先队员交给

了红三军团第七军后，手持介绍信到红三军团政治部报到，受到军团组织部长黄克诚的接待。黄克诚把他送到培训连队政治指导员的红三军团政工干部训练队去学习。学习期间，训练队政委周恒亲自给他们讲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原则、方针和任务，政治工作干部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还讲红军在苏区的当前任务和长远目标。当时同班一起参加学习的还有苏振华、甘渭汉等同志。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军政治部青年部工作。军青年部长刘志坚分配他担任青年干事兼青年训练队队长。也就在这一年，谢振华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一九三二年，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失利后，到崇义县、上犹县的营前、扲铺地区进行休整。经过整训，部队奉命向赣江东岸中央苏区开去，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这时，红三军团又增加了大批新兵，谢振华被调到军团部新兵营任教导员。谢振华圆满完成了新兵营的集训，并负责把这批红军新战士补充到各师、团。

一九三三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中央党校成立了红军干部政治班，组织上决定送谢振华去这个干部政治班学习。过了两个月，党校红军这个班改为红军大学上干政治第二队，培训各战斗部队选送来的营团政治干部，由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中央军委顾问李德亲自给学员讲授军事课和政治课。谢振华做为上干政治队的学员，聆听了他们的教诲，深受教益，他感

到自己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和提高。

一九三四年四月，谢振华从红大毕业后，根据红军总政治部的安排，他回到红三军团。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他谈话，任命他为红五师第十四团政委。

谢振华回到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任政委时，恰逢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处境极其艰险。由于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顾敌我兵力悬殊，提出“寸土必争”、“御敌于国门之外”、“死守广昌”的错误方针，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及红五军团一个师，以主力对主力，堡垒对堡垒，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至四月二十八日，与有飞机大炮支援的“围剿”中央苏区的五十万国民党军，在广昌决战。结果，不仅红军主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连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也丢失了。“围剿”的国民党军更加气焰嚣张，分兵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横冲直闯，得意忘形地大喊大叫，要在八月一日以前拿下红色首都瑞金。形势的发展，使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处于极被动的地步，在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已不可能，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为掩护临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红三军团（欠第六师）撤至贯桥地区，还有红五军团的一个师，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依托瑞金北面的重要屏障高虎脑，紧扼国民党军南进的咽喉要地，阻击南进石城的国民党军。

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师政委陈阿金向谢振华等传达了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坚守高虎脑进行阻击作战的指示。谢振华刚到红十四团任职，顾不上歇口气，受领任务后马上和团长王明昌、团参谋长陈连华一起研究全团作战部署，布置战前练兵及各项作战保障工作，他还亲自到野外看地形，参与讨论阵地配置、兵力使用、工事构筑等一系列问题。

战斗开始前三天，李天佑师长陪同军团首长彭德怀和杨尚昆来到十四团，检查了前沿阵地的工事，赞扬十四团的战前准备工作，不料谢振华却意外地受到批评。原来，炊事员在饭桌上放了一碗炖鸡，表示对军团首长的招待。彭军团长不但不吃，还板着脸，声色俱厉地对谢振华发火："部队这么艰苦，还吃鸡。吃得下去吗？我不吃！"谢振华虽然有点下不了台，但并没有因此感到委屈，反而非常感动，更加敬重首长。他想，首长对部队这样关心，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这是首长的真正爱护，作为团的领导，自己更应该以首长为楷模，时刻想着部队，想着前沿阵地，经常到前沿去了解下情，及时解决部队的困难。当时，前沿阵地上指战员们没日没夜赶修工事掩体，多少天没合过眼，吃不好饭，喝不上水，有的生疥疮，打摆子，中暑，但都咬牙坚持加修工事，多可贵呀！他感到坐立不安，于是他很快召开了一次有各营教导员和政治处干部参加的战时政治工作会议，讨论领导干部树立爱兵爱部队的

观念及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保持部队战斗力的措施。

在抓部队工作的同时，谢振华主动协同当地苏维埃政府，宣传发动群众支前。在他的有力配合下，很快组织起赤卫队、运输队、妇女洗衣队、担架队，挑水运木，送菜送粮，运送伤员，有的人甚至把自己家的门板和床板都献出来，给红军构筑工事，设置障碍，从而有力地保证了高虎脑作战的需要。

国民党“围剿”军以六个师的兵力，凭借优良的装备和飞机大炮的支援，日夜不停地向高虎脑红军阵地猛烈轰击，轮番发动进攻，山头被炸平，土木工事大半被摧毁，几抱粗的圆木被炸成碎块，断裂的枪支，血染的绷带，破损的钢盔和水壶，以及敌尸和敌伤兵，遍及山野。

战斗间隙，谢振华顺着前沿战壕仔细检查了二营每一个工事，每一个射击孔，举起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他发现敌人正紧张地赶修公路，敌人的汽车等不得公路完全修好就一辆接一辆颠颠簸簸抢路往前开，看样子大概是在拉重炮。他判断敌人可能很快又要发起新的进攻，而且规模比以前更大。

果然，时隔不久，嗡嗡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几架敌机掠空而过。接着，爆炸声震天撼地，引得山鸣谷应。对面山头上，敌人成排成排的炮弹接连不断地压过来。高虎脑刹时间硝烟滚滚，气浪灼热烫人，泥土冲天，很快又成了一片火海。刚赶修好的工事又被打塌了，碎土、断木散

落在谢振华的身上。他赶紧来到五连，但由于电话线被炸断，无法把战斗的情况告诉新来的姚喆团长。进攻的敌人在炮火掩护下，以密集的营方队，多梯次漫山遍野地往上冲，谢振华和二营指战员用全部火力英勇地进行抗击，前面的敌人被一片片打倒了，后面的敌人又冲上来，很快冲到了外壕。激烈的战斗正进行间，突然二营的水机关枪不响了，原来是子弹打完了。战场形势出现了危急情况。谢振华冷静、沉着地应战。趁敌人重新组织进攻的间隙，他果断地命令部队，一面派人到敌人尸堆里去搜寻枪支弹药，一面把附近的石头捡拢来，堆在身边，紧急关头当武器用。但毕竟二营的火力减弱了，敌人的敢死队踩着同伙的尸体继续向上猛冲。视死如归的二营战士们，同冲上来的敌人拼起手榴弹，可是许多自造的手榴弹没有爆炸，于是战士们又抓起堆在身边的石头向敌人砸去。战况太危急了。谢振华立即命令信号员打信号，调三营火速上来增援。这时，已有敌人跳进堑壕，快到谢振华的跟前。谢振华手疾眼快举起从敌尸中搜来的二十响驳壳枪打了个连发，把冲进堑壕的几个敌人打倒。二营五连的战士们紧跟着纷纷跃出工事，奋不顾身地跟敌人拼开了刺刀。肉搏战持续了十几分钟，背后忽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三营的先头连终于及时赶到，投入战斗，把敌人赶出了堑壕，使阵地转危为安。

经过半个月的生死激战，五师在四师等兄弟部队的协

同下，顶住了六倍于己、装备优良的敌主力汤恩伯、樊嵩甫部的进攻，歼敌万余人，圆满完成了高虎脑阻击任务，保障了红军主力和临时中央等领导机关安全地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的伟途。

## 二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后，由于张国焘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不积极，加之川军在赤水、土城一线疯狂阻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意图未能实现。为摆脱敌重兵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的围追堵截，红军改道经叙永、古蔺地区，进抵敌兵力薄弱的川黔滇交界地——云南扎西（即今威信）。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红军损失惨重。有的军团的实际兵力不到以前的一个师，一个师的兵力不到以前的一个团。面对的敌人，不仅数量十倍于己，而且装备优良。当时，长征的红军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单位多，层次多，机关臃肿，后勤庞大，战斗部队人员缺乏，严重影响着部队的机动作战。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决定对红军部队进行缩编，精简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以提高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这时的红三军团由三个师整编为四个团，取消了师的指挥机构，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团。各级领导干部都识大体，顾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能上能下，自觉做到层层下放。原五师政委钟赤

兵改任十二团政委。谢振华也由团政委下到十二团二营任教导员。他们的职务下降了，但心情是愉快的。

敌各路重兵尾追红军不放，向川南、滇东北麇集，对扎西进行合围。乘黔北只剩王家烈少数“双枪兵”，战斗力不强，后方空虚，红军出敌不意，突然回师东进，巧钻敌重兵缝隙，二渡赤水河，再占桐梓。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指出：夺取娄山关，是“开展战局的关键”，“对野战军顺利转移至为重要”。红三军团奉命担负“坚决消灭娄山关之敌，乘胜夺取遵义城”的重任。二月二十五日拂晓，红三军团前卫十三团在团长彭雪枫指挥下，向据守娄山关之敌发起突然进攻。十三团打得猛，冲得快，经过激烈争夺，很快抢占了山垭口两侧的制高点——点金山和大小尖山。与此同时，十团、十一团向左右两侧迂回，十二团继十三团占领娄山关垭口阵地之后，由二梯队变为一线主攻部队，从正面沿公路向山垭口以南发起攻击。十二团三营最先投入战斗，刚冲过山垭口进到黑神庙，就遇到敌人一个团兵力的反击，被压回二百多米。谢振华见此情景，立即率二营的五、六连猛扑上去。刚冲过关口不远，在黑神庙半山坡一个凹处，担任前卫的二营四连指导员丁盛迎面向他报告：前面敌人火力很猛，三营受阻，随三营行动的钟赤兵政委负伤还未下来。谢振华当即指示丁盛：“你们四连，必须把敌人压下去，五连、六连马上支援你们。”他嘱咐丁盛：“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钟赤兵政

委抢救下来。"说完，他同战士们一起，冲向敌人的反击部队。他冲到黑神庙附近的半山坡，只见处于昏迷状态的钟赤兵政委，躺倒在路旁山洼的草地上，刚刚包扎的伤口，鲜血止不住地往外流。谢振华急忙吩咐身边的六连指导员陈福太赶快派人把钟政委抬下战场。只见他举枪高呼："同志们，坚决把反扑上来的敌人打下去！"在他的号召和率领下，战士们锐不可当，很快把敌人压了下去。接着沿公路穷追逃敌，杀得敌人狼狈不堪。这次战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击溃了敌人两个团。二月二十六日，部队继续沿公路向遵义方向急追，追到板桥镇，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邓萍参谋长紧随十一团正好从娄山关右侧向南迂回过来。军团首长鼓励他们："你们打得好，追得快，要坚持下去，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谢振华边走边抓紧时间把军团首长的鼓励传达给各连，使部队的士气更高，追击速度更快。在高坪、董公寺一线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部队两个团。二月二十七日下午，红三军团逼近遵义城，进至老城对面的凤凰山、小龙山下，抢占了新城的边沿村寨，控制了跳蹬河至洗马河一线，当晚即向遵义新老城发起猛攻，一举歼灭了守城之敌。从娄山关到遵义城共歼敌王家烈部六个团，赶在敌增援的中央军到达之前，先敌占领遵义新、老城。

二月二十八日，红一、三军团及军委干部团在彭、杨首长统一指挥下，分别在忠庄铺、老鸦山，与援敌吴奇

伟的中央军九十三师、五十九师及王家烈残部展开激战，歼灭、击溃敌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和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缴枪两千多支，俘敌三千余人，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两渡乌江，佯攻贵阳，趁滇军东调驰援贵阳、云南兵力薄弱之机，渡过北盘江，兵临昆明，调动了金沙江守敌，红军再冷不防转兵西北，巧渡金沙江，围困会理城。这时，谢振华已由十二团调任军团部保卫局执行科长，出色地完成了接收会理城的任务。

一九三五年九月，鉴于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决定，分裂红军，毛泽东等率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九月十八日进占甘肃哈达铺后，将中央纵队和红一、三军团整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罗瑞卿任保卫局长，谢振华调任支队保卫局二科科长。一九三五年十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恢复红一方面军称号，谢振华任方面军保卫局二科科长。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吕梁山区大麦郊召开扩大会议，敌人调集兵力前来围攻。谢振华和司令部二科科长张经武共同负责大会保卫工作，他俩各带一个连出击，迷惑敌人，把敌人调开，保证了会议安全顺利地进行。一九三六年五月，红一方面军为实现全国抗战的大局，主动从山西撤回陕北。在中共的影响和推

动之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这时谢振华调任红军大学二队政治委员。

西安事变后，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由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首长亲自任教，积极培训干部，准备迎接抗战高潮的到来。谢振华被调到抗大二队，和余秋里、张震、洪学智、张国华、谢富治等一起参加学习。一九三七年八月，谢振华从抗大毕业，被派往山西太原，任战地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政工科长。在部长程子华、副部长唐天际领导下，他带领工作组赴汾阳孝义县扩军千余人。年底他将这支武装带到洪洞县牧马村八路军总部，与总部警卫营合并为特务团。由总部作战科长王鹤寿任团长，谢振华任政委。一九三八年二月，谢振华调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在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副主任邓小平、陆定一领导下工作。一九三九年初，谢振华调回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与江青同编在一个组，谢振华任组长。因江青表现不好，谢振华同小组同学一起，对江青进行过批评帮助，不料竟结下怨恨。

## 三

一九四〇年，谢振华在马列学院毕业后，中央组织部决定由他带一百多名干部到苏北敌后去开展工作。离延安前，毛主席亲自找谢振华和田守尧谈话，再三嘱咐：“到敌后发动群众，要讲策略，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一切可

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一九四〇年六月七日，谢振华一行离延安到西安。在西安他们化装成中央军校学员，穿国民党军服，谢振华佩带上校军衔，田守尧佩带少将军衔，这样，终于顺利通过了敌封锁线，经开封、洛阳等地到达皖北。在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新四军六支队住地，遇上黄克诚率八路军两个旅南下。黄部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经电请中央组织部批准，将谢振华一行留在五纵队工作。谢振华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兼敌工部长。不久，黄克诚奉命东进，率第五纵队七、八、九旅进驻苏北，开辟新的根据地。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三师后，仍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十月，谢振华奉命率三师教导队去阜宁建立根据地，组建地方武装。他到阜宁不久，扩大新兵一千余人，组成阜宁大队，出任大队长兼政委，下辖三个营，阜宁县大队与原二十四团部分部队合并为新二十四团，他任团长。一九四二年团政委调走后，他又兼任团政委。

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占领区，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旬，日军万余人，并纠集伪军九千余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多路全面对盐（城）阜（宁）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妄图歼灭苏北新四军主力。谢振华率二十四团，配合当地武装在阜宁、阜东、盐东、滨海地区进行反“扫荡”斗争，以灵活的战术，使日、伪军合击扑空。在敌人实行分区“扫荡”时，他率部与敌周旋，伺机不断打击敌人，“扫荡”

的敌人不得不被迫逐步撤退。

三月下旬，新四军三师八旅兼盐阜军分区，乘在盐城、阜宁地区“扫荡”的日、伪军主力陆续撤退之机，发起了攻占阜宁城西陈集据点的战斗。当二十三团强攻时，谢振华指挥二十四团，与涟东县独立团、建阳总队、阜宁总队等部一起，负责阻击援敌，袭击周围据点，担任外围警戒，保证了陈集歼灭战取得毙日军中队长以下八十六人的胜利。

三月二十九日，刚刚占领了东坎的日军，迫不及待地派出一个中队和二百多伪军在八滩安据点，妄图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扼死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新四军部队。这时，二十四团正在东坎、八滩及滨海地区活动。下午接到师长黄克诚电令，要求二十四团趁敌人立脚未稳，先下手为强，敲掉它。并派师特务营两个连前来支援。当晚，谢振华率二十四团在夜色中从各个集结地出发，沿田间小道，一面奔袭八滩，一面分兵阻击东坎来援之敌。晚九点，完成对八滩守敌的包围之后，随着红色信号弹的升空，攻击战斗打响了，二营从南向北冲击，副营长王光汉率领突击队，直逼日军中队部，砸坏了鬼子的报话机和电台装置。一营由西往东，攻打伪军，仅二十多分钟，就把二百多伪军消灭大部，其残部纷纷溃散。日军分住在三个大院里，顽强死守，攻击部队伤亡很大。这时，有十几个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勇猛地冲上一个院套的房

顶，正要揭开瓦顶往下打手榴弹，院里的日军一阵机枪扫射，房顶上的战士全都应声倒下。二十几个日军趁机冲出了北面的包围圈，向二十四团指挥所扑来，叽哩哇啦地乱叫。情况危急，谢振华一面把手枪里的子弹顶上膛，一面喊司号员吹号调一营的二梯队三连投入战斗。三连连长米富珍率领奋勇队，立即杀过来，将扑向团指挥所的二十多名日军一个不剩全部消灭。午夜，进攻部队夺下日军据守的两个大院，把其余的日军全压到中队部所在的一个大套院里。义愤填膺的战士翻过围墙，跳进去同日军展开肉搏战，寡不敌众被逼出院。这时，二营副营长王光汉牺牲了，一营营长毛和发和几个连的干部也都负重伤。战场形势又发生险情。师部指示要在早晨结束战斗，现在很快就要天亮了，再这样僵持下去只会对敌人有利。谢振华强忍失去战友的悲痛，紧急叫参谋长尹捷峰共同商讨下一步打法。只见尹捷峰头上缠一条白布，急匆匆跑回来。谢振华急忙问："老尹，头怎么了！"尹捷峰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一点擦伤。"他们两人的心火烧一般，不约而同地伏在堤坝上，紧盯着前面受阻的攻击部队和日军机枪吐出的火舌。他俩经过商量，决定采用战斗方案中最后一着：火攻。引火物战前就准备好了，一接到火攻命令，部队马上把蘸了煤油的棉花绑在马尾手榴弹上，投进日军据守的大院里，接着又把蘸了煤油的棉花捆在长竹竿上，抛上大院的房顶。顿时，烈火在大院里熊熊燃烧起来，浓烟滚

滚，火光冲天。日军鬼哭狼嚎，妄图冲出大院，杀一条血路。二营五连的两挺机枪早就紧紧地封锁了大门，日军露头一个即打倒一个，尸体很快堵塞了门洞。拂晓时，几架大肚子敌机，嘶叫着从头上掠过。这时，带领三营在新港子打援的副团长陈玉才派人送来报告：东坎的日军大队，昨晚两点多钟分两路前来增援，现已同三营打响了。正在这时，西北角一阵混乱，十几个日本兵推倒了围墙，从二营和特务营的接合部突围，向东坎方向逃跑。谢振华急起向敌人逃跑的方向追去，跑着跑着，他的右肩仿佛被什么东西猛撞了一下，身子一软扑倒在地上，鲜血顺着袖筒流出来，很快浸透了他的半边军装。警卫员忙赶上前，一把扶起他，他站稳了身子又继续指挥部队追歼溃逃的残敌。这次战斗胜利结束，共击毙日军山本中队长以下一百多人，歼灭一个伪军大队。八滩从此又获得解放。

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谢振华统一指挥下的二十四团和滨海、涟东、阜东、阜宁总队等部，经多次奔袭战斗，攻克滨海县东北之小尖集、七套等大小据点二十一处，歼伪军大队副以下五百余人。十二月八日，谢振华又带领二十四团及涟东、滨海县地方武装并肩战斗，突袭响水口、三岔口等据点，歼伪军一百二十余人。两次战斗，收复了涟东、滨海等地区东西约九十余里，南北约五十余里的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日夜，在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第

八旅旅长张爱萍指挥下，谢振华率二十四团，同二十二团和第七旅十九团等兄弟部队，及涟东、阜宁、滨海总队等地方武装配合，向灌河下游淮盐重镇陈家港（今江苏响水县城东北）发起进攻。激战三小时，至三日解放陈家港。除击毙驻守的日伪军一部外，俘伪中央税警总队第四大队大队长王西珠、第七大队大队长郭克以下四百二十五人，缴获迫击炮一门，掷弹筒三具，轻机枪四挺，长短枪四百一十六支，电台一部，弹药近四万发，食盐四十万吨，石油四十桶，伪币一百万元。

阜宁城是盐阜区的军事要地。伪军第二方面军第五军所属第四十一师、暂编第三十三师及军特务团共三千四百余人驻守在这里，城北还有掌庄、七灶、头灶、大小顾庄等据点。一九四五年三月，新四军第三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发起阜宁战役。谢振华奉命率二十四团首先攻歼城北七灶、九灶之敌，尔后与兄弟部队一起共一万四千余人，发起总攻，二十五日攻克城外据点，伪军第五军军部当晚率残部弃城南逃。二十六日战役胜利结束，俘伪军第三十三师副师长邓主东以下两千余人，毙伤伪军三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七挺，炮六门，长短枪一千六百余支，电台三部，弹药四万余发，解放了阜宁城及市镇二十二处。

阜宁战役之后，谢振华奉调新四军军部高级班学习，由于日本侵略军投降，学习班提前结业。一九四五年八

月，谢振华回到三师师部，被任命为淮海军分区副政委。

##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打着假和平的旗号，发动“和平”攻势；一面利用日伪势力，抢占城市要道，加强部署内战，企图消灭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中共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力争和平民主建国，同时不放松自卫战争的准备。根据内战危险和斗争形势的需要，黄克诚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率新四军三师第七、第八、第十旅和由皖中归建的独立旅及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余人，离开苏北淮阴，开赴东北。淮海区原军分区司令员刘震、政委康志祥和十旅一起，都随三师主力北上了，军分区司令员遂由吴信泉担任，政委由谢振华接替。一九四六年八月，淮海军分区改为华东第六军分区并组建华东新十旅，原军分区所属一、二、三团改为新十旅的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由覃健任分区司令兼旅长，谢振华兼旅政委。为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增强战斗力，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于十月发出了《关于开展全军时事学习的指示》，组织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中共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关于淮阴撤退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和《关于发动敌后广大游击战争的指示》，联系实际，进行对照检查，使广大指战员认清了斗争形势和坚持淮海区斗争的必要性与有利条件，破除了由于敌大军压境在部分干

部和战士中产生的消极恐慌情绪，树立起长期坚持苏北根据地斗争的决心和必胜信心。十月下旬，敌整编七十四师会同敌整编二十八师计五个旅猛犯涟水，力图占领淮海，切断苏鲁交通，围歼淮海区我军主力，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第六军分区所属部队，不畏强敌，由覃健、谢振华指挥，迅即投入战斗，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协同兄弟部队，发起涟水城保卫战，歼敌整编七十四师八千余人，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并掩护了华中军区后方机关的转移。在反击国民党正规军进犯的同时，清剿了上方、高苴一带由国民党收编的伪军，收复了七月份以来被敌侵占之所有失地。十一月上旬，第六军分区所属部队同兄弟部队并肩突袭灌云同兴地区之敌，攻占了哈蟆山，打击了板浦援敌，击溃敌一个营，歼敌近一个营，收复被敌侵占地区。

华中军区主力北撤山东后，国民党军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又重占沭阳、宿迁、灌云全境，淮海地区主要城镇及交通线陷敌手，地区被分割，与山东解放区的通道被切断。国民党军六个整编师在淮海地区齐头并进，全面“清剿”达三个月之久。还乡团等土杂反动武装也趁机跟进，捕杀解放区的干部和群众，破坏基层革命政权，建立反动政权，反攻倒算，使淮海区面临极严峻的局面。覃健和谢振华带领第六军分区部队，在中共六地委领导下，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英勇地坚持敌后反“清剿”斗争。一月中旬，第

六军分区三支队趁敌在陇海路集结，一举攻克河线之陆集、仰化集据点。二支队接着拔除淮涟之间重要据点古寨。一支队则在陇海路南侧袭击还乡团等地方反动武装。

一九四七年二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华东全境部队整编，撤销华中野战军番号，成立华东野战军，所属部队统一编为十二个纵队。新十旅编入第十二纵队，改为三十五旅，覃健调任纵队副司令员，谢振华任纵队副政委并兼任三十五旅政委，汪乃贵任三十五旅旅长。为策应华中、中原战场上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三十五旅于三月十九日一举拔除了东（海）、灌（云）、沭（阳）三县边区敌占万匹中心据点，切断了敌重要补给线，重新打通了苏鲁通道，扭转了战局。为开展淮海区反“清剿”斗争，三十五旅在三十四旅两个团配合下，于五月发起淮沭路攻势，连克胡集、钱集、徐溜等据点，歼敌六百余人，控制了北起沭阳十字桥、南至淮阴五里庄路段，迫使汤沟、沟间、西马屯据点之敌先后逃窜，收复了失地，保护了当地群众麦收。五月底至六月中旬，十二纵队又攻克灌河南岸重镇响水口和大新集，粉碎了敌人对盐阜区北部的“清剿”。仅半年时间，十二纵队淮海地区共作战三千三百二十五次，歼敌七千六百人，缴获机枪四十挺，小炮十门，枪二千四百六十一支，攻克敌据点四十余处，摧毁敌区、乡政府四十九个，恢复失地和扩大新区四千五百四十九平方公里，争取回归分子一万余人。八月到十二月，十二纵队还先后进

行了盐城、益林、李堡等战役，歼敌二万四千多人，恢复了苏北广大地区，改变了苏北地区的斗争形势。

一九四八年三月，华东野战军以第二纵队、第十一纵队和第十二纵队组成苏北兵团，由韦国清任司令员，姬鹏飞任政委，覃健任参谋长。调整后的十二纵队由谢振华任司令员，李干辉任政委，率部进抵兖州担任阻击徐州之敌北上的任务，配合山东兵团取得了济南战役的胜利。

济南战役胜利结束后，十月九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曲阜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作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谢振华等率领十二纵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要歼灭的主要敌人是黄百韬兵团。黄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好，战斗力强，五个军十一个师在徐州以东至海州沿线严密布防。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心投入主力在碾庄圩围歼黄兵团主力。十二纵队、二纵队和中原野战军十一纵队，由苏北兵团指挥，自夏庄、赣榆地区南下，担负围歼黄兵团在阿湖、商潭沟地区的部队。战役一开始，山东兵团所属各部队，首先从北向南切断黄兵团西退后路。十二纵队受领任务从东北插入阿湖镇、新安镇地区，切断徐州至海州的铁路，阻击敌人向徐州靠拢，配合主力分割围歼黄兵团五个主力军。谢振华、李干辉立即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担负切断黄兵团西退后路任务的重要意义。为了检查战斗准备的落实情况，谢振华亲自跑到三十

五旅所属各团察看，他还深入到连队指导战前的准备。十一月六日夜，十二纵队和第二纵队、中原野战军十一纵队一起，在同一个方向上发起进攻。十二纵队三十五旅主攻红花埠，得手后向西再攻新安镇；三十六旅直取阿湖。三十五旅先头部队接敌不久，正在师指挥所的谢振华接到报告：当面之敌出现混乱状态。谢振华当机立断，乘敌混乱之机，果断命令部队，迅速占领阿湖、新安镇，控制铁路线。果然，战斗发展顺利，部队以迅猛的速度攻占了新安镇至阿湖地段的铁路。战斗进行了三天，敌人被华东野战军各进攻部队打得建制混乱，节节败退。九日以后，十二纵队控制了阿湖到新安镇地段，有效实施了攻点打援的作战计划。黄兵团六十三军主力被逼向西撤退。这时，谢振华马上打电话要求三十五和三十六旅两个旅长：要利用有利时机，从阿湖与新安镇之间向敌两翼发展进攻，切断海州至碾庄之间的联系，阻敌六十三军西撤与黄兵团部靠拢。在十二纵两个旅的阻击下，敌六十三军被迫向西南方向溃退，被兄弟纵队围歼在窑湾地域。十一月十九日，十二纵队随华东野战军主力，对碾庄圩的黄兵团主力再次发起进攻，至二十二日夜间，将其全歼，并击毙兵团司令黄百韬。围歼战的后期，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十二纵队火速南下，经宿迁、睢宁、大三集、张集向徐州东南地区急进，胁迫徐州，并从南向北侧击由徐州东援之敌。根据野战军司令部和兵团部下达给十二纵队的任务，谢振华向各

旅布置作战任务时，着重强调了打下徐州机场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徐州机场是杜聿明集团同南京蒋介石总部联系的一个重要途径，打下徐州机场就能迫使徐州同南京的联系中断，把敌人从南京向徐州输送战争物资的线路破坏掉，切断敌空援通路，而且可以动摇敌人固守徐州的决心。三十五旅奉命突袭徐州机场的任务后，先以小分队展开袭击活动，打击机场的守备部队。一月二十六日，三十五旅一〇五团在敌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隐蔽摸进了徐州郊区敌机场。敌机场空勤人员寥寥无几，主要指挥官逃离机场，徐州国民党军总司令刘峙已逃走，副总司令杜聿明下令突围。谢振华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战机，立即派出侦察分队确实弄清敌人的动向，并将敌情报告野战军司令部张震参谋长。与此同时，他不失时机地向部队发出了出击命令，向突围之敌猛攻。当谢振华指挥部队进抵肖县和永城之间的公路两旁时，当面之敌恰是杜聿明总部的直属队。敌人不堪一击，眨眼间，被俘数百人，重炮、汽车等战备物资均被缴获。由于华东野战军多路纵队的包围和阻击，杜聿明三十多万军队突围成泡影。十二月二日，十二纵队迂回到大回村、五户张集一线，又遇敌李弥兵团的部队企图向西突围，谢振华指挥部队予以沉重打击，歼敌千余人，堵住了敌西逃永城的通路，为华东野战军主力继续围歼杜聿明集团创造了有利态势。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起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的三十多天，华东野战军主力从

四面八方向徐州突围之敌紧缩包围圈，十二纵队则从肖县以南转到青龙集、李石林、陈官庄以北地区，和兄弟纵队一起，把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狭小的地域。这时，敌黄维兵团已被中原野战军歼灭，杜聿明集团成了“瓮中之鳖”。在广播毛泽东主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遭拒绝的情况下，华东野战军主力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下午，向杜聿明集团发动了总攻。十二纵队作为总攻部队之一，在夏岩、夏庄地区，对国民党五大主力军之一的邱清泉第二兵团主力新五军展开进攻。三十六旅从夏岩西北面投入战斗，三十五旅配合华东野战军一纵队攻打夏庄。三十六旅执行命令非常坚决，不惜牺牲，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于一月七日晨前打下了夏岩，歼灭了新五军一个团。在夏庄，三十五旅以一〇三、一〇四团配合一纵队于六日发起攻击，仅用一天时间，打了一个歼灭战，歼敌一千余人。这时，敌李弥兵团部向北突围，正好落入十二纵队布下的口袋，由李弥亲自带领的一千一百多人的军官教导团，除李弥逃跑外，其余全部被俘。华东野战军经过四昼夜激战，一月十日全歼了杜聿明集团。

根据中央军委实行全军统一编制番号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召开了纵队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的整编指示和南下作战的行动部署，会上宣布十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

军，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委，饶守坤任副军长，夏光任参谋长，刘仲华任政治部主任。会后，谢振华等率领部队南进，准备渡江作战。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的伟大战役。三十军在芜湖对岸以北突破长江天险防线后，由军政委李干辉和副军长饶守坤率两个师，随兵团主力向东追歼逃敌。谢振华奉命在芜湖市担任军管会主任，率军直属机关和一个师，负责清查残余敌人和芜湖市的治安工作。不久，第二野战军第十军军长杜义德带领部队来芜湖市接替，谢振华率所部继续南进，到嘉兴平湖地区，与先行南进的两个师会合，积极进行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

遵照第三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在上海战役中，三十军担任向上海守敌侧后实施迂回的作战任务，截断上海守敌从浦东向海上逃窜的要道，为进攻市区部队全歼上海守敌创造有利条件。五月十日，兵团司令部发布作战令，三十军为迂回作战的第一梯队，五月十六日二十四时前攻占川沙、白龙港地区。谢振华和李干辉马上召开各师师长、政委会议，决定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为军的第一梯队，由谢振华带精干指挥所随行指挥。五月十三日下午四时，第一梯队兵分两路，由平湖出发，沿公路、海堤向川沙、白龙港急进。时值梅雨季节，道路泥泞，部队行进艰难。谢振华弃马步行。军长和大家一样步行，广大指战员深受鼓

舞，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不顾一切疲劳，你追我赶，奋力前进。两天不到的时间，部队经金山，夺奉贤，取南汇，边走边打，扫除小股敌人的阻挠，行军二百多华里，终于比野战军司令部规定的期限提前一天赶到川沙以南的江家路镇。谢振华不顾劳累，迅速看过地形，他还从战俘口中了解到，敌五十一军已于前三天进驻川沙、白龙港地域，现正忙于作顽抗准备，川沙城里只有不足千人的敌军和地方土顽部队。经过深思熟虑，他乘守敌设防薄弱之机，当即命令八十九师先头部队二六五团直扑川沙。守敌猝不及防，惊疑飞兵天降，顿时陷于混乱，被歼七百余人，仓皇放弃川沙县城。攻占川沙县城后，谢振华命令八十八师两个团，冒雨插入敌后，向北迂回，拿下顾家路镇，截断敌五十一军和敌十二军的联系。与此同时，谢振华用五个团的兵力，向当面之敌五十一军发起进攻。午夜十二时许，敌五十一军及暂编第八师被压缩在东西四公里、南北五公里的狭窄地区。经一阵短兵相接之后，敌发觉三十军的重火器因道路难行，尚未赶到，便组织三个团的兵力，在重炮掩护下进行反扑，企图杀出重围，与十二军重新连接。三十军二六三团经一天苦战，把敌反扑的三个团打垮。在抗击敌反扑的同时，谢振华已根据敌情的变化调整好各师的部署，掉在后边的军炮兵团克服了河川及道路泥泞的困难赶了上来。当晚七时谢振华指挥三十军发起总攻。二六七团直插敌军心脏，连续拿下清敦镇、林

家码头，又猛扑敌军部所在地白龙港。敌人很快陷入混乱，首尾难以相顾。三十军只用一个多小时就攻占了敌军部，打乱了敌指挥系统，俘虏了敌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及其军部全体人员和一个山炮团，并把敌四十师及一一三师分割成两块。为了更有力地杀伤和摧毁敌人，三十军把军炮兵团和从敌山炮团缴来的十八门火炮一起编组，向敌人猛轰。这一夜，炮声震天，杀声不断，战至十七日拂晓，三十军全部歼灭了敌五十一军和敌暂编第八师，仅俘敌即八千人。攻下白龙港，截断了上海守敌经白龙港向海上逃跑的退路。紧接着，在三十一军协同下，三十军发起了围歼高桥守敌第十二军的战斗。攻占高桥后，谢振华指挥三十军继续向黄浦江口追击，配合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完成对整个上海的全面合围。上海外围被摧，逃路已断，龟缩在上海市区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已无抵抗能力。发起总攻后，三十军配合各兄弟部队，势如破竹，经过三天三夜激烈战斗，于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全歼守敌十五万余人，迫使国民党军上海地区守备总司令汤恩伯仓皇逃遁，副总司令刘昌义投降，大上海宣告解放。

## 五

一九四九年的年底，为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军建设，将三十军的军部机关改为海军东海舰队的领导机构。

九〇师调空军，组建了空军第一师，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分别调归二十军和二十六军建制后参加了赴朝作战。谢振华调任由陈毅兼校长的华东军政大学一总队政委。他和总队长聂凤智一起，负责培训军队选送来的优秀青年干部和从京、沪、杭招收的大、中学校参军的学生。一九五一年元月，以华东军政大学为基础，在南京创建解放军军事学院，谢振华又调任学院基本系主任兼党委书记，在刘伯承院长的领导下负责培训全军的团、师干部。一九五二年，谢振华进入该院培训军以上高级指挥员的战役系学习，毕业后调任正在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军长。一九五八年八月，作为第二批志愿军归国部队，谢振华率领二十一军团以上干部到平壤接受金日成首相的欢送，并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致答谢词，祝中朝两国人民友谊万古长青。回国后他率部进驻山西省。不久，二十一军奉调西北剿匪，谢振华改任六十九军军长。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央军委根据周总理的提议，先后在广州、北京召开全军整编及装备会议，各大军区各兵种各派一名团长、师长、军长参加，谢振华作为北京军区的军长代表参加了会议，参与研究了全军的编制装备方案和整编工作方案。

文化大革命初期，山西的武斗不断升级，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先后瘫痪。为稳定局势，六十九军奉命于一九六七年四月进入山西支“左”。谢振华出任支“左”领导小组组

长，统一指挥山西军区和驻山西的二十八、六十三、六十九军的支“左”工作。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后，山西揪起“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在太原召开了“声讨山西军区走资派张日清罪行大会”，省军区的副司令员、副政委都被揪斗，许多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被砸，主要领导干部被揪斗，部队十几个连的枪支被造反派抢夺了，解放军战士被打伤数百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第三次会议，强调严禁打砸抢抄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人员。但是，山西的武斗事件有增无减，形势越来越严重。为此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九年七月，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任命谢振华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后经省党代表大会选为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同时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主持山西省全面工作。谢振华根据“七·二三”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动用了二十多个团的部队，在全省收缴了各种武斗队的武器七万多件，拆除了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制止了山西省长达两年之久的大规模武斗，初步恢复了社会秩序，稳定了局势。在此基础上，谢振华积极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进了两派的大联合。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谢振华解放和起用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老干部，使山西成为全国落实干部政策最早最好的

省份之一。为整顿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谢振华报请中央批准惩处了罪证确凿的杀人、放火和打砸抢的首恶分子。在此期间，谢振华凭自己的觉悟，顶住了批“唯生产力论”的黑风，坚持抓工农业生产，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他每年抽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两年内对山西省一百多个县进行了调查，并勘察定点修建太原新火车站和汾河大坝工程，得到周总理的称赞。在他的努力之下，使山西一九七〇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百亿斤大关。工业生产，尤其山西的煤炭生产，也得到大幅度的恢复和发展。他还坚定地贯彻执行了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在全省范围发起批无政府主义和批极“左”思潮的活动，对消除极“左”流毒，扭转山西形势起了很大作用。谢振华的这些作法，触怒了“四人帮”。

在学大寨的问题上，谢振华抵制了一些极“左”的做法。这更使“四人帮”及其在山西的代言人大为不满。一九七四年二月，山西省晋剧团带着江青直接控制的中央文化组派人选中的《三上桃峰》，到北京参加华北地区文艺汇演。三月八日晚，江青带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陈永贵等突然来到剧场，宣布“《三上桃峰》是一株‘大毒草’，是为刘少奇翻案的黑戏。”“这是谢振华支持的。”江青还加重语气强调：“今天，我是特意穿上军装来‘炮轰’谢振华的，你们应该起来和他斗。”文化组的于会泳亲自坐镇，按照“四人帮”的指示，在北京西苑旅社召开了山西到

京汇演的全体人员大会，对谢振华进行批斗。同时在全国开动各种舆论工具、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对谢振华横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诬陷。不久，王洪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山西省委常委到京汇报会，江青在会上指着谢振华大发雷霆："你在延安时是我们大队长，那时你就凶得很，你就镇压群众，现在你是山西的土皇帝，新军阀！""你再不认账，不好好检查，我一句话，就叫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成光杆司令！"果然，谢振华回到山西就靠边站了，连续被围攻、批斗六十多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谢振华向毛主席写信报告情况，经毛主席亲自过问和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他才免遭继续迫害之苦。但是，他的全家却受到株连，在国防工办任秘书的妻子被停止工作，大儿、儿媳和小女儿被处理复员，在南开大学毕业的儿子被隔离审查，不给分配工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命令免去谢振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谢振华在沈阳军区工作期间，中共中央部署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山西省委将所谓"谢振华路线"和"反大寨"两个问题作为山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并作为清查工作的两项重要内容，而对曾经支持和同情谢振华的广大干部，对大寨极"左"思潮表示不满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清查，大抓所谓谢振华的帮派体系。省委组织部五十八名干部，有十五名因

与谢振华有牵连而被列为清查对象，各厅、局和地区也依照省委的作法抓各自的帮派体系。省委抓了全国工业劳模王体和全国农业劳模李顺达两位常委，太原市抓了市委书记张华亭等四位负责人，省公安厅抓了正副局长，许多县和基层单位也都照此办理，大抓帮派体系，使谢振华和山西的大批干部遭受不白之冤。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山西问题十分关心，在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到山西任职前，邓小平找霍士廉谈话时曾说:“谢振华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所以‘四人帮’就比较恨他。‘四人帮’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夺他的权。你到山西任第一书记，罗贵波同志任第二书记兼省长，到职后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中纪委还派出了以毛铎、刘家栋为负责人的工作组，协助霍士廉、罗贵波解决山西问题。在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下，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一年签发了第十号文件，为谢振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被“四人帮”颠倒的是非终于颠倒过来了，使山西开始走上了安定团结的道路。

## 六

一九八二年谢振华奉中央军委命令调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同时担任军区党委书记。昆明军区情况复杂，文化大革命期间云南两派对立严重，昆明军区是受派性斗争影响的“重灾区”。谢振华到职后，军区内部形成的对立仍未

消除，有些单位仍以派性代替党性，以派划线，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结帮营私，严重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危害着军队的团结和建设，更不利边防的对敌斗争。中央军委对此情况很担心，在谢振华到昆明前，中央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杨得志总参谋长和总政余秋里主任，均亲自向他交代，昆明军区地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邻界，军内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当前要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统一军内思想，作好对敌斗争的准备。遵照军委领导人的指示，谢振华在昆明任职期间，着重抓了带动全局的五件事：

第一，结合整党狠抓克服派性，增强党性，要求全军区干部战士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根本前提。他向指战员剖析派性危害时说：文革中的两派，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论哪一派，都是在“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是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活动的，所以都是错误的，根本不存在哪一派正确的问题。他要求少数闹派性的人不要把自己的一派打扮成正确的，争个我高你低。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两派，才能彻底消除派性。他殷切地希望“文革”中参加过两派组织或倾向过两派的同志，各自看到自己的问题，严格要求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和组织调整，昆明军区的局面有了明显好

转，为后来的整党和取得“两山”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对此先后作了专题报道。又通过整党，昆明军区出现了一个团结一致、奋发向上、勇于创新、朝气蓬勃的新局面。

第二，军队建设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是在现代反侵略战争中取胜的重要保证。他根据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的“军队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最中心的问题就是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指示精神，狠抓了团以上各级班子的年轻化，大胆地把优秀中青年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与此同时，他下大力抓了部队的科学文化学习，努力把干部战士培养成为军队、地方两用人才。他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团以上部队考核干部，半年时间深入部队一百零三天，走遍了驻云南边防的所有团以上部队及八十多个县的武装部，具体指导和帮助各级领导班子的选拔、调整和配备。他还深入到南起阿佤山麓、西至玉龙雪山几千公里沿线部队，在一九八三年春节前夕到滇南驻军和中越边境前哨检查战备工作，迎风踏雪登上扣林山看望前线指战员。当他得知夜晚战士放哨寒冷时，亲自打电话给后勤部火速给哨所赶送棉大衣。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使他对军区的工作获得了主动权和发言权。他把四十多岁的优秀师长何其宗、廖锡龙提升为军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全军区经过调整野战师的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四十二岁，团领导班子

平均年龄三十二岁。当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和余秋里主任视察西南边陲时，很高兴的看到年轻化的一代指挥员经过战争的锻炼正在健康成长，并把何其宗推荐到总参任副总长，廖锡龙升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第三，一九八四年春，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组织指挥了对侵占我西南边陲的老山、者阴山之敌发起自卫反击作战。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收复了被敌侵占的全部地区，并在一个月内打退了敌人数十次从团到师级的疯狂反扑，歼入侵之敌一万四千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嚣张气焰。昆明军区这次自卫反击作战，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总参、总政、总后的具体指导下，在云、贵各级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谢振华和军区其他领导同志进行了精心部署，多次亲临老山前沿指挥，在战斗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提出明确的要求，及时帮助部队解决遇到的困难。谢振华还亲自到各战斗部队进行战前思想动员，讲明这次反侵略战争的性质和任务，要求广大指战员胸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与希望，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怕艰苦，不怕流血牺牲，以压倒一切敌人、征服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舍生忘死去战斗。在老山、者阴山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庆功大会上，谢振华在开幕词中讲道：昆明军区圆满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取得了重大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为祖国争了光，为

军旗增了辉，保卫了边疆人民的安宁，显示了人民军队新一代的战斗英姿和人民战争的无敌力量。他强调说：我们的干部战士，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愧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这次战斗所取得的经验，对于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是极其宝贵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给昆明军区颁布的嘉奖令中写道："你们取得的胜利，对全国人民是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你们的功勋，人民永记不忘。你们创造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我军的光辉史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的题词是："英勇善战，威震老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题词是："国威军威看西南。"

第四，在新的形势下认真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部队建设的基础。他以积极的姿态，领导部队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高干部战士防腐蚀的能力，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无私无畏的英勇精神。他运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英雄事迹和现实生活中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好人、好事教育部队。为实现军队党风的好转，他要求从领导干部做起，从领导机关做起，要"动真"的，不搞两面派，言行要一致，行动要兑现。他还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清查自己的不正之风。他提倡领导干部要有鲜明的原则性，要敢于斗争，绝

不容忍任何人搞不正之风，更不能看着败坏党风的人和事不闻不问。

第五，把开创新局面同对敌斗争、教育训练、边防建设、农副业生产、群众工作以及支援和参加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结合起来，把每个边防连队和前哨点建设成为对敌斗争的钢铁堡垒和干部战士生活的美丽家园。他要求部队要从实战出发，认真研究热带山岳丛林地的作战经验，针对作战对象和对敌斗争任务，大力搞好训练改革，练出过硬本领。他同时组织部队发挥驻守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山多地广的优势发展农副业生产，改善生活，增强部队体质。他还注意加强军民联防，积极支援云、贵两省发展生产，繁荣民族经济，帮助培养民族干部，树立热爱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思想。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央军委召开精简整编会议，把十一个大军区改为七个大军区。在研究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合并后的定点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意见。当时昆明军区所担负的自卫反击作战任务还没有结束，总参的初步方案和昆明军区领导及与会军以上干部都主张把合并后的军区领导机关设在昆明。谢振华当然也有同感。但他考虑更多的是长远的利害关系，整体战略的利弊。他认为，云南虽地处三国交界，目前与缅、老关系尚好，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经反击作战打击，不敢轻举妄动，边境也较稳定，不会出大乱

子；而成都方面则担负着保卫西藏和警惕印度方向的重任，将来会有麻烦。他还考虑到，成都是历代军事要地，交通发达，人口众多，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而云南则略显偏僻，交通不便，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改变的客观现实。因此，他执意赞成成都军区提出的把合并后军区领导机关设在成都的意见。他的意见得到中央军委和成都军区的赞赏。经过会议充分讨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四日发布命令，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整编为成都军区，机关设在成都。按照中央军委的通知，昆明军区的领导班子和机关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日停止办公。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委托谢振华协助成都军区做好原昆明军区精简整编工作，特别是要纠正突击提职、分钱分物和违反规定处理退役汽车等不正之风。谢振华以磊落的胸怀，严肃认真地完成了军委委托的工作。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驻昆明的各军、独立师、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座谈半年工作小结时，大家一致认为：两大军区机关顺利合并，谢振华和工作组做了连接工作，发挥了连接作用，半年时间卓有成效，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信任。

半个多世纪以来，谢振华从一个步入人生的求知少年，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久经革命战争和国内历次重大政治斗争的考验。他始终胸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他多次受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委派，到最艰苦困难的地区，到敌后开辟工作的新局面，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和个人的得失荣辱。他无私无畏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原则，公正清廉，不徇私情，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深入干练的作风，赢得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支持和信任，并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中央军委和上级领导的称赞。

一九五五年十月，谢振华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九大”代表。一九七二年八月他当选为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 。一九八二年九月，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一九八七年他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九八八年八月，他荣获一级红星勋章。

（黎 振 纲）





傅 传 作



# 傅传作

## 一

傅传作（1914—1982），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县调弦镇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傅在朝，是位忠厚勤劳的农民。傅传作生后不久，母亲病故，父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艰辛难熬，后来只好同叔父傅在贵一起度日，全家六口人，三间茅屋，全靠父亲、叔父耕种祖辈留下的三亩田和给地主帮工维持生活。

一九二六年，傅传作刚满十二岁，就下田帮助父亲干活，给人放牛，有时把家中种的菜背到镇上去卖钱换粮，养家糊口。由于家庭贫寒，社会地位低下，他常受富家子弟的欺辱，可从小就倔强不畏的傅传作，常与之对打相骂，有时也向父亲哭诉告状，憎恨人世间的不平。

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前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运动，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下，傅传作从心眼里高兴，随即参加了童子军（即少年儿童团），同革命群众一起抓赌、打菩萨、查封烟馆，思

想逐渐受到了革命的薰陶。一九二九年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他又参加了少年先锋队，跟着党领导的农会，跟着红军队伍，打官僚，斗地主，分田地，这不仅使他受到鼓舞，更在思想上羡慕和崇敬红军，认为红军才是穷人的队伍，自己暗暗发誓要当红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 二

一九三〇年春，傅传作告别了父亲，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入伍后，他先在红二军团第六军警卫团二连当战士。当时湘鄂革命根据地创建不久，国民党反动武装经常向根据地进行"围剿"，战斗频繁，生活亦很艰苦。从小就受苦失去母爱的傅传作，觉得部队如家，同志似兄弟，处处是亲人，他对连队的工作，大家的事情，都是积极地抢着干，对打土豪、打反动派更是高兴，每次战斗表现都非常勇敢，总是不避艰险的冲在前面。领导上很赏识他的才智和勇敢，认为他是个好苗子，第二年夏天就送他到教导团学习。通过学习，他不仅提高了军事素养，也提高了思想觉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鄂西北红军学校任区队长。一九三一年，在湖北省巴东县，吴云介绍傅传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一年冬，红二军团教导第二师师长胡梯之，见傅传作精明能干，指名要他去当从兵（警卫员）。一九三二年夏天，傅传作又调到红三军（原红二军团改称为红三

军）第九师，跟段德昌师长当从兵，不久被提升为警卫班长。这时，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其中以十万之众采取分路合围、步步为营的战术，向鄂西北根据地压去。为避敌锋芒，红三军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同年九月，红三军从洪湖突围，向鄂、豫、陕、川等省进行战略转移。

一九三三年初，红三军主力经过艰苦转战到达湘鄂边。二月，红三军在鹤峰走马坪进行整编。段德昌师长对傅传作多次机智勇敢地完成任务印象很深，整编中将他调往九师便衣队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傅传作由班长、排长升为便衣队队长，他在侦察敌情，打击反动地主、团总、保统等方面干得很出色，多次受到领导上的表扬。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正当红三军处于艰难困苦的时刻，中共湘鄂中央分局在夏曦的领导下，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政策，在红三军抓“改组派”，搞肃反扩大化。当时，指控红九师师长段德昌为“改组派”的头子，无辜被捕杀害。因为傅传作曾是段的“从兵”，也在鹤峰县金果坪被逮捕。酷刑逼供，用沾过盐水的绳子捆绑关押，白天罚劳役背苞谷，晚上剥掉外衣捆吊起来受冻，所受折磨不堪言状，一些认识傅传作的人，都望之流泪，愤愤不平。彭济民冒着风险，偷偷地送给他一件棉背心御寒。当时，傅传作思想上很苦闷，认为自己参加红军是来革命的，为什么反蒙不白之冤，被视为反革命？他困惑不解，但他对党

仍坚信不移，对革命事业忠贞不变。

一九三四年，为了改变红军的困境，红三军向贵州的东部进发，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同年十月，红六军团自湘赣根据地出发，经过艰苦转战到达黔东，与红三军在印江县胜利会师。这时，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成立了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统一领导、指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傅传作获释后，积极要求工作。同年秋天，他被派往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一营三连任排长，不久升任连长，至年底又升任一营副营长。

一九三五年春，傅传作升任湘、鄂、川、黔龙山独立团营长。龙山地处湘鄂西交界处，山高人稀，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加之市镇湾寨多为敌人盘踞，部队不得不露宿野山密林，用树皮野菜代食。这时，傅传作坚决执行总指挥部"不要去扰民，不要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的号召，带领部队利用战斗空隙和训练之余，帮助群众打草、背炭、挑粪，不管打仗，还是助民发展生产，傅传作总是以身作则，因此，他不仅受到战士们的热爱，也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同年秋，在湖南桑植他调入红军大学分校高级班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从连到营的战术科目、政治常识和党的建设问题。冬季毕业后，他调任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一营营长。这时，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下，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

根据地，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国民党反动政府极为震惊，于是调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采用“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大规模“围剿”。十月，傅传作随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桑植出发，退出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在艰苦、频繁的战斗中，他坚决执行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英勇杀敌，不怕流血牺牲。虽多次负伤，仍坚持战斗。在云南宣威战斗中，傅传作和政委朱辉照两人都负了伤，在艰难危急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尽最大努力把政委掩护下来，受到了师长卢冬生的表扬。

部队进至楚雄，反动武装保安团依赖坚固的工事，拚死顽抗，部队几番攻击不破，这时，部队前进受阻，后有追兵，形势非常严峻，上级命令傅传作尽快扫清障碍，以利摆脱敌追兵。他接到命令后，手枪一挥，亲自冲锋在前，终于将守敌全部击毙。部队进至宾川县，又遇到敌人的顽抗，部队伤亡较大，傅传作亲自带领部队反复冲击，攻打了整整一天，终于拿下该城。他气恨地亲自击毙了六名敌人。

经过艰苦转战，部队于是年六月渡过金沙江，在中甸县又遭敌人的顽强阻截。为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部队首长命令傅传作率一营担任主攻中甸县城的任务。他接命令后一马当先，迅速率领全营投入战斗，和兄弟部队一起攻

上了城墙，经过几次冲杀，占领了全城，消灭了敌人。就在这次攻打中甸县城的战斗中，傅传作负了重伤，子弹洞穿了他的腹部，肠子被打破了，紫红的血水从伤口处不断地流出来，他昏迷倒地。对这个在战斗中一贯勇敢不怕死的青年人，这次攻城战斗有功的年轻指挥员，领导和同志们都非常关心。部队首长下令要用最好的药给他治疗。要用担架抬着他走。在翻越第一座雪山时，傅传作坚决拒绝上担架。他忍着肚子疼痛，要求自行上山 。后来同志们见他实在走不动，又强行把他按在担架上抬着走。在艰险困苦的长征途中，缺衣少食，有些同志个人走路都困难，而傅传作却被战友们抬着走，四个人抬不动，换成八个人抬，有的同志倒下了再换人抬，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着，傅传作多次被感动得哭了。

两个月后，部队到达了甘肃边境的哈达铺。傅传作的伤口还没完全好，就坚决要求下部队工作。在他再三要求下，组织上才同意调他到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任参谋长。在长征途中，四师担负着掩护全军转移的任务。行至陕西海原县时，与全军失去了联系，师的领导非常着急，师长卢冬生命令傅传作亲自带便衣队回原路寻找大部队。傅传作终于找到了大部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受到领导上的表扬。同年，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进入陕北。组织上为了培养傅传作，送他到保安红军大学学习。一九三七年夏，傅传作调回部队，晋升为四师十二团团长，当时还不

满二十三岁。这个在旧社会受苦的穷孩子，入伍后即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实战锻炼中，他逐渐觉悟成长，并深刻认识到：“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只有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 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从此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同年八月，红二方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一二〇师辖三五八、三五九两个旅及一些直属团队。同年冬，傅传作被调到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在团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领导下担任第一营营长。

一九三八年六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和扩大革命力量，在李井泉率领下，七一五团进入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同年十二月，根据师首长命令，七一五团从绥中出发，数度越过封锁线，跋涉千里，于一九三九年二月穿过平汉路封锁线到达冀中。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七一五团在深县附近，同正在撤退的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傅传作率第一营与敌激战终日，毙敌一百余人。三月初，傅传作参加了消灭叛徒柴恩波部的战斗。三月中旬至四月初，他又参加了粉碎日军第

五次围攻的战斗。经过长途行军，频繁战斗，部队虽相当疲劳，但全体指战员无不精神振奋，英勇作战。

三月下旬，根据师部命令和冀中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七一五团与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合编为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士一，政委朱辉照，副旅长王尚荣，副政委幸世修，参谋长郭征，政治部主任杨琪良。傅传作任独一旅第二团团长。独一旅编成后不久，即参加了齐会、找子营、南留路战斗，在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亲自指挥下，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最后终将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王牌吉田大队八百余人，除四十余人逃窜外，全部歼灭，开创了平原对日作战的光辉范例。在齐会战役中，第二团驻在北留路，作为独一旅的第二梯队。在向找子营日军发起冲击时，傅传作带领第二团打得英勇顽强；在北苏鲁阵地守卫时，傅传作指挥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日军突围的冲击，迫使敌人龟缩到张家坟地，最后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

齐会战役后，为了及时补充战斗中的伤亡减员，加强部队战斗力，五月，独一旅进行了第一次整编，撤销了第三团，充实了第二团和七一五团，并从七一五团抽调了大批红军老干部到第二团，使第二团从团到营、连、排都配有红军老干部为骨干。六月下旬，国民党河北省民军司令张荫梧，率三个旅两千余人，由冀南进占冀中根据地深县之北马庄、张骞寺地区，企图“收复失地”。独一旅奉命在

一分区部队配合下，以七一五团第一营和第二团的二、三两营，于二十一日夜插入顽军腹心驻地，二十二日拂晓展开了全面攻击。经一日战斗，该部除张荫梧负伤后化装率十余名骑兵逃窜外，全部被歼，为冀中根据地消除了一大祸患。

九月上旬，独一旅进行了第二次整编，将第一、二团合编为第二团，傅传作仍任第二团团长。九月下旬，一二〇师在晋察冀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在灵寿县陈庄山地打了一个歼灭战，经过六天五夜的战斗，歼日军少将水源旅团长以下一千五百余人。在战斗中，根据师、旅首长的指示，为抓住进占陈庄敌人撤退之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傅传作带领第二团迅速抢占位于磁河南岸的冯沟里、破门口、高家庄地区有利高地，严密控制敌人东逃大路。九月二十八日，约八时左右，侦察员报告敌人主力正渡磁河，准备南逃。根据旅首长的指令，傅传作带领第二团主力，由冯沟里以南向长峪急进，协同独一支队阻击敌人南逃。九时许，据前方侦察报告，狡猾的敌人又转换了方向，妄图利用河边树丛、河套芦苇作掩护，正沿磁河南岸大道向东逃窜，其先头部队经高杨庄已进到冯沟里附近，遭第二团特务连迎头痛击。敌人为了抢占青杨山阵地，连续发起了五次冲击，均被特务连击退。这时，第二团团长傅传作闻到枪声后，及时果断地率主力返回鲁柏山。并在行进间迅速调整了部署，三营在西，二营在东，占领冯沟里、高

家庄以南高地，一营仍控制青山地区。十时左右，敌人主力全部进至高家庄、冯沟里地区，依托村庄及附近高地向第二团阵地进行猛烈反扑，企图抢占有利地形，夺路窜逃。第二团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三营尤其是九连、十连，打得特别顽强，经多次反复冲杀和白刃格斗，终把敌人击退，为全歼进犯之敌起了重要作用。二十八日晚，第二团二营向冯沟里南山发起攻击，五、六两连发动了连续冲击，终于夺取了敌人多处阵地，二十九日最后歼敌时，六连干部虽大部伤亡，但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精神，直至这次战斗的胜利。

十二月中旬，晋察冀冬季反“扫荡”刚结束，独一旅正集结准备休整，突然来了一百多国民党武装特工队——“平西先遣军”，携带电台，潜入八路军防地，专门从事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罪恶勾当。傅传作奉命以第二团一部兵力于夜间将该部包围，战至天明，将其全部消灭，为晋察冀除掉了一个隐患。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二〇师奉中央军委命令转移至晋西北，其任务是：将南起汾离公路、北至绥蒙大青山之间地区，化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以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保障党中央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来往联系。在师首长统一部署下，独一旅进驻临县地区。同年二至六月，日军乘独一旅刚到晋西北立足未稳之机，分别集中了一万二千余人和两万余人的兵力，发动了春季和夏季大“扫荡”，

持续时间长达四十天和一个月。在反“扫荡”中，八路军小分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骚扰和袭击敌人，掩护地方工作，主力部队则集中隐蔽，待机歼敌。在夏季反“扫荡”将近结束时，师部集中全师主力在兴县东二十里铺进行了一场战斗。独一旅经连日冒雨急行军赶到战场，积极主动的对东撤之敌展开激战，打得很英勇，毙伤敌四百余人，给敌以重创。

夏季反“扫荡”后，日军对根据地加紧推行所谓“囚笼政策”。独一旅仍以小分队深入敌占区进行游击活动，打击外出骚扰之敌，同时相机拔掉敌人的孤立据点。七月二十一日，第二团三营在团长傅传作亲自率领下，用奇袭的方式，在临县石门墕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不到半小时即全歼日军三十余人。石门墕是晋西北日军村井旅团一个中队驻守的据点，敌人妄图依赖“囚笼政策”，封锁、包围、蚕食抗日根据地。根据旅首长的指示，为拔掉这个据点，在战前，傅传作召集三营连以上干部，进行部署。他在给三营指战员作动员时说：“我们一定要拔掉鬼子伸向根据地的这颗牙齿，砸碎它那个笼子！”他还亲自带领担负主攻任务的十二连排以上干部，化装成老百姓，先头出发对敌人据点进行实地侦察。在战斗中，傅传作穿着被铁丝网挂破的裤子，按预定的进攻的道路，指挥部队发起攻击，迅速获胜。战斗结束后，为表扬十二连的战功，傅传作叫警卫员给送去了一大瓶酒表示祝贺，并告诉连里干部：“四

周都有我们的部队，如果敌人再来，就是打响了也没你们的事，要让战士好好休息。”傅传作身先士卒的行动，鼓舞了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十二连指导员田惠普曾说：傅团长把指挥所设在主攻连队，亲自布置，亲自动员，亲自侦察，战后又这样关心爱护战士，上下亲密无间，跟着这样的团长就一定能打胜仗。在抗日战争中这一奇袭战例，以后被列入步兵学校授课的教材。

八月份，独一旅参加了“百团大战”。在战役第一阶段，第二团和七一五团分别在岚县、临县一带活动，袭扰和相机歼灭敌人，先后进行八次战斗，毙伤敌人一百五十余名。在战役第二阶段，傅传作率第二团奉命向同蒲路忻口南北进行破击，九月十八日，进至宁武地区，途中在上庄村与日寇（约四百余人）遭遇，经激烈战斗，毙伤敌二百余人。九月二十二日，他率领第二团袭击奇村，七一五团袭击忻口、楼板寨。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两个夜晚，第二团同七一五团又对忻口南北地区铁路展开破击，先后作战五次，毙伤敌三百余人，俘敌五名，破坏铁路四里，公路四十余里。

冬季，日军又调集兵力两万余人，对晋西北进行大“扫荡”，实行分进合击，并采取空前残酷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这次反“扫荡”，在晋西北军区第四军分区（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兼任分区司令员）统一领导下，普遍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

野，不使敌人抢走一粒粮食，在军事上以部分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大部主力部队集中伺机歼敌。傅传作率领第二团一部，在安北附近消灭了敌人的抢粮队，把牲畜和粮食送还给群众。第二团的另一部，在三交、大武之间进行了两次破击战。这次反"扫荡"历时一个月，先后进行大小战斗一百零四次，毙伤日伪军五百余人，破击公路二十余次。

一九四一年春，傅传作奉命调延安军政学院高级班在职学习，后任区队长。

一九四二年，延安军政学院并入中央党校，主要学习党的路线与政策，兼学社会科学概论与文化。这一年，傅传作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被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候补代表，准备参加"七大"。他还参加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阶级觉悟、政治水平、思想方法等方面，均获得了显著的提高，从而进一步辨清了党在以往的路线是非，认识到毛主席英明伟大，提高了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自觉性。

一九四三年三月，因部队工作需要，傅传作又回到一二〇师独一旅第二团任团长。七月份，独一旅进行整风，通过学习，对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同年，在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独一旅全旅自制了几千辆纺车，粗手大

脚的傅传作同战士们一起，也盘腿窝脚“纺线线”，到处是一排排纺车，嗡嗡之声不绝于耳，洋溢着一片生机。在大生产运动中，第二团二连搞得最好，他们种瓜种菜不仅自给有余，还拿出自己生产的东西支援地方同志，因此受到表扬。

一九四四年冬，在整风和生产运动的基础上，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傅传作对第二团军事训练要求很严，抓得很紧，在射击、投弹、刺杀等方面，要求每个干部、战士必须完成计划，达到标准，不合格的要重新作，反复练，以至符合要求为止。在战术训练方面，要求班排长以上干部都要经过教导队的培训，从而大大增强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为实现抗日大反攻和迎接新的革命斗争准备了重要条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而此时的蒋介石，则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国内固有的阶级矛盾骤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过渡到国内革命战争。

在日本投降的新形势下，独一旅奉命开赴晋中参加大反攻。八月十七日，傅传作领导的第二团，在旅部指挥下，同七一五团一道，由绥德、米脂、子洲等县出发，东渡黄河，经过八九天的连续行军，到达汾阳以北地区集结，并在晋绥八分区部队配合下，一举攻克文水县城，歼

敌八百余人。在八路军实行大反攻逼近华北各大城市并迫使日伪军投降的同时，蒋介石却命令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并改编伪军为国民党军，就地占领地盘，形成了蒋、日、伪合流的严重局面。在华北绥远方面，长期避战于黄河后套地区的傅作义部也伸手摘桃子，在占领包头以后，八月十八日向攻入归绥正在围歼日伪守敌的八路军部队进行突然袭击，夺占了归绥，进而夺占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集宁、丰镇等城，并逼近华北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九月九日，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和晋绥八路军部队发起绥远战役。

十月中旬，独一旅、三五八旅等部队开进到晋北左云地区，由南向北发展进攻，与向东向西发展进攻的晋察冀部队相配合，对傅作义部实行合击。十月二十五日，三五八旅在独一旅等部的配合下，一举消灭了刚刚撤至卓资山的傅作义部六十七军新编二十六师。十一月三日，独一旅和骑兵旅奉命西进，在察素齐消灭傅作义挺进四纵队四个骑兵团，八日进抵包头城下。为增加进攻包头的力量，三五八旅八团和七一五团两个营，经三天急行军于十一日赶到包头。同日，组成两旅联合指挥所，指挥攻城战斗。担任主攻包头任务的部队，由独一旅第二团团长傅传作统一指挥。十一月十三日零时，在炮火支援下，第二团和七一五团一举登上城墙，迅速打开了城北门和城西门。第二团副团长彭济民和副政委罗洪标，率领本团三营和一营首先

突入城内，七一五团二营、三营也相继入城，进攻部队与敌展开巷战，迅速扩大了战果，接着攻下了西营盘等重要阵地，控制了全城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并将数百名俘虏带出城外。早四时左右，傅传作要二营营长张济堂跟他一起入城看地形，准备让二营从一、三营之间加入战斗，直捣财神庙以南高地，夺取敌人炮兵阵地。天明后，城内敌人组织约四个团的兵力和火力，向攻进城内的四个营八路军部队实施反冲击，并集中火炮向西北门射击，企图以火力封锁住突破口。在敌人发动的连续猛烈的反冲击中，入城部队四营勇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给敌以很大杀伤，但终因敌众我寡，弹药消耗已尽，于下午被迫撤出城外。对这次攻城战斗如何评价，当时有些同志说：上级对包头敌人侦察估计不足，没有采取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打法，我们攻进城内的部队太少了，四个营占领全城三分之一的街道后，几乎看不到自己的部队，如果当天夜间再有四个营加入战斗，在天亮以前可基本解决问题。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攻打包头战斗之后，傅传作晋升为一二〇师独一旅副旅长。

## 四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开始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奋起迎击，从此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遵照中

央军委赋予晋察冀、晋绥部队的任务，两支部队于八月初开始进攻大同。独一旅奉命在卓资山组织防御，阻止傅作义增援大同。在我军即将进攻大同的时候，傅作义集中全部兵力倾巢而出，其主力五个师一个炮兵团共两万八千余人为中路，南北两路均为骑兵以配合中路行动。九月五日晨，其中路第十一、十七师和新编三十一师，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独一旅卓资山阵地猛烈进攻。担任主要防御的独一旅第二团顽强抗击，杀伤了进攻之敌的有生力量，坚持到十四时后，主要阵地被敌突破，情况发展对我极为不利，遂决定撤出战斗。敌军占领卓资山后，继续向集宁进犯。三五八旅、独一旅和十一旅自集宁西南向敌之侧背发起进攻，九月十一日午，歼敌十一师大部和十七师一部共约五千余人。

同年秋，傅传作由一二〇师独一旅副旅长调往晋绥军区军政干校任教育长。

一九四七年初，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迫使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对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出于战争的需要，傅传作由晋绥军区军政干校调任西北军区第七纵队第七旅旅长，并先后参加了解放临汾、太原等战役。

一九四八年，从全国和华北的形势看，山西太原已成为国民党军一个孤立无援的据点，它也是一个最顽固的反动堡垒。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部队，依据毛主席指示的作

战原则，认为拔掉太原据点，消灭守备之敌，解放山西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在十八兵团司令员徐向前直接指挥下，攻取太原的战役开始了。十月中旬，经过反复的侦察，兵团召开了作战会议。周士第副司令报告了作战计划，大家发表意见后，徐向前司令员指着地图说："我军要解放太原，必须先打东山牛驼寨。牛驼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昔日李自成入太原，日寇陷山西，都是首占此地。我们占了牛驼寨，就可打碎东山的防御体系，控制太原全城，到那时，阎锡山就成瓮中之鳖了。"会议决定由第七旅主攻牛驼寨。同时以第三旅攻石柱沟，十二旅攻榆林坪，以保障第七旅两侧的安全。

作战会议后，七纵队司令员彭绍辉、政委孙志远率领全纵队由城南绕到城东北，连夜隐蔽地向东山挺进。十月十五日，第七旅旅长傅传作经反复考虑之后，为完成主攻牛驼寨的作战任务，他向纵队首长提出："这一仗关系着攻取太原的成败，我想在今夜亲自去看一下地形。"彭绍辉开始不同意，就对傅传作说："用不着你去，派侦察科长去就行了。"后经傅传作再三要求，彭绍辉看了看孙政委，用他仅有的一只手拍着傅传作的肩膀，关心地说："要打好仗，首先侦察好地形是最重要的一着。也好，你去吧！但路上要小心罗！要特别注意隐蔽。"

十月十五日晚上，傅传作带着两个侦察参谋，穿着山西老乡的破棉袄，腰里别着三号驳壳枪，背着粪筐向牛驼

寨出发。他们在漆黑的夜里，摸过山沟，攀过山梁，一直在敌人碉堡缝里钻。深夜三点钟，他们到了牛驼寨山梁上，伏在冰凉的山坡上等待黎明。东方发白了。他们边看地形，边数寨上的碉堡。寨上共有十个堡，以三个堡组成前沿阵地，以六个堡组成骨干阵地，用古庙改建的一个堡为核心阵地。这三个阵地互为犄角，步机枪均可直接联系，但相互间除一个大鞍部外，深沟断崖，彼此隔绝，各自又形成一个独立的作战阵地。在每个碉堡的周围，又都筑了很多明、暗的小碉堡，在小碉堡的前面是二三丈的峭壁，再向前是十多层台阶式的劈坡，上面架有五六尺宽的铁丝网，铁丝网附近还埋有地雷。傅传作看清地形后，急忙返回部队，向纵队首长详细报告了敌情。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纵队首长决定迅即攻打牛驼寨。

十月十七日傍晚，傅传作率领全旅指战员，沿着隐蔽的山沟向牛驼寨出发了。夜十二时，部队到达傅传作察看地形的那个山梁上。一点三十分，第七旅二十一团分两路向敌人展开猛攻。突击队员很快把梯子靠在峭壁上，敏捷地往上攀登。由于峭壁太高，还差一人高上不去，机智的战士们搭着人梯，踩着肩膀一个个地上去了。一营攻占五、六、七号碉堡后，二连主动向十号堡发展，战士们以神速的动作攻上了牛驼寨，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天空升起了一颗红色的信号弹，二十一团来电话报告，除四号碉堡外，其他碉堡已被全部占领。

正当欢庆攻占牛驼寨战斗的胜利时，忽然十九团团长仇太兴来电话报告:“二十一团撤离阵地过早，我团只接了五、六、七号碉堡阵地，其他碉堡又被敌人反扑重占。”傅传作知道敌人不会罢休，急切地命令十九团:“接多少，守多少，一定要守住！一定要守住!!”

十月十八日，天刚亮，战士们加紧修筑工事。九点多钟，敌人一阵猛烈的炮轰后，开始向十九团阵地反击。这一天，三营连续击退敌人四次猛攻。天黑后，傅传作和十九团的干部沿着山梁爬上牛驼寨视察阵地，根据白天敌人进攻的方向，决定加强六、七号堡之间的防御，要求在前沿的沟下边多挖一些暗堡，既可避免敌人的炮伤，又可打击反扑的敌人。

十月十九日，敌人的山炮、野炮、榴弹炮连续轰击。这一天，敌人向十九团坚守的阵地打了六千多发炮弹，进行了十五次冲锋，但除扔下一堆堆的尸体外，一寸土地也没有夺去。

十月二十日，太阳刚露头，敌人四架飞机向牛驼寨轮番轰炸扫射。敌人的南北炮群和城内的炮兵基地，又一齐向牛驼寨开炮，连续打了三个多小时以后，敌美式装备的三十师冲上来了。这时守在阵地上的十九团指战员，从虚土里找出枪支，向敌人还击，他们用刺刀把冲上来的上百个敌人刺倒，又用整箱手榴弹拉开其中一枚的弦，用脚猛蹬下去，把沟下正在冲锋的敌人炸死。疯狂的敌三十师被

打垮了！敌以收降日军编成的十总队向牛驼寨的冲击也被打垮了！这一天，敌人连续发动大反扑七次，七旅阵地落炮弹万余发，工事被毁，树无完枝，手榴弹柄铺地一层，但七旅部队的指战员仍顽强地坚守在牛驼寨阵地上。就在这天晚上，纵队彭绍辉司令员见七旅伤亡较重，命令傅传作率部撤下牛驼寨阵地，进行休整，准备再战。

牛驼寨争夺战夜以继日地在进行着。三旅、十二旅、警备二旅都曾登上过牛驼寨，到十一月九日，牛驼寨上的十个堡，除核心阵地四号堡外，又被七纵全部占领。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彭绍辉司令员命令傅传作率第七旅重登牛驼寨，炸毁四号堡。并嘱咐傅传作说："这是解放太原的战术要点，必须坚决夺取！"十一日下午，第七旅二十团和二十一团在炮火掩护下分两路向四号堡展开进攻。由两个团组成的爆破组，在轻重机枪等火力的掩护下，身着单衣，背上四五十斤炸药，利用敌人的火力空隙，向四号堡爬去，先后七次用一百斤、二百斤、五百斤炸药爆破，因四号堡周围水泥太厚，七次都没能炸开。第八次用了七百五十斤炸药，还在炸药里埋了一只雷管，终将牛驼寨中心阵地四号堡给炸开了。随着剧烈的爆炸声，突击队冲进了四号碉堡，接着又冲进了敌人的地下堡，只见里面躺着一片死尸。经过二十余天激烈的反复争夺战之后，牛驼寨所有的大小明暗碉堡全部被攻克了，太原城已完全控制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之下。

在攻打牛驼寨战斗中，上级多次表扬傅传作和他带领的部队，赞扬他们体现了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发扬了我军英勇果敢、坚决顽强、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前仆后继、孤胆作战、连续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以及他们所采取的隐蔽、迅速、突然、出敌不意的战术。

一九四九年，由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四月二十日夜，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二十一日，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为适应大兵团作战，人民解放军的全国部队改称新的番号，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纵队改称军，旅改称师。傅传作先后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三师和第一师师长，相继参加了扶武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 五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春，傅传作调至西南军区第一工作团任副军事代表，奉命到国民党起义部队十六兵团去工作。在此期间，他立场坚定，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深入下层，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在起义部队中获得较高威信，一些起义军官都愿找他谈心。通过大量的团结改造工作，最后顺利的将十六兵团这支起义部队送往华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团结、改造十六兵团过程中，傅传作、

罗洪标还奉命率一一二师、一一一师和七军二十一师两次参加剿匪、平叛斗争，消灭土匪八百余人，为川北人民除去祸害。

同年九月，傅传作调西南军区空军任司令员。当时正值部队进军西藏，迫切要求加强空投力量。增加空投物资数量。为便于执行支援进军西藏的空投任务，并为尔后组编运输部队进行准备，西南军区空军建议，并经空军首长批准，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四川新津机场，以川西航空站为基础，组建高空运输团，同时筹建高空运输训练大队，附设在长春空军航校进行训练。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七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将高空运输团扩编为运输航空兵师。

随着地面进藏部队向前推进，空运部队也需不断把航线向前伸延。傅传作领导西南空军，在康藏高原不断开辟新的航线，连续向前试航空投。那里号称“世界屋脊”，平均海拔高度四千米以上，崇山峻岭，地形复杂，终年积雪，气候恶劣，加之没有准确的航图和气象资料以及必要的通讯导航保障，特别是没有前人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被人们喻为“空中禁区”。为了保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贯彻执行，保证进藏部队由甘孜、昌都等地尽快抵达拉萨，傅传作亲自到新津机场，和运输部队的领导、空勤人员共同研究，选择向前延伸的航线，组织飞行准备工作，总结试航空投的经验，有时召开空勤人员座谈

会，有时把飞行人员接到家里听取汇报，征求意见，向他们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及时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问题。经过上下的共同努力，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试航空投任务。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一日，谢派芬、贾仁甫、胡明涛机组驾驶伊尔—12 飞机成功地降落在海拔三千二百米的甘孜机场上。一九五二年六月九日，李向明、胡明涛机组经过加装油箱和充分准备，又试航空投太昭成功。这是当时开辟的康藏航线中最长的一条，往返飞行九小时三十八分，距拉萨仅两百公里。自一九五〇年四月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运输航空兵师共出动飞机一千三百三十五架次，飞行三千七百六十六小时，空投粮食物资二千四百零九吨，先后开辟了二十五条航线，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队进军西藏的行动。

一九五四年，傅传作任中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广州空军指挥所司令员。一九五五年九月，他调任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在此期间，他领导部队较好地完成了国土防空、飞行训练和专机飞行保障等任务。一九六〇年，中央军委和军委空军又把陆军十五军改建为空降兵的任务交给武汉军区空军。十五军原是陈赓率领下的一支英勇善战、战绩辉煌的部队，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一仗更使他们的战功显赫于世，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十五军在改建为空降兵的过程中，傅传作和武汉军区党委组成了联合工作组，深入该军，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顺利地

完成了改建任务。

一九七三年五月，傅传作调任军委空军政治委员，同时担任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他还先后被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还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六

在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中，傅传作由战士到将军，由普通党员到中央委员，在其成长的历程中，他一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安排。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每次调动工作他都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傅传作常说：革命军人嘛，调到哪里去都是要打仗的！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有两次工作调动使他心情不安：一次是一九五〇年由陆军调到空军时，他既留恋自己熟悉的陆军战斗生活，又担心自己缺乏科学技术知识，怕到空军干不好工作，思想曾一度徘徊于陆军、空军之间，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他除要求领导今后多给些学习的机会外，没有再向组织提出别的要求。另一次是一九七三年，中央调傅传作到军委空军工作，当时他思想上负担很重，认为空军机关庞杂，摊子大，担子重，怕自己能力不适应，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因此而忐忑不安，不敢接此重任，后经中央首长做工作才到职。

傅传作一贯勇敢善战。战争年代，在频繁的转战中，他总是坚决执行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身先士卒，勇敢地冲在前面，即便他担任旅长职务之后，他仍不避艰险，亲自到敌阵地前沿侦察，亲临前线指挥。在战斗中他曾多次负伤，多次遇到险情，但他临危不惧，敢打敢拚，顽强地带领部队完成了战斗任务。

傅传作特别重视部队的建设，他把培养部队具有良好的战斗作风看做是战斗力的保障，要求部队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凡是要求部队作到的，他首先自己做到，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和带动部队。在消灭赵同反共救国军的战斗中，缴获的好表好枪，他一点不留，全部交公，在部队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傅传作一贯尊重领导，关心同志。在他任西南军区空军和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时，除认真贯彻执行军委空军各项指示号令外，对两大军区的首长和所在省委的领导也很尊重，经常主动地去汇报工作，请求指示，并不断教育所属空军部队人员，要摆对位置，搞好关系，虚心向陆军和地方同志学习。因之，他所在的军区空军和大军区、地方党政机关部门的关系都比较正常，既亲切，又融洽。傅传作在同级干部中，工作上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团结共事；生活上互相关心，以诚待人。他在当团长时，团政治处主任罗洪标生病了，他一天去看几次，并要求卫生队尽快给予治好；他在西南空军当司令员时，政委余非有时因

工作忙不能按时去吃饭（当时几个领导同志一块就餐），他就不入座，等余政委到后再一块吃。同志间的关心、爱护，促进了同志间的团结合作，因而他所在的领导班子中，相互关系都较好，很少有闹不团结的现象。傅传作在战斗部队工作时，经常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亲密无间，认真解决同志们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他担任司令员、政委的职务后，还是经常深入下层，逢年过节时到干部家中看望，征求意见，问寒问暖。傅传作平时虽很严肃，但同志们却感到他诚挚、亲切，和他一块工作心情舒畅。

傅传作酷爱学习。他参军前在家没读过一天书，入伍后经常一字一字地学，一句一句地背，逐步提高了阅读能力，他不仅可以读书、看报，还能批改文件，写点小文章。他特别爱读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并结合各个时期不同的作战对象，成功和失利的战例，进行学习和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指挥能力。

傅传作在生活上廉洁朴素，严格要求自己。他经常强调按章办事，从不搞个人特殊，更不以权谋私。跟他三十多年的炊事员老代，想叫自己的孩子当兵，请他给说句话，都被他谢绝。傅传作的小孩有时放学晚，回家赶不上公共汽车，警卫员提出用车去接一下，也被他制止。傅传作入伍后，二十年之久没和家通信，解放后才取得联系，得知家中因遭战争摧残仅剩简陋茅屋一间，七十三岁的父亲还在世，叔父已半残疾，缺乏劳动力，生活很困难。身

为司令员的傅传作，除用自己的薪金补贴家庭生活外，他未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认为，家庭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只能随着国家富强而好转。傅传作平时爱抽四川制的黑烟（类似雪茄），有时北京买不到就托人由四川带。驻成都部队的一位领导，让人给送来了四条黑烟，说是给首长抽的，没要钱。傅传作拒绝接受，他生气地说：不花钱的烟我不抽。有一次傅传作下班回到家中，见别人送来两只烧鸡，以为是找他办私事的，当场就发脾气吵起来：我是买不起烧鸡吃吗?！快拿走，别搞这一套！后来他弄清了，是别人来看他爱人李春景的，并无他求。自己批评错了又向人道歉。凡是知道傅传作不徇私情的，都不向他提出规章以外的个人要求。

傅传作长期患有肝炎，带病坚持工作，有时开会或下部队检查工作痛得难以支持，他就吃几片药强忍着，后来病情严重，转为肝癌，才住进了三〇一医院。不久，病情进一步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十三时十六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傅传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逝世后，组织上对他的评价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傅传作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同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革命的艰苦年代里，他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服从命令坚决，不怕流血牺牲，曾多次负伤，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忠

诚党的事业的高尚品质。在抗日战争时期，傅传作参加齐会、陈庄、忻口战役，百团大战和大青山、冀中、晋西北等多次反“扫荡”战斗。在解放战争时期，傅传作参加了解放临汾、太原和大西南等战役。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斗争策略，带领部队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作战任务，是我军的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全国解放后，傅传作从成立空军起，就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真执行上级指示，团结同志，联系群众，生活上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工作兢兢业业，在组织指挥打破空中禁区、开辟高原航线、粉碎美蒋空中入侵，在加强空降兵及空中运输部队工作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空军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樊　玉　先）

# 编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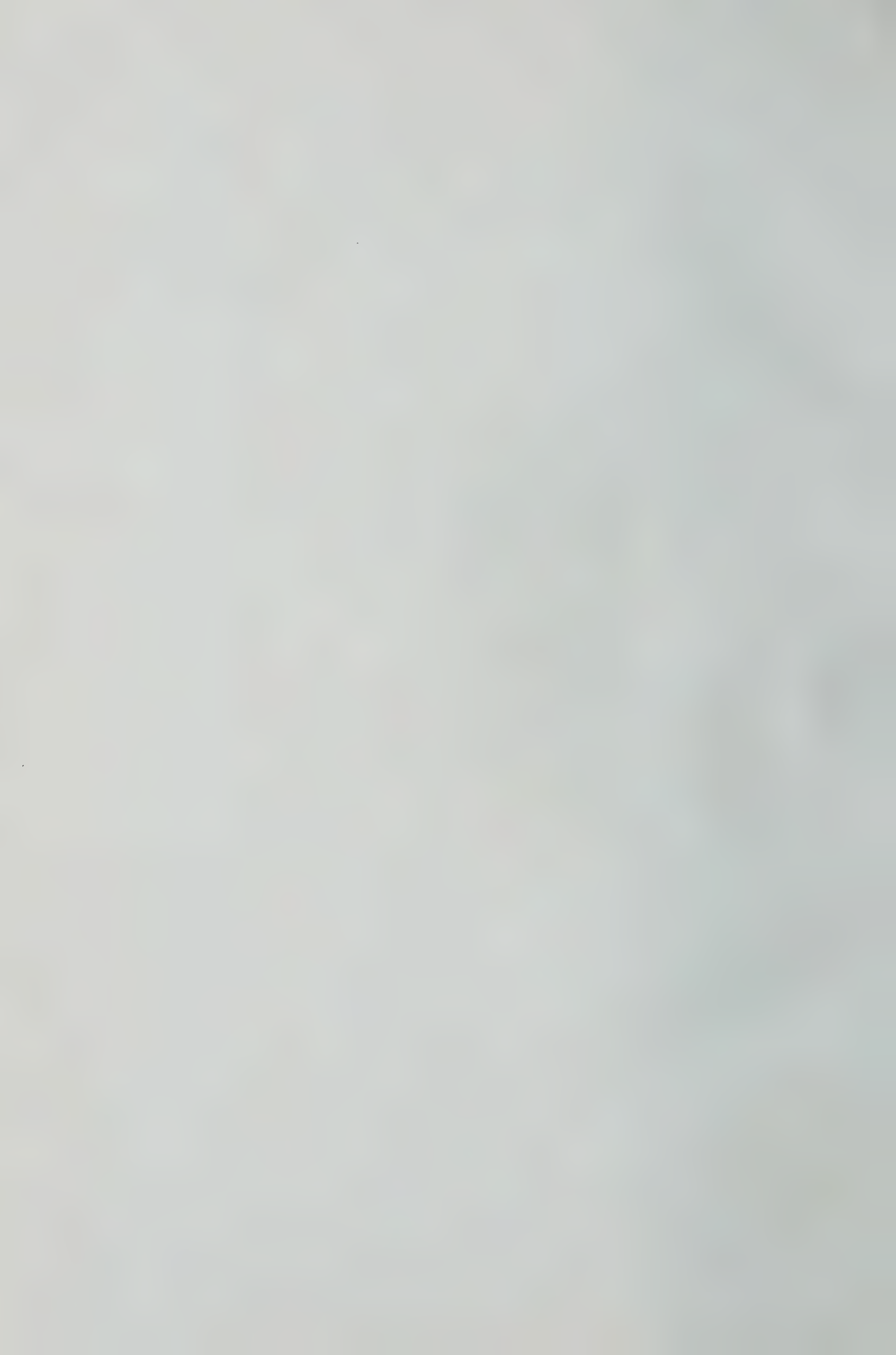
《解放军将领传》，是一部大型系列丛书，着重介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长过程中有影响的高级将领的生平及主要军事活动。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全，加之撰写人文笔各异，尽管我们尽了很大努力，仍难免有错漏和不足之处。考虑到许多读者盼望早日出书的强烈愿望，我们还是将书付印了。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读后提出宝贵意见，共同将这部书修订好。

本书每集人物的排列，均以姓氏笔划为序。











责任编辑：王　伟　　周国栋
封面设计：姜学亮

19

ISBN 7-5065-1437-0 /K·1

定价：7.00元

